自我耗竭式演进

SELF-CONSUMING EVOLUTIONS

政党—国家体制的模型与验证

[匈牙利] 玛利亚·乔纳蒂/著

李陈华　许敏兰/译



科尔奈教授的研究注重社会主义体制的一般问题，研究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性；乔纳蒂教授注重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结构的差异及其后果。乔纳蒂教授的研究因为关注的焦点集中，所以产生的成果没有科尔奈的研究所产生的成果体系那么庞大，但是她的研究可以解释科尔奈的研究所解释不了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计划体制在不同国家会以不同的方式结束，而且这种不同的结束方式对后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由此看来，两位学者的研究实可相互补充。另一方面，十分有趣的是，两位学者的研究方法却是一致的，都是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即通过观察、记录、追踪经济活动的全过程来总结归纳出规律，这种方法在我国鲜为人知，更别说应用了。通过阅读乔纳蒂教授的著作，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这种研究方法。

——赖海榕

自我耗竭式演进

SELF-CONSUMING EVOLUTIONS

政党—国家体制的模型与验证

上架建议：
经济学\政治学\社会科学


ISBN 978-7-80211-56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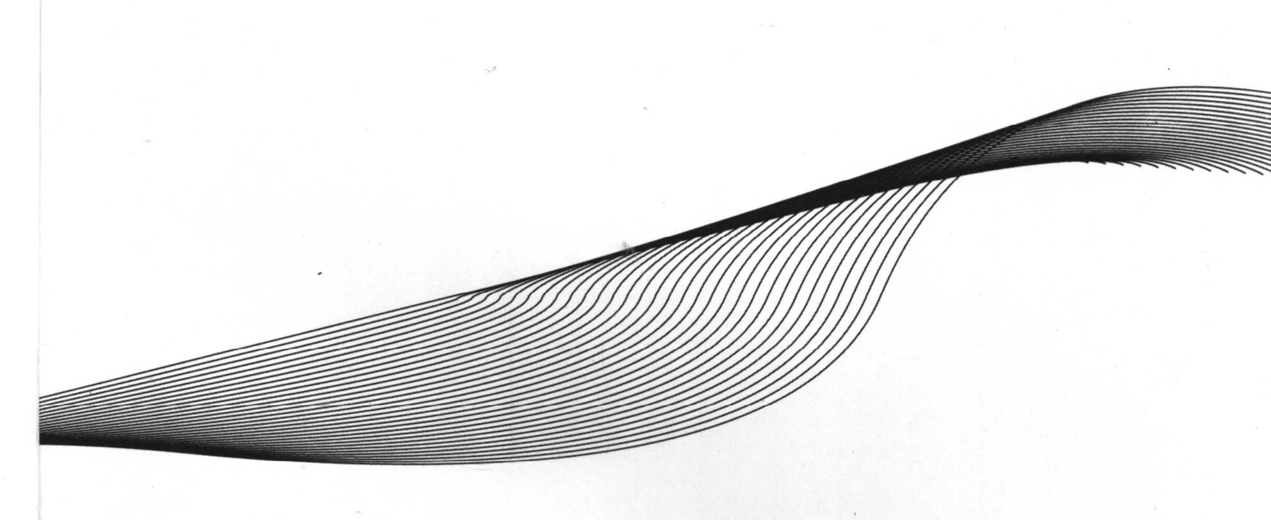
定价：4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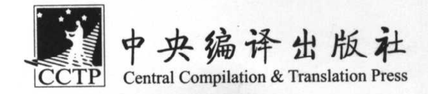
自我耗竭式演进

SELF-CONSUMING EVOLUTIONS

政党—国家体制的模型与验证

[匈牙利] 玛利亚·乔纳蒂/著
李陈华　许敏兰/译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01-2007-5743

Self-Consuming Evolutions: A Model on the Structure, Self-reproduction, Self-de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arty-States Systems tested in Romania, Hungary and China

by Maria Csanád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我耗竭式演进——政党-国家体制的模型与验证/(匈)乔纳蒂著;李陈华,许敏兰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80211-565-1

Ⅰ.自... Ⅱ.①乔... ②李... ③许... Ⅲ.政治制度-对比研究-匈牙利、罗马尼亚、中国 Ⅳ.D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185745号

自我耗竭式演进——政党-国家体制的模型与验证

出 版 人	和 龑
责任编辑	严海波 董 巍
责任印制	尹 琚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66(编辑室)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32 千字
印 张	22.25
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序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苏联东欧的改革遭遇了的巨大挫折：国家解体、制度崩溃、经济衰退。为什么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样致力于改革事业，结果却相去甚远，甚至截然相反呢？这个问题强烈地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理论家、政治家和普通人，人们撰写了许许多多的评述、论文、著作试图解释这种现象，这些智力活动也促进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绝大多数的研究把中国与苏东欧改革绩效的差异归结为改革战略的差异，即中国选择了渐进的、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战略，因而可以在稳定的环境下有效率地推进经济的连续增长，而苏联东欧国家则选择了激进的休克疗法、先政治后经济的改革战略，因而陷入了政治上的混乱和低效率，并使本应连续的经济活动发生断裂和衰退。

这样的观察固然是不错，但是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起作用的呢？为什么中国选择了渐进的、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战略，为什么苏联东欧却选择了激进的、先政治后经济的改革战略呢？决定不同国家选择不同的改革道路的根本因素是什么？是领袖人物的个人特质还是各国不同的权力结构？这些问题具有更大的挑战性，而且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还会导致人们对未来作出不同的预测。如果认为改革战略是领袖人物凭借个人意志选择的结果，那么未来将难以预测，而且为了确保未来的稳定发展，首要任务是选择合适的领袖人选。如果认为基本结构的作用更大，那么我们就能够相对有把握地预见未来的发展，而且我们为确保美好未来的工作重点，首先要放在确保好的结构，其次才是挑选好的领导人选。

到目前为止，多数研究关注领袖人物个人的作用，很少研究关注不同国家的权力结构的差异对改革战略的影响。匈牙利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的

目 录

表　格

图 示

第一部分

政党－国家的结构与动态运行：IPS 模型



1 社会主义体制运行及变迁的理论与比较观点

本章集中解释社会主义体制的组织原则、内部阶层化和变迁的理论。该体制首先产生于1917年的苏联，后来扩散到全世界。根据大卫·莱因（David Lane, 1996）的分类，后来的那些体制，或者是192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通过独立的国内革命而建立（蒙古、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越南、中国、老挝、柬埔寨），或者是1940年代末被苏联征服后而被强加（东欧国家、波罗的海国家等），或者是由于国内政治或军事突变而产生（如，古巴和津巴布韦）。我们将分析这些理论是基于什么来界定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特征，如何解释这种体制的内部动态运行和变迁，以及它们在发展中所表现的偏离（尽管具有共同特征）。

[①]绝大多数文献把极权主义归因于斯大林主义及其影响（例如，参见Curtis et al. 1969; Arendt 1966; Friedrich and Brzezinski 1965; Goldfarb 1989; Kornhauser 1960; Westoby 1989），着重阐述政治和统治精英在社会系统中的至高无上以及全面持久的控制。这些理论集中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不分，在冷战时期被认为是反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Lane 1976）；它们强调现代暴政条件下对个人的压制，公民社会的缺失，以及对人们生活各个方面实行持久控制。

遵循大卫·莱因的分类，一些理论家（Cliff 1964; Callinicos 1991; Harman 1990）把这种体制定义为国家资本主义，在这种体制下，国家仍然

---

① 我将不单独分析这些体制出现之前、期间和之后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后文中，我将分析网络最初形成时的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在建立这些网络的时候并没有太多地考虑本国国情。

履行着独立的政治经济职能，“体现了资本家阶级的统治，扮演着资产阶级的历史角色，国家官员变成了统治‘阶级’”（Lane 1996：140）。动态运行的基础在于工人与国家官员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些理论分析了攫取生产者剩余（所有者能够占有的利润）、进一步促进资源积累、支持统治阶级，但没有确定统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界限，因为这些理论认为统治阶级只能控制而不能拥有生产资料。

另一些理论家（Trotsky 1991；Mandel 1995；Ticktin 1973；1992）强调，苏联式社会是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性社会。该体制的构建基础在于精英阶层与零散化的工人（atomized workforce）之间的关系。他们强调，政治领袖不是工人阶级的真正代表，而是一个退化了的政治集团，向这种政治集团转移剩余是不合理的。一些人认为，该体制将来有可能成长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该体制并没有发展为一种新型生产方式的明显趋势。这一理论当时的支持者们解释道，这些体制解体的原因在于工人阶级有效地抵制了剩余榨取，要不然这种榨取也许会促进增长从而维持精英阶层的统治地位。由于缺乏合法性、不能变成所有者而继承财产权，所以精英阶层被进一步削弱。同时，他们原以为市场改革可以改善经济条件，稳定精英阶层的地位，但结果却相反，市场改革导致该体制消亡，统治精英被工人阶级推翻。

还有一些理论家（例如 Parsons 1971；Bell 1988；Galbraith 1971）基于工业社会的演进，认为现代化和工业化带来了先进的劳动分工，以及社会结构分化，从而导致未分化社会（undifferentiated societies）和国家政治霸权逐渐削弱。根据他们的预测，社会主义体制最终将发展为选举型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和多党制。在这类理论家中，有些人（Inkeles 1968；Goldthorpe 1966；Giddens 1973）强调工业社会的替代模式和框架，即，容许民主形式与极权形式并存。在这些体制中导致不稳定的主要张力源于对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和剥削、一党专制下多元化形式的缺乏、经济与政治的融合（fusion）。这种融合可能导致无法限制的经济需求，以及劳动人民对整个体制的挑战。

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些理论大都通过界定苏联式体制的内部阶层化、惰性或动力来解释了其主要特征。其中绝大多数理论强调了统治阶级（集

团）与从属阶级（集团）：极权主义体制中的国家与个人，国家资本主义中的官员与工人，过渡性生产方式中的精英阶层与零散化的工人。他们用统治集团与从属集团之间的冲突来解释该体制的动态运行。把社会划分为两极——阶级或集团——并把该社会的稳定性或动态性分别对应于两极之间的单向关系或双向关系，* 便无法考察这些集团所在的制度背景，从而无法考察这些集团之间相互交流和联系的基础。再者，这些理论认为该体制崩溃和转型的内部动态运行基础在于某些集团，而这些集团（除了少数例外）实际上在转型中作用不大（比如，转型社会中的工人阶层，工业社会中的反对派精英 [counter elite]）。有些阶级或集团分析忽视了作为一种制度权力结构的政党。一些理论家建议在分析这种体制时把外部因素（国际竞争）作为主要动力（国家资本主义），但是却忽视了该体制的内部动态运行。

以上理论界定了阶级或阶层（strata），以及社会中的主导子域与从属子域（subfield），它们一般都相互融合。主导子域与从属子域——极权主义体制中的国家与社会、国家资本主义中的国家与经济、转型体制中的非法精英阶层与劳动人民、工业社会中的政治与经济——的融合，或者带来体制的稳定，或者结合主导阶层及从属阶层与融合子域之间的张力，造成体制的不稳定。然而，强调一些子域（partial fields）的融合，会导致忽视（与被强调的子域相融合的）另一些子域的影响，错失考察其相互影响的后果的机会。并且，这些理论无法揭示同类体制间的差异性程度及后果，从而无法揭示它们在自我再生产、背离斯大林主义或转型等方面的差异性。另一些理论则拒绝承认该体制相比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或过渡型体制）的特殊性，或者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可以相互替代（工业社会），因而混淆了不同的体制。对于为什么背离或仍然保持斯大林主义体制、为什么发生了不同的解体、崩溃和转型，当时很少有理论家作出了解释。另外，由于这些理论集中于国家层面，所以都无法解释各级聚合体的自我相似性和差异性，以及体制的条件。

大卫·莱因（1996）采纳了一种体制与结构的分析方法，并将其联系

---

* 单向关系指的是一个阶级或集团统治另一个阶级或集团，而后者没有或无力反抗，因此具有稳定性；双向关系则是指一方统治、另一方反抗，因此出现动力或不稳定。——译者

于变迁的突发性。他重点分析了这些体制的变迁而不是它们的主要特征和差异，并强调它们衰落的多方面原因。莱因界定了进行有效果并有效率的自我再生产所需考虑的四类重要制度与相关运行过程：经济、政府体制、价值观和信仰、社会融合体制（Lane 1996：151）。在他看来，有两个重要的原则必须要加以考虑。第一，这些因素相互关联，可以相互稳定，也可以相互破坏。第二，现代社会不是独立自治的，而是处于全球环境中。基于这些因素，莱因分析了导致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社会秩序崩溃的五种明显的、相互关联的张力和累积效应（Lane 1996：152）：（1）经济增长速度的长期下滑，在普通老百姓中出现“期望”差距；（2）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导致政府所不能满足的新型需求模式；（3）变化中的政治结构内潜在反对派精英的兴起，职业和教育上的根本变化，弱化了在位精英阶层的势力；（4）合法性危机：政治精英中的改革运动领导者放弃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造成意识形态上的真空；（5）国内问题导致外交事务中的变化——加入西方阵营而非与西方竞争，而西方国家开出的条件对国内政治经济政策具有强有力的影响。对于理解这些体制的衰弱和崩溃，比较历史观点提供了颇有价值的见解，但是不能清楚地阐明：体制特征的制度背景，导致以上国内因素得以发展的该体制的主要结构及动态运行陷阱，不同政党－国家对相同外部影响作出不同反应的原因，以及一些政党－国家崩溃而另一些政党－国家仍然保持完整的原因。

在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书中，亚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全面分析了体制动态运行问题。虽然科尔奈没有对体制本身加以界定，但他确定了界定古典社会主义社会结构及其经济后果的各种因素中的因果关系主线（Kornai 1992：361）。根据科尔奈的因果关系链，改革可以激进地修正部分主要要素的内部因素，而“根本要素（genetic program）”的主要构成要素却保持稳定（Kornai 1992：565－580）。该因果关系链既涵盖了较深层次的原因，也包括较表面性的原因，其依序如下：（1）马列主义政党不可分割的权力，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影响；（2）国家控制财产权利；（3）官僚科层协调占主导地位（决策和信息的集权化、垂直关系的控制、科层依附性）；（4）行为人有动机和利益去进行计划讨价还价、追求数量、家长式作风、软预算约束，等等；（5）动机和行为将导致强制性增长、长

期短缺等典型而持久的经济现象。

在科尔奈的因果关系链中，除最后环节（block）以外，其他每一环节都影响后面所有的环节。由于其因果关系本质，科尔奈模型虽然认识到了几个方面的相互影响，但没有重视其中的互动性（尽管提到了这一点）（Kornai 1992：569－570）。既然箭头指示是单方向的（另一端是原因起点），那么它不能分析每一环节对前面所有环节的互动式影响，也不能分析从每一环节内部向外指的那些因素的互动性，以及这种互动性对自我再生产所造成的后果。因此，这种分析没有阐明每一环节内部以及在整个体制中发生变化的原因：对古典型体制的背离是如何被激发的，在该模式中为什么会发生危机，以及为什么会出现改革？在没有互动性的情况下，这种因果关系动力为什么以及如何导致了政党－国家的分权化、解体、崩溃和转型？

回顾了针对整个体制的理论之后，让我们回顾那些集中于这些体制中某一子域运行的其他理论。针对政党－国家体制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学术界发展了许多有影响的理论——例如，计划经济的运行与中央计划的缺陷（Kornai 1959），短缺经济学（Kornai 1980），导致社会主义软预算约束的政府与企业之间家长式关系（Kornai 1992），社会主义投资周期（Bauer 1980），社会主义体制下货币、计划和市场的作用（Soós 1986）。这些学者通过制度经济学分析，阐明了那些特定领域里的重要特征，以及国家官僚政治对经济的干预。然而，他们没有分析这些特征在什么程度上可以作为该经济子域的内在特征，整个体制动态运行的影响，以及整个体制与它的融合子域之间的相互作用。

学者们针对运行中体制发起了多维度、多方面、深入的**经验性实地研究**（*empirical field studies*），从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各个角度来分析其政治的、制度的、经济的、发展的特征，[①]这些深入的实地研究显然没有从整体上来阐释体制的结构、运行和变迁。

---

① 例如，他们从政治角度分析了中央和地方政党、地方政府精英和干部（nomenklatura）；从制度角度分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计划过程、官僚程序、管制和讨价还价过程；从经济角度分析了资源配置、局部市场运行（如劳动力市场，次等经济［second economy］）、区域差异、企业行为和投资周期；从发展角度分析了改革、革命、崩溃和转型等问题。

苏联东欧政党－国家的全面崩溃以及崩溃后的发展，使从前的实地研究者和比较分析者（comparative scientists）必须考虑其研究课题与苏联东欧事件之间的差异。研究极权统治向民主政治过渡的专家们开始比较拉美及南欧的政权过渡与这些前政党－国家的转型。这些研究不仅混淆了某一子域的动态运行——政治过渡（transition）——与体制转型（transformation），而且混淆了资本主义体制与社会主义体制，认为二者之间没有本质差异，从而忽视了发生政治转型的不同体制背景的影响。[①]

对于前政党－国家崩溃后不同发展特征的比较和解释，已有了汗牛充栋的文献。[②]在这些文献中逐渐演化出一类特殊的研究，旨在阐释这样的困惑：相比于苏联和东欧，中国和东亚的经济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进程。该比较分析中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一些经济崩溃了，而另一些经济仍然完整；为什么改革在一些政党－国家成功了，而在另一些政党－国家却失败了。[③]

解释多种多样，观点也错综复杂，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几个**共同之处**。对于该领域的一些代表性观点所涉及的热点问题，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改革的理想位置；改革的理想步伐；改革的理想顺序；最有利于施行改革的政体。在这些争论的基础上衍生出了两类完全对立的改革观点：从上面开始的改革与从下面开始的改革，哪一种方式更加有效；渐进式改革与休克疗法，哪一种改革步伐更加理想；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哪一种转型应该在先进行；民主政体与极权政体，哪一种政体更有利于施行改革。

以上所提到的改革特征是替代性地出现的。并且，施行相同或不同改革的不同政党－国家可以归类到相同的组。在政党－国家崩溃之前和之后，有人在国家间作过比较。于是，问题便产生了：某个政党－国家在崩

① Bunce（1995a）对这类文献作了详细的批判性分析。

② 这方面研究的例子包括 B. Dallago, J. E. Stiglitz. H. W. Hoen, M. Lavigne, W. Swaan, J. Kornai, K. Muller, M. Uvalic, T. Boeri, J. Fleming and J. Micklewright, S. Estrin, M. D. Nuti, S. Commender, M. Dutz. N. Stern, G. A. Cornia, V. Popov。

③ 例如：Jin and Haynes 1997; Tong 1997; Lin, J. et al. 1995; Halpern 1989; Montinola et al. 1995; Naughton 1996; McMillan and Naughton 1992; Qian aud Xu 1993; Solnick, 1996; Wu Yu－Shau 1994; Walder 1995; Gelb et at. 1993; McKinnon 1993b; 1993c; 1994; Woo 1994.

溃之前实施的改革与崩溃之后实施的改革，确实具有共同的基础吗？不同政党－国家实施的改革具有共同的基础吗？还有，改革例证是不明确的：在研究政党－国家“理想的”改革和转型路径时，针对以上因素中的每一个因素，我们都可以举出反例。这便导致进一步的问题：这些改革真的可以相互替代吗？改革的类型、顺序和时机只依赖于战略选择吗？如果只依赖于战略选择，那么为什么一些国家每次都选择了“失败的战略（loser alternative）”呢？

本书致力于引入一种比较体制观点，为解答以上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分析框架。接下来我们要详细介绍构建 IPS 模型的简明方法论基础。

2 构建互动式政党－国家（IPS）模型的方法论

2.1 从现实出发与经验证据

IPS 模型尽管抽象，但其构建基础在于经验研究和现实情况。虽然它分析的是权力结构及其再生产，但其基础首先是单个政党－国家和经济决策者的制度化相互关系、动机和行为，其次是这种背景中的制度、组织或集团。

基于对匈牙利政党－国家 1970 年代以来发展的经验研究，我归纳性地发展了 IPS 模型的主要特征。模型的基本思想得益于我二十年经验研究启发。这种经验研究分析了经济政策决策的产生和执行，主要目的在于揭示并用图形去描述政党、国家与经济决策者之间的制度化相互依赖性和利益提升可能性的结构背景。对行为人之间互动性的考察，是这一方法的核心标准。这种互动性是指政党－国家的内部运行方式，以及在特殊结构背景下个人利益和行为与机构利益和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

案例研究是基于原始文件、统计数据和访谈。除了官方资料以外，还有通过各种各样的、通常是特殊的渠道搜集来的资料。在这些资料来源中，有些是地方和中央办的杂志，其列出了地方政党行政领导班子的成员名单，有些是退休官员的尘封档案，有些是没必要保留而被重组的部委各部门（ministry departments）的文件，以及政党的宣传册、各级政党和国家官僚机构的会议备忘录、部委内部的指导方针和规章制度。并且，我们重

新查阅了政党与国家官员之间的通信、中央政党机关参观过的国有企业名单、地方政党组织和部委会议的备忘录、直属部委（line ministries）中有关企业中期计划讨论的记录、在政党和国家档案室翻出来的政党积极分子的会议的备忘录。这些资料来源包括我本人被正式邀请参与会议时所做的会议记录。我还查阅了部委的热线电话薄，部长接待员的日记本，其中记录了来电者的电话、姓名、职位和通话内容。另外，我还从地方政党组织废弃的文件袋中翻出了各级政党组织的干部（Nomenklatura *）名单、纪律程序的备案、政党的地方行政领导班子会议的其他备忘录。

类似于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的社会学方法在调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参与企业经理、部委代表与中央及地区政党官员之间的会议，或参与访谈（不时地被受访者电话打断），也很重要，因为这期间发生的事使我们有可能察觉和发现关系网的运行。它们经常自然地表明讨价还价过程的各种形式、阶段或片段，以及有关人员的行为。我们有可能察觉其中的利害关系，洞悉干预的策略、方法和程度，以及最终的接受情况。从个人决策者层面看，在每一事件的背后，都存在政党、国家与经济之间依附性和利益提升的各种新的制度化网络。

在一些重要经济政策决策之后，1980 年代初三个部委合并为一。最高层制定的机密计划泄露，最终清算行为，其中的阴谋、操纵、玩弄权术、混乱、剧变，以及伴随着新部委产生的文件销毁，等等，都与这一合并过程有关。我们还可以发觉丧失并重建其关系的部委根据制度环境的期望和要求而进行调整的过程。

我在 1980 年代中期积累了类似的体验，当时引入了新的企业管理模式，而我则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了企业委员会选举（enterprise council elections）。我能够观察到，在布达佩斯及其郊区，企业、部委和政党层面的选举之前和之后的策略；也能够密切观察到，布达佩斯第 13 区政党机关 1980 年代末解散前最后几周的情况。代表们在政党会议上宣布废除匈牙利工人党（Hungarian Workers' Party），我出席了那次会议，目睹了产生新型

* Nomenklatura 代指前苏联时代拥有实际管理权的特权阶层，我们把它译为“干部”。——译者

社会主义组织的第一个迹象，增加了实际体验。

在28年的研究生涯中，我在匈牙利和中国与政党和国家官员、企业经理进行了500多次开放式私人访谈。[①] 通过参与观察法，这些访谈进一步补充了原始资料和体验。在封闭式体制中进行开放式访谈，对于逐步了解该体制运行特征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访谈气氛冷淡，我们是很难了解真实情况的。每次连续访谈都使我受益匪浅，能够更加熟练地操作访谈和分析这些文件。[②] 这种体验使我学会了如何对中国的县、地区、乡镇（prefecture）一级的再分配和网络解体进行类似的经验研究。

调查和访谈也要分为两个阶段。在匈牙利政党－国家崩溃之前，调查集中于该体制运行的各个方面，以及政党、国家与企业的个人决策者之间关系的结构及动态运行。[③]

在匈牙利政党－国家崩溃之后，调查集中于转型的动态运行，经济、政治、社会领域里累积的不确定性，以及前政党－国家结构特征的影响。[④] 进一步访谈的目标是，不同子域里新出现的制度背景中行为人的适应性调整。[⑤]

---

① 在中国的访谈是与我的中国同事赖海榕合作完成的。

② 大部分资料和数据是来自新的匈牙利中央档案室（New Hungarian Central Archives）、政党历史档案学会（Institute of Party History Archives）、财政部各部门、财政次长的文件、财政部机密会议文件、金融研究学会的文件、金融计算学会、冶金和机械产业部的档案、工业部的档案、GyOr Sopron县党委会的档案，以及第13区党委会、布达佩斯党委会、Pest县党委会、匈牙利国家银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档案。

③ 案例研究的范围包括：对机械产业中企业补贴及其他优惠的分配；大型企业的行为；三个直属部委的合并，部委行为；各级政党行政的行为；政党与国家行政之间的关系，新型分权化企业管理的引入；企业、部委与政党行政之间的关系，区政党组织的解散，以及从前官员在解散后的命运。

④ 例如，在转型的累积的不确定性条件下，极右派政党的发展；被认为私有化国家财产的国家资产管理公司的行为；私有化作为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环境内涵（environmental connotations）；在转型的累积的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家的环境行为（environmental behavior）和国有资产剥离。

⑤ 在该体制崩溃后与企业经理进行了访谈，以调查切断政党－国家关系的影响，以及他们对新条件的反应和适应。与从前持不同政见者的代表（他们变成了新的政客）进行访谈，了解其地位变化、新获得的权力以及对不确定性的反映。与从前的共产党和共青团的高级官员、政治家也进行了访谈，他们变成新社会主义政党的反对派议会代表。这些问题围绕着从前当权者变成新议会中小社会主义反对派的必要性和驱动力。

最近在中国的访谈集中于各级政党－国家网络（县、地区、乡镇）中再生产约束硬化的影响。基于经验研究，我们已经描述了中国政党－国家在县一级的内部运行。我们的目的是揭示中央经济政策决策对所调查地区经济政策的影响。我们集中于产生这种影响的不同方式，以及在所调查层级激起的不同反应。我们追溯了这些反应对地方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转型所产生的后果。访谈有助于对中国体制中政党－国家网络不同类型解体的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我们追溯了政党－国家网络通过**自我撤离**而绝对收缩：政党和政府从前的职能和制度（由于网络内分配能力下降）随着半自由选举而逐渐变弱，网络随着目标逐渐消失（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私有化和倒闭）而被**打破**（切断）。我们还可以发现，替代性资本和行为的渗入使政党在网络中的影响力**逐渐变弱**，替代性领域的出现使剩余结构**虚空**（*emptying*），这些都促进了僵化结构剥离、残余价值转移到网络外（Csanádi and Lai 2003）。[①]

对匈牙利经济、社会、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例外经验研究，以及在中国的案例研究、访谈和经验调查，是实地了解匈牙利和中国政党－国家体制的结构及动态运行以及这些体制中所发生的解体和演进特征的唯一机会。所有的这些调查使我们能够用图形来描述政党－国家与企业决策者之间相互依赖和提升利益的网络：这种结构的主要要素及其主要关联原则、运行原则，以及它们的特征。我们利用这一机会，经验性地追溯了政党介入国家官僚机构和国有企业运行的方式。政党对国家和国有经济组织进行干预和渗透的制度化手段是什么？这些干预集中于国家和经济的结构和活动的哪些方面？这在各级政党机关的组织中是如何得到反映的？这些层级又是如何相互从属的？访谈可以揭示政党的渗透如何将政党与非政党融合、将政治与经济融合。我们可以追溯，融合如何产生提升利益的机会，如何促使使国家和国有经济组织中行为人采取适应性行为，从而导致网络

① 在准备和分析访谈、文件和统计数据的时候，我们把互动式政党－国家模型作为比较分析工具，用它来解释 1990 年代中期以来政党－国家网络在国家层面上的分权化、集权化、解体和自我撤离的细微迹象。2002 年进行了实地调查，调查范围包括 3 个省、3 个地区和 6 个县，总共与政党和国家官员进行了 72 次访谈。我们的研究得到了福特基金北京办事处和匈牙利国家研究基金的资助。

异常地互动。我们能够体验到这种结构所导致的利益提升方面的不平等程度，以及该网络中各类经济和国家行为人的融合程度。

实地研究揭示了以上因素（干预和制度化地渗入非政党领域的组织、手段、动机，提升利益的能力，以及不同程度融合所导致的不平等）如何把作为政治子域中作为一种政治实体的"政党"，发展为作为一种制度权力结构的"政党"。从访谈中我们发现，这种权力结构中的相互渗透和国家所有制如何与子域及这些子域各个层级融合在一起，使它们的内在特征和层级变得模糊不清。我们有可能追溯，这种结构中如何充满着决策者的资源攫取、分配、吸引和抵制攫取的活动。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循环标准（revolving criteria）：资源攫取、分配，从而动机、适应性行为，以及它们所激发的吸引和再分配资源、增强抵制能力从而促进政党-国家结构特殊凝聚力和再生产的理性。我们还可以继续追溯，不同行为人在不同时间或不同聚合体的渗透层级和不同融合程度，如何发展为不同的权力分配。这使我们有机会去揭示资源吸引、攫取、分配和抵制能力与权力分配的相关程度，以及资源攫取和分配手段如何适应这些差异。我们可以揭示导致再生产期间解体、后来又导致政党-国家结构崩溃和转型的主要结构及动态运行陷阱（Csanádi 1989a；1989b；1990；1991）；还可以对解体的动态运行和政党-国家对新体制演进的影响进行经验分析（Bunce and Csanádi 1993；Csanádi 1997a；1998；Csanádi and Páczi 1996）。

2.2 模型的理论扩展阶段

基于经验发现指出主要构成要素以及关联和运行的主要原则之后，在第二阶段，归纳性地发展出的理论结果被扩展至苏联和东欧政党-国家的结构和运行，以揭示政党-国家模型的一般性特征（Csanádi 1997b）。大量的、杰出的二手资料来源（Bunce 1983；1985；1989a；1989b；1989c；Wolchik 1988；1990；Comisso 1988；Fainsod 1958；Brown 1992；Grossman 1983；Hough 1969；Hough and Fainsod 1979；Pacepa 1989；Shapiro 1970；Tarkowski 1990；Voslenski 1984；Zemtsov 1985；Batt 1991）使这一"扩展分

析（maneuver）”成为可能。这些实地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当时东方集团及其成员国不同层面和时期的情况，主要集中于揭示它们相同的结构和行为特征，同时阐明它们相互间差异的结构性原因。

在第三阶段，追溯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同时，该理论演进为一个动态运行模型，认为政党－国家在结构的各个维度（时间、空间、聚合体和条件）都存在结构和运行方面的一般性特征，并确定它们相互间差异的结构性原因（Csanádi 1997b）。这些理论假说后来得到了关于东方集团、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演进、崩溃和转型的几项比较研究的经验支持（Blagojevic 1999；Bunce 1999；Solnick 1996；Wu，Yu-Shan 1994；Walder，ed. 1995；Batt 1988）。

在第四阶段，经过 6 年的研究之后，该模型被进一步扩展至中国的政党－国家结构和转型。这一扩展受到以下问题的启发：在该模型框架内可以解释中国相对于苏联和东欧的发展吗？中国至今为止是如何避免类似体制崩溃的？中国与东欧相比存在什么样的结构性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是否有助于说明不同发展和转型的原因？通过分析关于中国结构和改革的二手经验资料，与 IPS 模型有关的一些观点可以得到进一步强调，并且还可以进一步发展一些其他的观点。但非常明显的是，对于每一个因素，中国模式都可以在 IPS 模型框架中得到解释。再者，把中国结构纳入分析，使我们有机会在 IPS 模型中界定三**种截然不同的权力分配模式**。借助 IPS 模型一般性的结构及动态运行特征可以证明，这些模式造成了自我再生产以及发展和转型路径的特征。

在当前整体上看，IPS 模型从经验证据中发展而来，可以基于政党－国家要素、关联原则和运行原则的自我相似性，直接对**任何**政党－国家及其形成、运行、变迁、转型的结构及动态运行进行分类（categorization）和全面的经验分析。因此，该模型不仅具有空间上的适应性——任何时期不同的政党－国家——而且还具有时间上的适应性，因为 IPS 模型涵盖了政党－国家自产生到消亡的整个历史时期。IPS 模型的历史边界从一端（要素和关联原则产生之前）推进到另一端（运行原则、关联原则和要素都消失之后）。在这两端之间，IPS 模型的范围是有弹性的：根据不同的权力分配，在政党－国家结构的时间、空间、不同聚合体和不同条件等方面

可以有所变化。

在现阶段，IPS 模型已经被发展得更加细致：一般和具体的特征充分描述了政党 - 国家的结构及动态运行及其对转型的影响。这种详细描述使我们有可能将模型应用于政党 - 国家体制的权力关系和再生产背景，并将**软预算约束概念**重新界定为有选择的（selectively）软再生产约束，* 从而在时间、空间、不同聚合体层级上对这一概念**加以扩展**。对 IPS 模型的精细化和扩展，以及对不同模式的结构及动态运行的描述，使我们有可能确定嵌入权力关系中的改革的位置、原因和功能（function），以及改革对政党 - 国家体制再生产和转型的影响，从而与比较改革文献的分析进行对比。

接下来我们将详细讨论互动式政党 - 国家（IPS）模型的框架。首先，描述构成政党 - 国家结构的主要要素和原则；揭示运行原则，以及基于这种结构特征的动态运行特征。其次，分析政党 - 国家的运行、权力分配的动力及其对再生产行为和过程的约束。再次，根据模式的结构及动态运行特征来区分自我再生产、解体和演进的三种基本模式。基于 IPS 模型来界定几个新的分析术语，并在该模型的结构及动态运行背景中重新解释几个传统的术语。利用已有的分析结果，把 IPS 模型的结论与比较改革文献的观点进行对比。

* 这里“有选择的（selectively）”是指约束的软硬及其程度依赖于政党或政府的选择，比如政府选择某类企业为“重点扶持企业”，那么这类企业相对其他企业来说，面临的约束就更软一些。——译者

3 政党－国家的结构

在这一章，我们将界定政党－国家结构的主要要素、主要关联原则以及使这些要素相互联结的工具。我们将揭示从政党科层、国家科层与经济单位中的政党、国家和经济个体决策者之间相互关系中演化而来的主要结构特征；证明这些要素的关联原则是基于政治理性标准（politically rational criteria）。这些标准引入了依附于或脱离了这些关联的决策者在依附性和利益提升机会方面的累积的结构性不平等，从而导致资源吸引、攫取和再分配能力方面的不平等，以及再分配的政治理性选择标准（politically rational selection criteria）。

3.1 政党－国家的基本构成要素

政党－国家普遍被认为是一种科层结构。在实际中，它们的结构更为复杂。基于经验证据，我们可以在个体决策者层面上把政党－国家描述为几个相互作用的要素的综合。决定政党－国家结构的主要构成要素有五个：（1）政党科层；（2）国家科层；（3）国有经济，以及结构内可供攫取和分配的资源；（4）政党科层与国家科层（包括经济）之间的互联线（interlinking threads）；（5）可用于更深地融入该结构的结构性反馈（structural feedbacks）。为什么选择这些要素而不是其他要素？原因是：理论假定以及经验调查中出现的问题、解答和相互作用，证明这些要素及其融合最应该得到强调。尽管这些要素在实际中是不可分开的，但是为了清楚表

达，我们将根据它们构建逻辑依序地加以分析。

关键要素：

S 国家（非政党）科层

P 政党科层

A_n 结构第 n 级上的决策者（行为人）

D_1 科层内依附性的方向

I_1 科层内提升利益的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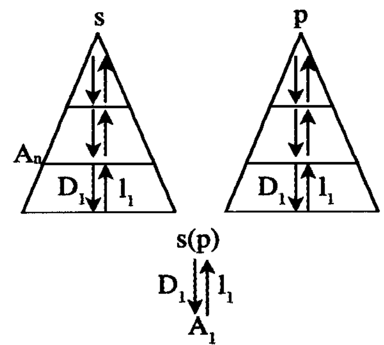



图 1

第一层次：正式科层，结构中各级决策者（行为人，A_n）沿着科层内依附线（D_1）提升利益的可能路径

根据表示结构第一层次的示意图（图 1），我们可以对这些构成要素进行分类，指出政党－国家三个首要的基本构成要素。图中三角形表示政党和国家都具有科层形式：

要素（1） 政党科层（P），包括科层依附线（D_1）①，以及通过这些线直接提升利益（I_1）的可能性

要素（2） 国家科层（S），包括科层依附线（D_1），以及通过这些线直接提升利益（I_1）的可能性

要素（3） 国家垄断所有权（这里是指受国家科层约束的经济单位），以及由于国家垄断经济而带来的可供攫取和分配的资源

以国家层面为例，从组织机构角度看，国家科层包括最高层的议会

① （D_1）符号“D”代表依附线：箭头从这些线的把持者指向依附者。符号“I”代表利益提升，箭头指向依附线的把持者。这些依附线和利益提升总是存在，只不过它们的密度、所达到的深度、依附（严格性）的程度、利益提升可能性和能力大小有所不同。

（或国会），往下是国务院（State council）、部委、地区政府，最底层是国有或其他形式的企业和/或它们的下级单位，直接从属于国家机关。这根线可以沿着企业和行业内的下属经济单位继续向下延伸。从个体决策者角度看，国家科层从最高国家职位开始，向下一直延伸到国家机关中最小部门和国有经济单位中的个人。①

政党科层包括它的最高决策会议（中央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如政治局），后者是中央政党机关实际服从的机构。从组织机构角度看，政党科层还包括各级政党机关（从党中央到非政党机构中所成立的党小组［组成党小组至少需要3个党员］），以及理论上被选举、实际上服从上级安排（民主集中制）的各级决策（执行）机构。② 从个体决策者角度看，该结构开始于党的第一书记（或类似职位），向下一直延伸到形成那些党小组中的党员。③

在组织机构上，两类科层都具有清晰的基层和顶层。同级决策者对于他们的下级具有同等的权力，对于他们的上级具有同等的依附性。依附性也是清晰的和单向性的（uni-linear），符合层级的垂直性。只有通过垂直依附线才可以提升利益，而不可能绕过直接上级来提升利益。④

但是，我们在实际中察觉到的决策过程路线却不像图1所描述的那样，而是：前述两个科层要素（包括国家科层中的国有企业和通过它们来实行的资源攫取和分配）紧密地相互关联，两个科层的决策者也密切地相互作用。通过这种相互作用的制度化手段，便产生了一个融合的结构，从而得

① 后者不依赖于机构的不同级别，以及属于这些机构的个人的不同职位。

② 这里我们将忽略国家和政党科层中实际从属关系（例如，不同层级的团体［bodies］之间，一级机关［apparatus］与另一级团体之间，以及［或者］不同层级的团体之间）的多样性；也将忽略每一团体的自由决断权（例如，该团体决定其下一级或下两级机关的命运和活动的能力）的多样性。

③ 这里也没有考虑党小组的机构级别（取决于它在机构中所处的科层级别）。

④ “在高度集权化的情况下，科层等级原则意味着每一个问题、每一项任务、每一次冲突、事实上每一种需要决策的社会现象，都融入了一个科层等级活动链。沿着等级链向上，需要经过明确的多个阶段，直到作出决策。沿着等级链向下，这一决策经过同样的垂直机构链（在前一种情况下是用于向上传递信息）来贯彻执行，直到出现问题的最底层”（Bthari 1985：115。作者的翻译）。

到了政党－国家结构的第二层次。这些手段就是政党－国家结构的第四个构成要素。

要素（4）互联线（D_2）

在实际中，政党与国家科层——包括国有企业——决策者之间存在密切互动，并且，这种互动通过政党机关（包括非政党机构中的个体决策者）的权力工具而得以制度化。我们把政党与国家机关之间的这种制度化关系称作相互关联的依附线（D_2）。[①] 互联线起始于政党科层，穿过非政党机构的边界，延伸到个体决策者（图2）。

关键要素：

S　国家（非政党）科层

P　政党科层

A_n　结构第 n 级决策者（行为人）

D_1　科层内依附性的方向

D_2　科层间依附性的方向

I_1　科层内提升利益的路径

I_2　科层间提升利益的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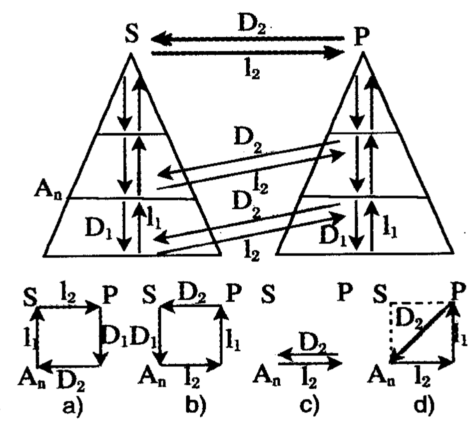


图2

第二层次：结构中各级决策者（行为人，A_n）沿着科层内及科层间的线（D_1 和 D_2）提升利益的可能路径

有4条重要的互联线可供政党来实现其意图。（1）非政党机构中各级政党组织的党员，都要遵守党纪，以实现党的期望。[②]（2）在指挥体

① 对于该社会的各个子域和层级（例如，文化、政治、教育、医疗保健、民间社团、社会运动、群众运动、行政人员、法律和司法判决、代理人和公安机关等）来说，这种直接关联也是现实存在的。为简化起见，我把垄断财产关系中的这些子域都“浓缩（condensed）”在非政党－国家科层的概念中。

② 政党科层内的党员也同样要遵守这些纪律，但是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位于”非政党机构中、利用各自权力工具而相互联结的那些行为人。

制（instructor system）中，中央或地方政党机关指挥并控制由非政党机构内党员所组成的政党组织，这些政党组织又指挥并控制各自所在机构中党员和活动的纪律。（3）主体负责制（subject-matter responsibility）涉及特定层级政党机关通过非政党组织及其代表的活动来跟踪政党优先权的履行情况。（4）干部体制（干部负责制）通过个人所担任职位和具体条件而落实到非政党机构中的个人。**由于政党既垄断了政治子域，也垄断了非政治子域，所以政党职能就必然要跳出其科层框架、维护其权力执行。**

这些工具可用于转发或传达干预和控制的标准。互联线穿过非政党（国家）科层及其所垄断的经济（和其他）机构的边界，通过党纪（党员资格）直接落实到个体决策过程，通过非政党机构中的组织结构（指挥体制）、活动结构（主体负责制）和职位结构（干部体制）间接落实到个体决策过程。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互联线，使个体决策者从几个方向接受指示：作为某个职位的把持者，作为某个组织的成员，作为某项活动的执行者，作为党员。①

还有其他几种穿透非政党机构边界的政党工具，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国家，它们的类型和重要性各不相同。② 不管互联线在类型、强度和密度上会如何不相同，都不能改变它们存在的事实，也不能改变以下事实：把互联线延伸到特定战略性职位、组织、活动和个人的原因**对政党机关来说是政治理性的**。通过转型了的非政党机构的活动，这些权力工具可用于扩展政党机关的执行权力，同时也可用于宣传政治优先性、命令、期望，并控制其施行。③ 于是，国家和经济根据政党的意图被制度化、结构化。

---

① Csanádi（1997b）详细讨论了这些权力工具的职能、起始位置和扩张。

② 例如在中国，所谓的政党核心集团正在加强政党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这些政党核心集团包括机构中的行政领导和政治领导，并在这些组织中的党委会之外形成一个操作性的决策团队。政党核心集团受到上级政党权力机关的组织部的监督（Burns 1994）。

③ 因此，任何一个非政党领域中实行重组行为，总是反映于政党机关中的组织结构和职责分配，因为这样便可以相应地延伸并与互联线相重叠。

图2描述了政党与国家科层间的互联线，以及互联线对非政党科层的渗透如何导致科层规则被打破。

政党及其各级机关通过综合使用这些工具、把互联线延伸到个体，能够从尽可能多的方向渗入整个非政党决策结构、包围（embrace）决策者。同时，所有依附于这些依附线的人，都可以把这些依附线作为直接渠道（D_2 I_2）或间接（D_1 I_1，I_2）渠道，为政党科层及其内部的依附线把持者提升利益。从互联线起点出发，沿着所有那些方向（和层级）都可以提升利益提升（参见图2关于行为人n的说明）。

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融合了的结构失去了一些科层等级规则：能够识别的只有最高层和最底层。政党代表大会仍然处于最高层。[①] 剩下的与互联线和科层线无关的那些行为人处于最底层。依附性保持原有的单向特征，但是由于科层线和互联线（D_1，D_2）使它们变成多线的（multi-threaded）。

行为人的依附性以及行为人沿着依附线提升利益的可能性，都是多线的（I_1，I_2）。互联线和科层线可以环绕科层的各个层级［参见图2中的a）、b）、c）、d）变型］。[②] 但是，并不是所有行为人都具有这种优势。再者，互联线可能起始于科层的不同层级，从而在控制和影响的政治理性动机的基础上导致依附性和利益提升可能性上的**结构性不平等**。所以科层的层级变得模糊不清，因为相同级别的正式职位并不意味着相同的讨价还价能力，正式层级上的行为人对下级的权力是不平等的，对上级的依附性也是不平等的。互联线制度化了依附性和提升利益机会上的政治理性关心方

---

① 实际上，处于关键职位的是议会中党员代表团所服从的政治局、党中央书记和部门领导。

② 例如，a）某个经理可以要求部门把他的问题提交给负责该部门的更高级别的政党组织，让更高级别的政党组织命令地方党委利用政治压力解决企业人力资源短缺问题。b）某个企业经理可以向确定其干部职责或负责控制该国有企业活动的政党组织寻求帮助（主体负责制），调解他们与负责分支部委的、企业所从属的、更高级别的政党权力机关之间的问题。这样做的目的是，比如说，帮助企业绕过可改变的进口配额。c）不通过监管部委，地方政党可以在其权限内通过与其他企业进行协调来解决该企业的投入品短缺问题。d）地方政党向上级政党机关反映情况，希望后者能帮助解决其下属企业的问题，导致上级政党机关中的人与该企业直接接触。

面的结构性不平等。*

在实际中，行为人可以同时通过不同路径来提升利益。例如，让我们考虑匈牙利政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1964 年的一项决议，它表明了 a）、c）和 d）三种变型的组合。该决议指定了 Györ-Sopron 县党委在履行出口要求和解决有关问题方面的经济政策任务，并进一步提名了政党和国家层级上的负责人，以这种方式来给予提升利益的机会：

该县党委要更加努力地实行经济和政治监管。[……] 在下个月底以前，县党委必须总结出妨碍生产和满足出口要求的所有具体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超出了地方经济领导的权力，因此要提交给中央委员会的工业和国民经济部门。中央委员会的工业和国民经济部门将保证各个部长都采取措施，排除所列出的障碍，这必须列入 1965 计划框架内。②

由于政党、国家和经济通过联结个人的互联线而直接关联，所以，所有政治决策对政治机关都具有直接的经济和行政影响，所有经济和行政决策对政治机关都具有直接影响。直接影响导致政治对经济决策具有高度敏感性，③ 经济对政治决策也具有高度敏感性。

这种直接的私人关系导致被这些依附线联结起来的个人变得**零散化**（*atomized*），④ 他们制度化的利益提升可能性和利益提升驱动力也变得零散

---

* 这里的意思是：如果政党根据某种意图（政治理性标准），对某一行为人更加"关心"，那么就会导致该行为人比其他行为人更加依赖于政党，也更加有可能提升利益，从而造成结构性不平等。互联线则使这种不平等制度化了。——译者

② Resolution directed at the Györ-Sopron county PC according to the December 5, 1963 CC resolution on the regional and enterprise party organizations ' work of organizing the economy to promote the fulfillment of export plans. HSWP Institute of Party History archives, September 23, 1964. Secretariat resolution (288. 20 /47 storage unit [s. u.] in the archives).

③ 经济学家从数学角度把敏感性定义为一个变量的微量变化导致其他因素发生变化的程度。我们这里所说的敏感性与此定义类似却又不完全相同，因为政治敏感性不能用具体数字加以度量，并且其中还涉及到权力关系。这里的敏感性是以下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是垄断政治权力；二是对依附线把持者和被包围者造成影响及反应的直接关联。这种密切的相互作用不仅仅在经济子域中存在，而且在该体制的文化、教育、司法、社交等其他子域也同样存在。

④ 联结于任一互联线的个人绝不知道是谁把持着他/她的平级同伴的互联线，也不知道是谁把持着他的互联线或他/她的正式下级同伴的互联线。

化。行为人的零散化，以及他们零散地提升利益的主要驱动力，在制度上已经预先确定了。该结构想要排除，但实际上没有排除决策者或实体之间发展横向关系。然而，横向关系不是制度化的，而是非正式地发展，**针对性地和暂时地**（*ad hoc and temporary*）弥补网络内的短缺和硬自我再生产约束。[①] 横向关系可以在结构内的实体之间得以发展，也可以在部分或完全处于结构外的实体之间得以发展。横向关系可以在政党－国家结构形成期间幸存（例如，妇联、工会、职业协会），在政党－国家结构解体期间发展或制度化（例如，新的协会和党派）。

我们可以看出，互联线是如何通过职位、组织和活动结构以及直接通过党员资格渗入非政党机构，把个人联结起来。如果我们经验性地追溯决策过程，找出政党－国家结构的第五个构成要素，那么，这一结构将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要素（5）结构性反馈（I_3）

科层决策过程暗含着以下逻辑：决策由上级制定，并沿着科层向下逐级传递；决策对目标具有影响，然后目标再作出反应，同时信息被反馈到初始决策者（或决策者们）。基于经验证据，我们可以总结出政党－国家结构的第五个要素：政党－国家结构中不同节点上决策过程的**制度化捷径**（*institutionalized shortcut*）。把这些捷径纳入进来，便形成了政党－国家结构的第三层次（图3）。沿着依附线在政党和国家科层内以及在国家与政党科层之间产生的捷径，可以作为决策过程的渠道。这些捷径在错综复杂的网络内形成了决策者之间的直接联结，要不然这些决策者就会由于处在不同科层、或同类科层的不同层级而相互隔离。[②]

① 例如，私人建房缺乏资金时成立互助集团，企业间相互拖欠：签单却不付款，从而为继续经营获得所需的物质投入。

② 例如，如果某个企业经理应邀参加有关出口战略的部委委员讨论会，并且财政部、计划局、物价局的代表以及中央委员会的部门负责人也出席了这样的会议，那么便创造了科层内捷径。如果某个省或县党委被选入中央委员会，某个县党委被选入省党委，也会创造出这种捷径。如果某个企业经理、部长或地方行政长官升为中央委员会委员，那么便产生了跨科层捷径。如果该企业经理应邀参加省党委会议，并且会议讨论了该企业的经济战略，那么也会形成跨科层捷径。

关键要素：

S　国家（非政党）科层

P　政党科层

A_n　结构第 n 级决策者（行为人）

D_1　科层内依附性的方向

D_2　科层间依附性的方向

I_1　科层内提升利益的路径

I_2　科层间提升利益的路径

I_3　反馈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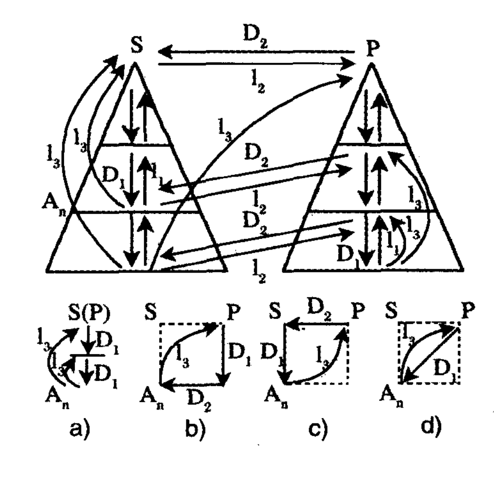


图 3

第三层次：基础网络中的结构反馈（I_1，I_2 和 I_3），以及结构中各级决策者（行为人，A_n）通过科层内和科层间反馈（利用 D_1 和 D_2）来提升利益的可能路径

通过 I_3 线，行为人能够在自己所在的科层中“跳过”任何数量的层级，到达特定层级的任何决策者，事实上也能到达政党科层任何层级上的任何决策者。借助于捷径，决策者能够在自己的科层内和跨越政党科层，直接影响那些与他们有关的决策。① 借助于 I_3 线，可以在决策过程中形成一个制度化的反馈环（feedback loop）：一边是 I_3 线，另一边是 D_1 线或 D_2 线或 D_1D_2 线的组合（参见图 3 中的变型）。因此，我们称这些捷径为**结构性反馈**。

所以，对于反馈关系的出现存在着有选择的政治标准。当科层内或科层间依附线所俘获的决策者能够通过依附线产生高水平政治敏感性时，这些个体反馈关联便会出现。因此，在维持政党领导地位、国家安全、经济或政治稳定以及增长的过程中，其主动性或被动性能够——通过互联线

① 如果考察其厂长由中央委员会下设的“大型企业工作委员会”任免的 179 家企业，或者考察其厂长由中央委员会直接任免的 44 家企业集团，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国跨科层反馈的情况，以及国家计划中 49 个独立项目的科层内反馈，等等（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Csanádi，2001）。

——挑起紧张关系的那些行为人可以获得反馈。[①] 这些人是关键的行为人，他们轻而易举就可以在国内供给、向西方出口、满足所谓的社会主义急需（contingencies 国家层面的商业协议）、延迟重大投资等方面制造瓶颈。如果决策对关键行为人不利，那么他们就能够让别人相信这些决策可能会带来不满，并造成相应的政治后果。但是，这些关键行为人也可以帮着缓和这些威胁、实现重要目标。这些目标代表了政党－国家体制基本的政治优先性。正是对这些政治关系的影响，决定了某个决策者或组织的政治讨价还价（抵制和吸引资源）能力。

于是，被选择的决策者在增加其个人利益的时候，**深深地融入**了决策过程。通过结构反馈，他们遇到了在正式职位上绝不会遇到的决策者。通过这些更紧密的私人关系，从反馈中受益的那些行为人能够传送和接收直接信息，承诺以物质或非物质的形式给予回报。他们能够达成交易，实行抵制，或针对不可避免的决策做好准备，寻找联盟，探测潜在对手，获得资源索取方面的支持，等等。[②] 例如：

最突出的问题在于经济任务完成情况。在解决大量的内部问题时，我们从政党那里得到相当多的帮助。例如，在延期偿还债务问题上，区党委和布达佩斯党委在各种各样的讨论会上给予了许多帮助。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讨论会是布达佩斯［首都］党委的代理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这次会议，我们能够使自己受到关注。部委也有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这要感谢区党委有意提名让我们汇报工作，使我们可以提出企业存在的问题。匈牙利国家银行（HNB）的一个副经理也是党委委员。正是这次

① 例如，如果企业的产品被纳入政党优先权的范围，如果企业规模很大和/或雇用了大量的劳动力，如果企业的产品是向西方出口或满足苏联需要等，如果企业工人在投入、投资或产出等方面的不满或问题可能危及政治稳定，那么，政治敏感性就会很高。

② 在 1980 年代初，匈牙利的三个分支部委合并成一个新部委（工业部），当时工业部的一位副部长让我查看他秘书的笔记，其中记录了所有的日常来电。这些记录显示，在工业部成立后的第一个月就有 61 个电话来自 27 个企业经理，一些经理打了多次电话。在这 27 个企业经理中，有 24 个企业经理具有跨科层反馈，因为他们是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的县或区执行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会议上所得出的结果，打破了我们与 HNB 之间谈判的僵局。在其他措施中，这也是必要的，因为近来企业里的政治氛围由于企业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变得非常糟糕，导致员工跳槽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企业党委书记 1985）。①

尽管互联线尽可能多地包围决策者的决策，但是只有很少的行为人可以从反馈体制中受益。因此，获得反馈的行为人的数量是有限的。② 然而，对于那些已经有能力造成政治敏感性的个体行为人来说，在这种直接关联体制内积累反馈的能力实际上是无限的。

于是，结构中讨价还价能力出现了**新的不平等**：有些人获得了反馈，有些人只拥有 D_1 和 D_2 线，有些人只拥有 D_1 线，有些人根本没有制度关系。结构性反馈代表了讨价还价能力，这不仅是针对直接符合这些标准的人而言的，对通过 D_1 或 D_2 线向这些人负责的人以及从属于这些人的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③

因此，政党－国家最初就承载着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充满着依附性、利益关系和结构上固有的不平等（built-in inequalities），这种复杂形式和不平等程度依赖于决策者通过依附线所能挑起的政治敏感性程度。由于所有这些线在结构上非常复杂，并且经由它们传递的程序缺乏透明度，所

① 会见材料来自 Erzsébet Szalai，他同意我使用这一材料。

② 1970 年代匈牙利中央委员会的情况是一个反馈稀缺性例子：如果我们忽略在国家结构内没有竞争性伙伴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具有同样的机会被选择（例如，内务部、国防部、部委委员会主席、中央委员会机关部门的领导、中央委员会秘书，等等），那么，有 150－170 个职位被填满，大约 50－70 个职位空闲。因此，如果我们考虑 19 个县、22 个区、近 700 家属于部委和地方委员会的企业、661 家合作性工业企业、包括农业合作社在内的 2830 家非工业企业（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BS］ 1980）去竞争获得跨科层反馈，那么实际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另外还有其他的国家机关和社会机构（大学、高等教育学院、研究机构、委员会、社会团体等），从原则上说，他们也都符合那 50－70 个职位的条件（Csanadi 1984：50）。

中国政治局中也许存在类似的有选择性：在 32 个省、直辖市中，1980 年代末只有 4 个，1990 年代初只有 2 个，进入了这一高层级党委会（Huang，1996：10）。

③ 对于匈牙利的详细情况，参见 Csanádi 1997b；Kovacs 1980；Lamberger 1988；Szalai 1981，1989；Teller 1984，1987。

以，我们可以称政党－国家结构的这些线为**封闭式渠道**（关于中国的情况，参见 Burns 1987，1994；Harmin 1992）。这些封闭式渠道使得每一次决策讨论会都成为制度化的、非正式的利益调解的借口，即使在专属于国家机关权限范围内的领域中也是如此。

对于那些已经以个人身份卷入了互联线的人来说，纯粹的规模和结构的透明度缺乏，甚至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结构零散化**（*structural atomization*）：当他们相互讨价还价的时候，每个行为人背后都存在未知的、不可识别的力量。我们把这些可变的、不确定的势力称为**隐藏力量**（*phantom force*）。在任何特定的决策情形中，隐藏力量的内容依赖于许多因素：个体决策者的、在任何时刻都处于活动状态的反馈环；当前的联盟者数量；联盟者反馈关系的密度和性质，以及反馈关系在特定时刻的累积水平；结构本身的神秘性质。隐藏力量是**无法度量的**，因此，对于某个行为人或机构来说，其隐藏力量大小其实是主观性的，取决于周围其他人或机构愿意——或被迫——相信它有多么强大。

特定行为人融入结构的程度以及所积累反馈的水平，会增加他们的隐藏力量。这也是因为：既然反馈可以从多方面产生，那么这些行为人的利益也可以从多方面去实现。这不仅让人觉得其符合群众利益，而且还让人误以为这是一种集体行动。[①] 建立在利用私人关系基础上的优势，不是由个人机灵来保证的，而是由结构性质来保证的。因此，体制弊端的可能性

---

① 这一结论与政党－国家中集体行动作为“正规”运行的因素的思想和可能性（Olson 1971；Murrel and Olson 1991）在理论上是相反的，后者认为网络的条件是稳定的。这种结构上固有的不平等、隐藏渠道、隐藏力量的性质、个人关联以及通过这种关联而存在的零散化、资源分配和攫取上的垄断，都表明了个体性地吸引资源、抵制干预的利益和结构性能力。除非提供这种可能性，否则集体行动就不会遵循这种运行方式。瞄准同一目标的个体行动并不必然意味着企业及其上级主管的阴谋抵制。Szalai（1989）分析了 1980 年代后期之后匈牙利大型企业的单个集体行动，该时期是匈牙利政党－国家结构解体加速的时期。在这些条件之下，互联线还不够稳固，不能被有效利用或被打破，结果，横向联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

但是理论上并不能排除特殊的集体行为——可能产生默契合作的会议，各种类型的罢工、游行、革命，只不过结构特征导致这些集体行动不成为正规机制的组成部分。横向关联与结构解体是同时进行的。

不是源于**打破规则**，而是源于**利用规则**。

由于存在封闭式渠道和隐藏力量，导致决策者在日常决策过程中，不能准确判断自己的实力或联盟者的实力，事实上也不能判断对手的真实实力。因此，隐藏力量导致每个行为人相对于所有其他行为人的**讨价还价地位**和讨价还价能力**总是不确定的**。

尽管整个体制内在提升利益的能力上是不平等的，但是这种结构不确定性要求每一个体决策者都要时刻保持警惕性、积极性和适应性。即使其职位比较稳定，每个行为人仍然要持续努力地保住这种职位。所以，他们被迫去认真维护现有关联，努力创造新的关联。

3.2　依附性与利益关系的最终网络

这五个要素综合起来便形成了政党－国家的权力结构（图 4）。它们确定了渠道，从而确定了依附性和提升利益的网络。换句话说：它们形成了政党、国家和经济决策之间个体决策者层面上的相互依赖关系网。这一网络也显示了在结构上固有的不平等和依附性，从而体现了该结构固有的政治理性选择标准。这些标准确定了资源讨价还价地位差异的**政治理性**背景，这里——正式地说是同等级别的——决策者有的被卷入，有的被忽视。

最终网络表明该结构微妙的阶层化、打破科层式结构特征的不同方式、固有的微妙的不平等、被搅乱的科层（图 4）。这种结构的主要特征表明了**国家与政党之间、国家与经济之间、政治与经济之间、权力与社会之间模糊边界**的制度背景（Csanádi 1997b）。这种政党－国家结构挑战了把政党－国家界定为**统一**（*monolithic*）实体的观点，也挑战了这样的分析：承认政党与国家结构的融合，但认为政党－国家结构是**科层性的**，从而把融合的政党和国家结构界定为国家和国家官僚机构，并以同样的方式把政党－国家结构与社会隔离开。基于这一隔离可以得出结论：两极关系存在交替换位，如，强国家－弱社会（strong states-weak societies）或强社会－弱国家（Bunce 1999）。与 Bunce 模型相反，我们的模

型认为，由于模糊的结构,[①] 导致政党与国家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政治与经济之间、统治精英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边界和势力（weights）是难以确定的。

关键要素：

S　国家（非政党）科层

P　政党科层

A_n　结构第 n 级决策者（行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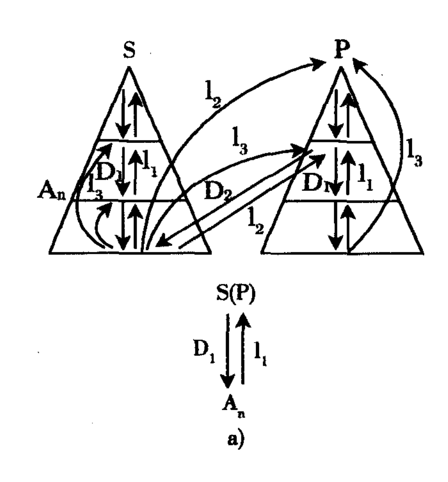
D_1　科层内依附性的方向

D_2　科层间依附性的方向

I_1　科层内提升利益的路径

I_2　科层间提升利益的路径

I_3　反馈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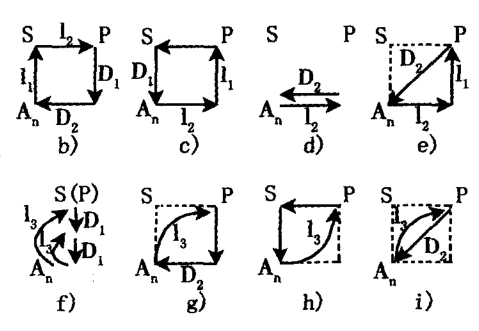


图 4

政党－国家体制的权力结构，以及各级决策者（行为人，A_n）提升利益的可能路径：从 a）到 i）

① 模糊的原因在于：国家所有权，互联线，到达和来自任何一级科层的跨科层反馈和科层内反馈及其累积，结构中各个层级之间在攫取或分配资源上的不同能力，形成网络的无组织行为人之间缺乏横向制度联结和关系。

3.3　关联的原则

尽管这种结构的边界模糊且非常复杂，但如图 4 所示，构建该结构的基础在于上述要素的两个简单的关联原则，其源于政党的**垄断权力地位**：

（1）相互关联的依附线 D_2，作为党的权力工具，**只能起始于政党科层的不同层级**。[①]

（2）政党与国家科层之间出现的反馈（跨科层反馈）**只能起始于非政党机构**。这是因为跨科层反馈环是这样形成的：非政党科层的行为人延伸到政党科层的不同层级（I_3），然后利用相互关联的依附线（D_2）最终结束于相同的非政党机构（I_3 D_2）。

描述政党－国家结构的主要要素和关联原则之后，我们在表 1 中总结了政党－国家的主要层次（参见图 1～图 4）。这使我们可以阐明以下方面的基本的结构性差异：某一科层的典型特征；显示政党与国家科层相融合的网络（涉及与国家官僚机构相联结的经济单位）；联结子域的政党－国家的主要结构特征。表 1 显示，政党如何通过包含和紧密渗透其他子域而从一个**政治实体**发展为一种政治垄断的**制度化权力结构**。

表 1　政党－国家结构互动性的要素和层次

正式科层 （要素：D_1 和国家垄断经济——垄断化的资源攫取和分配）	具有互联线的网络 （要素：D_1、D_2，以及直接通过 D_2 和联结国家科层中 D_1 而间接通过 D_2 的政治垄断性经济）	政党－国家结构 （要素：D_1、D_2、I_3，以及通过 D_1、D_2 的政治垄断经济）
在政党内部和国家科层内部，顶点是可识别的	交织结构有一个顶点（政党）和一个基点（没有入党的那些行为人）	只有基点是可识别的：与该结构没有通过任何制度化联结线而联结起来的那些行为人。顶点很难识别

① 最简单又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北京的党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情况。北京的党中央和国家机关混合在一起。从政党办公处到政府部门设有自由通道，而从政府部门到政党大楼却不能自由通行，需要得到批准（2001 年的访谈）。

续表

联结发生在机构间和机构内	机构内和机构间的联结都形成于个人之间	机构内和机构间的联结都产生于个人之间
直接依附：只有通过科层依附线 D_1 才可以提升利益 I_1	直接依附：只有分别通过 D_1 和 D_2 才可以在科层内 I_1 和科层间 I_2 提升利益	双重依附： 1. 直接依附，I_1 和 I_2 只能分别通过 D_1 和 D_2 而产生 2. 间接依附，I_3 可以通过用尽 D_1 和/或 D_2（作为反馈环的一部分）而产生
单向依附：依附的起点和方向是不可逆的（因此权力在结构内被垄断）	单向依附：依附的方向是不可逆的（政治上的权力垄断）	单向依附：依附的方向是不可逆的（政治上的权力垄断）
同级决策者处于相同层级（这里的级别与讨价还价地位是一致的）	正式科层中各个层级上的同级决策者的讨价还价地位是不同的	正式科层中层级不同但其他方面都相同的同级决策者的讨价还价地位是不同的
单线依附：在提升利益的过程中，决策者不能绕过他的直接上级	多线依附：在正式的国家科层内，决策者在提升利益的过程中可以借助 D_2，绕过他的直接上级，但不能绕过负责把持 D_2 的政党	多线依附：决策者可以通过 D_2，借助 I_2 绕过 D_1；也可以借助于 I_3 D_1 绕过 D_2
单线依附（D_1）和利益提升（I_1）影响每一个具有制度关系的行为人	多线依附只影响至少与一条 D_2 类（D_2-type）线联结的那些决策者（间接反馈）	I_2 和 I_3 是那些符合体制选择性标准的决策者的特权

注：D_1 是科层内依附线；D_2 是起始于政党、联结两类科层的依附线；I_1 是通过 D_1 的科层内利益提升线；I_2 是通过 D_2 的科层内利益提升线；I_3 代表网络中科层内和科层间的结构性反馈。

至今为止，我们已经分析了政党－国家的结构特征，并基于政治理性从个人依附性和利益提升机会的角度描述了政党－国家结构的要素及其关联原则、固有的结构性不平等。这便引出了几个问题：如何使政党－国家结构充满积极性？这种相互锁定的结构将引起什么样的动态运行？是什么力量在保持这一结构的凝聚力并使它可以进行再生产？这种运行和再生产具有规律性吗？

4 政党－国家的动态运行

我们将证明，在依附性、利益提升、资源攫取和分配被政治垄断的结构中，把持依附线并被依附线包围的决策者的特定职位，激发了使结构实现再生产并为结构提供凝聚力的政治理性行为。由于固有的不平等，再生产约束对一些人来说是软的，对另一些人来说是硬的。这种选择也是政治理性的。由于存在这些特征，所以自我再生产也制造了导致自我耗竭的陷阱。

4.1 运行的主要原则

由于政党－国家结构的内部关联具有特殊性质，所以其动态运行可以用这些特殊原则来加以界定。这些运行原则很简单：

（1）依附性在政治上被垄断。尽管所有决策者都拥有科层内（D_1）控制线，但是只有政党决策者才拥有互联线（D_2），这些互联线可以把政党决策者与非政党结构内的那些行为人联结起来。

（2）资源攫取和分配在政治上被垄断。这种情况的出现有两种方式：**间接地**通过国家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及联结国家与政党科层的依附线（D_2）；**直接地**通过联结经济单位和财产权利的 D_2 线。

（3）利益提升的可能性在政治上被垄断。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因为在政党－国家体制内，除了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利用 D_1 和 D_2 依附线之外，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提升利益。

这些运行原则（在政治上被垄断的依附性、资源攫取和分配、利益提

升）形成了结构性动机的政治垄断制度框架，这种结构性动机决定了网络再生产期间的行为。[①]

自我再生产的结构性动机

运行原则上的互锁结构（interlocked structure）的动态运行是由什么结构性动机造成的？我们首先分析这种互动式结构如何决定个体决策者的职位、动机和行为，然后再考察这些职位、动机和行为将产生什么样的再生产动态运行。

该结构内与依附线相联结的所有决策者，都会发现自己的双重角色：既是依附线的**控制者**，又是依附线的**俘虏**。因此，在**同一实体**中既有分配者，也有抗辩者（pleaders）。[②] 特定政党－国家背景中这种双重性，在决策者当中产生了一组非常复杂的激励和压力，结合起来成为网络内行为的结构性动机。

在这种政治垄断的权力结构内，决策者作为依附线把持者，能够介入同时也被迫介入结构内任何地方。他们能够垄断决定资源掠夺和分配的优先权，垄断特权。其实从原则上看，他们能够打着"全面"（垄断）负责的幌子介入该体制内任何地方。决策者作为依附线的把持者，能够改变积极性和优先权，重组组织，增加或限制社会流动性，在任何层级上实行肃清（purges），转移资本、人力甚至整个民族。这些行动实际上付诸实践的程度，将因特定时点上的权力关系而所有不同。[③]

然而，决策者同时也**被迫**实行干预，因为那些只能通过垄断依附线来

---

① 从历史上看，这些垄断性的结构和运行原则的政治要求在1920年代就出现了，这种政治要求看来已经成为列宁论述政党及其对社会的控制和导向的一个有利因素。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Lenin 1977：155），列宁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着和领袖。"（referred by Lane 1996：143）。斯大林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发展，并加以制度化。

② 这种双重角色是任何制度科层的特征。这种结构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自我类似的结构特征和运行原则（政治垄断的活动、组织和职位结构，通过国家垄断而实现的政治垄断所有权［攫取和分配能力］，以及互联线［D_2］，最终导致政治垄断的依附性、攫取、分配及利益提升）。所有这些将决定政党－国家中的特殊动力。

③ 例如，匈牙利1950年代上半叶与1968年改革之后的差异（Petö and Szakács 1985；Berend 1974），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与1994年之后的差异（Schurman 1968；Barnett 1967；Wong，C. 2002）。

实现利益的那些行为人会不断地施加压力。为了满足这部分人提出的再分配资源、获取资源以供再分配的持续要求，决策者（作为依附线的控制者）不断地**被迫**干预并汲取资源。政治敏感性通过互联线和反馈进一步增加了干预的压力。通过依附线进行干预的能力和义务，确保了基于政治的干预行动。干预反映了对经济活动的政治关心和期望。①

总之，通过垄断依附线来持续地争夺资源，迫使行为人作为依附线把持者要不断地努力实行干预并攫取资源，根据优先权来加以分配。如果他们**不实行干预**，情况会怎样呢？一方面，在政治垄断体制中，他们将放弃网络内的那些决策者和机构，等于是放弃一种帮助来源，因为在这种体制中，没有提升利益的其他途径。在这种政治垄断体制中，某个人或机构被切断依附线从而被抛弃，并不会增加他们的自主，而只会导致他们更加依赖把持着剩余依附线的那些行为人并受其剥削。另一方面，权力再分配的方式将有利于继续控制这些依附线的决策者，不利于打破这些依附线的决策者。换句话说，如果被切断了依附线，权力拥有者将自愿放弃他们自己的权力职位（Csanádi 1985；1997b）。因此，作为依附线的把持者，决策者的经济行为和动机是**政治理性的**。②

---

① 例如，负责经济活动效率的是政党和国家组织。政党希望用政治斗争来控制国家补贴的增长。企业内中长期规划的制定被认为是一种政治煽动功能。而反对短期规划被认为要依靠个人忠诚、共产主义意识和阶级斗争，要求个人对其组织（企业）具有革命立场。根据其用途来对产品加以选择，取决于政党组织的热心监管。

②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权力关系转变导致损害一个干预单位的利益。1981年，匈牙利的三个分支（直属）部委合并成一个工业部。新的工业部被剥夺了干预权，并且不能为其下属企业提升利益。新工业部的任务是促进长期产业政策而不是干预，不能为其下属企业进行利益调解。这一任务是公开的，为了让事情更加明确，中央委员会中负责直属部委的部门也被废除了。这便导致企业直接转向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分支部门，而不是利用新工业部的调解。结果，权利关系转变削弱了新工业部在网络中的讨价还价地位。对中央委员会机关、计划办公室、财政部以及企业来说，新工业部变得越来越弱，但是，那些职能部委的分支部门，以及负责职能部委的中央委员会的经济政策部门，变得越来越强："……但是，企业最终发现许多事情依赖于职能部委，比如，依赖于其组织［通过导致体制或主体负责制］属于我们［中央委员会部门］的国家机关。因此，如果他们想在国家银行、物价办公室、外贸部获得什么东西，他们经常会来我这儿"（CC Department of Economic Policy 1984）。

作为结构依附线的**俘虏**，决策者受到**剥削**，同时在依附线的继续存在和繁殖中也有**利益**存在。决策者容易受到影响，因为通过依附线以各种方式进行传递的政治期望直接限制了他们的机动空间。同时，决策者在这些依附线的维持、利用和繁殖中也有利益存在，因为在政治垄断体制内，依附线是提升利益的主要途径，以便通过融入网络而获得资源和特权。也正是这些依附线，使他们有机会去讨价还价、吸引资源、抵制干预、攫取资源和扩展机动空间。

受制和获利的同时存在，解释了为什么特定结构中的决策者愿意去**适应**通过依附线所传递的政治理性要求。在这一过程中，不只是凝聚力，而且还有决策者作为"抗辩者"的长远（well-considered）利益，驱使他们去满足监督者的期望，接受主流的权力结构，事实上他们认为依附线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行动，情况将会怎样呢？决策者作为依附线的俘虏，将自愿放弃讨价还价的机会。换句话说，他们将放弃获取信息和提升利益的渠道。他们也许会损害其组织的未来、可能资源的流动以及自己的事业生涯。因此，**决策者作为"抗辩者"，其经济动机和行为也是政治理性的**。

总之，在政治垄断性结构中，能力与义务、受制与获利，都是行为人行动的**结构性动机**——它们有力地相互联系在一起。它们结合起来将形成网络内**行为人自我再生产的经济行为的政治理性动机**，以及自我再生产期间结构的凝聚力。[1]

自我再生产的结构性约束

由于行为人在单个实体中的双重角色，使行为人的自我再生产能力变得非常复杂。这是因为单个行为人作为依附线的把持者和俘虏，能够在网络内联合进行资源吸引、攫取、分配和抵制干预。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行为人进行自我再生产的**个体约束**。然而，每个行为人所面临的约束**并非完全一致**；它们依赖于行为人在结构中的地位。固有的结构性不平等将造成资源吸引、攫取、分配和抵制干预等方面有**选择的机会**，从而导致**有选择的软或硬自我再生产约束**，选择标准是行为人在政治理性关心方

---

① 对于这些制度性动机，科尔奈所列举的个人动机起到了补充作用：道德负罪，工作身份，权力，声望，物质利益，安逸生活，以及害怕惩罚（Kornai 1992：118）。

面的结构性讨价还价地位。[①] 因此，有选择的软/硬自我再生产约束在本质上是结构性的，也是政治理性的。这些动机和有选择性特征代表了网络内反复活动的驱动力，从而也代表了政治垄断结构的凝聚力和再生产。

这一过程包括以下几个循环互动的阶段：除了使用依附线之外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提升利益，这一事实把依附线所俘获的行为人引向封闭式渠道；反馈的驱动力增加，因为积累了反馈之后就可以确保有利的讨价还价机会，满足资源分配的选择性标准。但是，个人或组织必须使自己在战略上变得重要，这需要实现增长。增长的必要性迫使抗辩者持续依靠依附线去获得资源。对于把持依附线的决策者来说，为了重新创造实施权力的物质基础，继续推行有选择的再分配，就必须不断地汲取资源。这再次驱使被依附线俘获的行为人去利用这些依附线，这反过来又激励了这些依附线的把持者。

因此，正是**自我再生产机制**的结构背景，造成了持续争夺和汲取资源、干预决策、谋求特权和资源从而最终实现增长（包括猎取投资和人力、储藏投入）。一方面，反复出现的政治关心也导致了资源分配中特定的有选择性，另一方面，满足期望的努力具有结构背景。因此，这些行为模式不是基于主观动机，[②] 而恰恰是这些结构动机产生了这些行为模式。因此，动机和行为都是与结构相符的（structure conforming）。[***]

4.2　有选择的软结构约束与软预算约束

让我们回顾科尔奈所论述的软预算约束的条件和结果：预算约束表达

---

① 我们可以结合中国教育界的情况来解释这种不平等（有选择性）的含义：假如中央确定扶持 9 所大学打造国际影响力（也许把它们设为“部级”），这便造成结构上不平等；这 9 所大学便可以向各有关部门要政策、要资源等，或者利用“中央重点扶持”的牌子吸引社会资源，这便造成机会不平等；有关部门都对这 9 所大学给予“特殊照顾”，这便造成软约束。根源在于“政治理性关心”（中央扶持），受到中央关心的大学说话分量更重，讨价还价地位更高。——译者。

②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同意科尔奈在《短缺经济学》中所提出的观点，科尔奈在这本书中用企业经理追求增长的“自然本能”来解释追求增长的制度背景（参见 Kornai 1980：78，204－206）。

*** “与结构相符”是指，什么样的结构决定了什么样的动机和行为。——译者。

了经济和社会环境中的行为标准。预算约束软或硬的程度依赖于具体的条件，以及强制人们服从行为标准的社会关系（Kornai 1980：42）。如果说亏损也不能排除某个经济单位的长期生存，那么该单位的预算约束就是软的（Kornai 1980：123）。传统的和改革中的政党－国家体制中预算约束是非常软的（Kornai 1980：330）。绝大多数企业制定价格（主要是产出品价格）而不是接受价格。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价格不是一个外生因素。即使价格由中央决定，政府当局也会受到企业的强有力影响。如果企业可以影响有关税收规则的解释，或者获得单独的税收减免或延期缴纳，或者税收没有被系统性地征收，那么税收体制便是软的。国家分配了许多无偿性的投资或补贴，以弥补长期非效率或特殊损失，或提供特殊激励。信贷体制是软的：该体制没有遵守信贷标准的正统的保守原则。即使企业不能有效地保证用其收益按期还贷，也仍然能够获得贷款。贷款与企业的生产和销售能力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关系，到期贷款的无规律偿还总是被容忍。

因此，生存不是严格依赖于收益与成本的良好比率。即使成本持续大于收益，也不是一个生死存亡问题。企业的技术发展和增长将不是排他性地依赖于其内部资源积累能力。企业不是被迫去适应价格环境，因为它是产品价格的主要决定者。所以，企业的兴趣不在于适应投入价格，或者它还可以故意制造长期亏损，期望政府以某种方式进行补偿而不是让它倒闭。风险与国家共享：如果企业环境改善了，国家将汲取其部分额外收益，但是如果企业经营不善，随后的负担十有八九能转嫁给国家、购买者或债权人。不确定性是双重的：第一，价格、采购和销售条件上的不确定性；第二，坚持实行企业收益再分配所造成的不确定性。企业不能准确预见国家将攫取多少以及随后再分配多少。这些结果一起导致了无限制地寻找投入，因为投入也许从内部和外部资源都可以购买到。总之，软预算约束不能约束真实世界中的企业在生产、采购或销售中的活动。软预算约束——与硬预算约束相反——将不能施加有效的约束。企业行为将会受到软预算约束预期的影响。约束的程度不是一致的。在同样的体制内，预期可以根据长期经验而出现偏离。企业越是预期其生存和增长排他性地依赖于需要用销售收入来补偿的开支总量，它就越多地考虑预算约束，约束也就

越硬（Kornai 1980：322－327）。

在 IPS 模型框架内，以上引用的科尔奈所定义的软预算标准的结构背景，可以方便地纳入权力关系来加以分析。影响分配决策的能力，从而抵制不利干预、吸引有利干预和资源的能力，依靠政府帮助摆脱困境（bailed out）并降低不确定性的可能性，不受市场需求、效率和应偿还贷款约束的生存，等等软预算约束的期望，都是**在结构上被推动的**（*structurally motivated*）。对于能够通过互联线提高政治敏感性的人来说，满足这些标准并获得那些能力的机会更多，而且，对于那些拥有反馈能力的经济行为人来说，情况更是如此。反馈积累得越多，他们就越加不必考虑预算约束，结果他们就越加具有软预算约束的期望。

因此，软预算约束的非均等机会，同时揭示了特定结构中被剥夺了软预算约束特权的那些行为人，因为他们不具有符合选择性分配标准的特征，从而不具有吸引资源、抵制干预的能力。[①] 因此，从分配角度来考虑，有选择的软和硬预算约束是互补的。所以，硬预算约束的“分配”也是有选择的。因此，网络背景中预算约束软和硬意味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基于政治而非经济利益的不同讨价还价能力和选择标准。[②]面临有选择的软/硬预算约束的经济单位的模式——正如有选择的再分配模式——反映了权力关系的模式，同时也反映了再生产约束的有选择性，并且这种选择性的软和硬存在**结构上的**原因（Csanádi 1997b）。

---

① 抵制能力产生于科层线和互联线、反馈、拥有攫取和分配能力。某个行为人或单位对这些手段拥有得越多，其抵制能力就越强；相反，对这手段拥有得越少，抵制能力就越弱。在网络内，行为人的抵制能力与吸引能力是同时增长的。

② 例如，根据匈牙利 1970 年和 1979 年的统计调查，那些国有企业（SOEs）有着大量的机会从中央分配中获得各种资源，具有满足中央有选择的分配标准的政治理性特征。这些标准包括在分支部门内该国有企业的规模，该国有企业所在地区的规模，以及经理在政党科层任一层级委员会中被选举上的职位（Csanádi 1997b：116－174）。

我们可以间接地看出，在中国，对于大型国有企业、中央下属国有企业、省属国有企业和县属国有企业，存在类似的选择性特征，这涉及行政科层的不同层级，以及行政科层内特定层级的地区。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参见以下著述：Burns 1983，1987，1994；Wildasin 1997；Walder 1995b；Qian and Roland 1998；Sun 1997；Huang 1996；Perotti 1993；Zou and Sun 1996；Lin，C. Z. 1989；Granick 1990；Chen，C. J. 1999；Goodman and Segal 1994；Xiao-qiang 1998；Perotti et al. 1998。

科尔奈对这种现象作了注释，强调软预算约束的程度会有所不同，但科尔奈认为，与国有企业整体上的软预算约束相比，前者不太重要（Kornai 1992：489，fn. 24）。因此，软预算约束的有选择性，以及软预算约束激发的动机的结构背景，在科尔奈的理论中都没有得到重视。

基于结构特征——以及源于这些特征的运行原则——我们可以争辩，政党－国家体制的典型特征是**软再生产约束**基于政治理性标准而**有选择地出现**，而不是企业整体上的软预算约束。

4.3 自我再生产中的陷阱

结构特征由于政治理性而导致政党－国家体制在自我再生产中出现陷阱。

（1）政治理性使政党－国家结构产生关联和关联目标。结构特征产生于政党、国家与国有经济之间的直接联结和关联原则。直接联结使国家可以垄断经济和资源。

（2）政治理性使互联线和反馈造成行为人之间出现阶层化。

（3）政治理性使决策者在正式科层内所占有职位与真实讨价还价力量之间不相称。

（4）政治理性使选择性得以产生，并且对于获得政治垄断资源和抵制不利决策的机会来说，选择性看来起着最重要的作用。[①]

这些结构特征是**自我再生产陷阱**得以产生的基础。这一点反映于不同维度：

（1）政治理性关心激发了政治理性的结构动机，从而导致政治理性的经济行为，再而激发了谋求增长、猎取资源、积累投入品并根据战略重要性加以分配的动力。政治理性关心形成了有选择的分配从而有选择的软再生产约束。于是，政治理性关心便决定了再分配中产生固定路径，进一步

① 政治考虑部分地符合科尔奈所说的分配时“更深更一般的”动机。这些动机包括：追求稳定性，缩小收入差距，强化社会任务，加强政府的再分配职能（Kornai 1980：332-333）。

软化了被选择集团的再生产约束，同时，对于面临硬再生产约束的那些集团来说，却出现了选择性短缺。这又将导致整个结构自我再生产的固定路径，有时候也会导致该结构的再生产约束硬化、全面短缺和凝聚力损失。这些因素结合起来解释了自我再生产的政治理性特征。

（2）产生于结构特征的陷阱，解释了政党－国家体制再生产中为什么缺乏经济效率约束。只要能获得资源，结构性动机和政治理性行为就会阻止将在网络内控制或约束以上自我支持（再生产）机制再生的因素出现。

（3）由于以上特征，自我再生产陷阱便可以解释自我再生产为什么同时也是一个**自我耗竭**的过程。

基于结构特征及其所派生的自我再生产陷阱，IPS 模型从制度上解释了在科尔奈所说的自我再生产过程中（Kornai 1980：79，330）的动机和结构意义上"失去抑制力（missing withholding force）"。科尔奈认为缺乏这种力量的原因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预算约束是软的。于是，企业经理可以满足他们努力谋求增长的"内在愿望"（"自然本能"），这是政党－国家努力实现增长的主要动机，这些动机由于短缺和中央再分配而得以强化（Kornai 1980：78，204－206）。然而，我们已经得出结论，软预算约束和短缺——如果纳入权力关系——都是有选择的，增长的驱动力是在结构上被推动的，并且，自我再生产的结构及动态运行所派生的陷阱是失去抑制力和缺乏效率约束的结构动机（structural motifs）。

总结这一章，我们已经定义了源于结构特征的运行原则。政党－国家结构意味着决策者的政治垄断依附性、利益提升、资源攫取和分配，从而形成了政党作为一种制度权力结构的运行基础。在政党－国家结构中，决策者把持着依附线，同时也受制于依附线。同样地，在垄断环境中，决策者能够干预和应用，同时也被迫这么做，但是为了提升利益也愿意稳定和繁殖互联线。能力与义务、受制与获利一起作为结构动机，促进政治理性的经济行为，从而提高自我再生产期间的结构凝聚力。由于行为人的双重地位，导致自我再生产的能力非常复杂。它的产生是由于单个行为人能够在网络内联合进行资源吸引、攫取、分配和抵制。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构成了他们的自我再生产约束。固有的不平等将形成资源吸引、攫取、分配和抵制干预的有选择的机会，所以，自我再生产

约束是软还是硬，依赖于行为人在结构中的讨价还价地位（基于政治理性关心）。由于缺乏效率约束，自我再生产过程将导致再生产约束偶尔硬化，甚至整个结构都失去凝聚力。结构特征将造成自我再生产的陷阱，激起自我再生产过程中的政治理性和缺乏效率，从而导致自我再生产期间的自我耗竭。

5 政党－国家结构及动态运行上的自我相似性

至今为止，我们都是从某一个国家的角度（国家层面）来描述的结构及动态运行特征。问题是，这些特征在什么程度上也存在于其他维度？让我比较性地思考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知识体验是，中国工厂车间里的关系和动力的结构（Walder 1988；You 1998），匈牙利政党－国家的结构与动态运行，苏联和苏维埃集团的动力结构（Bunce 1983；1985），这三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是这种体验让我发现可以在 IPS 模型框架中归纳和界定哪些特征。可以证明，这些特征并不局限于某个层级、某个时间，而是可以扩展到同一时间的不同层级、不同时间的相同层级、不同时间的不同层级。

基于上述实际体验，我们在 IPS 模型框架中引入了**自我相似性**概念，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特征。自我相似性是政党－国家的要素、关联原则、运行原则的特征，包括结构动机及其行为后果、有选择的软再生产约束、该体制的结构和运行中固有的陷阱等方面的自我相似性。①

这种自我相似性**在各个时期**都存在，一旦产生了要素和关联原则，那么就与分析时期无关：例如，1939 年的苏联（Fainsod 1958）或 1985 年的苏联（Bunce 1983）。**在空间上**也可以发现自我相似性，比如在罗马尼亚（Pacepa 1989）、越南（Sun 1997）、匈牙利（Csanádi 1997b）或中国（Qian and Xu 1993）等国家之间，或者在一个国家内同级**聚合体**的有关单

① 这种自我相似性反映了不规则结构的主要特征（关于不规则结构的实质，参见 Mandeibrot 1983）。但是，由于我们将不深究不规则结构的其他特征，所以我们在本研究中只使用自我相似性。

位之间，或者在特定时期或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任何相同较低层级的有关单位之间（Bunce 1999）。自我相似性还普遍存在于相同时期或不同时期的不同层级聚合体之间，例如，某个工厂车间（Walder 1988）、区（Csanádi 1997a）、县（Grossman 1983；Hough 1969）、国家及其联邦（Bunce 1999；Blagojevic 1999）甚至苏联和东方集团成员国（Bunce 1983）。甚至在政党－国家形成或解体的时候，即在不同的**条件状态**（*states of condition*），我们也可以在网络所覆盖的地方发现以上自我相似性，例如，在 1929－1931 年间的苏联（Fainsod 1958），在 1987－1988 年间的匈牙利（Csanádi 1997b），1997 年的中国（Qian and Wu 2000）。

为分析方便，我们把**自我相似单位**界定为：要素、关联原则、运行原则及其在特定结构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任何层级聚合体的影响之间任何一种复杂的结构组合。[①]自我相似单位的构建过程如图 5a 所示，这里对前面的图 4 作了进一步简化；图 5b 表示，一个自我相似单位包括一个层级上几个自我相似单位（在空间上）；图 5c 表示不同层级的情况。图 5（a、b 和 c）表明了一个自我相似单位中自我再生产期间的相互作用的可能路径。

根据图 5c，我们称较低层级聚合体内的那些单位为某个普通单位（a unit）的“下级单位（sub-units）”，称较高层级聚合体内的那些单位为该普通单位的“上级单位（supra-unit）”，普通单位是上级单位的下级单位之一。由于自我相似的特征，一个单位是被作为下级单位、普通单位，还是被作为上级单位，这完全依赖于分析的焦点和聚合体的层级。一个普通单位包含多个下级单位，并且，它一般都会融入包含多个上级单位的某个较大聚合体。图 6 表示了不同层级聚合体为集团、国家、县和企业等情况下的自我相似性。

在现实中，自我相似单位要复杂得多。这些图形不能显示的是：联结着各级政府和政党组织（例如，省级政府或党委与地方政府或党委）D_1依附线，不仅仅可以联结不同层级聚合体内部的自我相似单位。事实上，D_1线还可以联结较高层级的机构及其下级机构，甚至可以把较高层级政府机

① 自我相似性不适于部分地处于网络外的横向集团（家庭、宗教团体或朋友关系），但是横向集团中每个人也许恰好在他/她的制度背景中拥有互联线，该互联线对这些横向关系具有重要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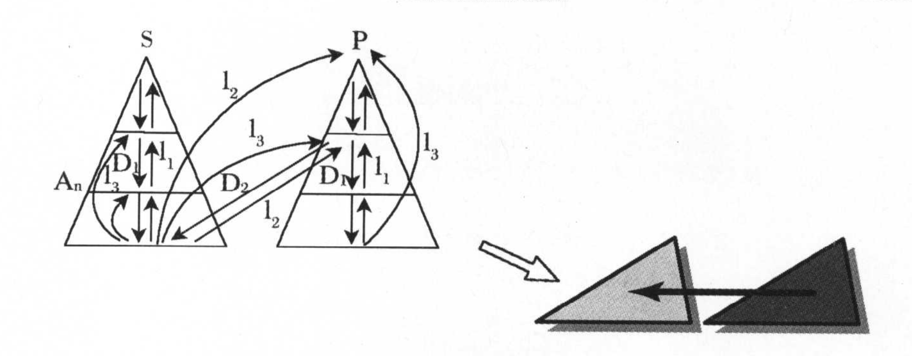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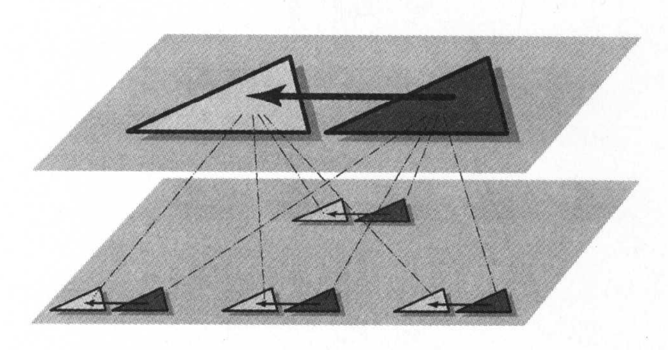


图 5a　某一层级上某个聚合体的一个自我相似单位



注释：虚线表示分解（disaggregations）

图 5b　自我相似单位的分解：一个上级单位、多个下级单位

关中的部门与较低层级政府机关中的部门联结起来。联结不同层级的互联线把不同层级聚合体直接联结起来；跨科层反馈通过互联线把不同层级间接联结起来，这些互联线联结同级政党和国家，也联结对同级机构的反馈。不同聚合体的融合是紧凑的还是松散的，依赖于互联线和科层内依附线的密度，以及联结上级的科层内或科层间反馈的密度。联结自我相似单位的依附线的密度和类型，将决定自我相似单位间的联结灵活性（lightness of the contact），以及它是被当作聚合体的一部分，还是被当作网络不能到达的外部环境的一部分。

在制度上可能出现资源吸引、抵制干预、资源攫取和资源分配的地方，就会发生单位间的相互作用。由于政党－国家结构的性质，导致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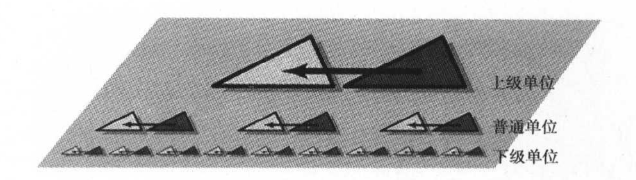


图 5c　自我相似单位的分解：一个上级单位、多个普通单位、多个下级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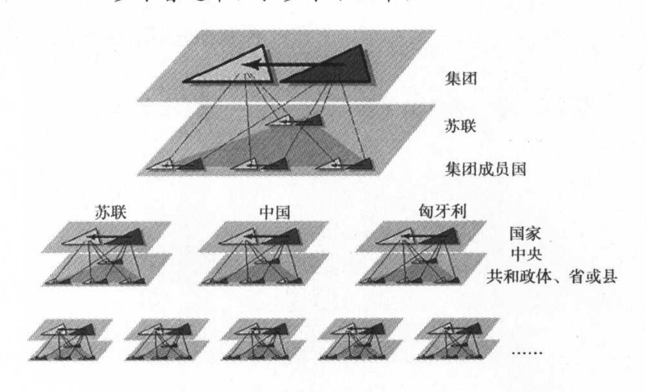


图 6　自我相似单位的不同层级聚合体

聚合体的关系中出现了这种制度可能性。自我相似单位在某个聚合结构内相互作用的特征，与相似单位预先确定的特征之间是**没有**差异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基础是自我再生产的自我相似的结构及动态运行特征。聚合起来的自我相似单位内的决策者将与较高层级自我相似单位进行相互作用，以吸引资源和抵制干预，并且也将与聚合体内较低层级的自我相似单位进行相互作用，以攫取资源并加以再分配。

然而，自我相似单位不必然完全融入较大聚合体。有一些聚合体是终极聚合体（无论其内部有多少聚合体层级，也无论其规模大小），它们不属于某个较高层级聚合体的下级单位（例如，苏联、中国、古巴、越南、朝鲜）。但是也有一些单位是没有下级单位的（例如，车间单位中的党小组、波兰的地方政府［没有下属集体农业单位］、中国的乡镇企业［没有下属经济单位］）。因此，上面或下面都受到限制，并**没有**改变行为人和自我相似单位在结构内的结构及动态运行关系特征。

综上所述，只要自我相似的结构和运行特征普遍存在，它们就确定了自我相似单位内结构性动机和行为的自我相似性。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聚合体层级、不同条件的政党 - 国家结构中，都将存在这些自我相似特征。

再生产的结构及动态运行方面的自我相似性，是对各个政党 - 国家在不同时期发展进行比较的共同基础，也可以用来区分与其他体制之间的动态运行差异。尽管各个国家在形成社会主义体制的过程中，其规模、政治地理区位、文化特征、历史传统和社会发展状态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但是，比较分析的这种自我相似基础仍将存在。尽管当政党 - 国家形成时，该国历史条件和发展阶段上存在差异；尽管当斯大林主义被修正时，这些政党 - 国家的发展阶段 - 在古典阶段或社会主义改革阶段 - 各不相同，在实际的国际环境方面都存在差异在以上背景中仍然保持自我相似性。然而，我们如何解释：为什么各个政党 - 国家尽管存在结构及动态运行上的自我相似性，但是它们却走了不同的自我再生产道路，使用了不同的自我再生产手段，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打开自我相似单位的黑箱，从而揭示自我相似性内部结构及动态运行差异的背景。

6　分歧的结构及动态运行背景

经验证据表明，政党 - 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结构及动态运行上的自我相似性。这些差异不仅仅在于规模（例如，中国或古巴）、历史和文化传统（朝鲜或捷克斯洛伐克）、工业发展水平（苏联或阿尔巴尼亚或东德）。而且，从**空间**上看，不同政党 - 国家体制（罗马尼亚或中国）的结构及动态运行之间，以及同一政党 - 国家不同**时期**（匈牙利在 1950 年代初与 1956 年以后，或中国在 1960 年代初与 1979 年以后）的结构及动态运行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在**聚合体不同层级**（苏维埃集团与苏维埃共和国，中国与西藏、上海或某个公社）之间，也存在这种差异。特定体制在不同**条件状态**（*state of condition*）下也会存在差异，例如，这些政党 - 国家形成或解体的阶段（例如，苏联在 1920 年代中期或 1990 年代初期）。这些差异怎样适合自我相似概念？可以证明，不损害基本要素和关联原则，把政党 - 国家要素分配中的各种变型结合起来，将确保政党 - 国家间差异的结构背景。

6.1　政党 - 国家类型多样化的结构背景

一般来说，互联线、反馈和有选择的攫取和吸引能力，为政党 - 国家中权力分配提供了制度基础。自我相似单位内的权力分配可以存在具体的、特定的差异（不论其聚合体层级），是因为：

（1）政党和国家科层内的严格性，涉及要求、执行、控制、适应、对

不符合期望和偏离期望的宽容或惩罚、决策和期望的细化程度（例如，在商品、家庭、个人等详细事务上的决策）。[①]

（2）相互关联的依附线的密度、类型、起始层级，它们在非政党范围内重叠的领域，以及它们延伸到特定领域的深度。[②]

（3）反馈的起始层级、密度、终点层级，科层内、科层间、跨聚合体的反馈，累积反馈的能力。[③]

（4）资源攫取和吸引能力在各级国家科层上的分配。[④]

以上要素变形的结构组合，造成了同一自我相似单位内个体行为人之间权力分配的具体差异。[⑤]因此，IPS 模型既包括自我相似特征，也包括那些个体特征。这些权力分配可能随时间、空间、聚合体层级和类型而变

① 例如，在 1950 年代，国有企业必须向部委和中央计划办公室汇报一些规定项目的计划及其执行情况，这不仅仅是每年一次，也不仅仅是每月一次，甚至有时是 10 天汇报一次（Kornai 1959）。在苏联，甚至到了 1980 年代，苏联中央政府每年必须处理成千上万个单位的经济和政治信息（Lane 1996：101）。计划就像法律一样，未完成计划可能会被定性为怠工，并受到相应惩罚。

② 例如，它们绝大多数情况起始于中央，就像在罗马尼亚那样；也许不与农业重叠，就像 1960 年代之后的波兰那样；也许深入到社会，就像中国的街道委员会那样。

③ 例如，反馈可能很少，可能起始于科层中的较高层级，没有跨科层反馈，就像在罗马尼亚那样；或者可能起始于企业层级，在政党－国家科层内或跨过政党－国家科层而延伸到任何层级，就像在匈牙利那样。

④ 资源攫取权限可能被集权化，就像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那样；可能被相对地分权化，就像在中国那样。

⑤ 例如，在匈牙利 1956 年革命之前与之后的权力分配是截然不同的，在建设时期与解体时期的权力分配也是截然不同的（Csanádi 1997b）。在 1949－1953 年间，匈牙利政党和国家结构是非常严密的。由于没有其他估价方式，下属的迎合和绩效取决于主观判断。对非绩效的宽容依赖于个体判断。

1956 年之后，直到 1963 年，结构的严密性有所下降，政党中的个体决定转给了委员会，互联线相对来说变得更分权化，出现了来自经济领域的反馈（Csanádi 1997b）。但是在农业中没有得到缓和，因为曾经解散的农业合作社又重新强制性地成立了，互联线也延伸到这些合作社，这就是 1963 年以前的情况。直到 1963 年中期这一情形才得以缓和（Petö and Szakács 1985：445－459）。

化，随着该结构发展、稳定和解体的水平而变化。[①]

基于以上结构特征，我们可以强调，不仅像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政党等融合子域的边界不能被准确界定，而且权力精英阶层一般也非常难以界定。这是因为该结构被互联线和反馈搅乱了，导致讨价还价能力与结构中正式职位不相匹配。时间、空间上的变化以及发展或解体的条件，影响了权力分配的稳定性。还有，普通单位的下级单位（密切地或松散地扭结在一起）和普通单位本身，都是经济、地区、政治等方面不同类型聚合体的组成部分，并且根据特定聚合体内的权力关系，它们在这些聚合体中具有不同的讨价还价地位，[②] 其相互作用受到结构特征的有力影响。因此，在某种聚合体的一个单位的正式框架中，既不可能准确地界定单位之间的权力分配，也不可能准确地界定其下级单位之间的权

① 例如，中国在 1950 年代早期到 1970 年代末出现过几次巨大权力分配摇摆。更具体地说，这些摇摆从自 1950 年代初开始，一直延续到 1958 - 1959 年，这一时期产生了高度集权化的、严格互锁的结构（Barnett 1967 Huang 1996; Burns 1989）。另一个转变是从 1958 - 1959 年开始的，在大跃进时期出现了互联线和经济权限的分权化（Barnett 1967; Bachman 1991; Naughton 1996）。随后，在 1961 - 1965 年间出现了再次集权化（Huang 1996）。再后，在 1964 - 1976 年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过程又出现逆转，互联线和针对企业的经济权限再次分权化，同时废除了中央的国家和政党机关，政治严格性增加了（Huang 1996; Burns 1989; Barnett 1967; Hong Yung 1978; MacFarquhar 1974）。在毛泽东逝世之后，1978 年又出现了短期的再次集权化（Huang 1996; Naughton 1996; Qian and Xu 1993; Lieberthal 2004; Burns 1989）。

不仅从时间上看存在差异，而且从不同聚合体看也存在差异：在宏观层面上（Qian and Xu 1993; Jin and Haines 1997; Manion 1985; Burns 1987; 1989; 1994; Naughton 1996），在不同地区层面上（Oi 1985; 1992; 1995; 1996; Steinfeld 1998; Walder 1995b），在企业层面上（Chamberlaine 1987; Child and Xu 1991; Bolton 1995; Granick 1990），甚至在车间层面上（Walder 1988）。

② 例如，某个企业在某个地区设有总部，但它的下属单位却遍及全国。可以从下属单位攫取资源的时候，该企业也许会把下属单位设置在地区政党组织进入了中央委员会的地区（反馈），而企业总部却不设在这里。因此，经济下属单位比企业主管的讨价还价地位更好，因为他/她的反馈在这种环境下更弱。然而，这并不排除在另一种环境下权力关系将发生转变。因此，如果把整个企业作为一个单位，那么在该单位内部，总部的攫取能力将依赖于其对下属单位的权力。但是，企业总部的权力随着下属单位在另一聚合体中利益提升能力提高而下降。

力分配。

但是，利用上述要素的具体变型的组合，我们可以界定特定结构的特征。权力分配的结构变型必须适应特定单位的个体特征。[①] 一般来说，适应得更好的那些变型可以更持久一些。这些个体因素限制也推动了网络重组战略。这些变化中的结构特征没有损害基本要素及其关联原则、主要运行原则的自我相似特征，也没有影响该结构的一般运行特征所强化的动机。

总之，网络的自我相似特征中出现了结构变型。这些变型源于以下变型的组合：互联线和反馈的密度、起点、终点；每一科层的严格性；资源攫取和分配权限在结构内、科层间和聚合体间的分配。这些变型的组合将导致自我相似单位内个体决策者权力分配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随时间、空间、不同聚合体和结构条件而变化。个体特征将会影响这些变型中的某一个变型所融入的那个组合。以下我们将揭示结构动态运行的自我相似性与差异性的相互影响。

6.2　结构特征与自我再生产的动态运行

我们已经确定了自我相似的结构特征及其所激发的最重要的动态运行特征，并且描述了使权力分配的结构变型在自我相似特征内得以产生的要素。于是，问题产生了：**结构特征如何影响再生产的自我相似的动态运行？**我们将证明，尽管自我相似动机和选择标准没有受到损害，但是这种选择将依赖于结构特征。再生产约束硬化激发了体制特有的（system－specific）行为和战略时，并且，实施战略的结果将受到结构特征的影响。这些特征还确定了特定单位再生产约束硬化的不同频率，以及该单位实现自我再生产的手段。

---

① 例如，要适应该单位的规模、历史和文化传统、制度化水平、地理政治位置、聚合体层级、工业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结构，等等。

自我再生产过程中的有选择性与结构特征

现在让我们考虑权力分配的一般特征与内在形式。我们从自我再生产的角度来考虑一个自我相似单位。来自上面（上级单位）有选择的资源分配将显示该单位的个体资源吸引能力，来自上面（上级单位）有选择的资源攫取将显示该单位的个体抵制能力。然而，某个单位的再生产约束不仅依赖于该单位吸引资源和抵制干预的能力，而且依赖于它在其网络内的攫取能力。[①] 这里的攫取能力包括两个主要因素：第一，分配给该单位的攫取资源的决策权力（自由决断权）的大小。这种自由决断权（攫取能力）的大小，就像来自上面的其他特权或负担的分配一样，依赖于上级决策者的经济政策意图和该单位的讨价还价能力，即该单位的规模、反馈（融入）以及包含它的互联线的起始层级。第二，攫取能力依赖于单位内权力分配的特征，即，下属单位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资源丰富程度。下级单位在单位内不同程度的讨价还价（吸引和抵制）能力，形成了特定自我相似单位的结构特征。这些特征将容许或阻止该单位从下级单位那里进一步攫取资源，并影响监管单位再生产约束的可能结果。[②]

资源攫取或分配上的自由决断权与其他特权一样，是可以被收回的。收回的程度依赖于监管单位的经济政策意图和该单位的抵制（威胁）能力。保持这些权力变成了被监管单位授予特权的那些人的个人利益。通过

---

① 我们将包括该单位通过向银行举债而获得资源的能力。这可能同时意味着攫取能力和吸引能力，依赖于银行是否处于该单位的网络内。如果银行处于该单位的网络外，那么该单位就是从更高层级聚合体或从网络外吸引贷款。同样，分别在单位内部或外部筹集资金也是攫取资源或吸引资源的因素。同时，创新或允许资源丰富的单位在网络外创新，意味着增加可能的攫取对象。我们暂时忽略中央银行直接印刷货币的能力，尽管中国在 1994 年以前地方政府能够不受限制地增加指导性的银行贷款（Wong, C. 1991; Qian and Weingast 1997; Bachman 1991: 222）。

② 这就是为什么各个单位的攫取能力各不相同。例如，在匈牙利，直到 1980 年代中期，攫取能力才排他性地集中到中央政府，而在中国，攫取能力部分地分配给了各个省和较低层级的行政科层（相对分权化）。尽管分配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权力的象征，但是，如果只有很少（或没有）资源可供分配（支出大于收入），那么分配能力就会变成责任的象征——例如，19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省级以下的自我相似单位日益增加（Wong, C. 2002）。

攫取权限的分配，他们自己的再分配潜能也许随着他们的抵制能力一起扩张，并且，替代性资源将降低对来自上面的转移的依赖性。这就是为什么难以扭转分权化趋势的原因。如果上面坚持收回权限，那么将导致该单位的再分配潜能收缩、抵制能力弱化、依附性提高。讨价还价能力较强的单位可以更好地抵制权力收回。结果，逆转也会像攫取一样，将会是**有选择的**、与结构相符的。[①]

因此，单位吸引资源和抵制干预的能力将是**有选择的**，攫取和分配的能力也是有选择的，前者依赖于这些单位不同的讨价还价能力，而后者依赖于它们下级单位不同的吸引和抵制能力。

自我再生产过程中的行为和结构特征

行为人在攫取、分配、吸引和抵制能力上的差异，如何影响整个单位的再生产约束？又如何影响行为人在单位内的行为？

（1）我们假定一种极端情况：该单位唯一地依赖于分配，也就是说，该单位的攫取能力为零（我们分析的是被依附线俘获的单位，而不是把持类似依附线的单位）。该单位是否把吸引来的资源进一步分配给它的下级单位，依赖于分配决策的分权化水平。这意味着，增加单位资源吸引能力的因素变得至关重要。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融入网络（channel in）”并努力从“上面”争取资源之外，没有哪个单位还有其他任何选择。[②] 成功与否依赖于该单位从较高层级聚合体那里吸引资源的能力。

一方面，该单位吸引资源的能力越强，其再生产约束就越软。该单位将尽最大努力去获得或维持吸引资源的特征（例如，通过投资或接管实现增长，积累反馈），并努力控制互联线的分权化。由于缺乏攫取能力，该单位将努力增加自身规模。于是，其下级单位的规模也间接地变得重要起

---

① 比如，中国 1980 年代初和 1980 年代末曾多次努力集中资源却收效甚微（Naughton 1991；1996）。类似因素使中央政府在 1994 年税收改革开始时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目的在于改变被攫取收益在中央与省之间的分配，同时提供补偿（2000 年的访谈；Huang 1996；Sun 1997；Shu - ki and Yuk - shing 1994）。

② 在终极聚合体情况下，如果在特定权力结构中不可能攫取到资源，也没有机会重新分配权力，那么该聚合体就有可能利用“开放”政策来吸引更多资源。

来，因为下级单位的规模扩张将增加下级单位以及该单位自己的讨价还价能力，从而增加该单位的经济潜能。[1] 通过培育、发展或吞并可能破坏整个单位稳定性（内部供给、不满足急需、政治张力等）或者较高层级聚合体稳定性的下级单位，也许可以实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单位努力增加下属国有企业（SOEs）的经济潜能，或把权限扩张到位于本地但属于较高层级聚合体的更大国有企业的原因。[2] 单位获得的讨价还价能力越强，其再生产约束就越软。另一方面，该单位的吸引能力越弱，其再生产约束就越硬。

单位的吸引能力也可能趋近于零。如果自我相似单位不符合分配的选择标准，并且再生产约束硬化，那么情况就会如此。[3] 如果来自上面的再生产约束变硬，而又不可能从下面攫取到资源，那么，单位为了生存，就

---

① 我们认为，从中央——地方政府行为方式及其对财政平衡的影响来看，这就是一位中国专家所描述现象的原因："下级权力部门的兴趣在于从国有企业利益场中攫取价值，上级权力部门则向国有企业提供补贴或国有银行贷款，从而补充价值，这二者之间是非对称的，造成了机会主义的地方官员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这导致了国有企业部门坏账累积、债务拖欠，使金融体系抵抗外部冲击和危机的能力非常脆弱"(Jefferson 1998 referred by Peroffi et al. 1998：165)。

② 这可能就是在匈牙利为什么地方政党组织努力使大型企业的总部设在自己的地区，或者使新的中央计划投资置于他们的干部责任之下（Csanádi 1997b）。类似动机也使中国的省级政府以及省级以下政府在1980年代四处游说，建议把原属于更高层级行政的国有企业实行分权化（Sun 1997：10，referring to Lin et al. 1995；Naughton 1996；Walder 1995a；1995b）。

③ 有人对1970年代匈牙利企业的绩效和倒闭的分析是这方面的一个好例子。尽管大企业比小企业更缺乏效率，但小企业更有可能被迫倒闭。事实上，在1970年代，匈牙利企业缺乏效率引起的是有选择的倒闭。而且，政府总是更频繁地为大企业而不是小企业融资解困（Csanádi 1997b：115）。

在1984年之后的中国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现象（Shu 1998：393，cited by Zou and Sun 1996：11－12；Portyakov 1991）。国有企业越是没有赢利，它们与中央政府或银行讨价还价的能力就越强。例如，1989年第四季度启动了1200亿元人民币的信用减免措施——在紧缩时期——以购销经营不善的企业的贷款，主要是国有企业内部信贷，而与此相反，1989－1990年间，数百万乡镇企业（TVEs）倒闭或被其他乡镇企业接管(Zou and Sun 1996，referred by Perotti et al. 1998：160)。不仅仅是对于企业，而且对于地区和政府融资解困，都保持类似的选择标准（Wildasin 1997 cited by Qian and Roland 1998：1444）。

会联合具有讨价还价能力的单位，或间接从它们那里获得利润，以补偿吸引能力的缺乏。[①] 再者，不管再生产约束是硬化还是软化，如果吸引资源是该单位内的唯一机会，那么，行为人就不会主动退出他们所处的网络或组织。[②]

（2）另一种极端情况是，给定攫取和分配的自由决断权，没有来自上面的资源分配（即，单位是依附线的把持者，没有被相似的依附线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再生产约束将唯一地依赖于单位从管辖范围内攫取资源的能力。成功攫取依赖于该单位的下级单位抵制能力的大小。抵制能力越弱，该单位来自下面的再生产约束就越软。抵制能力越强，该单位来自下面的再生产约束就越硬。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否有兴趣促进管辖范围内下级经济单位（economic sub-units）的增长，依赖于该单位在网络内增加攫取能力所带来的利益大小。另一方面，下级单位的兴趣在于增加讨价还价能力，以便更好地抵制攫取。因此，单位努力把管辖范围内的互联线进一步集权化，减少对讨价还价（抵制）能力较弱的下级单位的反馈，[③] 尽管下级单位努力获得增长。

把（1）、（2）两种情况结合起来，由于这些单位内或它们不同层级聚合体内的权力分配特征（即，被依附线俘获或把持依附线的个体决策者），

---

① 在 1970 年代，匈牙利的小型国有企业有过这种经历（Csanádi 1997），它们与大企业签订分包合约，以获得处于有利讨价还价地位的大企业所获得的稀缺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在 1980 年代，同样的动机驱使中国的乡镇企业成为大型国有企业的分包商，当时 60% －80% 的乡镇企业产品都是与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郊区的大型国有企业之间有分包合约的企业生产出来的（Perotti et al. 1998）。

② 例如，尽管自 1980 年代中期开始，匈牙利在法律上允许企业子公司与母公司分离，但是直到 1980 年代末这种分离才开始逐渐增多，而在这期间却很少发生这种情况。但是，从 1980 年代末到 1990 年代中期，加工工业中前 50 强企业分解为 690 多个单位（Voszka 1997）。

③ 这可能是在国家层面上——与以往时期不同——拆分（而不是进一步发展）大企业的措施是匈牙利 1980 年代中期主要政治问题的原因之一。在那一时期，来自外部的资源急剧减少，因为西方贷款和利率上升都需要偿还，该体制的攫取能力却急剧下降。重组措施由于具有累积反馈的大企业抵制而收效甚微（Voszka 1988）。在中国，这可能是具有攫取能力的地方政府下属国有企业没有像东欧国家那样快速发展的原因，在东欧国家，攫取能力分配给了中央政府负责（Huang 1996；Naughton 1996）。

所以，一个单位作为一个下级单位，也许是某种权力分配的一部分，而其内部又包含着另一种权力分配。因此，该单位受上面导向的情形、激励和行为，也许与受下面导向的情形、激励和行为截然不同。在较高层级，以及在管辖范围内，该单位不同或相同权力分配模式的共同影响，产生了不同或相同吸引、抵制、攫取、分配能力的组合。

自我再生产的形式将取决于它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互作用的组合。于是，有选择的软/硬再生产约束的**扩散**（*dispersion*），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适应权力分配的结构类型。各个行为人不同或相同程度的吸引、抵制、攫取和分配能力的组合，决定了该单位再生产约束软/硬的**程度**。再生产约束的强弱将决定动机，同时，单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结构条件将形成再生产期间的可能行为和战略的类型。

6.3 再生产约束硬化与结构特有的反应

结构的动态运行在软再生产约束与硬再生产约束下是不相同的。再生产约束软，就证明所采用的手段（工具）是正确的。因此，没有理由改变现状，只有理由努力维持或改进现状。如果在特定结构中再生产约束变硬，情况将会怎样呢?

在再生产约束硬化的情况下，体制（或较低层级聚合体）的凝聚力下降，权力关系永久或暂时地改变（获得特权的人和提供特权的人都变弱了）。再生产约束硬化和凝聚力下降，将导致增长放慢或不景气，增加经济、社会、政治上的紧张。这些条件造成了在原有的或新的权力分配中恢复结构凝聚力的动机。到最后，每个组合都引起了符合期望的各种可能行动。然而，结构特征使这些努力不会相互独立，也不会局限于一个单位。这是因为，聚合体是相互关联的，一个层级上的再生产约束硬化，已经是其上面和下面的层级上相似发展和连贯反应的累积结果，导致权力分配变化。因此，在互动性结构中，网络中某一层级上再生产约束硬化的因素，与相互关联层级上对再生产约束硬化作出反应的影响是一致的。具体战略步骤（行动）的类型，该行为人的实际权力职位或单位在自下而上和自上

而下的网络中的讨价还价能力所造成的结果，从而他们的行动潜能，都会有所不同。

以下我们将详细说明导致特定单位再生产约束硬化的来自上面和下面的行动，以及该单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地影响（上级单位的和下级单位的）再生产约束的可能反应，指出行动和反应的相似性。

自上而下的行动

资源分配（开支）的责任被分权化，但是资源没有被分权化；

负责开支的机构和组织被分权化；

收入被吸走（攫取）；

提供资源的机构、组织被吸走；

来自上面的转移支付降低；

上面废除反馈；

上面分权化互联线。

自下而上的行动

从下面攫取资源的能力下降，因为抵制增强或资源耗竭；

向下面分配的压力增加。

这些行动的直接目的不在于软化再生产约束，而是要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获取资源以实现再生产。一个单位适应再生产约束硬化的**可能战略**是什么？

自下而上的反应

要求上面给予更多的转移支付；

抵制进一步攫取。

自上而下的反应

通过压缩反馈（简单化）从而降低吸引（施压）能力，或者通过直接减少在资源分配中享有特权的人数，在分配中引入更严格的标准；

取消已成为义务或已被掏空的职能，或者通过分权化或在国家科层中收回职能并取消组织，或者通过在政党科层中分权化职能或收回职能；

消除已成为负债的资产，通过倒闭，或者通过私有化从依附线上切断债务，或者通过把它们分权化；

施加压力以便从下面攫取更多资源。

这些行动和反应对网络自我再生产期间的重组、张力增加、解体和自我撤离具有自我强化的影响。在通过提高讨价还价地位或通过网络向下属单位施加压力来获取资源之前，劝说和强制都不会改变决策者的行为。他们都促进了动态运行陷阱，面临自我再生产的结构性约束。

然而，自我再生产中的自我强化过程，最终也许导致**跳出**网络，该网络中通过以上行动进行自我再生产的机会急剧减少，或者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如果没有较高层级聚合体或机会对它施压，这些条件将自下而上地出现；如果没有下级单位，或者耗尽了可攫取的资源或资源丰富的组织，这些条件将自上而下地出现。换句话说，如果自我再生产持续遭遇硬化的结构性约束，便会出现跳出网络的驱动力。跳出意味着可到达网络所及的国内或国际领域之外。

跳出网络

以贷款形式从网络外获取资源；[①]

促进私有部门发展以创造获取更多资源的条件；

通过多样化所有权（建立合资企业、把企业转型为股份公司、调整管制）和放松入党条件，促进私有资本和资本家的渗透；

把价值（可变现资产，剥离了的人力和活动）转移到网络外，从而掏空僵化的结构。

行动和反应是**在结构上被推动的**。主导条件取决于某个单位当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讨价还价地位，这种地位将推动各自不同的适应、动机以及战略组合。

再生产约束硬化的频率与结构特征

硬的和软的再生产约束，也许是暂时的，也许会持续一段时间。如果该单位的讨价还价能力自下而上地改变，或针对其下级单位自上而下地改变，那么现状也会改变。因此，资源攫取和吸引就会遭遇或避免结构性约束。这些结构特征影响再生产约束硬化所费时间的长短吗？换句话说，权

---

① 这些贷款不同于该单位从管辖区网络内部获得的贷款，也不同于该单位从较低层级或更高层级聚合体那里获得的贷款。

力分配影响必须要频繁地采取行动吗？它影响凝聚力失而复得的时间有间隔吗？

当特定权力分配中资源攫取和吸引遇到结构性约束时，软再生产约束有时可能变硬。如果某个单位在较大聚合体内早先的讨价还价地位被动摇，或者其下级单位的抵制能力增加，那么其再生产约束就会由软变硬。类似地，如果该单位在较大聚合体内的讨价还价地位上升，或者其下级单位的抵制能力下降，那么其再生产约束就会由硬变软。某个单位在不同时期的再生产约束可以是软的，也可以是硬的，并且还可以由软变硬或由硬变软。硬再生产约束的持续性，依赖于该单位是否能够改变其在较高聚合体内的讨价还价地位，和/或在该单位内重新分配权力关系，和/或从网络外获取资源从而恢复和保持现状。软再生产约束的持续性，依赖于该单位能够在什么程度上维持其在较大聚合体内的地位，和/或它能够镇压下级单位抵制能力的时间长短。

在宏观层面上，如果没有机会从网络外吸引资源，也没有机会从较高聚合体吸引资源，那么软再生产约束变硬的频率便依赖于该单位内部的权力分配。更清楚地说，网络内下级单位的抵制（和吸引）能力越弱，该单位在网络内遇到资源攫取障碍（硬化再生产约束）就越不频繁，恢复凝聚力所需的时间就越短。相反，下级单位的抵制（和吸引）能力越强，那么在特定权力分配中，该单位遇到资源攫取的结构障碍就越频繁，它通过重组网络来寻找和攫取新资源也就越困难。这也意味着恢复凝聚力所需的时间更长。因此，不仅再生产约束硬化的频率是结构特有的，而且恢复凝聚力所需的时间间隔也是结构特有的。

考虑自我相似特征——硬和/或软再生产约束可以在同一时间不同聚合体中出现，可以在不同空间相同层级聚合体中出现，也可以在不同时间、相同或不同聚合体中出现。总之，它们可以在一个单位中依次出现，也可以在不同单位中同时出现。[①] 所以，名义级别相同或不同的聚合体上的单位，由于吸引和攫取能力大小不同，导致所面临的结构性约束也不

① 它们甚至可以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单位中，这取决于互联线联结或避开的领域的实力。

同。这一能力决定于整个聚合体以及单位个体的结构特征。[1]

资源获取和分配的工具与结构特征

结构特征会影响行动所采取的工具吗？假定从较高层级聚合体的资源吸引是标准的（n 或 0），如果互联线或攫取能力越集权化、反馈越弱，那么下级单位的抵制和吸引能力就越弱，网络内再生产就越少地遇到结构性约束，从而导致挖掘网络内资源的更强激励。如果互联线或攫取能力越分权化、反馈越强，那么下级单位的抵制和吸引能力就越强，网络内再生产就越频繁地遇到结构性约束，从而导致吸引网络外资源的更强激励。因此，战略改变和资源获取方法都依赖于权力分配，以及网络内对权力分配和攫取变化的抵制能力。换句话说，特定结构将导致通过资源攫取和再分配的结构特有性工具进行再生产的**恰当机制**（*adequate mechanisms*）。在结构上受约束的战略以及资源攫取和分配的工具，将在后面的章节中阐述。

6.4 再生产约束、外部约束与结构特有的选择性

根据网络内特定的权力分配，以及网络内抵制和吸引能力的强弱，整个结构自我再生产的结构性约束会以不同频率硬化。但是，不论权力分配如何，当自我再生产机制遇到结构性约束时，网络的凝聚力和压力都将增加，从而改变现状或者跳出网络寻求更多资源。改变现状（权力分配）在结构上是挑战性的，跳出网络在经济上是挑战性的。来自网络外的资源有助于避免这一结构性挑战。因此，改变现状不是不可避免的。政党－国家

① 例如，在匈牙利，甚至在 1968 年改革之后，资源攫取和再分配能力只分配给了中央政府，但互联线的分配却相对分权化，拥有反馈的国有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较强（Csanádi 1997b）。在中国，1980 年代中期以后，攫取和再分配能力被部分地下放给了地方政府，尽管其分权化程度是有选择性的——参见 C. Z. Lin（1989）。在国家级聚合体上，在省级聚合体内，在省级聚合体之间，在省内行政的不同科层等级上，权力分配的形式差别很大（Zhao Xiobin 1996；Huang 1990）。不同形式的权力结构从而不同攫取能力，部分地因为：国有企业在各省和各行政级别上有选择的分配，国有企业在一个正式层级的权限内的分配，该地区的乡镇企业数量，FDI 的数量。

单位不仅仅嵌套于网络内较大聚合体中。网络外环境——在国内[①]或国际[②]——包围着这些单位或它的较大聚合体。

单位与它的外部环境（国内外部环境或国际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将取决于从网络外施加给网络的约束。在这方面，网络内再生产约束（内部约束）与单位的外部约束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如果再生产约束是软的，那么外部约束就不起作用。如果再生产约束硬化，那么网络外的国内领域或国际环境中的外部约束就更加重要。[③]

如果不大可能在特定权力分配中吸引或攫取资源，从而网络内再生产约束硬化，但可以从网络外获取资源——外部约束是软的——那么，该单位的再生产约束就会变软，改变现状的动机就会像适应性压力（adaptation pressures）那样受到抑制。[④] 如果网络内再生产约束变硬，从网络外吸引（或汲取［suck out］）资源的机会减小——该单位的外部约束变硬——那么，该单位就会有更强的激励在网络内改变现状，适应国内压力和/或外部压力。这一改变可能是短暂的、明确的，也可能导致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⑤]

网络在再生产期间的适应能力，在软外部约束或硬外部约束情况下是

---

① 国内的网络外环境是网络不能直接到达的那些个人领域。因此，这些单位的经济环境，以及与这种环境有关的网络，都将形成某种预算约束。即使这些经济单位相比于网络内经济单位的从属地位以及它们与网络的直接联系产生了扭曲，这种网络外领域也会出现。例如，这些领域包括波兰 1950 年代末开始出现的小农业主，匈牙利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的次等经济成分，中国 1980 年代的私人企业主和农业。

② 该单位的更大聚合体并不意味着外部环境，因为它是网络的一部分。

③ 作为资源攫取来源的国内领域，其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该国家的个体特征（如规模、文化和历史传统、地理政治位置）以及网络内的权力分配。国内的网络外领域越小，网络内抵制能力越强，那么单位就愈加依赖于来自更大聚合体的转移。网络外领域越小，网络内抵制能力越大，从更大聚合体吸引资源的能力越强，那么单位就愈加依赖于国际环境。

④ 但是，一旦贷款和利息必须偿还时，这种大好形势就会结束（有关匈牙利的情况参见 Antal 1979；1983；1985）。从再生产约束的角度来看，在更糟糕的结构条件下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此时的国外贷款已被用来维持现状。这只不过强化了既得利益者的再分配的固定路径。

⑤ 具体情况参见后文中的案例研究。可逆性和不可逆性的原因见后面的第 8 章。

截然不同的。由于该结构固有的动态运行陷阱，在软外部约束情况下，网络的内部动态运行可以根据再生产的内在标准和固定路径，灵活地"转化(translates)"并在形式上适合（form-fits）环境影响。在硬外部约束和硬再生产约束情况下，由于同样的陷阱，环境影响和适应动力会增加再生产约束硬化的频率、降低凝聚力，刺激与结构相符的工具的反复实施，从而增加压力和/或瓦解该结构。**适应性动力因而是自我耗竭的。**

最后，描述政党－国家体制自我再生产的结构及动态运行特征的因素，以及结构特征影响自我再生产约束的方式，可以在与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观点的比较中得到界定，软预算约束一直以来被看做政党－国家运行的一个关键特征。表2对比较观点进行了分类，总结了传统模型和IPS模型的特征。

表2　比较观点：传统预算约束与再生产及外部约束

方法	传统观点	IPS模型的解释	
特征	预算约束	再生产约束	外部约束
运行背景	政党－国家内的一个因素	网络内的一个因素	网络与网络外领域相互关系中演化出的一个因素
动机	经济理性与内在的增长愿望	政治理性与结构性动机	经济理性
约束的成因	制度－经济的	权力－结构的	主要是经济的
约束的主体	企业	网络内任何行为人或自我相似单位	网络的行为人和单位
有关行为人	两个行为人：国家和企业	单个实体：自我相似单位	网络内和网络外的行为人
职能	两项职能：分配(国家)与抗辩(企业)	几项职能：攫取、分配、抗辩、抵制	竞争、渗透
结构背景	—	行为人把持依附线，又被依附线俘获，固有的不平等的讨价还价能力	—

续表

方法	传统观点	IPS 模型的解释	
特征	预算约束	再生产约束	外部约束
行为人之间的关系	国家与抗辩企业之间的家长主义	通过网络从所有关联方面同时影响自我相似单位，反之亦然（互动性）	相互作用主要是经济性的
约束的性质	对企业是软的	根据讨价还价地位有选择地软/硬	软/硬

表 2 表明，再生产约束的概念包括几个传统软预算约束概念所不能反映的特征。例如，行为人在结构内的双重地位和职能，在同一实体中分配者（distributor）与抗辩者（pleader）是同一个行为人；运行原则的特征——政治垄断的依附性、利益提升、资源攫取和分配——以及行为人在结构内的双重地位和职能，激发了政治理性的结构动机。这些将决定自我再生产期间经济行为的政治约束。自我再生产能力的复杂性，以及这种能力因结构内讨价还价地位差异而存在的有选择性，决定了自我再生产约束上的差异。在自我再生产期间，在结构上激发的经济行为的政治理性，涉及进一步的约束：整个结构自我再生产的陷阱。再生产约束包括空间上、时间上、各级聚合体中自我相似性的结构及动态运行特征。但是，再生产约束还融入了个体决策者和自我相似单位的再生产约束差异的结构背景。

再者，与软预算约束的稳定特征且缺乏结构背景相反，再生产约束不仅是一个**结构性的**概念，而且也是一个**动力性的**概念。对于再生产约束，不仅可以在空间和不同聚合体上加以扩展，而且可以在时间上加以扩展。行为人或单位在内部或与下级单位的关系中讨价还价地位的改变，可能会导致再生产约束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因其所控制的依附线和反馈的数量和质量上的变化而直接发生，也可以因其下级单位或较大聚合体地位的改变而间接发生。这种变化还可以因内部陷阱和外部压力而发生，这些陷阱和压力将共同加强网络内外决策者的相互作用，从而导致模式内、模式间以及体制间的重组。

软预算约束没有反映出权力网络内固有的不平等，因此没有反映出有

选择性。表3指明了软预算约束与有选择的软再生产约束对自我再生产的动态运行的作用。

表3　软预算约束与有选择的软再生产约束在再生产的动态运行中的作用

有选择性在自我再生产中的作用		
影响	传统的预算约束	再生产约束
约束的性质	对企业一般是软的	根据讨价还价地位有选择的软/硬
选择的标准	—	战略－政治理性
选择对分配的影响	—	基于政治理性的分配的固定路径
选择对动机的影响	—	政治理性的经济行为，谋求增长
选择对再生产过程的影响	—	缺乏效率约束
谋求增长的动机	个体谋求增长的内在愿望，不受效率约束	结构性动机与有选择性，受到权力分配以及单位在其中的地位的约束
从聚合体角度看选择与聚合之间的相互作用	—	由于政治理性的经济行为，特定权力分配中的资源被耗竭了，因此整个结构再生产约束有时会硬化，**聚合体层面出现短缺**。
从单位角度看聚合与再生产约束之间的相互作用	—	如果不能吸引或攫取资源，那么该单位再生产约束就会硬化，**单位层面出现短缺**。它选择重组还是跳出网络，依赖于内部权力分配和外部约束。

根据软预算约束观点，企业经理的个人抱负和国家官僚的家长式行为解释了结构性动机以及他们各自的行为。相反，根据再生产约束观点，有选择性解释了网络内有选择的吸引和抵制能力，揭示了分配中干预和偏的政治理性关心。由于这种有选择的关心，它还解释了软再生产约束的有选择性，从而解释了短缺的有选择性。决策者对有选择的关心的反应，指出了有选择性与个体决策者谋求增长的政治理性经济动机和行为之间的紧密联系。有选择的关心、有选择的软再生产约束以及政治理性经济行为，共同影响了整个单位：它们造成了再分配的固定路径，以及整个结构再生产

约束的偶然硬化。

这些因素还解释了整体单位偶尔出现短缺的原因。结构差异与有选择性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不同的权力分配意味着该单位内不同的行为人面临有选择的软再生产约束。再者，不同的权力分配和再生产约束的不同的选择性，解释了整个结构再生产约束硬化的不同频率。整个单位自我再生产的动态运行，以及该单位内有选择的再生产约束硬化的不同分配，将决定资源攫取和分配的可能手段，或者说将决定自我再生产的结构特有性工具。有选择的软再生产约束的分布，以及单位自我再生产的动态运行，还将决定硬化再生产约束在空间、时间上有选择地扩散的特征，以及整个结构解体的特征。

基于以上观点，在后面章节中，我们将用再生产约束作为预算约束的扩展解释，并结合政党－国家权力关系，在时间上、空间上和聚合体上的不同权力分配，以及权力结构的不同条件，分析个体决策者和自我相似单位。

7 自我再生产的特定模式与转型的路径

我们在前文中已经定义了政党－国家结构及其动态运行的自我相似特征，并指出了权力分配差异的结构背景。我们也分析了结构特征和自我相似特征对自我再生产的动态运行的综合影响。结构特征和自我相似特征表明，结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对结构内有选择的软约束分布的影响也是多种多样的。尽管如此，结构类型仍然会影响再生产约束的硬化及其频率，并且会产生行为后果。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对于产生无数种自我再生产的动态运行的无数种结构类型，是否可以基于某种体制因素把它们划分为几个特征组？我们将描述满足这些标准的三种主要的权力分配模式。这些模式造成了再生产约束硬化的不同频率、自我再生产的不同方式、转型的不同路径。转型同时包括混合子域（entangled subfield）中网络解体和新体制的子域演进。

7.1 对不同的权力分配进行分组

分组标准

政党－国家的不同发展和转型可以从体制再生产角度、根据权力分配及其恰当动态运行来加以分组。这包括三个主要的结构性因素，它们是结构的主要要素的关联的变型：（1）互联线的分配；（2）经济反馈的分配；（3）资源攫取和分配的权限在国家科层中的分配。[①] 我们将使用以下缩写

① 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忽略科层内的严格性。

作为简化因素：

I_2（d）　互联线被分权化；

I_2（c）　互联线被集权化；

I_3（+）　来自经济领域的反馈普遍存在；

I_3（o）　来自经济领域的反馈不存在（很少）；

E（d）　资源攫取被分权化；

E（c）　资源攫取被集权化。

考虑到这些因素稳定性和变化，我们以动态方式来对它们进行组合。[①]以一个自我相似单位为例，包括这三个因素的四种动态运行情形如下：

（1）三个因素当中一个变化，两个稳定；

（2）三个因素当中两个变化，一个稳定；

（3）三个因素都变化；

（4）三个因素都稳定。

为了能进行自我再生产，至少有两个因素必须稳定。稳定性意味着这些特征在自我再生产期间发展出了强制性路径，而第三种情形中的不稳定意味着自我再生产期间该模式内部权力分配可能发生变化的趋势。这一标准的基础在于政党－国家结构运行中的动态陷阱，其产生了一个自我强化过程，具有基于政治理性关心的自我再生产固定路径，但缺乏可抑制住它的效率标准。这样看来，对于情形（1）和（4），就需要考虑自我再生产的必要条件。

情形（1）具有24种变型，其中只有两种变型满足必要条件。在选出的两种变型中，一个要素上的变化趋势强化了该组合自我再生产的趋势[②]。

---

① 我们用简化的方式来分析这些变化，只考察两个极端之间的转变，而不考察中间阶段无限多的情况。事实上，我们把转变解释为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的运动。

② 例如，我将从第（1）组中明确排除在政治垄断结构中毫无意义的组合。我们认为从政党－国家再生产的角度看，I_2（c）、I_3（o）、E（d）；I_2（d）、I_3（o）、E（c）和I_2（d）、I_3（o）、E（d）是不相关的。再者，如果对吸引和抵制能力只有又弱又少的反馈，那么在互联线集权化的结构中便没有理由和力量去分权化攫取。如果攫取被集权化，对力量分权化没有反馈，那么在第二种情况下也没有理由和力量去分权化互联线。并且，如果互联线和攫取都被分权化了，那么也没有理由和力量去创造或增加反馈。

这是因为，动态运行陷阱强化了自我再生产的固定路径，提高了有选择的抵制和吸引能力。结合与再生产约束硬化对应的行动和反应的自我强化趋势，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变化趋势是与模式相符的。由于同样原因，与一般趋势相反的那些变化，将会**暂时背离**自我强化过程，迅速与形式相符（form-fitted）。从24种变型中保留下来的这两种组合及其动态运行是互联线的集权化水平改变、其他因素稳定的情况：第一，I_2（c）；I_3（+）；E（c）和I_2（d）；I_3（+）；E（c）；第二，I_2（c）；I_3（+）；E（d）和I_2（d）；I_3（+）；E（d）。

结果，与第（4）组的一种情况I_2（c）；I_3（o）；E（c）结合起来，便有了最初因素的三个重要组合，其确定了权力分配模式，以及自我再生产固定路径的自我强化方向，这三个组合是：

1 I_2（c）；I_3（o）；E（c）

2 I_2（c）；I_3（+）；E（c）和I_2（d）；I_3（+）；E（c）

3 I_2（c）；I_3（+）；E（d）和I_2（d）；I_3（+）；E（d）

现在让我们考察第（2）组的动态运行，其中两个因素变化、一个因素稳定，以及第（3）组的动态运行，其中三个因素都变化。因此，在第（2）组中有24种变型，在第（3）组中有8种变型。第（2）、（3）组中的累积变化已经显示了结构的**不稳定性**。它们对应着政党-家要素**解体**的阶段，这种解体的原因在于动态运行陷阱的组合效应，以及再生产约束硬化的相应行动和反应对结构的影响。因此，与我们在第（1）组中的选择战略相反，这里，我们将考虑导致解体而不是自我强化运行的那些**相反**方向的变化。在这些情况下，稳定化变化（stabilizing changes）只是暂时的。因此，这些情形将被作为第（1）、（4）组中保留下来的那些变型的解体阶段。这样，我们便可以从第（2）组的24种变型中选出三种变型。不符合IPS模型中所描述政党-国家逻辑的组合，以及不符合解体和演进动态运行逻辑的变化，都将从第（2）、（3）组中剔除，尽管它们也显示了相反的趋势。于是便有了以下三种情况：第一，互联线和资源攫取被分权化，I_2（c）；I_3（o）；E（c）——I_2（d）；I_3（o）；E（d）；第二，资源攫取被分权化、反馈被降低，I_2（d）；I_3（+）；E（c）——I_2（d）；I_3（o）；E（d）；第三，互联线被分权化、反馈被降低I_2（c）；I_3（+）；E（d）——

I_2（d）；I_3（o）；E（d）。

1* I_2（c）；I_3（o）；E（c）——I_2（d）；I_3（o）；E（d）

2* I_2（d）；I_3（+）；E（c）——I_2（d）；I_3（o）；E（d）

3* I_2（c）；I_3（+）；E（d）——I_2（d）；I_3（o）；E（d）

1*、2*和 3*的第一部分**在变化之前**符合 1、2 和 3 或它的变化。解体的最终结果在三种情况下是相同的：互联线被分权化，资源被分权化，反馈消失。在后文中我们将会发现，1*、2*和 3*事实上代表了 1、2 和 3 不同的解体模式。

在情况 1，再生产具有三个稳定的因素：集权化的互联线 I_2（c），来自经济领域的弱反馈 I_3（o），集权化的资源攫取和分配 E（c）。由于弱反馈，结构内资源吸引能力和抵制中央干预的能力都较弱。这种组合将显示再生产期间进一步集权化的趋势。

在情况 2，互联线被集权化 I_2（c），来自经济领域反馈较强 I_3（+），资源攫取和分配被集权化 E（c）。由于反馈，存在决策者对干预的有选择的抵制和吸引能力，以及对分配的有选择的吸引能力。反馈创造了资源获取的有利环境。互联线的分权化 I_2（d）强化了抵制能力增加和进一步有选择的分配的趋势。

在情况 3，互联线被集权化 I_2（c），来自经济领域反馈较强 I_3（+），资源攫取和分配被分权化 E（d）。在这种情况下，抵制能力和资源获取能力不仅由于反馈而演进，而且由于已经分配给较低层级的资源攫取能力而演进。互联线的分权化 I_2（d）增强了权力进一步分权化的趋势。

组合 2 和组合 3 显示了不同程度的分权化趋势以及与第一种情况的区分。组合 2 和组合 3 都形成于组合 1，只不过在组合 2 中改变了一个因素，从 I_3（o）到 I_3（+）；在组合 3 中改变了两个因素，从 I_3（o）到 I_3（+），从 E（c）到 E（d）。

这种分组方法适合 IPS 模型分析。然而，这并不排除其他替代的分组概念。虽说我们在前文中已经强调，结构变型的组合将涵盖所有政党－国家以及它们的各级聚合体，但是当前的分组并没有包括所有可能的变型。这三种情况及其变型在时间和范围上都将涵盖绝大多数可能的权力分配类型。但是，我们不排除经验研究中可能会出现不适合这三个组的新的

个案。

7.2 权力分配的三种模式及其动态运行

基于从三个结构因素的变型中选出的三个组，我们可以从体制再生产的角度，把政党 - 国家的发展和转型划分为前文所述的三种基本的权力分配模式[①]（表4）。让我们从网络再生产和发展的角度，把这三种模式称为**自我掠夺型**（*self-exploiting*）、**自我解体型**（*self-disintegrating*）和**自我撤离型**（*self-withdrawing*）。三种模式的命名已经说明了它们自我再生产的动态运行特征。在再生产过程中，第一种模式在每一个方面都是稳定的，第二和第三种模式在一个方面是不稳定的，但在另外两个方面是稳定的。由于体制和模式在再生产期间的陷阱沿着稳定特征而演进，这些稳定特征导致解体和演进的模式专有特征，所以，这些结构模式将不仅决定再生产的不同模式，而且也将有助于追溯特定体制解体、崩溃和演进的不同路径——总之，转型的不同路径。

从自我再生产角度看，表4包含了三种模式中的以下发展逻辑和动态运行：（1）权力分配的典型模式；（2）特定权力分配中单位与其下级单位之间的关系；（3）特定权力分配产生的再生产约束的类型和频率；（4）特定权力分配所推动的资源攫取和分配的适当工具；（5）特定权力分配对经济发展和体制再生产的影响；（6）所采用的工具对网络条件的影响。

表4　政党 - 国家中权力分配的基本模式与相应的再生产和转型

再生产模式	自我掠夺型	自我解体型	自我撤离型
权力分配	集权化的攫取、再分配、互联线，没有（很少）经济反馈	集权化的攫取、再分配，相对分权化的互联线，强经济反馈	部分分权化的攫取、再分配，集权化或分权化的互联线，强经济反馈

① 参见相应章节中一种模式内权力分配的不同变型。

续表

再生产模式	自我掠夺型	自我解体型	自我撤离型
单位与下级单位之间的关系	下级单位有限的吸引和抵制能力	下级单位有选择的强吸引和抵制能力	下级单位有选择的强吸引和抵制能力
自我再生产的约束	很少硬	偶然硬	经常硬
获取资源的工具	强制性资源调配	资源调动型改革	资源调动型（分权化）改革，资源创造型改革
经济发展强制性	经济增长和张力	经济衰退和改革深化	网络外经济增长，网络内经济衰退和改革深化
网络的条件	不损害原有网络	解体	相对和绝对收缩，解体有选择地扩散并向上渗入结构

自我掠夺型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权力分配是这样的：资源攫取、分配以及互联线都是集权化的，很少或没有经济反馈。这些特征意味着网络内的弱抵制能力和吸引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聚合体拥有无限制的攫取能力。换句话说，该单位的再生产约束是软的。

对于某个单位来说，下级单位通过依附线和反馈进行抵制和影响的能力越弱，它在特定权力分配中施加压力的能力就越强。因此，不论哪一级聚合体，在这些情况下都可以通过施加政治压力和/或发起重组权力关系的运动而攫取资源。软约束会持续存在，因为可以反复进行强制性资源调配（攫取和重新分配），而不会遇到有意义的抵制。强硬的重组将导致强制性资源调配，或对资源丰富的目标（如人力、经济单位）进行直接调配。我们并不是说只有自我掠夺型模式中才使用强制性资源调配，而是说只有自我掠夺型模式中才**非常频繁地**使用强制性资源调配。

例如，在1950、60年代，匈牙利、中国和罗马尼亚的强制性资源调配

包括产品结构变化、企业合并、农业合作社的合并或分解（Petö and Szakács 1985；Barnett 1967；Crowther 1988：56－58）。其他手段，如 1980 年代以来中国对所谓“预算外（off budgetary” and “extra budgetary）” 收入的攫取（Huang 1996；Wu and Qian 1999；Lin，C. Z. 1989），也属于强制性资源调配。*（中国 1990 年代以来所采取的措施还包括：为资助进口的强制性出口，强制性投资增加，强制性资本增加，强制性工人分享（Smyth 1998），强制性发放国债（2000 年的访谈）。我们也许还可以加上通过以下途径实行的强制性资本转移：为了优先工业投资，政府以固定的低价强制性收购农产品，实行工农价格剪刀差，同样地，这类手段还包括在其他领域的固定价格、固定工资，或直接的强制性人力转移（就像 1950 年代所有政党－国家和更早时期的苏联一样，强制性劳动力迁移实际上提供了免费人力）。

由于同样原因，匈牙利对企业管辖权的集权化或分权化，经济管理机关的重组和合并（Csanádi 1985），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国家和政党的中央机构的废除，也属于这类措施（Huang 1996；Burns 1989；Hong Yung 1978；MacFarquhar 1974）。

如前文所述，网络内施压能力越强，那么再生产约束硬化就越不频繁，普遍存在硬再生产约束和缺乏凝聚力的时期也就越短。因此，如果特定权力分配的再生产是没有约束的（软约束），那么，不论在哪一级聚合体，都没有必要去改变优先权、适应、寻找其他资源攫取工具。经济和人力资源被最大极限地掠夺——如，1980 年代末的罗马尼亚（Verdery and Kligman 1990），2000 年代初的朝鲜（Eberstadt 1998：203－231），大跃进

---

* 在中文中很难区分“off-budgetary revenues” 与 “extra-budgetary revenues”，我们将其统译为“预算外收入”。事实上根据一些学者的理解，前者主要包括：个人、企业或海外华人所提供的“自愿”捐赠；各种违规收费；来自乡镇企业的利润；出售土地所得的收入。后者主要包括：政府资金和附加税，如农业附加税、教育附加税以及基于收入、消费、利润或营业等方面的税收；国有企业专项资金提留，如折旧基金、重大维修基金和创新基金；地方自筹资金和行政收费，如道路建设基金、公共事业收费、道路通行税、学费。参见：Ze Zhu and Barbara Krug. “China's Emerging Tax Regime：Local Tax Farming and Central Tax Bureaucracy” . 2005，ERIM Report Series Research in Management，ERS－2005－088－ORG。——译者。

和文革时期的中国（Barnett 1967；MacFarquhar 1974），斯大林独裁时期的苏联。这些体制仍然保持稳定，尽管看起来它们都存在经济上非理性的开支、对经济和人力资源的掠夺、张力的增加。这是因为，关联和运行的主要要素和原则仍然没有受到损害。因此，经济按照政治理性的方式运行，同时网络内没有（或只有弱）抵制能力，从而自我再生产的软约束，都将从经济上侵蚀该体制的基础。这一再生产过程将维持权力网络的现状（控制和重叠［overlapping］能力）。同时，自我再生产将持续地增加网络内的经济和社会张力。如果增长的自我相似动机和逐渐增加的张力暂时地硬化了再生产约束，那么，这将进一步激发强制性重组和资源集权化来软化约束，同时通过国家和政党科层对下级单位和决策者增加压力。如果再生产约束硬化和张力增加，由于外部性而必须与稳定相一致，那么强制性再生产就会暂时松解和停止。如果单位内领导权改变、较大聚合体中出现危机或发生类似事件，或网络外预算约束暂时硬化，那么就会出现这种外部性。由于同样的结构性原因，凝聚力缺乏的时间跨度与遇到结构性约束的时间跨度是负相关的，即，遇到硬再生产约束的时间跨度越长，恢复凝聚力的时间跨度就越短。外部约束如果是软的，那么在这种模式中，它就有助于体制的软自我再生产。如果外部约束一直是硬的，那么强制性资源调配措施便可以得到强化，张力增加可能会导致社会暴乱。

自我解体型模式

第二种模式可以被称作自我解体型。该模式中权力分配是这样的：互联线绝对集权化，但网络内存在强经济反馈，攫取也是集权化的。这意味着在集权化攫取和分配的背景下，接受反馈的单位在网络内的吸引和抵制能力较强。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强吸引和抵制能力通过强制性资源调配措施，阻碍了结构的再生产。这些措施（如果被实施）是有选择的，究竟对谁采取这种措施依赖于后者抵制能力的大小。根据 IPS 模型，强制性资源调配与权力关系特征在形式上是相符的。由于动机和行为（增长的驱动力）的自我相似特征，那些获得反馈的单位有选择的软再生产约束，以及它们在网络内对资源集权化相对较强的抵制能力，所以，在这种模式中，从宏观上看，这种体制将比在自我掠夺型模式中更加频繁地遇到再生产约束硬化。

由于结构特征而遇到再生产约束硬化的时间间隔越短、预期越大，网络内恢复凝聚力的时期就越长。既然资源调配由于结构性原因而遇到抵制，那么，单位就更加有激励去寻找挖掘资源的其他方法。在凝聚力松弛、享有特权者地位下降的情况下，改革派在保守派不反对改革的情况下，便有机会获得资源以恢复现状。因此，在这些条件下，在特定权力分配中便会出现实施改革的机会。改革将变成一种获取资源和恢复结构凝聚力的手段。让我们把资源调动型改革称作网络范围内的资源挖掘行动，其通过改变网络内资源主体的活动背景（环境）来挖掘资源。然而，这种改变不包括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但是包括生产要素的结构－制度背景的重组。

实施这些措施需要利用资源调动的规范激励、资源攫取的规范手段，而不是一些个体性的激励和手段，来最终降低国家的行政作用。这些措施包括，国家和政党向更低行政层级和/或企业分配其决策权。并且，从前被占有的利益提升渠道可能被"解开（disentangled）"，缩小从前享有特权的人的圈子。利用这些手段，从前被隐藏的资源可以浮出表面，或单位从被动变主动。

通过规范的宏观手段来降低国家行政作用、从而调动资源的例子如下：准世界市场价格制度，收益共享结构，所得税制度，企业收益制度，降低指令性计划的作用，分权化投入、产出、商业合作、投资、进口和出口等方面的决策。调动资源的方式多种多样：缩小有选择分配的范围（例如，减小享有特权者的数量，改变收益共享比率，提高税率）；降低下级单位的吸引和抵制能力，例如，削弱下级单位的隐藏力量，废除其潜在调解人、分支（直属）部委，或者剥夺部委的利益强化以及资源调动的能力和职能；把干部管理和企业经理任命等权力下放给较低层级的政府；切断下级单位的来自政党－国家结构中较高层级的反馈（特权关系）（例如，通过精简党委会），使下级单位讨价还价能力自然削弱。

由于网络内接受反馈的行为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和抵制能力，调动起来的资源将总是基于政治理性标准来加以分配，有助于维持固定路径，从而进一步强化选择性目标的软再生产约束。这一陷阱导致了进一步的分权化，网络内可调动的资源更少，集权化的可能性更小，因此宏观层面上的

再生产约束硬化更频繁。来自上面的再生产约束硬化或网络外约束硬化，进一步增加了通过分权化改革来挖掘和掠夺更多资源进行分配的持续驱动力。然而，在改革深化的同时，攫取、集中和再分配资源的能力下降了，但不能废除享有特权者的软预算约束的强制性路径。[①]同时，由于分权化改革，通过互联线（D_2）维持传统控制的难度将会增加，D_2向外延伸到众多的组织、活动和职位以及那些职位上的非政党成员。使用网络的强度也将降低，因为通过网络分配资源的期望降低了。

总之，反复出现的维持自我再生产的驱动力将逐渐瓦解相对地不能重叠非政党领域的网络：通过活动、组织和职位结构；通过网络内分配能力下降、积极性下降、凝聚力松弛所导致的网络收缩；通过网络内分配能力下降、活动减少和凝聚力松弛所导致的网络弱化；通过承诺与事实的差距扩大、经济下滑、反馈简化所导致的政党合法性削弱。再者，改革深化将瓦解网络，但不创造其他替代的资源和替代的行为理性，而是增加单位层面上再生产约束硬化的频率。当再生产约束持久变硬时，由于在特定结构中不能从更高或更低聚合体吸引和攫取更多资源，导致互联线的分权化加速，攫取权被部分地分权化，消除负担的动力增加，创造网络外资源或从上面吸引资源的努力加强，剥离僵化刚性结构的动力增加。但是，到了那个时候，这种结构模式中结构的制度条件和经济条件恶化，以至于凝聚力无法恢复、体制开始崩溃。

自我撤离型模式

第三种模式可以称作自我撤离型。在这种模式中，互联线或者被集权化或者被分权化；存在来自网络几个维度的强经济反馈，资源攫取能力被部分地分权化。因此，在特定权力分配中，由于反馈的存在，导致对于资源攫取的抵制能力有所增加，并且由于存在替代性的本地资源，导致对上级的依赖性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强制性资源调配和资源调动措施都不足以实现自我再生产，因此，结构内的再生产约束由于动态运行陷阱而经常变硬。结果，网络内资源获取动力被迫通过不断地职责分权化（开支和分配目标）和/或跳出网络来消除分配负担。而跳出网络方式包括：剥离

① Csanádi 1997b：229；Steinfeld 1998：xiii-xv，18－21；Gordon and Li 1997：2.

网络，和/或容许网络外领域增长，或容许其渗入网络以攫取更多资源。

创造可攫取的资源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容许网络外资源丰富的单位数量增加，或为这一过程创造条件。又如，让超出计划的产品以市场价格进行交换，增加网络外收益，[①]改善国内私有企业的环境，容许国有企业创造私有子公司；让政府部门的个人暂时或有条件地离开网络，发展私有企业；提高自留地耕作。再如，容许网络外资源的**渗透**，比如，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建立合资企业，把国有企业转型为股份制企业，以便国外和国内私有资本的渗透，撤销劳动力流动、市场定价、产品和资本流动方面的障碍。

让我们把资源创造型改革称为这样一些措施，通过这些措施，决策者部分地或完全地“跳出”网络，或让网络外领域增长以便获取新资源，或让它们渗入网络。这一过程增加了网络的替代领域（替代行为、活动、组织、财产资源和理性）。这样看来，这些改革导致了网络的相对收缩，而在网络外创造了一个转型了的子域。[②]

然而，资源创造型改革将使网络在绝对意义上也产生收缩。这一过程可以通过故意撤离互联线和科层线而直接发生，例如，中国通过乡镇一级实行半自由官员选举，在县级以下撤离网络。[③] 绝对收缩也可以这样发生：政府自己完全地撤离，或部分地撤离（例如，从各个工业部门撤离），收缩国家职能和各自的组织。[④]

---

① 在中国，增加替代性领域的方法之一是1980年代前半期开始实施的所谓双轨制。双轨制是指，对于所有超过计划的商品，同时通过传统计划渠道和市场渠道来加以分配。双轨制意味着该体制下的产品具有双重定价制度：一种商品将有两个价格，一个国家制定的计划价格（很低），一个市场价格（很高）。在完成计划任务之后，剩余商品将可以以市场价格出售。通过这些工具，企业逐渐学会了如何在计划外运作，通过直接销售而出现了市场部，增加收入。对小企业来说这种机会更大，因为大企业受到更严密地监管——它们的价格不能偏离政府决定的价格，当商品供不应求时，计划者就会削减大企业直接市场交易的产品份额（Naughton 1996：8；Jin and Haynes 1997；Qian and Xu 1993；Smyth 1998）。

② Naughton把非国有部门的相对增长称为“计划外增长（growing out of the plan）”，见McMillan and Naughton 1992：130－143。

③ Lai, Hairong 2004；Shuhfan 1987：32，fn. 18.

④ Csanádi and Lai 2003.

绝对收缩可以间接发生，这时，互联线的目标和那些依附于科层线的行为人跳出网络，或消失，但国有企业或其他依附单位出现破产、倒闭或私有化。[①] 在特定聚合体层级上，再生产约束硬化所激发的这些行动具有几个后果：经济单位被切断网络，从而依附于网络的下级单位的数量减少，可供网络内剩余下级单位攫取并再分配的（货币形式的）资源增加。它们还向单位提供了网络外资源丰富的实体。

如果网络内剩余资源（资本、人力、技术）通过掏空和剥离僵化结构而转移到网络外，那么网络也会收缩。发生这一过程的原因在于从网络外获取资源作为替代选择的吸引力。这些选择将促使决策者部分地或彻底地退出网络——以个人身份（Gordon and Li 1997：1－2，23），或有组织地（Voszka 1997；Qian 1996：430；Smyth 1998：798）——掏空僵化的结构，把负担留在网络内（Qian 1996：431）。通过结合新领域，或者甚至从网络内外抽取收入（例如，以子公司的形式与私有企业一起设立合资企业），可以产生这种情况。从依附线上切断目标，网络收缩，以及通过把人力、技术和资本转移到网络外而掏空网络，都会导致网络在绝对意义上发生自动撤离或强制性撤离。再者，由于可获得替代资源，所以使用网络的强度也下降了。

对网络内再生产约束硬化的期望越高，分权化和跳出网络的压力就越大。期望、驱动力和压力将使资源创造型改革的加速，加快网络外领域的增长和网络的收缩。网络外的领域越大，价值、组织和人力在网络内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换就越强，同时网络内经济单位所承受的网络外竞争压力也越大。这一过程是自我强化性的，因为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再生产约束硬化，将增强网络内的特殊动态运行，使体制瓦解和转型。再生产约束硬化看来适合该模式和体制的特征：有选择地在一个层级聚合体上、在多个聚合体当中，从较小经济单位扩散到较大经济单位，从较低级聚合体扩散到较高级聚合体。

总之，三种模式中的抵制和吸引能力、再生产约束硬化频率、自我再

① 根据得自私有化的资源的利用，资源如果被用于补贴残余国有企业或社会事业，那么就会被重新配置，如果被投资于合资企业、基础设施、私人企业股份，那么就会导致资源创造。同时，私有化降低了网络内的资源目标。

生产工具，都截然不同。这些差异性特征又将对自我再生产期间的经济条件演进和政党－国家网络条件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问题在于：这些运行差异会影响转型的条件吗？我们将证明，模式特征对解体、体制崩溃的顺序从而政党－国家要素转型的顺序，都将产生强有力的影响。

7.3 模式特征与解体和演进的不同顺序

如前所述，不同的模式意味着不同的自我再生产工具，这些工具对特定模式的动态运行起着重要作用。例如，纯粹的有改革或没有改革，将决定解体、崩溃和演进的顺序。改革的类型（资源挖掘型或资源创造型）和改革的起点（从上面开始或从下面开始），将决定权力结构要素转型的顺序：经济转型在先，还是政治转型在先。然后，这些顺序又将决定体制崩溃的类型（突变、温和或渐进），体制转型的特征，以及在转型过程中体制解体、崩溃、演进的顺序，从而各种模式中政治转型的经济条件（下滑或改进），以及经济转型的政治条件（独裁或民主）。因此，顺序和条件将限制决策者的机动空间和他们在网络内外、模式依据、在体制崩溃之前、期间和之后的可能战略（表5）。这些因素又将决定各种模式转型的不同社会成本（表6）。

表5　模式对政党－国家转型的动态影响

模式特有的影响	自我掠夺型	自我解体型	自我撤离型
改革的实施	没有改革	改革	改革
改革的类型	—	资源挖掘型（分权化改革）	资源挖掘型和资源创造型改革
改革的起点	—	从上面开始	从上面和下面开始
崩溃的类型	突变	温和	体制逐渐消亡
解体的类型和要素的演进	重叠进行	有顺序地进行	从局部扩展，有选择地推进，绝对收缩和相对收缩

续表

模式特有的影响	自我掠夺型	自我解体型	自我撤离型
主要要素解体、崩溃和演进的顺序	(1) 突然崩溃 (2) 政治和经济解体和演进重叠进行	(1) 政治解体 (2) 温和崩溃 (3) 政治演进 (4) 经济解体和演进	(1) 经济解体和演进 (2) 体制逐渐消亡，通过从局部扩展、有选择地推进、绝对收缩和相对收缩 (3) 政治解体
政党－国家要素转型的顺序	政治与经济转型同时发生	政治转型在先	经济转型在先
经济转型期间的政治条件	名义上的民主政体，不确定的结果，受到个体特征强有力的影响	民主政体	独裁政体
政治转型期间的经济条件	宏观经济急剧下滑，深度危机，不平衡扩大，恢复时期长	宏观经济下滑，崩溃前和后的危机，不平衡，恢复时期相对短	宏观经济增长（网络内下滑，网络外增长）可以抚平网络内危机的关键点
网络内决策者的机动空间	崩溃前网络内广阔的机动空间	崩溃前完全受到限制	在网络内被限制
网络外决策者的机动空间	受到强有力的限制（崩溃后）	完全受到限制（崩溃之前和之后）	广阔的机动空间

模式与解体和演进的顺序

表 5 包括各种模式对自我再生产的动态运行和政党－国家要素转型产生的特殊影响。

在自我掠夺型模式中，由于网络实际上保持完整无缺，只是倾向于进一步的集权化，所以体制崩溃之前没有发生解体。于是，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会发生体制崩溃：强制性资源调配导致发生更大张力和压力，遇到了扩张的国内外政治时机和精英阶层内部冲突，这种冲突的原因是，（被预料到的）领导逝世和/或较高聚合体中相邻自我相似单位或上级单位的崩

溃，网络内再生产约束硬化，网络外的外部（预算）约束硬化，等等外部性。[①] 因此，体制将意外地和突然地崩溃。如果一直被压抑的张力爆发（社会革命），并且没有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可以渐进地接管崩溃的体制，便会出现体制突变。在这些情况下，在体制突然崩溃之后，体制剩余要素的解体和政治经济演进，将重叠进行。这种情形将决定经济解体和演进期间极度不稳定的政治条件和累积的不确定性，并由于政治解体和演进期间深远的经济危机而进一步恶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决策者几乎没有机动空间。

在自我解体型模式中，资源调动型（分权化）改革占主导，结构要素的解体和演进，以及体制崩溃，都是有顺序的。政党作为一种制度权力结构，在它的解体过程中，政府决策会首先受到影响，然后互联线开始解体，再后是政党机构开始解体，最后是体制崩溃。温和的体制崩溃之后是政治演进，国家所有权解体，以及经济演进和政府职能转变。在政治转型的第一阶段，经济解体和演进的政治条件类似于发展中民主政体的政治条件，具有发展中民主政体的所有缺点，只不过掺入了特定国家的个体特征。随后，模式特有的自我再生产的遗留特征所导致的经济危机，恶化了政治转型的缺陷。

在自我撤离型模式中，随着网络内再生产约束频繁地硬化，分权化和资源创造型改革进一步加速。结果，来自网络外的竞争压力增加，使网络在融合的经济子域里绝对收缩。国有财产被变卖或关闭，互联线被撤离、打破、抛弃（left in limbo）、挖空或弱化——并且，国家科层收缩了。因此，在自我撤离型模式中，首先发生的是解体，然后是经济子域的演进，而不像自我解体型模式中那样，解体之后是政治子域的演进。这种并行过程将伴随着网络内经济下滑和网络外经济增长。

由于结构特征，[②] 绝对和相对收缩将不会在整个单位层面上发生——

---

① 参见 Bunce 1999：131.

② 这里我们指的是机关级别下降，同时这些机关下属企业的规模减小。我们也指选择标准的自我相似规则的运行：根据在更高聚合体中的战略重要性（规模、政治地位），在权力机关之间以及在权力机关所管辖的企业之间分配和攫取资源时都潜在地运用了这种政治理性选择标准。

而是在该结构的各分散部位（下级单位），根据有选择的再生产约束硬化的动力和位置，在聚合体的不同层级、特定聚合体层级的不同单位上发生。所以，该模式将在整个网络中，经历局部地、分散地、有选择地推进下级单位解体和演进，从而推动整个结构逐渐消亡。经济领域的解体和演进在独裁政治条件下进行，伴随着网络内经济下滑和网络外经济增长。网络内下滑和网络外增长形成了政治子域解体和政党转型的经济条件——有时间上的滞后——政党从一种政治垄断制度权力结构转变为一个政治实体。网络内的机动空间由于再生产约束频繁硬化而变小；而网络外机动空间则变大。

模式与转型的社会成本

模式不仅影响解体、体制崩溃和演进的顺序，政党－国家要素解体和演进的顺序，而且还将有力地影响解体和转型的社会成本差异（表6）。

模式的影响将揭示共产党或合法继承者从一种制度结构转型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方式，以及从前享有特权的阶层获取关键职位的机会。模式将强有力地影响转型危机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差异、危机后的恢复时间、解体和演进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水平和骚乱程度；深远而有力地影响经济和社会阶层化的程度；影响旧制度迅速崩溃与新制度缓慢演进之间的时滞所导致的动态运行张力的强度；影响腐败的程度，以及解体和演进过程同时进行且相互作用所导致的其他短期行为。

表6 模式对解体和演进的社会成本的影响

转型的社会成本	自我掠夺型	自我解体型	自我撤离型
从制度权力结构转型为政治实体的最初机会	高：缺乏其他政治力量和基层组织	低：失去的合法性，替代性政治组织，经济危机，不稳定的选民	只是暂时地高：因为网络内、网络间以及网络外领域的张力增加
享有特权的经济和政治阶层继续保持从前优势的机会	高且集中，因为在国有财产再分配、民主控制缓慢演进、竞争性社会阶层之间，存在巨大的时滞	相对高但分散，因为在经济解体、民主控制出现、竞争性社会阶层之间，时滞较小	高，因为缺乏民主管理，独裁条件，封闭式渠道，转型时期较长；但是分散，因为国内外资本渗透，解体和演进同时发生

续表

转型的社会成本	自我掠夺型	自我解体型	自我撤离型
解体和演进中骚乱程度	非常高	高	偶尔地、地方性地高，但是分散
累积的不确定性的水平	非常高，因为解体与转型重叠	相对高，因为解体与演进依序进行	高、相对高或低，依赖于当地模式；分散
创造宏观均衡的机会	低	一般（Fair）	高，但网络内张力增加
网络外经济改革成功的机会	低	一般（Good）	高
改革的可能速度	慢	既有渐进，也有突变	渐进
腐败水平	高，因为重叠、骚乱、从前特权阶层的关键职位	一般	高，因为网络内外被扩展的（long-stretched）关联
社会阶层化的程度	低	一般	高
适应的灵活性	低	一般	网络内一般，网络外高
引入并实施法制的机会	低	较高（Favorable）	一般，独裁条件下的法制和法治是混在一起的

这些因素将容许在转型体制的不同子域中，改革和稳定化战略（突变或渐进）在速度、时机（timing）和结果上存在差异。它们形成适应中的灵活性、引入和实行法制的机会。所有这些都是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地缘政治的、少数民族的个体特征产生影响的制度背景。

自我掠夺型模式原来的要素在崩溃后发展中的解体，与新体制要素的演进是相互重叠的。这种**重叠转型**将导致高水平的、累积的不确定性，长时期经济危机，长时期重新调整，艰难的适应，勉强的妥协，并伴随着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张力。在缺乏阶层化的社会和政治利益集团逐渐演进的情况下，很可能的结果是：部分前共产党接管政治职位，前特权集团获得有利的经济职位，形成实际上独裁的政体。创造宏观均衡并成功改革的机会较低（不论突变还是渐进），因此，转型速度可能非常慢。腐败程度很高，因为以下过程之间存在巨大时滞：前特权者在从国家所有权解体

中获利的最初机会很多，而民主控制的演进缓慢，参与前国有财产再分配竞争的新社会阶层的出现缓慢。所有这些因素有助于个体特征的随意影响，有些人则充分利用这些因素，挑起历史传统、受压制党派、受压制信仰等方面的冲突。在弱的、形式上民主的制度中，极端的政治形成（formations）可能会变成夺取政权的战争（几个后苏联共和国的命运及在 2006 年仍未解决的冲突）。

在自我解体型模式中，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不大可能重新夺取政权。这是因为她失去了合法性，在该模式运行的最后阶段迅速解体了。利用国有财产解体的经济优势的最初机会相对地受到限制，并且，竞争性利益集团的出现使再分配更加不集中，这些集团的出现与政党作为一种制度权力结构的解体是同时进行的。旧体制要素的解体与新体制要素的演进之间的时滞，在演进中的民主政治领域激发了高的、累积的不确定性，导致短期行为和高度腐败。由于使组织、活动和职位结构多样化的渐进式解体和经济改革，导致社会更加阶层化；经济危机的深远程度要低于自我掠夺型模式崩溃后的情况。学会适应分权化改革的灵活性，也有助于在短期内实现宏观均衡，并且，引入法制的机会要高于自我掠夺型模式崩溃后重叠式转型的情况。

在自我撤离型模式中，共产党变成强政治实体的最初机会很多，因为宏观经济增长支持了她的合法性，但也正是由于经济增长，导致其对转型没有太大压力，尽管她作为一种制度权力结构在渐进式地解体。由于国外和国内资本渗入网络，以及资产剥离和资本逃离到网络外，所以解体中的国有财产广泛分散于不同集团当中。独裁政治条件、封闭式渠道、没有制度控制的经济转型以及这一过程中的演进特征，促进了高度腐败。由于同样的条件，法制（rule of law）与法治（rule by law）被替代地运用。实现宏观均衡的机会不错，在网络外成功地实现经济改革的机会也很多。但同时网络内张力正在累积。由于分权化改革和资源创造型改革，阶层化和灵活性很高，但是地方性危机有选择地从结构低层推进到高层，增加了网络内张力，降低了用资源分配去抚平危机的机会。

模式的影响并不只局限于国家层面或单个单位。基于政党－国家单位的自我相似性和它们内部的结构性差异，不仅国家层面上的自我相似单位

及其特征将影响转型和制度化，而且内部权力分配不同的各级自我相似单位也将影响转型和制度化。符合其从前内部权力分配和个体特征的单位实现转型的不同动力（假如它们是联邦制的、省制的或其他领土制的自我相似单位和企业），也将促进整个结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而最终促进了独特的转型过程。①

在一个较大聚合体内部同时出现不同的模式，可以被当作单位之间或它们的较高层级聚合体之间出现非均衡发展和张力的结构背景。如果结合于个体特征，非均衡发展也许会导致该聚合体在网络凝聚力降低时期出现肢解（分裂）的趋势，② 以及较高层级聚合体的相互对抗（例如，俄罗斯和车臣的对抗开始于 1994 年，西伯利亚与波斯尼亚的对抗开始于 1992 年），增加社会成本。

政党 - 国家体制：一个结构性和动力性概念

基于前文分析，我们现在可以定义使共产党成为一种制度权力结构的政党 - 国家体制。政党 - 国家体制是指以下要素自我相似的复杂性：（1）结构；（2）时间、空间、聚合体和条件上的动态运行；（3）在时间、空间、聚合体和条件上的结构及动态运行差异。

（1）这一结构包括政党 - 国家体制的主要构成要素；基于个体决策者的关系的关联原则；运行原则，其在结构中形成依附性、利益提升、资源攫取和再分配的政治垄断特征，从而个体决策者在政治垄断结构中的特殊地位，作为依附线的把持者和被依附线俘获。（2）有关动态运行是指随后产生的结构性动机，在结构内根据权力分配导致有选择的软再生产约束，以及与结构相符的行为。（3）权力分配的多样性导致自我再生产动态运行的与模式相符的特征，这导致了以下各个方面的差异：自我再生产的工具；要素转型和体制崩溃的顺序；经济解体和演进的政治条件；政治解体和演进的经济条件；政党从一种垄断制度权力结构到一个政治实体的转型。

① 国家层面和联邦层面上的差异可见于南斯拉夫（Blagojevic 1999）、捷克斯洛伐克（Wolchik 1990）、苏联（Bunce 1999；Roeder 1993；Derluguian 1993；analyzing all three：Dunce 1999）、罗马尼亚（Verdery and Klignian 1990）。

② 参见 Bunce（1999）对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原因的分析。

8　IPS 模型动态框架中的术语解释

在构建政党 - 国家模型的结构和动态运行及其三个具体模式的时候，我们所使用的几个术语和概念现在需要从在政党 - 国家结构、自我再生产和转型的角度加以界定或重新界定。结合模型背景来澄清这些术语，将提供一个概念基础，以便把模型的结论与其他相关理论进行比较。作为对从前的和仍在运行中的政党 - 国家及其转型的进一步比较经验研究的分析工具，这也是很有用的。因此，我们将从自我再生产的几个维度来列举这些术语：变化程度（一种模式内的权力再分配、模式变化、体制变化），这些变化的可逆转性和不可逆转性（暂时的或确定的自由化、集权化、改革和崩溃），以及变化的“手段”（干预和改革）。然后我们再揭示决策者在这些过程中的机动空间。

8.1　模式内的权力重组

分权化与集权化

分权化或集权化的过程意味着在网络内利用网络的要素进行权力再分配。对于政党科层，该过程可以通过政党 - 国家的要素来推行：互联线的分权化或集权化，或者沿着政党科层的垂直依附线。该过程也可以通过依附线以及有关分配或攫取能力的决策的分权化或集权化，在国家科层和国有经济内部进行。而依附线和分配或攫取能力决策的分权化或集权化，可以通过资源攫取或分配的再分配主体**直接地**发生，也可以通过资源攫取或分配和互联线上的再分配**决策**而**间接地**发生。重组也可通过以上各种运动组合而发生，并且，可以全面地重组，也可以有选择地重组。

根据IPS模型，分权化的主要原因是双重的：通过资源调动或者通过消除分配负担来攫取资源。集权化的主要原因是：集中权力，废除抵制，以及通过强制性资源调配来攫取资源。

因此，在网络内对决策者下放权力的结果也是复杂的。一方面，对于那些将把持依附线并决定资源攫取和分配的行为人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在垄断结构内的更多自主权和讨价还价能力以及再生产约束软化。但是，对于从属于这些行为人的行为人来说，这又意味着失去了向上级讨价还价能力的渠道。另一方面，如果只有分配责任及其他负担（例如，亏损企业，社会责任）被分权化而无须花费资源，那么分权化可能意味着更多地挖掘资源和再生产约束硬化。如果资源被集权化，而分配负担保持不变，那么分权化将意味着同样的结果。但是，只有资源攫取能力被分权化，而没有增加分配负担，或者，如果分配负担被集权化，而资源仍然留在特定阶层，那么，分权化也许可以软化再生产约束。

分权化与效率

决策能力（攫取和分配，相互联结的依附线，以及政党的自由决断权）和/或资源的分权化并不必然意味着效率增加，因为如果网络维持完整无损，那么被重组的就只有权力关系。因此，自我相似的动态运行（运行原则、动机和行为）普遍存在：无论在聚合体的哪一层级，网络内不可避免地缺乏效率约束。分权化没有改变以下方面的政治理性：行为，选择，增长的驱动力，以及尽可能保持现状的驱动力。[①]由于同样原

①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在1994年以前，财政和货币权限方面的决策都被分权化到各个省，甚至货币印刷也可能采用授权形式。国家银行的地方分支行的领导地位采纳了地方政党组织的干部责任制；地方政府顺利地迫使地方分支行扩张信贷。因此，来自下面的经济行为导致了不可控制的价格和投资膨胀，使经济过热（Huang 1996; Lin, C. Z. 1989）。1994年改革收回了这种权限：省级支行被取消，成立区域分行。另外一个例子是，网络的政治理性环境中的国有企业的类似行为。Groves（1994）发现，在1980－1989年间769家国有企业的样本中，企业自主能力增加提高了工人收入，但没有增加利润或减少国家补贴（referred by Qian 1996: 444）。企业投资饥渴对利率反应不敏感性，这方面也有类似的观点（Xiao-qiang 1998）。乡镇政府（TVGs）也会有类似的行为。乡镇政府对乡镇企业实施产权。乡镇企业利润归乡镇政府，后者用这些利润来改善地方生活，而不是对成功企业进行再投资或减少债务（Smyth 1998）。

因，分权化不必然意味着较低层级上的自由化和决策自主，因为行政能力可以向下延伸和分权化到最小单位——即，[①] 个人（Barnett 1967；Szabó，I. 1990）。

分权化作为消除分配负担和转移责任的手段

对分配的自由决断权进行分权化而无须对资源进行分权化，也许会导致再生产约束硬化，如果从上面可吸引的资源很少，和/或没有可供攫取资源的经济实体，或在单位中下级单位具有巨大的抵制能力，那么这还会进一步导致网络解体和/或收缩。在这种情况下，寻找资源的驱动力和结构的再生产也许会导致企业倒闭和私有化，以便消除分配负担，缓和再生产约束。私有化还在网络外形成可征集税收的新的经济实体。由于同样原因，这种分权化可以导致从网络外吸引新资源的驱动力（FDI 或国内资本），或通过共同承担强制性分配（constrained allocation）的责任而部分地消除负担（例如，中国在乡镇和县一级上实行的半自由选举——参见赖海榕 2004）。总之，如果是这样的分权化，那么就会导致网络的相对收缩和绝对收缩，但不会直接导致网络内效率的提高。

不同模式下分权化与集权化的可逆性

分权化——重新集权化——的逆转，在自我掠夺型模式中最为容易，因为该模式中的抵制能力较弱，在自我撤离型模式中最为困难，因为该模式中的抵制能力较强。换句话说，在自我掠夺型模式中，固定路径是朝向集权化的，偶尔才被分权化打断，而在自我解体型模式和自我撤离型模式中，固定路径是稳定地朝向分权化的，偶尔才被集权化打断。在后两种模式中，从抵制能力上看，集权化要在形式上适合模式内特有的权力结构，而在前一模式中，分权化要在形式上适合中央抵制。

总之，资源攫取的结构特有性工具的实施，并不意味着这是它们在实际中的唯一应用。有时，某种自由化被运用于自我掠夺型模式，资源调配

---

① 例如，在中国 1950 年代，人民公社对资源拥有特别决策权，它们不像市场那样运作。相反，公社接管了除私人住房外的私人企业的所有重要遗产；这不仅包括农民私人的小块土地和牲畜，还包括家庭炊具。吃饭在公共食堂（Barnett 1967：341）。由于类似的原因，1990 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的通货膨胀和投资一直在增加，因为国家银行的支行经理是省级或省级以下党委会中的干部（Huang 1996：37，41）。

作为再生产约束硬化的习惯性反应，被运用于自我解体型模式，而资源调配和资源调动都被运用于自我撤离型模式。但是，在再生产和转型的过程中，所谓的与模式相符的工具是最具影响力的。

改革作为自我再生产的工具

在一个复杂的自我相似性结构中，根据结构特征和具体条件，可以实施不同的资源获取工具，发生不同类型的改革。这可以发生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层级的聚合体，或在不同时间发生在同一层级聚合体的不同单位。因此，在实行不同类型改革的时候，通过强制性重组来攫取资源可以发生于相同聚合体的不同单位，或同一层级的不同聚合体，或在不同时间发生在相同单位。[①]

改革的复杂影响

从再生产的角度看，改革具有复杂的影响。一方面，改革有助于体制的演进，因为它们产生了更加结构化的利益、行为模式、所有权关系、价值观，比如说，通过促进商业部门的发展，拓宽传统制度结构中水平关联演进的可能性。[②] 另一方面，改革有助于体制的维持：它们创造了可被汲取的新资源，从而暂时地排除了体制再生产的障碍，而没有改变政治垄断权力结构的基本特征。由于这些改革的资源调动或创造效应，它们可以通过为这种自我支持机制提供额外的资源而恢复结构凝聚力。通过这种方式，改革便使网络内的典型行为重新合法化：讨要资源从而实施权力，使这些运动再次变得合理。同时，由于活动、组织、职位结构上的差异化，它们降低了依附线向外延伸的能力，“重叠了”政党与非政党的结构、制

① 例如，在同一层级：罗马尼亚的强制性资源调配与匈牙利的资源调动型改革。或者，同一单位的不同方面：中国1980年代初，农业中的资源创造型改革与工业中从上面开始的改革。在时间上：匈牙利1950年代的强制性资源调配与1968年以后的资源调动型改革，或者，中国1960年代的强制性资源调配与1980年代初开始的资源创造型改革。聚合体的不同层级：中国1990年代初，国家层面上的资源调动型改革与县一级的资源创造型改革。

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就像科尔奈和Naughton所分析的：“改革是一种协调机制——基于行政命令和数量目标的非效率机制——被更有效率的市场价格机制所取代”（Naughton 1996：33）。

度、职位和个体决策者。再者，依靠结构特征，它们可以在网络外创造一个增长的经济和社会领域，提供替代的理性，但政治理性行为和强制性再分配路径在网络内仍然普遍存在。换句话说，它们松解了体制，使体制撤离，或者，其实是通过直接削弱该结构的基础要素而把体制搞乱。结果，我们所描述的在政党－国家内获取资源的任何一种手段，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支持性手段，一种体制自我毁灭的路径。

改革的结果

动态运行结果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体制自我再生产和转型；（2）与结构相符和不相符的资源获取手段的应用；（3）采取措施改进经济效率。

（1）在体制动态运行的情况下，结果并不关系到经济意义上的改革成败，而是关系到体制自我再生产的能力。

（2）对于通过不同的资源获取手段进行自我再生产的方式，结果却恰恰意味着成功或失败。但这里的成功或失败不是在经济效率意义上而言的。相反，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取决于这些措施（改革或强制性调配）是否已经暂时地增加了（或没有增加）可供再分配的资源。依靠下级单位中的权力分配，实施与结构相符的措施总体上是成功的，但是如果涉及资源获取增加，那么与结构不相符的措施则是非生产的。在这种情况下，成功（获取的资源增加）的同时经济效率可能提高，也可能不提高，这依赖于资源获取的来源和方法（强制性资源调配、资源调动、资源创造）。再者，在自我掠夺型模式或自我解体型模式的情况下，从自我支持的角度上看，成功分别导致了突变的体制崩溃或渐进的体制崩溃，同时出现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这意味着经济意义上的失败。相反，在自我撤离型模式的情况下，网络外从经济角度上的成功或通过资本渗透而获得的成功，导致了网络的绝对收缩和渐进的体制消亡。

（3）再者，改革结果在经济意义上的成功，即使面对全球市场的评价，也会由于网络内关于选择性决策的政治理性的制度影响而受到侵蚀（corrupted）。网络外的或渗入网络内领域中的经济评价要素，由于它们与网络内要素之间的关系而被扭曲了。甚至崩溃后改革的效率，与前文所述的崩溃前模式的转型类型也存在很大关系。

分权化和分权化改革的消极和积极意义

只考虑结构和自我再生产、改革和分权化，而不考虑体制背景，我们就无法确定自上而下的改革或自下而上的改革是积极的或消极的。[①] 第一个原因是，在自我相似的结构中“上面”和“下面”是相对的概念，因为根据自我相似单位的聚合体层级，以及它们的不同模式，改革驱动力可以来自上面，也可以来自下面。第二个原因是，自我再生产的模式和工具，依赖于该单位的结构特征和条件，而不是依赖于它在结构中的位置。再者，当只有分配负担被再分配以缓解较高层级的再生产约束硬化时，这些分权化模式才可以最终导致自下而上的改革。因此，所谓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也许是直接相关的。我们将解释改革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解释改革是资源挖掘型还是资源创造型。在第一种情况下，改革在网络内实施，在第二种情况下，改革可以增加网络外领域或渗入网络内。二者都需要政府在网络内发动改革或至少默许改革，或者在网络内为改革提供意识形态和法律方面的环境，并且，二者都将对网络再生产产生实际影响。

外部条件与模式内的动态运行

网络内动态运行并不是独立于它的外部环境。根据 IPS 模型，外部环境并不完全与国际环境重叠。在模型的解释中，外部因素是网络不能直接到达的那些国内领域，以及国际环境。后者可以是国际市场环境，包括与该网络没有制度关联的任何自我相似单位（例如，中国是集团国家的外部环境）。某个国家的较大聚合体（比如苏维埃集团）不属于国际（外部）环境，因为它是网络的一部分，该国家在这一网络中是普通单位，苏联是上级单位。根据 IPS 模型，传统的国内环境与内部环境也不是重叠的，因为在后一情况下，“内部”涉及网络内的领域，在习惯用法中它可以指国内的，也可以指国际的（例如，苏维埃集团）。同时，传统的内部领域也包括网络外的国内领域。根据 IPS 模型，外部因素对自我再生产和变化的条件具有实际影响。这些因素的作用，影响了网络内暂时的或明确的重组，可以缓解或加速内在趋势。外部因素的影响和针对外部因素的反应，

---

① Liu 1992：293－316；Lin et al. 1995；Naughton 1994a.

主要依赖于权力模式，但战略要适合这些条件。这是因为，模式内的可能性、利益和条件限制了战略的机动空间。

理论上，在自我掠夺型模式中，不存在网络外的国内领域，因为网络包含了最大可能的可攫取资源。因此，资源掠夺中的结构性约束将接近自然约束。具体的自然条件，经济政策，以及来自较高层级聚合体的资源，将界定这一接近的时间间隔。如果遇到自然约束，来自较高层级聚合体的资源较少，那么国际因素和外部（预算）约束便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自我解体型模式中，资源掠夺不能到达自然极限，因为这一过程在模式内遇到自然约束之前就会遇到结构性约束（更强的抵制能力）。因此，在这种模式中比在自我掠夺型模式中要更快地遇到结构性约束。如果遇到结构性约束，来自较高层级聚合体的资源（如果有）又很少，那么，该模式内的再生产约束就会变硬，外部因素（软或硬外部［预算］约束）的影响就变得更加突出，而不是在内部进行进一步的资源掠夺。

对于自我撤离型模式，由于网络内抵制能力增强，在三种模式中，它遇到结构性约束的时间最早。自我撤离型模式中再生产约束硬化的频率也是最高的。在这种情况下，改变现状或依靠外部因素变成最重要的问题。规模、文化和历史传统、地理政治区位、改变现状的能力、机会，将决定对国内的和国际的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模式特征、具体地理政治区位、较高层级聚合体内的权力分配，将决定网络外国内领域的发展程度，以及依靠国际因素的能力。①

在每一种情况下、每一种模式中，具体的历史时期和条件将决定：在再生产约束持久或反复硬化、需要外部资源的时候，反映网络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外部（预算）约束是硬还是软。具体的反应受到网络内权力分配和单位在较高层级聚合体中位置（如果有的话）的约束，该位置也将决定外部约束硬化的影响程度和后果。

① 自我掠夺型模式不允许国内存在大量的网络外领域；自我解体型模式允许它紧密依附于网络；自我撤离型模式允许它，但对网络中的经济行为人仍然持有强烈偏见。

8.2 模式转变

当再生产约束硬化的时候，结构的凝聚力会削弱，并且权力再分配将先于或后于凝聚力恢复。然而，这些动力的出现并没有改变权力分配典型模式的形式，它们在模式内仍然保留着变型。模式转变意味着特定自我相似单位内权力关系的激进式重组。

各模式中权力关系的激进式重组

激进式转变在哪里发生？在社会主义历史上，激进而明确的模式转变仅发生在自我掠夺型模式中。一方面，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对改变现状的内部抵制能力较弱，那么就可以实施权力分配上的激进式转变。基于 IPS 模型的观点，只有在自我掠夺型模式中，改变现状的内部抵制能力才较弱。另一方面，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网络内抵制能力低容许了更长时期的资源攫取，那么为什么在自我掠夺型模式中还会发生模式转变呢？

激进式变化的可逆性

即使在自我掠夺型模式中，重组也是有限度的，对变化的抵制也许可以逆转这一过程。以下条件足以把权力关系恢复到现状：较大聚合体中上级单位的反对，或者从前见风使舵的小派系的反对，或者领导权的潜在竞争者转变为积极反对新修正的权力关系。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经验性地考察三个国家（罗马尼亚、匈牙利、中国）的历史时，发现在自我掠夺型模式中出现过反复的分权化——集权化摇摆（宽松和紧缩），使这种观点得到强调。

即使在很可能出现激进式变化的情况下，这种模式也可以被逆转。斯大林的逝世，乔治乌·德治（Gheorgiu Dej）统治的最后几年和他 1965 年死后一段时间内的苏联改革导向，以及这种改革导向被齐奥塞斯库（Ceausescu）逆转为严格的中央集权体制，共同造成的交错影响，使这种摇摆恰好赶上罗马尼亚在文化和经济领域的自由化。类似地，赫鲁晓夫增加地方决策权力（territorial decision-making capacity），勃列日涅夫却减少地方决策权力，也导致了逆转（Huang 1996：35）。在 1950 年代初到 1957 年以

及 1960 年代，中国也曾出现过集权化与分权化之间剧烈摇摆（参见《百花齐放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Barnett 1967；MacFarquhar 1974）。

这些摇摆可能持续发生，直到出现震荡——对自我掠夺型模式运行方式来说是意外情况——并且，单位层级再生产约束出现周期性硬化，领导层的机动空间减小。震荡包括：较高层级聚合体的领导逝世，单位的领导逝世，社会起义，较大聚合体的暂时崩溃，较高聚合体中的权力斗争，债务危机，国际市场的外部（预算）约束突然硬化，等等。

但是，即使在同样震荡的情况下，细节特征和意外因素也有助于有效的局部崩溃和重组，或者反过来有助于不改变模式的情况下恢复网络。即使在网络暂时崩溃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出现**逆转**。因此，仍然可以重建最初的模式（196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但是它也许被改造为一个完全不同的权力分配，恢复凝聚力（1956 以后的匈牙利）。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时期，网络为什么可以被重建为最初模式的原因，或被重建为新模式的原因，极大地依赖于几个个体因素的相互作用。这些因素包括：地方特征，实际的国际权力关系，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区位（隔离或相互连接），较高聚合体中的反映以及特定单位在国际秩序中的战略重要性（参见 1954 年的东德，1956 年的匈牙利，196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1956 年或 1981 年的波兰），[①] 领导阶层的动机和操纵技巧（1957 年和 1976 年的中国），领导权变更（1953 年的苏联，或 1965 年的罗马尼亚），等等。

激进式变化的不可逆性

如果把经济变化和制度变化结合起来，并且此前政党－国家结构就部分地、暂时地崩溃了，那么便会出现权力关系中结构变化的不可逆性。出现暂时性崩溃，是因为对经济急剧下滑的干预，政治领导层内的权力冲突，领导者权力的不稳定，社会张力的上升，权力的隐藏力量由于意外事变而下降，以及外部压力。这种暂时性崩溃也许变成不可逆的，因为弱化

---

① 例如，如果事情发生在东欧国家它就很重要，在东欧国家，特定政党精英的动机空间依赖于他在集合式自我相似单位（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内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如果改革发生在东亚社会主义国家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在这些国家，制度化的相互依赖超越国家层级，国家层级的自我相似单位没有相互联结，尽管相互间具有密切的政治关系。

的和暂时的崩溃为新权力结构的形成和稳定留有时间余地。在这种情况下，新权力分配的制度化会阻碍最初权力结构的恢复。

一旦稳定了，新的权力结构阻遏了（counter-selects 形式上适合）从前的权力关系再生产工具。* 这是因为，新的权力分配（相结合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将不容许总是通过从前的机制实行进一步的资源攫取，即使新领导想要这样做也没有多大价值了。如果没有时间去稳定，那么模式转变也许只是暂时的，恢复中的制度化权力将抵制和阻遏新的再分配和资源攫取工具，即便实施这些工具，也是根据最初的权力关系。

模式转变稳定化的条件

在任何单位内都可以发生模式转变，该单位可以是也可以不是较大聚合体的部分（例如，整个苏维埃集团，其上级单位是苏联，或者中国的一个省，其较大聚合体是国家层级，上级单位是中央层级）。稳定化依赖于单位在更大自我相似单位中的讨价还价条件。这些条件可以在暂时崩溃之后在较低层级聚合体内产生，如果占统治地位的单位和较大聚合体容许暂时崩溃的话。如果较大聚合体的凝聚力弱化，或占统治地位的单位（上级单位）的凝聚力弱化，那么也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些总体发展被谋求政治和体制稳定性的一次性（one-off）决策强化了，也被特定历史、地理政治背景中的突发事件强化了。

8.3 体制转变

政党－国家要素的解体是先于还是后于体制的转变，依赖于特定权力分配模式的特征。

解体的过程

解体关系到政党－国家体制要素、依附性以及通过这些依附性所带来的

---

* 根据原作者的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一旦稳定下来，新的权力结构就会在形式上适合从前的自我再生产工具，而这种形式上适合的发生，将依赖于结构内行为人的不同的抵制能力。——译者。

利益提升。推动解体过程的是与模式动态运行结合在一起的自我再生产的自我相似性陷阱。政党－国家要素的解体只发生于自我解体型和自我撤离型模式，这时，挖掘和掠夺更多可分配资源的持续动力、网络内再生产约束硬化、网络外（国内的和/或国际的）预算约束硬化，将相互强化，导致改革深化。由于具有讨价还价能力的行为人的抵制,[①] 以及再分配的政治理性，所以在不放弃再分配和自我再生产的强制性路径的情况下，改革也会深化。

解体过程导致结构内不断地进行权力再分配。解体可以发生在几个维度，包括结构的主要要素，被赋予的职能，赋予那些职能的机构，以及赋予那些职能的手段。我们可以考察该过程中的以下主要变化：

通过与传统方式不相重叠的机构、活动和职位的数量增加，依附线变得**相对稀缺**；

由于分配的预期下降，通过网络而发生**相互作用**的强度下降；

互联线被彻底抛弃，或者通过**再分配**，或者通过私有化、倒闭、撤销部委和其他非政党组织，**切断**依附线所环绕的行为人；

通过剥离（单位、活动、专业人员等可变能力的外逃），网络**被掏空**；

通过其他（国内或国外私有）资源的渗透和网络多元化，通过资本家的渗透，引入其他行为和利益，网络**被弱化**；

通过部分地[②]或全面地取消政党和国家的职能、把持依附线的组织、用来赋予职能的手段，网络**被撤离**；

国家和政党科层内的反馈**被精简**，以便降低网络内行为人的讨价还价能力，从而缩小特权圈。

随着政党作为一种垄断制度权力结构的解体，以上因素将逐渐弱化网络的运行原则，逐渐放弃从前所包含的各个子域。结构要素的解体过程不能逆转——它明确地导致体制崩溃之前或之后的体制转变。解体的过程可以被外部条件加速或延缓，但解体的原因是结构性的，解体的方式是模式特有性的。

以上因素在特定模式中将出现于不同的组合、不同的时机和不同层级

---

① Csanádi 1997b：229；Steinfeld 1998：xiii-xv，18－21；Gordon and Li 1997：2.

② 当依附线缩短并且出现其他依附、行为和利益时，政党和国家科层中就会发生撤离，例如，多候选人选举，在较低层级政府和政党机关中实行半自由选举或自由选举，或者在较高层级决策会议上允许直接选举。科层依附线缩短使互联线变得更弱。

的聚合体——在体制崩溃之前、期间或之后。根据这些模式，该过程将与政治、经济和国家同时或不同时地演进。因此，模式特有的解体过程也意味着政党（作为一种制度权力结构）解体并演进为政治**实体**的各个阶段的**变化顺序**。在自我掠夺型模式中，崩溃之后不同子域的解体和转型是重叠发生的。在自我解体型模式中，首先发生的是政治子域的解体和演进以及体制崩溃，然后再是经济和国家子域的解体和演进。在自我撤离型模式中，首先发生的是经济和国家子域的解体和演进，然后是政治子域的解体和演进（取决于再生产约束和外部约束硬化的局部地、有选择地扩展）。

体制崩溃

什么是体制崩溃?

体制崩溃意味着，政党－国家结构的主要关联和运行原则的消失，以及再生产的结构性动机的消失。

在什么时候发生体制崩溃?

如果从资源获取的角度看，实施自我再生产的不同工具反复失败，并且再生产约束持久变硬，那么就会发生体制崩溃。因此，在单位内和从单位外吸引或攫取资源的期望消失，互联线被掏空、被抛弃或被打破。存在外部压力（预算约束硬化）的情况下，特定再生产方式对结构的影响导致了结构特有性工具、解体、崩溃和演进的明显升级。在这一过程中，对于下级单位来说，既没有理由也没有更大压力仍然留在该单位的范围内。如果较大聚合体也崩溃了或没有更大的聚合体，那么崩溃就不可避免。如果较大聚合体没有崩溃，并强制进行逆转或模式转变，以便提供自我再生产的资源，那么情况是可以逆转的，解体和张力得以延缓。

在哪里发生体制崩溃?

由于单位的自我相似特征，崩溃可以发生在任何聚合体层级。它可以被隔离（局部的崩溃），也可以是整体崩溃，可以悄悄地发生，也可以具有累积的影响。[①] 这依赖于具体模式、与聚合体层级的相关程度、聚合体

① 一般来说，在面对硬再生产约束时位置是重要的。如，从单位的角度来看，较低层级上的部分转型或崩溃在政治上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国家层级、国家下一层级上、国家上一层级上的部分转型或崩溃对体制本身具有不可逆转的后果。

本身的实际层级、机会窗口、学习到的经验。相互渗透越多、结构越集权化，崩溃就越具有累积性。

体制崩溃如何发生？

崩溃可以平缓发生，也可以突然发生，这依赖于具体模式。如果在崩溃之前就有任何要素的渐进解体，并对崩溃起了推动作用，那么崩溃就会是平缓的；否则，崩溃就会是突变的。在后一情况下，整个网络立刻消失，要素被彻底抛弃。在自我解体型模式的情况下，网络逐渐地解体，而崩溃加速了这一解体过程。在自我撤离型模式的情况下，互联线终端的经济领域的实体逐渐消失，互联线被彻底抛弃，剩余网络受到排挤，模式内职能和组织以及用来执行这些职能的工具被撤销，具有软再生产约束的行为人的圈子被缩小。

要素的解体和演进，不是体制崩溃的必要前提条件。根据不同的模式，崩溃可以在政党－国家要素解体和演进之后发生，也可以在这之前发生。另一方面，体制崩溃是体制转变和完全转型的必然阶段。

转型的过程

转型一词包括哪些含义？

转型是一个演进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由于自我再生产期间的内在陷阱、对再生产和外部预算约束硬化的适应，它是旧的要素、关联和运行原则的自我耗竭（解体）过程；第二，它是新体制的要素、运行规则和制度背景的出现过程。这两个过程相互强化，加速了新体制的演进、旧体制的消亡。政党－国家要素通过切断和撤离所导致的弱化、挖空和收缩而解体，同时使政党从一种政治垄断权力结构转型为一个**政治实体**。当子域（包括政治子域）逐渐退出政党范围时，解体过程便涉及体制崩溃，此时，关联和运行原则及其所引发的动机消失了。因此，要素的解体和体制的解体是相互强化的。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把具有两个方面（自我耗竭和演进）的整个过程称作转型（体制转型及其要素的转型）。基于这种定义，我们要强调，转型的概念并不等同于比较文献中广为应用的“过渡（transition）”这一线性路径的含义：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从计划到市场、从独裁政体到民主政体。在转型的过程中，新要

素和新体制不是旧要素和旧体制的修改版，[①] 因为适应是自我耗竭性的。然而，新要素和体制继承了旧要素和体制的某些特征，因为新子域并不是脱离旧要素和体制来得以发展的。边界是可以从多方面渗透的，它们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和往复交流，新要素和体制中的可能性受到网络的操纵，并且，从前的权力分配模式对新体制的演进特征具有实质性的影响。

在政党－国家的三种模式中都会发生转型。但是转型受到模式特征的影响。因此，这些差异并不在于是否发生转型，而在于政治或经济转型的时间顺序。这将详细规定经济转型期间的政治条件和政治转型期间的经济条件。

要素层面上的转型在什么时候开始？

政党－国家要素解体的一开始就出现了要素转型，这一转型直到新体制的替代性制度背景包容了从前要素的剩余部分并使其适合新体制规则的时候结束。在该过程的最初阶段，把持依附线或被依附线俘获的决策者在他们的职能上受到挑战，从依附线的一端被拆开作为网络的组成部分，或依附线本身被取消，从前融合了的子域又分离了。经济制度作为政党（作为一种制度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变成了经济实体或消失；政党作为一种制度权力结构，转型为一个或多个政治实体或消失。

转型的迹象

体制的自我相似性（要素、关联原则、运行原则）的弱化和逐渐消失，将增加个体特征和模式特征的作用和影响。但是，自我相似性遗留特征将使转型过程出现重要的共同特征，以及针对这些特征的共同反映。同时，特定的从前结构的内在特征将决定以上特征的程度差异，以及这些过程产生暴力的程度差异。[②]

所有模式崩溃前后萌芽的替代选择

在经济转型的情况下，出现了替代性的资源获取能力，竞争性逻辑开

---

① 这些新子域可以包含政党－国家子域的适应了的因素：私有化了的企业，转移了的价值（转移了的人力资源、资本和活动），适应的国有企业，共产主义政党。但是，政党－国家体制及其要素的适应性是自我耗竭的。

② Csanádi 1997a: 61－85; 1997b: 291－301.

始发挥作用，替代性的规则被强制实施，替代性行为最终盛行，而利益和行为的从前的结构性动机逐渐弱化。在这些情况下，刚性结构的掏空进一步加快。[①] 一方面，从前框架中产生了更多的有能力的单位，他们包括个体决策者、[②] 经济单位、[③] 或整个地区。[④] 另一方面，消除负担的驱动力增加了——通过分权化、倒闭或出售。

自我掠夺型模式和自我解体型模式中利益和行为的结构性动机弱化

由于存在模式特征，在政治转型先于经济转型的情况下，体制转型是不相同的。在第一种情况下，首先发生的是，与资源主体之间的垄断关联逐渐或突然消失；在第二种情况下，首先发生的是，资源攫取的目标逐渐消失。

在自我掠夺型模式和自我解体型模式的转型中，随着政党或国家科层被解散和互联线消失，国家所有权的政治垄断也会弱化。随着干预和抗辩的政治垄断基层组织的消失，依附线和利益提升的政治垄断将不复存在。政治对子域的直接影响和子域活动对政治的直接影响也也将不复存在。

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导致决策者政治理性行为模式的激发因素的结构背景也会消失——这些激发因素包括干预的能力和义务，以及维持尽可能多的决策者的依附性所带来的利益。进一步，这些结构激发因素——资源搜寻者，投资的巨大驱动力，增长－导向，资源储存，劳动力积蓄，以及短缺再生产的许多其他原因（Kornai 1997：1－45），这在过去被当作该体制最典型的特征——所导致的政治理性行为模式也消失了。在这一发展的同时，适合政治理性期望的政治理性动机也有所削弱。

互联线消失并不意味着与国家官僚科层有关的科层依附线也同时消失。相反，在经济解体和演进发生在先的地方，互联线消失了、弱化了、更稀少了，同时，互联线终端的目标也消失了。在日渐收缩的网络中，结构激发因素和行为将普遍存在。

在自我掠夺型模式和自我解体型模式中，从前的自我相似单位的交织

① 关于中国，参见 Smyth 1998：784－800.

② Laki 1991：38－45；Gordon and Li 1997：1，23.

③ Voszka 1997.

④ Bunce（1999）分析南斯拉夫、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

聚合体层级的弱化，以及独立子域的出现

没有维持凝聚力的从前动机和背景，体制将沿着自我相似单位继续解体为越来越小的分片，从而政治垄断制度结构也将解体为其组成部分（Bunce 1989a；1939b；1989c；1991；1995a；1995b；Csanádi 1989a；1989b；Walder 1988）。解体过程扩散到整个社会制度结构，[①] 该结构越来越变得差异化，并解体为越来越小的利益单位。转型标志是，体制基本的结构和运行原则、动机的消失，其主要特征及其意识形态基础的部分消失。

所有模式中网络内从前机构的职能消失，网络外相应制度的缺乏

由于转型期间的解体，政党首先创造的机构失去了权力或职能，而在没有横向组织的情况下，也没有了表达利益的方式。在解体过程中，适应习惯、行为模式以及期望都失去了目标和参照点。因此，决策过程失去了制裁的威胁，利益和干预没有了合适的渠道，分配没有了从前的选择性和过滤机制。讨价还价失去了坚实地建立起来的参照点，决策者没有了明显的同盟和对手。从前被政党垄断的职能失去了制度背景，资源流动没有了协调机制，冲突没有了调停人，信息、需要、技能没有了媒介。缓慢演进的转型将导致一个不稳定的体制。

所有模式中同时发生的解体和演进中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体制变化中，量的变化和质的变化都可作为议事日程。从数量上看，个体、集团和机构的作用、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人变成失业者；具有中等生活条件的那些人将变穷或变富；官僚变成企业家；知识分子变成政客或官僚；从前在政治和经济上有影响力的机构变得无关紧要；出现了新的关键机构；产生了新的角色、规则、行为和竞争规范；旧的那一套在权力中变得过时了或转型了（Bunce and Csanádi 1993）。

质变的性质也是新奇的。这些变化突然发生，而不是渐进地发生；最主要的是，它们的发生不是由于个体决策，而是由于环境改变；它们不仅影响个体或小集团，而且影响广大群众。主要变化发生在一个或几个领

---

① 这一过程延伸到国际经济和军事组织，国家，州，民族，县，村，区，联盟，经济、社会、政治机构，职能（产品分配，价格制定，资本、劳动力和偏好分配，等等），部门，企业，合作社，社会阶层和互助集团。

域，它们同时发生而不是依序发生。这些事件的发展没有可预测的逻辑——也许在一夜之间就改变方向。因此，这方面的波动也是巨大的。

变化的制度背景也是不确定的。公共机构的目标、任务、地位、作用和责任，它们的决策、决策者和决策过程，以及它们内部的组织方法和责任分配，都会经常变化。程序上的机制不完善，规则是不完全的、可改变的。纠察和监督机制的发展也不完善，而且比较简单。难以评价信息的可靠性或真实的权力分配，因为利益仍然非常模糊。

决策者必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重叠的体制不确定性中相机处理，这使转型过程中不确定性所特有的高度复杂性进一步增加。这些累积的和重叠的不确定性，导致决策及其成功执行更多是随机的，而不是设计好的。恰恰是这些因素，有助于确定未来的作用、规则、结构以及体制。

这种未定型体制中的可预测性水平是很低的，因为异质因素——个体行动、技能、出现、时机和关联——的权力比在具有稳定结构的体制中更加重要，在具有稳定结构的体制中，这些因素具有相机行动的制度框架。但是，使代理人拥有结构性特权的相同因素，也降低了那些个人能够产生的被控制和被预见的影响。不稳定性从而体制的开放性，既使个人拥有权力，也使个人没有防备（defenseless）。① 时间太短，后果太多，参照点太少，这是个人不能承受和处理的（Bunce and Csanádi 1993）。

个人成功地适应，将不仅依赖于个人自己，而且依赖于环境。由于每一件事都在变化，决策过程以及决策结果通常是非理性的和偶然的。在转型的早期阶段，难以合理地解释谁赢谁输，也难以准确地解释他或她为什么输了、输了什么。再者，赢输概念本身就是不明确的。没有人可以预见，赢输在什么程度上变成长期持续地发生在某个领域，该领域在这个时候是重要的，或者实际上已经不重要了（Bunce and Csanádi 1993）。

对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反应——抛弃僵化的结构

持续的、累积的不确定性将产生几个方面的影响。在不稳定的环境

---

① 个人变得非常无助，部分地因为在持续变化的环境中，他们没有标准去衡量采纳新的或以前的行为模式，以及从前的经验、传统和惯例的风险或成功；部分地因为他们周围都是不可预期的决策，更不用说他们自身决策的不可预期的后果；部分地因为他们无法应付变化的、不确定的环境（Bunce and Csanadi 1993）。

中，决策和结果都变成偶然性的，战略行为的激励遇到了困难。由于不稳定环境中的条件，特殊因素的作用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它们的成功只是一个概率事件，因为制度条件总体上缺乏或不完善。因此，尽管假定个体拥有无数机会和巨大激励去作出决策，不稳定的环境对灵活适应和具有合理风险的战略计划构成了巨大障碍。

短期行为

在这种不稳定环境中，开始呈现出一个非常明确的、具体的适应过程和动态重组（Csanádi 1997a；1997b）。尽管抛弃僵化结构的过程开始了，但是新体制的结构也才开始成型。在所有模式中，这些过程的主要要素以如下方式出现。

更多有能力的专家从国家企业和政府部门跳槽，把职业关系、客户、经验和知识都带入私有企业。大企业中更多有经营能力的、依附性较小的单位脱离出来，自立门户；企业廉价出售股份，摆脱没有利润的单位和冗员。占有国家所有权的决策者的行为模式也出现变化：政府希望剥离无效率的资产和业务。结果，政府中的决策者对整个组织进行分权化或抛弃（即便他们是没有财务资源的社会、文化、教育、卫生或科研机构），廉价出售剩余的亏损的国有资产。

在这一解体过程的不同阶段，私有资本渗透和吸收仍然有价值的商品及任何可挽救的资源。但是，由于不确定的和不稳定的决策环境，短期行为在私人部门和国有部门都占主导地位，而这对转型过程具有特定影响。在不稳定的环境下，经济行为人被迫也有机会去追求短期利润。

谋求短期收益的行为模式，鼓励了通过分权化、国有企业、私人债务、价格和/或税收增加等方式来摆脱负担（Csanádi and Lai 2003）。短期收益还进一步鼓励了寻租行为：提高非法利润、隐瞒收入、逃税、洗钱、腐败、利润被挥霍或汇回本国而不是用于国内再投资、非法倒卖、践踏环境。再者，短期考虑倾向于发动非正式的或非法的关联，鼓励决策者绕过法律或制度化的渠道，从而形成精细的地下活动网络（Vaksberg 1991）。因此，尽管短期行为动机增加了经济活力——并促进了重组过程——但其消极的结果限制了复兴的可能性范围（Greskovits 1993；Kornai 1993）。

追求短期利润所带来的经济复兴，对重组的特征具有深远影响，因为

它造就了所有权和社会结构的类型和模式，并对社会尤其是政治经济制度结构的演进形成持久的影响。

8.4 机动空间及其动态扩张：在模式及体制内的权力转变期间，在模式及体制间的权力转变期间

首先，我们必须澄清，由于自我相似性的概念，IPS 模型没有独立地区分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决策制定的作用和重要性，及其对结构形成的影响。但是，IPS 模型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相互作用，因为体制动态运行赖以建立的基础在于：决策者的结构性动机和行为，以及这种行为对结构及动态运行的影响（宏观层面或微观层面的）。这是因为，自我相似性使我们可以对任何层级聚合体进行类似分析。决策与宏观政策决策是否一致，是一个聚合问题。在 IPS 模型中，任何特定单位——不依赖于聚合体层级——把“宏观经济”决策带到它这一层级：基于它的相互作用的影响，以及来自上面、来自下面、来自外部环境的影响。

在模式、模式转变和转型中，模式特有的变化如何影响决策者的机动空间?

任何聚合体层级上的机动空间，都会**受到模式特征的约束**。每个模式都有自己的再生产工具。与模式不相符的那些工具，将在形式上适合特定模式的权力分配。如果单位处于较大聚合体内，那么该较大聚合体内权力分配的相互作用，具体的历史、地缘政治和国际条件，以及领导人的个人抱负，将决定机动空间的范围。外部条件是维持模式还是瓦解模式，依赖于单位内部硬再生产约束的情况下，单位的外部（预算）约束是软还是硬。单位的个体特征和领导人的个体特征，以及特定的历史条件，将会强化或弱化结构性约束。

在自我掠夺型模式中，领导一般都会由于结构内抵制能力有限而拥有更大的机动空间。因此，领导也可以决定从属层级上决策者的机动空间和行为。但是，由于依附线较长及其集权化性质，所以较低层级上的领导不

会被完全控制，因此，较低层级上也会存在一些机动空间。在自我撤离型模式中，领导人在网络内的机动空间最小——对改革派和保守派来说都是如此——因为内部抵制能力很强。

领导在重建**暂时崩溃了的**模式时，也具有更大的机动空间。然而，重建所需的时间，以及该单位从暂时崩溃中所获得的权力分配，都受到来自较大聚合体（如果有）、个体和外部条件所施加约束的有力影响。

领导**在转型期间**甚至对形成结构变迁也有巨大的机动空间。在这些时期，如果机动空间较大，那么从变化类型上看，个人品质和动机就更加重要。然而，转型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充满张力和矛盾，并且非常难预测。换句话说，新体制处于一种变迁状态，因为结构还没有完全成型和稳定。但是，这种不稳定状态提高了累积的不确定性。未定型体制中的不确定性不同于稳定结构中的不确定性，因为在未定型体制中结构本身处于不稳定状态。因此，不仅结果是不确定的，而且过程也是不确定的（Bunce and Csanádi 1993）。

因此，尽管国家干预社会和经济的能力很强，但这种干预的有效性却很弱，因为存在无数的强制性路径、仍然模糊不清的利益、不可预测性、在许多方面仍然不可控制的行为模式。结果，虽然预期没有实现，但是干预导致了进一步增加张力的意外过程。同时，政党－国家的转型期受到崩溃前模式和外部条件的强有力影响。因此，与政党－国家时期相反，在转型期间，后自我掠夺型模式（post-self-exploiting pattern）中的机动空间是最小的，自我撤离型模式中的机动空间是最大的。

在再生产约束硬化期间，领导的机动空间最小，在再生产约束软化期间，领导的机动空间更大。在解体期间，领导的机动空间减小，模式动态运行压制了个人意图，个人意图对模式动态运行只起着加快或减缓的作用。

总之，以上我们界定了体制和模式特征，模式内、模式间、体制间的不同变化，以及这些动态运行中决策者面临的模式特有性约束，接下来，我们可以把这些体制观点与比较改革文献中所提出的观点进行比较。

9　基于 IPS 模型挑战有关改革和转型的比较观点

借助 IPS 模型，以及关于政党 - 国家体制结构及动态运行的术语解释，我们可以批判性地评论比较改革文献。比较改革文献中的传统方法是在动态运行和结果方面对改革进行比较，本书所介绍的结构和制度方法是结合体制动态运行和结果的背景对改革进行比较，我们将对两种方法进行对照。对比分析将显示，如果脱离制度结构背景来对改革进行比较、分析和应用，那么不同模式也许被同质化，模式与体制相互混淆，不同体制相互混淆，导致所采纳战略的出现无法预料、不合意图的结果。

9.1　个体特征及绩效上的差异

在深入考察比较文献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一些基本数据，它们也许可以对被评价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给出某种提示。我们要在中国、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等东欧（EE）国家之间进行比较，显示这些国家在 1990 - 2004 年间在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发展源泉、宏观经济平衡和宏观经济张力等方面的差异。

表 7 和表 8 显示了各国规模和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距：东欧国家加总的人口只有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十。2003 年，中国总人口中有 13% 仍然是文盲，比东欧国家 0.3（波兰）和 2.8（罗马尼亚）的平均水平要高出十倍。2004 年中国的单位资本 GDP（表 7），大约是东欧国家中最低单位资本

GDP（保加利亚）的一半，最高单位资本 GDP（斯洛文尼亚）的十分之一。与分析中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服务业部门占 GDP 比重最低，农业和工业部门占 GDP 比重最高（表8）。中国显示了三位数的农业生产增长、工业生产的巨大下滑，这与东欧国家的趋势恰好相反，其工业生产相比于1995 年实现了稳定增长，只有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这两个国家是例外。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农业生产中赶上来，也许还要进行工业重组（表8）。

关于**发展速度**，中国的追赶过程是非常显著的。看起来增长前景无限，这是与东欧国家之间的明显差异。在 1990－2003 年间，文盲降低了将近一半（表7）。在 1990－2002 年间，中国的单位资本 GDP 翻了近三倍，大大高于东欧，后者由于体制崩溃，发展被 1990 年的单位资本 GDP 下降打断了。东欧国家的这种推动力损失到了 1995 年就恢复了，从那以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中国的单位资本 GDP 增长至少是东欧国家（除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两倍（表7）。该时期中国 FDI 占 GDP 的比率增长了近 20 多倍，尽管 FDI 总量只翻了一倍。在东欧也出现了类似的增长速度，但 FDI 占 GDP 的比率在各国之间差距巨大，从 15.6%（斯洛文尼亚）到 51.8%（匈牙利）。

关于**增长源泉**，除了中国具有巨大的内部投资能力之外（Wu Yanrui 2005），流入这些国家的 FDI 总量也出现了巨大差异，这证明中国对 FDI 的吸引力要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国外资本规模一直增长，具有持续的投资者利益。2003 年，有 535.05 亿美元投资于中国，比进入整个东欧的投资要高五倍（表8）。同年，流入东欧的 FDI 从 1.81 亿美元（斯洛文尼亚）到 42.25 亿美元（波兰），后者不到中国 FDI 总量的 8%。与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的固定投资总量占 GDP 的比重最高（表9）。

表7　个体国家特征：1990－2002 年

	总人口/百万	总人口中文盲百分比/%			单位资本 GDP*/美元			单位资本 GDP 增长%（上年=100）		
	2002	1990	1995	2003	1990	1995	2002	1990	1995	2002
中国	1281	23.1	18.1	13.0	342	584	980	3.8	10.5	7.2
保加利亚	8	2.8	2.1	1.4	2377	1559	1771	－17.5	2.1	4.9
克罗地亚	4	3.1	2.3	1.5	5486	4225	4527	－7.1	6.8	5.3

续表

	总人口/百万	总人口中文盲百分比/%			单位资本 GDP ●/美元			单位资本 GDP 增长%（上年＝100）		
	2002	1990	1995	2003	1990	1995	2002	1990	1995	2002
捷克共和国	10	–	–	–	3850	5037	5693	–1.2	5.9	2.1
匈牙利	10	0.9	0.8	0.6	3484	4373	5383	–3.5	1.5	3.5
波兰	39	0.4	0.3	0.2	1547	3292	4790	–11.5	7.0	1.2
罗马尼亚	22	2.9	2.4	1.6	1648	1564	1849	–6.5	7.1	4.5
斯洛伐克	5	–	–	–	2947	3570	3056	–2.5	6.9	4.3
斯洛文尼亚	2	0.4	0.4	0.3	9063	9419	9737	–4.5	4.1	2.9

● 2002 年单位资本数据，根据 2001 年单位资本 GDP 与 2002/2001 单位资本 GDP 增长计算得来。

表 8　个体国家特征：1995－2003 年

	农业增长 *			工业增长 * *			FDI 流入百万美元			FDI/GDP %		
	1995	1998	2002	1996	1998	2002	1991－1996	1998	2003	1990	1995	2003
中国	135.8	160.2	184.6	97.0	90.2	76.4	25476	43571	53505	2.0	19.1	35.6
保加利亚	77.9	67.9	70.0	106.1	78.5	83.6	74	537	1419	0.5	3.4	29.1
克罗地亚	58.8	70.6	66.9	103.0	114.2	127.9	216	932	1713	–	2.5	49.6
捷克共和国	80.3	80.4	77.2	102.0	108.2	123.2	1177	3700	2583	3.9	14.1	48.0
匈牙利	70.8	77.9	75.1	103.4	129.0	181.0	2205	2037	2470	1.7	26.7	51.8
波兰	83.8	90.8	83.7	109.4	127.4	146.1	2119	6365	4225	0.2	6.2	24.9
罗马尼亚	98.9	89.3	84.9	105.7	81.9	95.7	206	2031	1566	–	2.3	23.4
斯洛伐克	75.6	78.3	68.1	102.5	108.6	132.6	201	684	571	0.5	4.4	31.5
斯洛文尼亚	97.6	102.7	101.5	101.0	105.8	117.9	122	216	181	3.4	9.4	15.6

* 1989－1991 ＝ 100　　* * 1995 ＝ 100。

资料来源：*U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1，Issue 45 · Education 1996：60－69 · GDP per cap and per capita growth China 1990－1998：135－146 · Agricultural growth 1995：307－310 ◆ *U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2，Issue 46 · Illiteracy 1990：59－61 ◆ *U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3，Issue 47 · Illiteracy 1995，

2003：59－61◆*U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4，Issue 48 · Industrial growth 1996－2002：211－224 · Agricultural growth 1995－2002：337－339◆*World Investment Report*，2004 · FDI：370－371 · FDI/GDP：407－710◆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4 · Population 2002：252－253 · GDP/cap. growth 2001－2002：252－253.

在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宏观平衡（表9）表明中国比东欧的发展更加均衡。中国是唯一一个对外贸易显示盈余的国家，所有其他国家都显示了外贸赤字。除了保加利亚外，中国也是唯一一个单位资本当期余额为正的国家；所有其他国家都显示了负账户。除了保加利亚和斯洛文尼亚，预算平衡都显示了不同程度的赤字。

关于**宏观张力**，中国的国民失业率大大低于东欧；通货膨胀率也是如此，尽管只比东欧国家稍微低一点点。这里没有考虑中国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地区内部的巨大差距，众所周知的迁移问题，以及工人从私有化了的亏损企业中被大规模解雇（Zhao 2005；Tong，S. 2005）。这种快速增长伴随着巨大的收入差距——使中国与东欧国家相比显示了最大的基尼系数。如果在不同维度上进行度量，那么这些差距甚至会更大、更具差异化（Herrmann-Pillath et al. 2002；Lai，Hongyi 2005）。

这种非凡的增长只是由于个体特征吗（巨大的规模、低工资、巨大的自然资源存量、地理政治区位、工业结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巨大的国内市场，以及这些特征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当然，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些因素。

决定这种非凡的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推动经济改革的经济政策**战略**，实质性地促进了这种增长。关于改革的理想**步伐**方面的争论，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哪一种战略更加有效——渐进式改革还是休克疗法？中国的改革开始于从部门到部门，从行业到行业，从地区到地区。一个部门成功的经济改革可以作为其他部门改革的试点，并且创造了配套改革的压力（Wong，J. 1994：8）。1960年代末以来，匈牙利也试图建立经济特区，实施这种渐进的试点战略。但是这些改革并没有对其他领域和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休克疗法在波兰获得了成功，而在俄罗斯和罗马尼亚的转型初期却失败了。

表 9　2004 年的宏观平衡

	部门 GDP 增长%			GDP/资本 千美元	失业率%	通货膨胀率%	基尼系数%	GFI/GDP%	平衡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预算收—支	出口—进口	资本现金账户 美元
中国	13	53	33	5.6	46	4.4	4.1	9.8	–	+	23
保加利亚	12	30	58	8.2	19	2.6	6.1	12.7	=	–	92
克罗地亚	8	30	62	11.2	29	2.9	2.5	13.8	–	–	–428
捷克共和国	3	39	57	16.8	29	2.5	3.2	10.6	–	–	–560
匈牙利	3	32	65	14.9	23	2.4	7.0	5.9	–	–	–794
波兰	3	31	66	12.0	18	3.1	3.4	19.5	–	–	–99
罗马尼亚	13	34	53	7.7	23	2.9	9.6	6.3	–	–	–163
斯洛伐克	4	30	66	14.5	24	2.6	7.5	13.1	–	=	–258
斯洛文尼亚	3	36	60	19.6	25	2.8	3.3	6.4	=	–	–26

资料来源：*http：//www. exxun. com*。注释：GFI：固定资产投资总量。

我们还要强调，中国改革的顺序适合其经济结构和政治、社会条件：从农业改革开始，增加生产率，释放劳动力，迅速增加农业收入，容许乡镇企业快速成长，这些乡镇企业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Wong, J. 1994：6）。然而，波兰的改革不是这样进行的，波兰 1950 年代开始农业私有化；这种改革没有提供经济增长的任何推动力，并且至今处于混乱状态。在匈牙利也是这样，容许基于合作社基层组织的小私有农场，并且，从 1970 年初开始，合作社获准从事私有事业，但是它们都没有对经济增长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促进转型过程的**改革**也是如此的**不相同**吗？这种观点也不成立。中国所采取的所有这些战略步骤在东欧国家也已经被采用，但是东欧的整个经济增长仍然非常低。这些改革包括农业改革、决策分权化、经济活动中法律规则逐渐扩散、税收改革、私有化过程、私有领域和市场关系获得改善、价格自由化、对外开放政策、为 FDI 创造友好而灵活的法律环境、加入国际组织。

甚至**同时进行的解体和演进过程也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例如，通货膨胀，无序的信贷结构，长期的政府赤字，同时影响大型社会集团的制度和组织突然消失导致累积的不确定性，新制度和组织的演进式发展，腐败，黑社会的渗透，资产抽逃（asset stripping），寻租经济行为，国有企业亏损，坏账，债务拖欠，基尼系数巨大且日渐上升，大规模国内移民，失业，地区不平等，收入不平等，环境破坏，等等。

解决办法没有实质性的差异。例如，引入法律的规则，双重信贷体制（two tier banking system），现代企业制度，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取缔黑社会组织，惩治腐败，限制资产抽逃，失业者再就业培训，政府解困（bailing out）或倒闭，亏损企业私有化，债转股措施，银行合并，建立或发展社会保障网络，增加环保热情，等等。

主要差异在于**转型的顺序**。中国是经济转型在先，而东欧是政治转型在先。这意味着经济转型的政治和效用经济条件在过去和现在都不相同了。在中国，经济转型在独裁的政体下发生，伴随着经济增长；在东欧，经济转型在民主的政体下发生，伴随着经济危机和缓慢恢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转型在专政体制下更加有效呢？这是可能的，但是许多独裁体制就像东欧那样出现了经济停滞，而许多民主体制却充满动力。因此，我们不要错误地得出一般结论，认为独裁体制可以推动经济增长。

如果首先发生经济转型，那么东欧能够避免经济危机吗？也许可以，但是大多数东欧国家在政党－国家时期没有实行经济改革，而另一些东欧国家实行了经济改革但没有出现经济转型。如果在东欧国家首先发生经济转型，那么结果会像在中国那样明显地挽救政党－国家体制吗？也许可以。但是在东欧所有国家中都是首先发生政治转型，最终都陷入了经济危机，政党失去了合法性。

那么为什么他们没有走经济转型在先的中国式道路呢？那只是一个战略选择错误的问题吗？基于 IPS 模型的基本原理，我们认为原因主要在于每一个东欧及中国的政党－国家内权力分配模式差异，其导致了转型的不同道路和条件。

9.2　比较改革文献中的改革分析

比较改革文献从内在动力的角度来分析改革，把这种动力作为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工具。于是，绝大多数学者把共产主义政党－国家体制中的变化描述为：经济改革导致向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转变。这里显然存在一个不可避免的顺序，开始是经济自由化，然后是政治开放和政治自由化，最后导致民主政治。根据这种观点，改革是从共产主义体制过渡到资本主义体制的经济政策工具。[①] 然而，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是：如果改革是经济发展的理想方式，那么，为什么一些政党－国家实际上没有实行改革（例如，朝鲜、罗马尼亚、古巴）？是什么决定了改革的范围？为什么一些政党－国家发展了私有部门（例如，中国），另一些政党－国家容忍其为次等经济（例如，匈牙利），而还有一些政党－国家严格地禁止私有经济（例如，罗马尼亚）呢？

比较改革文献从效用的角度来评价改革——改革有助于改善经济效率和市场化吗？例如，改革带来了经济增长吗？改革导致了更多的经济自主吗？改革提高了市场的作用吗？改革使企业面向市场、对价格反应敏感吗？改革促进了要素流动吗？改革硬化了企业的预算约束吗？

因此，在比较改革文献中，改革分别被分为成功或失败两种类型。然而，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或甚至任何一种战略的存在，使得许多问题都不能在比较改革文献中得到解释，这些问题如下：如果改革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败，那么为什么政府还作出类似行动？如果改革缓和了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那么，为什么在大多数政党－国家，用改革来背离斯大林主义体制没有导致经济增长，而是导致了经济下滑呢？为什么类似的措施在一个国家获得了成功，在另一些国家却失败了？为什么不同的政党－国家采取了相反的措施，但它们都成功了？

---

① 比较改革文献一般都集中于某方面问题来分析改革和转型，例如，从经济政策、经济管理工具、经济管理机构转型、经济管理目标、经济组织本身、政治制度体系等各个角度。

理想改革与替代方案

在比较改革文献中，关于成功转型所需遵循或避免的战略，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这些观点通常涉及改革的步伐，改革起始的层级，改革的顺序，（可能）发生改革的政体类型。由于以上特征，出现了一些相反的观点：改革应该从下面开始还是应该从上面开始，转型的最佳手段是渐进式改革还是休克疗法，应该经济改革在先还是政治改革在先，为了实现最优结果，改革应该在独裁政体下实施还是应该在民主政体下实施。

比较文献草率地把成功的改革界定为从下面开始的改革，把失败的改革界定为从上面开始的改革。[①] 基于此，第一步可得出结论：决策分权化本身就是一种成功的战略。这忽视了分权化运动失败的反例，例如，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分权化过程的不良结果，[②] 中国大跃进时期或1980年代初期的分权化导致通货膨胀和投资过热的驱动力。[③] 这些文献没有反映，为什么政党－国家中的分权化改革推动了通货膨胀和投资过热，而不是增加效率和硬化预算约束（例如，中国、匈牙利、南斯拉夫和越南）。

比较改革文献还认为，地方政府下属的小型国有企业（SOEs）比中央下属的大型国有企业更加有效率，这种观点也是有问题的。根据这种观点，符合逻辑的战略应该是，大型国有企业应该被分解，企业应该被分权化（Qian and Xu 1993：157），以便增加效率。然而，这种观点没有解释，为什么匈牙利1980年代把大型企业拆分为更小的、更灵活的企业没有获得成功（Voszka 1988）；没有解释政党－国家交替进行集权化或分权化的原因（Wong，C. 1991：693）；没有解释同一国家的相似行动在不同时期的各种结果。[④] 而且还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从下面开始的改革是理想的模式，

---

① Dewatripoint and Maskin 1995；Gelb et al. 1993：125；Lin，C. Z. 1989：115；Lin at al. 1995；Naughton 1996：196；Qian and Xu 1993：157；Walder 1995b；Sun 1997；Solnick 1996：232；Woo 1998：177；Xu and Zhuang 1998：218.

② Sachs and Woo 1997；Solnick 1996；Aslund 1993：93.

③ Huang 1996：65；Wong，C. 1991：693；Qian and Roland 1998：1157；Sun 1997：13，15；Lin，C. Z. 1989：115；Naughton 1996：201.

④ 参见中国1988年以前的情况：Wong，C. 1991：709－710，或者1994年以后的情况：Huang 1996.

那么，为什么政府让改革从上面开始？

不仅在改革位置方面，而且在改革步伐方面的一些观点也存在问题。提倡休克疗法的那些人建议，[①] 越南在渐进式改革失败之后引入了稳定化措施。成功是用 GNP 增长来度量的。但是很少有人提到，越南实现的增长只有中国的一半，而中国的改革过程是更加渐进式的。越南努力吸引 FDI。但是，FDI 在越南受到限制：FDI 的流入局限于国有企业。最后，国有企业并没有变得更加有效率，私有部门没有在一个成功地创造均衡的环境中获得增长，私有化没有加速（Tran 2000）。

再者，越南所谓的休克疗法发生在分权化之后投资和价格高涨的环境下，此时正是东欧国家体制崩溃的时候。Woo 认为越南的休克疗法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没有什么不同——中国在相同时期（1989－1991）出现了紧缩（retrenchment），在 1994 年实行了税收改革。这些事件的发生都后于中国的类似现象——通货膨胀，投资和价格攀升——然后又迅速回弹。让我们看看赞成休克疗法、反对中国渐进式发展的引文（括号内是我的评论和参考文献）：

越南经验证明，把波兰 1990 年和 1991 年的产出下降归因于大爆炸方法（big－bang approach）是不正确的。越南在 1985－1988 年间采取了中国式的局部分片式改革。但是唯一增长的是通货膨胀［如中国 1980 年代初］，并且，产出增长率持续走低。1989 年，越南实行了大爆炸改革：急剧缩减信贷增长［像中国一样］，农业非集体化［像中国一样］，除了 12 种价格以外其他价格都完全放开［像中国一样］，取消贸易限制［参照中国］，把汇率定于黑市水平［像中国在 1982－1994 年一样，参见 Woo 1998：160］，使私有经济活动合法化［参照中国］。结果，1989 年增长率达到 8%，而 1988 年为 5%［参见中国自 1980 年代后期开始的两位数增长］（Sachs and Woo 1997：305，参照 1994 年美元）。

① 参见 Aslund 1993：96－97；Gelb et al. 1993：125；Lin at al. 1996：226；McMillan and Naughton 1992：132；Naughton 1996：13－16；Nolan 1996：297；Sachs et al. 1994：119，122，131；Sachs and Woo 1997：12；McKinnon 1994：102－103；Nolan 1996：297.

在以上例子中，可以看出这一存在几个一致性问题：在不同类型的渐进式改革（波兰从上面开始，中国从下面开始）之间进行了比较，在崩溃之前大爆炸式的决策（紧缩和自由化）与崩溃之后大爆炸式的决策之间进行了比较。同时忽视了渐进式改革在崩溃之前的成功（例如，中国）。崩溃前的渐进式改革和休克疗法也被作为相互替代的方案。再者，如果休克疗法和渐进式改革被作为实际的替代选择，那么就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休克疗法在一个国家执行得不错（波兰），而在其他国家却失败了（俄罗斯或罗马尼亚）；为什么渐进式改革一个国家成功了（中国），而在其他国家却失败了（波兰或越南）。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创造私有部门是休克疗法的优势（Rostowski 1994：103），但是如果改革保持循序渐进，那么创造私有部门也能获得成功，不论是崩溃之前自下而上的改革（中国），还是崩溃之后自上而下的改革（匈牙利）。再者，把经济危机联系于渐进式改革或休克疗法，我们不能解释接下来的几个问题。如果休克疗法是理想的改革步伐，那么，渐进式改革在一些国家（中国）又是如何获得成功的呢？如果渐进式改革是理想的，那么，为什么它们在一些政党－国家（匈牙利、捷克共和国、越南）失败了，在另一些政党－国家（中国）成功了？为什么渐进的措施在某个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匈牙利的私有化）有效，在其他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罗马尼亚）却失灵了呢？

其他观点认为经济绩效水平取决于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相对顺序。[①]有人认为，中国选择了首先实行经济转型，这种选择被证明是成功的，而另一些可比较的体制选择了政治转型先于经济转型，引发了深刻的经济危机（Aslund 1993；McKinnon 1991；1993a；1993b；1993c；1994；Naughton 1996）。但是，这些观点没有解释危机的深度和恢复时期。尽管这些国家都选择了政治转型在先，但是，为什么它们在崩溃后的危机深度和恢复时期如此不相同？为什么民主的后社会主义政体首先实行了政治改革，却获得了改革成功？于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为什么国家选择政治转型先于经济转型，尽管经济转型更加有效。相反，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在体制崩溃

① 例如，Shirk 1993：330，350；Tong，V. 1997：179；Walder 1995b：975；Woo 1994：289；1998：180；McMillan and Naughton 1992：131.

前发起的经济转型失败了，导致网络内具有良好反馈和讨价还价地位的行为人实现了财富的垄断性积累（Sachs and Woo 1997：278）？否则的话就可以成为经济转型先于政治转型的范例。

政治转型先于经济转型，或者反过来，经济转型先于政治转型，很容易导致哪一种政治制度最适于实施改革这一选择问题。[①] 经常被提出的问题是，政治分权的、民主的政府在努力克服经济危机，它是否足够强大以实施激进式改革？或者，独裁主义政体是否更加适于实行损失多数人利益的、不受欢迎的改革（unpopular reforms）？一方面，专家有激励去证明，为什么经济增长应该（或不应该）联系于盛行的独裁规则和政治权力垄断。另一方面，有人提出争论，为什么经济衰退应该（或不应该）被认为是决定政治民主先于经济转型的结果。有人认为对立于独裁政府的局部民主化对改革是有害的，因为公开化（glasnost）不能通过政治渠道来推动改革，尽管中国在这方面成功了（Aslund 1993：96）。另一些人强调，中国增长来自于计划而不是抛弃计划，这降低了政治不稳定的风险，相反，东欧国家则想不惜一切代价废除旧秩序（Chen et al. 1992：223）。对独裁规则的类似研究出现在 Shirk 的观点当中，她认为政党当局也许更应该承担不受欢迎的改革的责任，并分别把中国作为正面例子，把苏联作为反面例子（Shirk 1993：333，350）。Jin 和他的合作者在研究中提出了一个相关的观点，他们强调，中国使改革过程在有序与混乱之间保持适度，是一个正面例子（Jin and Haynes 1997）。类似地，《世界银行报告》要求政府和部委坚决加强金融纪律约束力度，不能任凭企业索取资源（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45－47）。

然而，在一个政党－国家中，独裁政府不必然导致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参见 1989 年以前的罗马尼亚、东德，现在的朝鲜和古巴。相反，民主选举不必然带来民主，例如，米洛舍维奇（Milosevic）在塞尔维亚，Tudjman 在克罗地亚，叶利钦在苏联，Meciar 在斯洛伐克，以及几个后苏联共和国（例如，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

① Aslund 1993：96；McKinuon 1994：68；Nolan 1996：299；Perkins 1993：133；Tong，Y. 1997：179，220；Walder 1995b：975；Woo，1998：167；Sun 1997.

斯坦)。再者，在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波兰那些所谓早期改革的国家，民主选举也没有妨碍经济增长。

无论采取以上哪种方法，学者们都是为了解释以下对照：中国式经济改革导致了成功增长，苏联和东欧“失败的”改革导致了衰退、崩溃和困难。基于比较文献的分析，这里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有些政党－国家体制实行了改革却仍然发生了崩溃（匈牙利、苏联)？为什么有的政党－国家体制实行了改革却没有发生崩溃（中国)？为什么类似的宏观条件引起了不同的反应，从而实施了不同的措施？为什么类似的宏观条件在一个国家（罗马尼亚）引起了突然崩溃，在另一些国家（波兰、匈牙利）引起了温和崩溃，而在第三类政党－国家（中国）却使结构得以维持？为什么尽管没有改革（罗马尼亚）也发生了过渡？为什么一些过渡陷入经济危机（东欧)，而另一些过渡却伴随着经济增长（中国)？为什么处于过渡时期的国家中（罗马尼亚或匈牙利）经济危机的程度各不相同？为什么一些过渡中政治家们在急需要改革的时刻却动作迟缓（罗马尼亚)，而另一些过渡中政治家们行动迅速（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为什么前自由派或保守派的反对者在自由选举之后接管政权的情况下，改革步伐较快（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而在社会主义者接管政权的情况下，改革步伐较慢（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为什么这不适于自由派获胜的所有情况（俄罗斯)？在什么程度上，以及出于什么原因，个人动机和领导的战略在不同的国家被放松或被限制？如果只有正确的战略才是重要的，那么为什么一些国家没有实施成功的战略，而另一些国家却实施了成功的战略？

不同模式下的改革特征

表5和表4隐含地涉及适当模式和体制中的那些维度，即比较改革文献中所提出的对立党派之间存在重大分歧。模式的动态运行为体制再生产背景中改革的位置、作用和影响提供了一个答案。自我相似特征、不同模式及其动态运行,① 将解释改革在位置、步伐、顺序上的差异，以及用来

① 考虑资源攫取和分配的不同工具，再生产约束硬化的不同频率，发展的不同途径，每一种模式内权力分配的变形，以及他们在崩溃后发展中的残留影响。

描述改革特征的政体。

表 10 明确地包括了在体制背景中关键维度上的一般结果和动态模式运行。

结合表 4、5 和表 10 的结果，我们可以强调，自我掠夺型模式在体制崩溃之前没有发生改革，但是在民主政体下，也许在体制崩溃之后会发生某种改革。政治转型先于经济转型。从表 5 我们可以知道，在民主政体中，体制崩溃是突发的，经济解体和政治解体是重叠进行的，并且与崩溃后的转型过程同时进行。①

表 10　改革在不同模式下的主要特征

改革	自我掠夺型		自我解体型		自我撤离型	
	崩溃前	崩溃后	崩溃前	崩溃后	崩溃前	崩溃后
下面	–	×	–	×	×	
上面	–	×	×	×	×	
渐进	–	×	×	×	×	
突变		–	–	×	–	
政治改革在先	–	×	×		–	×
经济改革在先	–	×	–	×	×	
独裁政体	–		×		×	
民主政体		×		×		

在自我解体型模式中，从上面开始的、造成国有经济领域局部解体的渐进式改革，在独裁政体下发生于崩溃之前。尽管如此，但是政治转型先于经济转型。根据模式的变型，在体制崩溃之后，经济转型期间可能发生激进式改革，也可能发生渐进式改革。从表 5 可以看出，这一模式中的体制崩溃是平缓的，政治领域解体先于体制崩溃，但政治领域演进后于体制崩溃。

① 一个民主政体首先意味着正式的民主规则，我这里不深入研究实际民主的程度和民主的不同形式。而且，既然规则还没有在社会中确定下来，后－自我掠夺型转型中累积的不确定性最高，那么，在形式上的民主规则下也可以出现独裁的统治方式（参见许多后－苏联共和国）。

在自我撤离型模式中，改革从上面和下面同时开始。在独裁政体中，改革是渐进的，经济转型在先（表10）。从表5中我们可以看出，局部的、推进的、有选择的网络绝对收缩和相对收缩导致渐进式的体制消亡，在此期间，经济解体和演进同时进行。

把表4、5和表10结合起来，便为本书开头所提到的那些问题给出了结构性解释，对于这些问题，比较改革文献既没有给出答案，也没有对有关改革问题提出战略选择。在反映这些问题之前，基于其动力以及与模式动力相匹配，我们已经把比较改革文献中所提到的国家进行了模式分类。评价的基础在于它们形成导致特定转型的最终权力分配的时期。基于这种分类，罗马尼亚和朝鲜属于自我掠夺型模式；匈牙利、波兰和苏联属于自我解体型模式；中国和越南属于自我撤离型模式。根据这些比较中所确立的标准，我们已经评价了俄罗斯和捷克共和国，并把它们归类于体制崩溃后的转型中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把这些国家准确地归类于不同模式，还需要对这些国家的权力分配逐个地进行经验研究。然而，即使这种尝试性的分类，也使我们可以基于不同模式的动态运行进行解释。

这三个表使我们可以阐述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再生产的模式和模式特有性工具解释了一些政党－国家实际上忽视了改革，尽管改革看来是一种理想手段，可以使自我再生产保持自我掠夺型模式的形式，而不优先考虑经济效率。结果，一些政党－国家仍然保持斯大林主义结构（例如，朝鲜、罗马尼亚和古巴），而另一些则背离了斯大林主义结构（例如，中国、波兰、匈牙利和苏联）。由于自我解体型模式特殊的结构性动力，用改革来背离斯大林主义体制，不会直接导致市场经济，而是导致网络内经济下滑（波兰、匈牙利和苏联）。并且，正是背离斯大林主义结构的自我撤离型模式的特殊动态运行，导致了市场逐渐（在经济上和制度上）占据主导地位和经济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绝大部分是发生在网络外，而网络内经济增长放慢或下滑（中国或越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正是网络内总体上与体制相符的行为和动机，在分权化改革中推动了通货膨胀和投资过热，而不是增加效率和硬化预算约束（例如，中国、匈牙利或越南）。

自我解体型模式与自我撤离型模式之间的模式动态运行差异，提供了以下问题的结构性原因：为什么一些政党－国家体制实施了改革却仍然发生了崩溃（匈牙利或苏联），为什么另一些政党－国家体制实施了改革而没有发生崩溃（中国）。不同的模式也提供了以下问题的结构性原因：为什么相似的宏观条件激发了不同的反应和不同措施的实施。自我再生产期间进行资源攫取和再分配的、与模式相符的工具得以产生和实施的机制，解释了政府反复采取类似行动的原因。尽管从经济增长角度看这些行动是失败的，但是政府却仍然这样做。

类似地，不同的结构性因素解释了为什么一些政党－国家支持私有部门（例如，中国），另一些政党－国家容忍私有部门为次等经济（例如，匈牙利），而还有一些政党－国家却严格地禁止私有经济（例如，罗马尼亚）。也是由于不同的模式动态运行，类似的宏观条件在一类国家（罗马尼亚）导致了突发式崩溃，在另一类国家（波兰、匈牙利）导致了温和式崩溃，而在第三类政党－国家（中国）却维持了这一结构。自我掠夺型模式和自我解体型模式的结构及动态运行与自我撤离型模式的结构及动态运行的差异在于，某些过渡陷入经济危机（东欧），而另一些过渡却伴随着经济增长（中国）。正是自我撤离型模式与自我解体型模式之间的动态运行差异，解释了为什么渐进式改革在一类国家（中国）成功了，而在另一类政党－国家（波兰或匈牙利）却失败了。在这里我们把中国从下面开始的渐进式改革和波兰从上面开始的渐进式改革称作与模式相符的改革。网络内从上面开始的渐进式改革在中国和越南都没有获得成功，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崩溃后转型中的模式动态运行的影响从结构上解释了为什么处于过渡时期的国家（罗马尼亚或匈牙利）的经济危机在程度上有所不同。模式动态运行的遗留特征及其变型，决定了政治解体的程度从而崩溃前横向关系演进的程度，从而决定了是（改革派）共产党（在前自我掠夺型模式中）还是自由派或保守派政府赢得了首次选举（在自我解体模式中）。转型的自我掠夺型模式和自我解体型模式，也揭示了为什么崩溃后国家的危机深度和恢复时期有所不同，尽管它们都是首先发生政治转型。因此，转型的不同模式的遗留特征以及毫不含糊的政治风格，部分地导致了政治家们在急需改革的过渡中行动迟缓（罗马尼亚），在另一些过渡中却动作

迅速（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1]）。如果不考虑第一印象，那么对**转型速度**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不在于政党风格，而是在于结构的遗留特征。例如，尽管在俄罗斯和波兰自由派赢得了选举，但是在俄罗斯休克疗法失败了，而在波兰休克疗法却成功了。另一个例子是罗马尼亚的情况：在自我掠夺型模式中，政治解体与经济解体是重叠的，事实上解体与演进本身是重叠的，在崩溃之后，渐进方法和休克疗法从短期来看都没有获得成功。关于**转型的顺序**，其他方面都取决于模式动态运行，改革派共产主义者戈尔巴乔夫强行改变转型顺序，在自我解体型模式中优先考虑经济转型和政治解体，也是失败的：没有促进经济增长，而是为在崩溃前获得反馈的那些行为人提供了垄断优势，决定了俄罗斯的自由派政府在崩溃后的经济条件。

战略的作用

这意味着战略是无关的吗?

如我们前面所强调的，机动空间和替代方案的出现受到特定体制和模式的结构性约束和动态运行约束。不是正确的战略而是模式动态运行决定了资源攫取和再分配的工具的类型，只有在模式内部，战略才至关重要，才会出现特定类型工具的不同变型。与模式不相符的工具，或者由于缺乏约束和利益而不会出现，或者应用之后很快就在形式上适合了特定的权力结构。事实上，在再生产约束硬化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模式特有性工具的应用会加速，而不是改变措施。基于表5和表10，比较改革文献中相互对立的流派提出的战略替代方案在结构上是不一致的，政治家的假定的机动空间被夸大了。

那么，为什么在比较改革文献中，学者们会得出结论认为战略涉及改革位置、步伐和顺序的选择以及应该实施改革的理想政治制度呢？原因在于，在比较改革文献的分析中，**没有把政党联系**于其体制和模式背景。因此，他们在分析改革时把不同的模式同质化；混淆了模式和体制，把不同

---

[1] 基于其动力，在以前的捷克斯洛伐克，捷克共和国趋向于自我解体型，而斯洛伐克共和国则是自我掠夺型的，更大聚合体在1968年以前是自我解体型的，在1968年以后是自我掠夺型的。

的体制同质化。对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在比较文献的代表作中找出一些具体的例子。

9.3　脱离结构背景的改革比较

模式特征被同质化

在比较改革文献中，学者们经常忽视不同模式的结构和/或动态运行特征，有时甚至错误地组合不同模式的结构及动态运行特征。[①]

最明显和普遍的例子就是，对自我掠夺型模式——以及其中的斯大林主义——的结构及动态运行的过度一般化（overgeneralization），把它当作正统的政党－国家体制。由于这种一般化，使其他两种主要的模式被忽视了。在这种意义上，背离斯大林主义等于背离国家社会主义和向市场经济过渡。但是，如前所述，在时间、空间、不同聚合体和结构条件（发展中的或瓦解中的）等方面都普遍存在自我相似性。因此，根据 IPS 模型，在网络普遍存在的地方，自我相似特征将在每一种特定模式中保持完整无缺，在所谓“极权主义”政体的构建、稳定化和出现之后也将保持完整无缺，就像在崩溃之前一样。

在当前的分析中，斯大林“极权主义”体制是政党－国家自我相似特征中的一种自我掠夺型变型。再者，背离它并非自然地意味着向市场经济过渡，而只不过意味着政党－国家体制内可逆转或不可逆转的发展（延迟的结构转变）。如果忽视这些因素，那么就会错误地认为：背离僵化的斯大林主义结构、朝着完全市场关系发展，是连续性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过渡（过渡到独裁主义或民主主义政治体制）。

在这种情况下，在对自我掠夺型模式的**结构**进行一般化的时候，学者们把另一种模式的**动态运行**一般化到整个体制——自我撤离型模式的动态运行。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崩溃只不过被看做一个片段：政治体制

① Aslund 1993：96；Gelb et al. 1993：87 133；Perkins 1993：133；Nolan 1996：298；Sachs 1994：121；Sachs and Woo 1997：12；Walder 1995b：975；Woo 1998：167，168；Xu and Zhuang 1998：194，195，210；Wu，Yu-Shan 1994：205.

变化。

出于同样原因，分析者没有反映出平滑的崩溃与突变的崩溃之间的明显差距——由于政党－国家结构的再生产有的在改革情况下进行，有的在没有改革情况下进行，导致平滑崩溃与突变崩溃在东欧都出现过。他们也没有反映每个模式内转型和经济危机的强度和骚乱差异的结构背景。

通过考虑对斯大林主义（传统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背离（一个转向市场协调的持续过程），资源攫取和分配的结构特有性机制（模式）被当作了替代方案。由于忽视了结构特征（模式及其内部的变型）和相应的动态运行，所以仍未回答背离所谓的斯大林主义体制的原因（例如，中国、匈牙利、波兰），也没有回答保持所谓的斯大林主义体制的原因（例如，朝鲜、古巴、罗马尼亚）。相反，学者们经常把不同的结构特有性发展作为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权力斗争的唯一结果（Woo 1994：280）。

在这种分析中，制度化的模式差异将被当作简单的战略选择问题，这种选择在原则上是可逆返的。有些学者认为这些观点混淆的不仅是模式，而且还有与模式相符的体制解体、崩溃和演进，但是他们没有分析共产党复辟的可能性（Tong，Y. 1997：19，220）。

另外，我们还可能发现更复杂的模式混淆：在比较崩溃后的发展时，通常忽视了崩溃前模式的不同影响。这些学者认为，崩溃后的差异是隔离的、不辩自明的。如果忽视了模式特征的崩溃前原因，那么，崩溃后的影响就被重新纳入因果关系之中，并被当作特征发展的工具。在这些情况下，对于有关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有关机动空间和战略决策影响，都会得出错误结论。

例如，Joel Hellman（1998：203 234）用后苏联和东欧政党－国家的崩溃后改革的详细经验证据，来证明全面改革比局部改革的过渡成本更小，因为在全面改革的情况下，短期获利者妨碍改革的能力更小。Hellman 还证明，即便执行者和领导者发生了变更，全面改革仍然可以进行，即便领导者维持了一段在位时间，局部改革也仍然可以进行。他还证明，在发生局部改革的地方，短期获利者很强大，有能力和兴趣阻碍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在这方面，Hellman 反对这样的观点，即，政府应该保持独立、不受失利者的影响，否则失利者就会阻止全面改革。

在 IPS 模型的框架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在自我解体型模式中，崩溃前改革的全面性和崩溃后更广泛的政治联盟，另一方面，在从前是自我掠夺型模式的情况中，崩溃后改革的局部性和狭窄的统治利益。这些就是崩溃前动态运行对崩溃后演进的直接影响。与自我解体型模式相反，在自我掠夺型模式中，没有时间和机会产生新的集团。因此，前社会主义政党通常能夺取政权，从前具优势地位的短期获利者通常成为受益人。但是，Hellman 忽视了影响转型特征的崩溃前的权力分配，因此忽视了崩溃前解体的程度，忽视了新的横向集团出现的机会，或者忽视了继续保持从前优势地位的机会。忽视体制和模式影响，问题便会轻易地转变为一个最优战略选择问题，而结果将是无意识的和意外的。

因此，改革的全面性与局部性是相互衍生的，而不是被当作从前权力分配的并行结果。由于同样原因，崩溃后危机的程度是从崩溃后拥有特权地位者的行为中推导出来的，而不是从崩溃前模式动态运行的影响中推导出来的。过渡成本的大小被认为取决于短期获利者的出现，而不是从前再生产模式的影响，短期获利者可以在从前再生产模式中出现和稳定化。从这种逻辑中导出的结论是类似的：失利者应该被指定，以便拓宽联盟、控制短期获利者，从而限制他们的机动空间。

再者，由于忽视了自我解体型模式中崩溃前渐进解体所导致的温和革命和自我掠夺型模式中崩溃前没有出现解体所导致的暴力革命的结构背景（原因），所以，执政精英中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对抗（激进的和温和的），起着决定性的解释作用（Tong, Y. 1997：220；Hellman 1998）。而且，同时发生的结果被再次纳入因果关系链之中，为曲解留下了广阔的余地。然而，不考虑从前模式的动态运行，我们经常发现这些所谓的因果关系对其他案例并不成立。例如，实际上不存在反对派——激进的或温和的——与改革派的政党－国家（比如罗马尼亚）的暴力崩溃，仍然没有得到解释。这些理论都不能解释中国能够避免崩溃的结构性原因，尽管所有的因果关系迹象都很可能存在。

模式与体制相混淆

在几个分析中，学者们混淆了体制特征与体制内特征。换句话说，他们混淆了政党－国家结构及动态运行的一般特征与政党－国家结构内不同

权力分配模式的结构及动态运行。结果，体制特征被当作政党－国家中的模式特征，政党－国家中的模式特征被当作体制特征。[①]

最重要的错觉之一就是，再生产约束的体制特征被归因于国家特征。在改革文献中，中国专家隐含地、广泛地建议资源分配的选择性，尽管他们赞成把资源用于非常分散的用途。[②] Walder 提出了最突出的争论，他否定科尔奈软预算约束概念的广泛有效性（Walder 1995b：270）。Walder 正确地指出，软预算约束不是一般性的，而是有选择的。但是，他错误地把有选择性当作体制特征，与中国普遍存在的有选择的特定模式动态运行混在一起，并把有选择性归因于中国，作为中国的特征。这样，Walder 便把体制特征（选择性软再生产约束）归因于某个特定（自我撤离型）模式，作为该模式的特征。这里出现了几个问题：

（1）第一个问题就是，预算约束（一个经济术语）与再生产约束（一个结构术语）混在一起，也意味着不同的动机特征。

（2）Walder 论述了有选择的软而不是总体上的软，局限于中国国有企业从属性的特殊分布（行政层级越低，下属国有企业规模越小——因此，行政层级越高，约束软化的频率就越高），而不代表政治理性选择标准的一般特征，在中国这一标准也具体地出现在聚合体层级当中。

（3）因此，选择性作为体制特征与中国自我撤离型模式的特殊选择性被相互混淆了。

（4）结合（1）～（3）（经济特征与结构特征，模式特征与体制特征），将导致忽视结构和动机上的自我相似性。在 Walder 看来，把资源下放给具有更硬预算约束（而不是再生产约束）的下级经济单位，将推动通货膨胀和投资过热。

忽视结构和动机上的自我相似性，也会导致类似的错觉。例如，分权化被认为是这样一种战略，它——通过减少非对称信息——将提高信贷分

---

① 后面的这些情况在前面的章节中比较详细，模式被概括为体制，如所有的那些作者都将斯大林式自我掠夺型模式的特征当作体制特征。

② 例如：Dewatnipoint and Maskin 1995：541 － 556；Granick 1990：152 － 158；Huang 1990：431 － 458；Sohnger 1996：14；Sun 1997：15；Walder 1995a：266，270；Weingast 1995：4；Wildasin 1997 Wong，C.，1985：257；Xu and Zhuang 1998：191.

配的效率，硬化预算约束。[①] 然而，如果不顾政治上驱动的经济行为和资源竞赛的一般体制特征，那么这种分权化也将导致通货膨胀和投资过热，而不是经济上的再生产约束硬化和效率增加。1980 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的分权化几次都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并导致紧缩。匈牙利 1960 年代以来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Huang 1996：14；Ungvárszki 1989）。

类似地，如果根据规模有选择地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那么就不能解释在其他政党－国家中，不同规模的经济单位在资源、价格、免税等方面讨价还价的不同成功（Csanádi 1997b：106－173）。再者，如果真的硬化了更小经济单位（在中国是负责这些单位的更低行政层级）的预算约束，那么，为什么在匈牙利通过吞并来实行破产倒闭的频率与固定资产的规模负相关，而不是与非效率正相关（Csanádi 1997b：115，121）？为什么宏观层面上的改革——分权化或集权化——在政党－国家中反复"失败"（形式上适合 Naughton 1996：23）？

以上提出的所有问题，涉及体制特殊的有选择性及其基于政治理性标准所导致的结果。这些标准产生了有选择的资源吸引、攫取、分配和抵制机会，对经济单位有选择的软再生产约束和自我相似的储藏行为。然而，它也将产生自我再生产约束硬化的模式特有的频率，以及不同的自我再生产工具。如果忽视体制特征或把体制特征与模式特征相混淆，那么几个重要的问题就会被低估或得不到解释。

相反，当模式特征被作为体制特征时也会发生混淆。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详细阐述了模式被一般化为体制的情况。把斯大林主义自我掠夺型模式的特征作为体制特征而不是模式特征的所有支持者，都存在这一问题，他们把背离斯大林主义看作朝向市场体制的持续发展。在此期间子域（经济）的发展被夸大到整个体制，[②] 而体制崩溃则被缩小为政治子体制（政

① 在以下著述中可以发现这样的暗示：Dewatripoint and Maskin 1995：841－843；Woo 1998：177；Qian and Xu 1993：138；Qian and Roland 1998：1143－1162；Sun 1997：13－14；Naughton 1996：47.

② 在以下著述中可以发现把子域与体制或模式相混淆的类似问题：Naughton 1996：318；Qian and Xu 1993：157；Tong，Y. 1997：179，220；Walder 1995b：975；Weingast 1995：1－31；Cao et al. 1999：125；Pearson 1997：101－103；Woo 1998：168.

体）的变化。[①]

这一误解对经济分析具有严重的影响，它倾向于忽视以下事实的重要性：在几个东欧国家，“尽管”实行了经济改革，但仍然发生了体制崩溃（例如，匈牙利、苏联）。同时，中国尽管实行了改革，但没有发生体制崩溃。再者，在没有实行改革的情况下，也发生了体制崩溃和转型（例如，罗马尼亚）。

不同体制被同质化

在混淆了模式与体制的具体情况下，政党－国家模式与崩溃后的演进被赋予了共同的基础。在比较改革文献中，这种混淆也同时也导致了不同体制的混淆，例如，研究者对改革进行比较，而不管是体制崩溃前实施的改革还是体制崩溃后被实施的改革。[②]

在这些研究中，体制崩溃及其典型的制度行为后果和经济后果，都没有隐含地或直接地得到重视。例如，Tong 最明显地提倡这一方法，她强调国家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一个无止境的动态过程”，而“中间时期”也许包括“建立某种形式的民主，保存某种类型的独裁主义规则，权力在无能的继任政府中轮换，或者出现革命性的取代者，在经济领域创造混合型官僚主义市场体制，出现腐败的市场体制，或者经济停滞或局部崩溃”（Tong，Y. 1997：2）。

如果一种模式的崩溃后演进与另一种模式的崩溃前动态运行结合在一起，那么情况将更加复杂。[③] 在这些情况下，不仅崩溃前模式被相互混淆，

---

① 在“过渡论”的文献中经常把体制改革当作政治制度变化，基于同一平台来分析拉美和南欧的政体变化与东欧的转型（详见 Bunce 的批判性分析，Bunce1995a：111－127）。

② Rostowski，in McKinnon 1994：101－102；Sachs and Woo 1994：119；Sachs and Woo 1994：3，15；Nolan 1996：299；Shirk 1993：350；Walder 1995b：975；Woo 1998：180.

③ Perkins 1993：133；Gomiilka 1994：93；Chen et al. 1992：223；Sachs and Woo 1994：119，122，131；Woo 1994：303，305；1998：167，281；*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143；Xu and Zhuang 1998：194；Rostowski，in McKinnon 1994：102，103；Sachs and Woo 1997：12，37；Gelb et al. 1993：125；McMillan and Naughton 1992：132；Dollar 1994：357－390.

而且不同模式对崩溃后演进的影响也被忽视了。再者，崩溃本身被忽视了，一种模式（如自我撤离型模式）的动态运行与另一种模式（如自我解体型或自我掠夺型模式）的崩溃后影响，被赋予了共同的基础。最后，不同政党－国家与本主义体制也变得混乱不清。结果，所得出的结论在结构上是无法证实的。

例如，Naughton（1996）谈到了三种改革类型（models），却没有区分这些行动所处的模式和体制，这是便出现了累积的不一致性。根据他的分类，第一种类型是中国的双轨制改革；第二种类型是1960年代欧洲指令经济在改革中所遵循的"理性化改革"；第三种类型是首发于波兰、后来不同程度地扩散到捷克共和国和俄罗斯、1990年代流行的"大爆炸"方法（Naughton 1996：13－16）。根据 Naughton 三种独立类型或理想类型，几乎涵盖了社会主义指令经济中所实施的重要经济改革的所有尝试。然而，Naughton 用理性化改革这一术语来表示整个东欧的重组，而没有在强制性资源调配模式（这里只有行政重组）与资源调动型改革之间作出区分。另一方面，Naughton 把崩溃后体制中的休克疗法与"理性化"改革归于一组，而忽视了休克疗法与"理性化"改革发生在不同的体制中。

类似地，在分析休克疗法支持者的观点时，我们也可以发现相互矛盾之处。他们高度重视中国改革的前提条件有利于渐进式改革的比较优势，而波兰和俄罗斯的改革则是在严重的宏观经济危机或外部债务危机的条件下被迫实施的（Woo 1998：167）。这些观点没有反映不同模式（中国的自我撤离型，波兰和俄罗斯的自我解体型）的动态运行对经济与政治转型的不同顺序的影响，以及对经济发展和衰退过程的影响；没有反映体制崩溃对一种模式（自我解体型）转型的影响，以及导致造成累积性危机的解体的动态运行。这意味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原因在于分权化导致政府行政能力较低。同时，也没有反映为什么崩溃后政府具有更高的行政能力，可以在经济危机和民主秩序下实现休克疗法。关于分权化战略的这些争论没有区分出：一种模式的动态运行，不同模式的动态运行，一种体制向另一种体制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因模式而异。

混淆体制的另一个例子是，渐进式改革的支持者把独裁主义中国比作"新生的"崩溃后的民主政府，并认为独裁主义政府更适于实施这样的改

革，这些改革不可避免地造成大量的失利者，而这些失利者可能妨碍民主政权引入和推行改革。[①] 我们还发现，这种争论被归因于激进破旧、冲击西欧“最优方法（best practice）”制度的能力（Sachs 1993b：146）。

在强调不同初始条件重要性的时候，如果混淆了模式与崩溃后和崩溃前体制，那么也许会最终赞扬独裁政府而不是民主政府，认为独裁政府为从指令到市场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想条件：

一旦共产主义领导者放弃了对立法机构的权威，不愿意行使立法权，便会出现民粹的保守主义（populist immobilism）。在一个具有灵活选举程序的共产主义政体中，保持共产党对政府和社会的深远威信，这虽说不符道义，但也许是经济改革最好的短期政治战略（Shirk 1993：350）。

针对中国改革的成功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实施的苏联和俄罗斯改革的失败，Shirk 提出了不同模式相混淆的问题（自我撤离型模式与自我解体型模式，以及自我解体型模式的崩溃后影响）。并且，Shirk 和支持这种观点的其他学者，[②] 在独裁政府与经济景气之间，在民主政府与经济危机之间，建立了某种因果关系。

除了不同模式和崩溃前、崩溃后体制的结构不相容之外，还有几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释。如果独裁政体更适于改革，那么为什么罗马尼亚、朝鲜、古巴、蒙古等国家没有发生改革却发生了经济危机？为什么匈牙利的经济螺旋下滑——类似于苏联的情况，只不过更加轻微——尽管在独裁政体时期实施了经济改革？什么程度的独裁统治对于实施改革是最优的？这确实是一个战略问题吗？

结构背景与替代战略

没有结构性约束，就很可能出现替代战略。这些替代战略包括鼓励分权化和从下面开始的改革，反对从上面开始的改革，[③] 鼓励渐进式改革，

① Tong, Y. 1997: 20, 133-134; Shirk 1993: 350; Aslund 1993: 67.

② 如 Tong, Y. 1997: 133-134.

③ Dewatripoint and Maskin 1995; Gelb et al. 1993: 125; Lin, C. Z. 1989: 115; Lin et al., Naughton 1996: 196; Qian and Xu 1993: 157; Walder i995b; Huang 1996; Sun 1997; Solnick 1996: 232; Woo 1998: 177; Xu and Zhuang 1998: 218.

反对大爆炸式改革，或鼓励大爆炸式改革，反对渐进式改革，[①] 鼓励经济改革在先或政治改革在先，[②] 鼓励独裁政体或民主政体。[③] 其他支持者分析了根据改革的理想战略及其最优实施方法[④]在这些替代方案之间进行选择的可能性[⑤]。然而，没有考虑体制背景或它的遗留特征所造成的驱动力和约束，不论是被赞扬的战略还是被抛弃的战略，还是得不到清楚的解释。机动空间明显发展得更大，改革和改革的成功看来只是一个关于改革和转型的位置、顺序、时机和速度的最优战略选择问题，或者说是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权力斗争以及领导者个人素质问题。

总之，基于 IPS 模型，我们可以强调，不同体制中的改革不能置于共同的基础上来加以分析——如果改革是在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体制下、在体制崩溃前或崩溃后被实施的。不同模式（自我掠夺型、自我解体型和自我撤离型）中的改革也不能置于共同的基础上来加以分析，因为改革作为一种自我再生产工具，其实施与否是模式特有的（在自我解体型和自我撤离型模式中），改革的起始位置（在自我解体型模式中是从上面开始，在自我撤离型模式中是从上面和下面开始）也是模式特有的。而且，体制自我耗竭和转型的模式动态运行将决定：

要素转型和体制崩溃的性质——重叠、依序或有选择地推进。

结构要素转型的顺序——政治转型、经济转型和国家转型。

政治转型的经济条件——在自我掠夺型和自我解体型模式中经济下

---

① 参见 Aslund 1993: 96, 97; Geib et at 1993: 125; Lin et al. 1996: 226; McMillan and Naughton 1992: 132; Naughton 1996: 13－16; Nolan 1996: 297; Sachs and Woo 1994: 119, 122, 131; Sachs et al 1997: 12; Rostowski 1994: 102; 103.

② 如 Shirk 1993: 330, 333, 350; Tong, Y. 1997: 179; Walder 1995b: 975; Woo 1994: 289; 1998: 180; McMillan and Naughton 1992: 131.

③ Aslund 1993: 96; McKinnon 1994: 68; Nolan 1996: 299; Perkins 1993: 133; Tong, Y. 1997: 179, 220; Walder 1995b: 975; Woo, 1998: 167.

④ Dewatripoint et al. 1995: 541－556; Woo 1998: 168, 177;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143; Dollar 1994: 357－374; Lin, Cai et al. 1998; Qian and Xu 1993: 157; Bunce 1994: 50, 57; Hellman 1998: 203－234; Sachs and Woo 1997: 105, 123－124; McMillan and Naughton 1992: 131; Li 1998: 310, 313.

⑤ Aslund 1993: 96; Chen et al. 1992: 223; Shirk 1993: 333, 350; Jin and Haynes 1997: 83－93;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 ment Report* 1996: 45－47.

滑，在自我撤离型模式中宏观经济增长（网络内下滑，网络外增长）。

经济转型的政治条件——在自我掠夺型模式和自我解体型模式中，崩溃后形成了民主政体（或形式上民主的独裁主义），在自我撤离型模式中，政党作为政治垄断制度权力开始解体。

转型的社会成本（例如，实现宏观均衡的难度，经济危机的深度，累积的不确定性水平）。

战略决策可以加速、减缓或者弥补改革、解体和演进的以上特征，但不能改变改革、解体和演进的以上特征。机动空间和战略选择受到模式特征及其内部变型的约束——体制崩溃之前、期间和之后都产生影响，被外部条件缓解或恶化。模式内出现替代选择。战略选择不能扩展到模式和体制的类型。基于以上论述可以得出结论，在评价发展战略的时候，在确定改革路线和顺序的时候，我们既不能忽视体制背景也不能忽视模式背景。如果我们忽视这些背景，那么分析结果就会变成无意识的，导致自我反映式的解释（self-reflective explanations）。

第二部分

政党－国家从诞生到转型：罗马尼亚、匈牙利与中国



10 案例研究：引言

10.1 选择国家的条件

本书第二部分将比较代表三种模式变型的三个政党-国家，目的在于用IPS模型为比较经验分析提供的分析工具，阐明三种发展路径。同时，案例研究也可以对IPS模型作为比较经验分析工具的效率进行实地检验(test-fields)。

基于为研究政党-国家动态运行所建立的标准，我们可以尝试性地把这些政党-国家分为不同模式。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蒙古、阿尔巴尼亚、古巴、朝鲜、东德，也许还有1968年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可以归为自我掠夺型模式；波兰、匈牙利、苏联和1968年以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可以归为自我解体型模式；越南、中国和苏维埃集团可以归为自我撤离型模式。[①] 要把这些国家准确地归入正确的组，自然需要全面的经验分析。选择罗马尼亚、1956年以后的匈牙利、1979年以后的中国这三个政党-国家代表三种模式来加以分析，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它们分别代表自我掠夺型模式、自我解体型模式、自我撤离型模式。那么，我们是基于什么因素来作出这样的选择呢？

① 没有经验研究，我们不能把南斯拉夫作为自我解体型或自我撤离型。

对于罗马尼亚，关键因素包括：从1948年以来几乎连续不断的政治恐怖从中央扩散到社会最基层，消灭潜在政治对手的残忍方式，对罗马尼亚德治和齐奥塞斯库这连续两届终身领袖的个人崇拜。经济领域的指示器包括：强制性地发展重工业（直到该政体崩溃前只有过短期中断），以牺牲农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利益为代价，长期无限制地攫取原材料、人力和资本。自我掠夺型模式的迹象是：持续的机构重组，战略职位上的人员不断轮换，短期不稳定的、强制性的改革历史。进一步的迹象是：在这一时期重工业投资动力得以恢复，其后便是短期的、可逆返的自由化；强制性资源调配手段的实施，进一步增加了社会张力；突变的、暴力的体制崩溃，转型的困难，稳定化期间深远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该模式的特征还有，由于缺乏任何其他的、全国性的、有组织的持不同政见者集团或运动，缺乏基层组织和金融设施，缺乏表达共同政治利益的社会集团，导致从前“失宠的”共产党在崩溃后首先接管了政权。

对于匈牙利，把它归于自我解体模式的原因是：在政党－国家网络1956年暂时崩溃之后，大型企业的成立和选举进入了政党在区、县和中央的执行委员会，县级农业合作社在农业重新集体化（re-collectivization）之后的合并和选举。一个重要的迹象是1968年以来分权化改革的形成和实施，期间出现了紧缩和放松约束之间的摇摆。模式的迹象还包括，反复的、徒劳的斗争浪费了再次出现的补贴和其他优惠，这些补贴和优惠扭曲了大企业的利益和经济行为所形成的管制性市场和价格制度。同样重要的迹象是，中央集中分配的各种资源，反复地分配于同一方向，形成了强制性路径。在显示出选择性抵制能力的实施全面管制的历史中，我们发现了体制性例外（systematic exemptions），这导致了网络内强制性资源调配和紧缩政策的失败，这也是匈牙利模式的基本特征。由于同样原因，网络内分权化改革加速，与此同时经济进一步衰退，亏损企业数量增加，都是一些明显的迹象。体制的温和崩溃，随后经济复苏时期的平缓转型，从经济危机中复苏的时间相对较短（相对于罗马尼亚），强化了这一假定。类似因素可以描述大多数中东欧政党－国家和苏联在国家层面上的特征。

对于中国，把它归为自我撤离型模式是基于以下现象：如，非国有企业在数量、就业、产品和税收等方面的贡献比重快速增长。类似重要的因

素是：大量的国外和国内私有资本，形成合资企业，购买转型了的国有企业的股份，或者购买整个国有企业。类似地，这一模式的基本迹象是：大量的县乡一级政府的赤字日渐增加，国有企业私有化在数量和规模上的扩张和加速；越来越多的村、镇和县一级实行自由和半自由选举（Lai，Hairong 2004）；更多地引入法律和规章，以便直接或间接地减小国家的分配作用；增加透明度和责任，从而逐渐打开封闭式渠道，降低封闭式渠道的作用。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网络的相对和绝对收缩，并且由于网络内分配能力下降，或许还会导致各级网络的虚空和加速解体。

我们选择这三个国家的原因除了它们明显地适合这三种模式之外，还因为它们在个体特征上的突出差异。一方面，不同的规模、地理政治区位、苏联的不同作用、截然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制度发展、基础设施水平、领导个性，等等，为我们考察这些差异之外的空间上的自我相似性提供了机会。再者，不同层级聚合体上的自我相似性，使我们可以基于共同的平台，在中国与依附于苏维埃集团的东欧政党－国家之间进行历史比较，尽管它们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把中国纳入这一研究，使我们有可能在经验上检验 IPS 模型的理论扩展。

另一方面，个体特征在这些模式形成时期起着决定性作用。一旦结构稳定了，自我再生产的典型方式出现了，那么个体特征就会被模式激发或筛选（filtered）。我们的研究还揭示了各种条件下不同模式中的机动空间：存在较大聚合体的情况和不存在较大聚合体的情况，存在外部压力的情况和存在外部支持的情况，结构处于发展时期的情况、暂时崩溃时期的情况、衰落时期的情况和转型时期的情况。在这些时期，领导者的个人性情将通过他们的决策对较大聚合体和国际条件产生影响。

经验事实还可以在以下方面对 IPS 模型假说进行证伪检验（falsifying tests）：自我相似性，与模式相符的使再生产约束硬化的行动及其反应，政治理性的有选择性，动态运行陷阱，模式转变，与模式相符的自我再生产工具，加快自我耗竭过程的内部和外部原因，等等。

案例研究所能得到的和不能得到的

首先，对于习惯了基于记录文档对经济、社会或政治历史进行传统描述的读者来说，接下来的分析将显得不同寻常。本书不是对这其中任何一

个领域的传统研究。而且，我们并没有揭示新的历史事实。这对于那些习惯了传统比较分析的读者来说也是不同寻常的，因为传统比较分析是基于一组重要的统计指标或其他标准化的指标，寻找出现偏差的原因。我们不打算进行这种传统的比较分析。相反，在本书的框架中，我们所期望的是简短证明不同模式的结构和运行。基于 IPS 模型方法的案例研究，将揭示历史事实、经济政策、领导者个人动机、外部政治经济条件等方面新的内在关系，从而揭示对历史发展过程进行新的比较分析的可能性。

这部分将遵循三个政党 - 国家发展阶段的历史时序：背离时期，自我再生产时期，模式转变时期，转型时期。每个阶段都包括一个历史交叉部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三个国家在时间上处于同一历史时期，而是指从 IPS 模型的动态运行角度来看适于相互比较的时期。对于苏联和苏维埃集团，我们只在它们与这三个国家的动态运行的主要转折点之间的关系中分析其动态运行。从三个政党 - 国家自我再生产、模式转变或维持和转型的角度来看，这些转折点是与苏联关系变得至关重要的时期。

我们在分析中要阐述关于历史的三个问题。第一，历史事实支持了模型的主要假说和关于结构及动态运行的模式吗？第二，如果是这样，那么具体的历史事实又是如何支持这些模型假说和模式的呢？第三，经验事实揭示了哪些新因素可能有助于模型的调整呢？

用 IPS 模型的方法分析历史事实，包括几个维度。第一，这部分的内容结构遵循 IPS 模型的动态运行。第二，每一章都以 IPS 模型方法描述三个政党 - 国家的历史事件。第三，每一章都包括一个历史背景，并从较大聚合体和统治单位的影响的角度来评价历史环境。第四，每一章都得出一个小结，从 IPS 模型的动态运行角度在理论上对发展进行解释和比较。

由于分析集中于国家层面和具体历史事实，所以相比于前文中的模型分析，我们将更多地强调宏观政策和宏观经济战略的作用、具体外部条件的影响、具体外部条件的相互作用、具体历史时期的个体特征。但是，这些都不会与模型中建立的规则相矛盾，而只会让这些规则更加符合实际。

正如模型本身一样，具体的分析也将是跨学科的。我已经从各个学科搜集了数据、事实和现象，它们有助于解释：结构形成，与结构相符的动机和行为，与模式相符的工具，原因和结果，内部影响和外部影响及其具

体条件下的相互关系，网络再生产，网络的暂时的或明确的解体。[①]

对于二手经验资料，我们在分析中将不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而是根据网络发展、网络内活动以及它们对网络的影响，对这些资料所提供的信息来加以解释。这些文献中所用的、通常的比较术语和概念，以及我们的模型分析中出现的一些新的术语和概念，也将在网络背景中加以解释。由于一些客观原因，我们分析三个国家时使用了不同类型、数量和经验深度的参考资料。总而言之，这一部分的分析在许多方面都与通常的分析有所不同。

基于以上标准和方法论，以下几章将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苏联紧密控制下向每一个国家灌输同一自我掠夺型模式的过程。然后，我将阐明在这些国家中决定激进式变化的关键时期，或者强调最初权力分配的机会。我将详细说明斯大林逝世和赫鲁晓夫上台对卫星国和竞争对手的影响：有助于在罗马尼亚维持自我掠夺型模式，在匈牙利和中国发生激进式模式转变。同时，我将揭示赫鲁晓夫降职和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在罗马尼亚所维持的模式中，自我再生产的最初工具广泛盛行的原因，在匈牙利和中国，自我再生产的与结构相符的工具的渐近式发展，适合改变了的权力分配模式。我将阐明网络的再生产约束硬化的频率增加，同时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及由于来自网络外、领域内的压力增加，导致集团和苏联权力网络先渐进、后加速的瓦解。再生产约束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硬化，各种网络外预算约束进一步硬化，共同促进了与结构相符的反应，从而促进了走向自我耗竭的模式特有性道路。

① 最后，我将使用统计数据、访谈、政党－国家档案文件、经验性的实地调查结果、正统的经济历史、传统政治科学、政治论文集、政党历史、制度经济学、制度政治学、政治历史、“苏联政体研究（kremlinology）”、经验性制度研究报告、新闻报道、外交政策和外贸分析、OECD 和 IMF 调查。

11　背离起点：自我掠夺型模式的多样性

这一章将集中分析以下问题：统一的斯大林主义结构如何在不同的国家得以实施？该网络如何得以发展？这些国家最初的个体特征在什么程度上影响其结构的制度化？允许多大程度的偏离？本章将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三个国家自我掠夺型模式的形成：在匈牙利，莫斯科派共产党接管了政权；在罗马尼亚，国内共产党接管了政权；在中国，毛泽东接管了政权。我们将考察苏联特别是斯大林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我们追溯国家官僚机构的接管、垄断化和变更，经济、政党官僚机构和互联线的建立以及向垄断子域的延伸，与模式相符的自我再生产工具的发展。

11.1　历史背景

邱吉尔与斯大林1944年10月9日在莫斯科会晤，磋商欧洲的命运。他们把解放了的西欧、东欧和中欧国家划分为停战协议之前的“势力范围（influence zones）”。根据邱吉尔与斯大林之间草拟的谈判结果（最终由莫洛托夫［Molotov］敲定），罗马尼亚、匈牙利这两个德国盟国以如下比率被“共享”：苏联的势力范围为80%，西方势力范围为20%（Gati 1990：36）。根据盟军的协议，在每一个被占领国家都要建立由意识形态上的广泛联盟（ideologically broad coalitions）组成的临时政府，以准备进行自由的议会选举和成立联合政府。共产党可以成为联盟的一部分。尽管苏联在

这些国家具有相似的势力范围比率和相似的联盟结构，但是斯大林对被占领国家中苏联势力长期发展的不同态度逐渐演进为背离起点的差异。在斯大林关于共产党在联盟内接管政权的战略计划中，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属于不同的集团。

根据斯大林的计划，罗马尼亚、波兰和保加利亚的共产党要迅速地接管政权。而匈牙利等国家的共产党在联合政府中的权力扩张被计划为 10－15 年——这是为了缓和西方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恐慌。根据斯大林的指示，那些国家中的共产党要按照这一计划来开展工作（Palasik 2000：142－240；Petö and Szakács 1985：85－89；Gati 1990：24－27，36，87）。

在被苏联占领之前，两个国家的政治形势就有所不同：在匈牙利，霍尔蒂（Horthy）右派保守主义政府在退出德国联盟问题上是矛盾的，公然亲德的法西斯（匈牙利纳粹）政府于 1944 年 10 月 15 日接管了政权（Gati 1990：33－34）；相反，在罗马尼亚，1944 年 8 月 23 日（被苏联占领的前第七天），年轻的米契尔（Michael）国王和主要的反法西斯政党共同发起军事政变，接管了安东内斯库（Antonescu）公开的法西斯政府的政权。由于反法西斯政变，导致一个独立的国家卷入战争，与它从前的敌人一起反对它从前的盟友（Deletant 1999：50）。

罗马尼亚的临时政府，由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农民党和国内共产党的一个代表组成，[①] 准备进行停战谈判，支持自由选举。[②] 这种不同的起点是至关重要的。最初的差异为罗马尼亚国内共产党支持从苏联回国的流亡共产党夺取政权提供了唯一机会。[③] 回国的流亡共产党强有力地影响了罗马

---

① 在那个时候共产党是非法的，非常弱小，党员数量不超过 1000。帕特拉什卡努（Patrascanu）被选出来加入反法西斯政府是偶然的。他正好在动乱中的恰当地点、恰当时间，在事件加速发展的过程中获得了关键职位（司法部长）（Deletant 1999：50－62）。

② 1944 年 9 月 12 日正式签署了停战协议。

③ 苏联要求德治在 1944 年 12 月 31 日到 1945 年月 1 月 16 日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私人会面。在德治逗留莫斯科期间，斯大林做出决定：祝贺他成为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罗马尼亚共产党员安娜·鲍克尔（Ana Pauker）被苏联驱逐出境，她遭到反对是因为她的犹太血统和资产阶级家庭背景，这与德治的非犹太人工人阶级背景相反（Deletant 1999：164）。

尼亚与苏联的特殊关系，以及罗马尼亚领导层在国内的合法化来源和策略。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斯大林有一次历史性机会在苏联周边构建一个较大聚合体。斯大林计划在东欧建立这一网络，并在赫鲁晓夫手中得以最终确定。该网络是由苏联控制的联合控制委员会（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演化而来的。该委员会在国内各级行政上都有代表团，它可以合法地垄断被占领国的国内政府职能和组织（行政单位、警察、军队）。这种环境使苏联可以将其制度控制直接引入到被占领国。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代理机构①在各个国家的所有战略性机构和行政层级的积极活动，为这种控制提供了支持。

苏联在被占领国没收外国资本，通过停战协议规定战争赔偿，合法地获准在所有战略性领域通过扩张苏联国内合资企业而直接攫取资源，这些合资企业在被占领国有着非常优越的经营条件。国内联合政府中忠诚的共产党与苏联领导的联合控制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联大使馆直接保持一致，在被占领国创建了斯大林主义结构模式。这种模式允许建立较大聚合体的较低层级单位。斯大林的恐怖行动和个人权力，国家安全委员会代理机构的直接控制，以及混入转型的战略性国家和经济机构中的苏联顾问，促成了科层内依附线（D_1）的严格性以及两个聚合体之间的融合。

在 1947 年，西方与苏联这两大阵营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以至于斯大林决定修改他早期制定的共产党依序接管政权的地缘政治战略。这种转变意味着共产党通过收紧联盟阵线而加快接管速度，通过清除“内部敌人”而强制严格遵守斯大林主义路线，通过加快运用与结构相符的工具而努力解除对西方资源的依赖，为即将来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好准备。这些密切协调的活动需要建立新的有效的国际组织，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① KGB 是 Komitet Gosudarstvennoi Bezopaznosti（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缩写，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秘密警察在苏联谋杀了 100 多万人。1934 年，政府政治管理委员会（GPU）被当作内部事务人民军需处（NKVD）。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共产党秘密警察改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KGB）。

(COMINFORM)。[①] 该情报局是苏联政党科层的扩展，直接为斯大林的政治目的服务。该情报局根据斯大林及其私人助手的直接指示，对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施加压力和发布命令，规定他们在国内和国际领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应该采取的战术和战略步骤（Gati 1990：111－121）。

1949年成立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参见脚注154）逐渐取代了所有的合资企业[②]的进出口业务（shipments）。该委员会批准了制度化的资源攫取和资源集中，以及根据计划、劳动分工和国家间商业往来方面的国际协议，在各个国家之间进行集中分配。根据1955年签订的华沙条约，各国国内防卫（domestic defense）必须服从总部在莫斯科并受莫斯科控制的组织的领导。根据1947年和平条约的决议，苏联军队要从被占领国撤军，而华沙条约对撤军的直接控制规定了补偿条款。

因为卫星国在网络内仍然保持形式上的自主，所以在较大聚合体中互联线是分权化的，起始于国家层级上的政党官僚机构。由于同样原因，攫取能力也仍然部分地下放给各个国家。在较大聚合体内没有直接反馈，但是分权化的互联线和部分分权化的攫取能力，为网络内的卫星国提供了抵制能力，尽管存在来自莫斯科和斯大林个人的威胁。较大聚合体的模式的特征是自我撤离型的，而它的单位的模式则是自我掠夺型的。

几个方面的原因使斯大林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最为松散。东欧是苏联通往西方的第二扇门，可作为苏联与德国之间的安全走廊。斯大林在战略上对东欧更加感兴趣。再者，斯大林不想在亚洲与欧洲之间过度分散他的军事力量。苏联军队占领了满洲，汲走了幸存资本存量的一半（Riskin 1991：33）。斯大林对领导人民解放军（PLA）的毛泽东不感兴趣，而更加偏向于国民党共和政府。斯大林与毛泽东和国民党都进行了谈判。在1945－1949年间，毛泽东反复试图会见斯大林，但屡遭拒绝（Westad 1998：5－

① 共产党情报局的缩写。该情报局成立于1947年9月27日，直到1956年才被取消。斯大林的反对南斯拉夫战略发起于1948年6月中央办公署的决议，刺激了整个东欧共产党内的一系列肃清运动和虚假公审，把潜在对手扣上“铁托代理人［Tito's agents］”的帽子（*Akadémiai Kislexikon* 1989：986）。

② 合资企业中苏联股份全部由国内合伙人买下来，其中大多数到1954年席卷了整个东欧。

8）。甚至在人民解放军频频告捷、占领一个又一个大城市的时候，斯大林仍然不相信毛泽东会成功，尽管他向毛泽东提供了技术和某些军事上的帮助。毛泽东1949年首次会见了斯大林，当时毛泽东作为整个国家解放者的声誉在中国得到了承认。盟军与中国之间的军事关系是很不相同的：中国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之一。1945年，中国人民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赶走了日本侵略者。苏联或西方既没有合法的理由、也没有机会去占领中国。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在国内的合法地位是不可挑战的。

11.2 罗马尼亚自我掠夺型模式的确立

为政治接管准备基础

苏联手中有两项工具可用于在被占领国清除临时联合政府并建立卫星国：罗马尼亚共产党（RCP）和停战协议，后者先于计划好了的和平条约（到反对德国的战争结束）。联合控制委员会（代理主席是苏联人）利用停战协议赋予它的自由决断权，帮助共产党接管政权。根据苏联人的要求，罗马尼亚共产党的作用是阻止临时政府以任何其他条件建立秩序，除非让罗马尼亚共产党执政。罗马尼亚共产党必须基于苏联模式重新部署军队、司法和警察；必须争取民众支持，摧毁支持君主政体和西方民主的残余势力（Deletant 1999：55）。

利用直接的苏联帮助、战略协调和有效的行动协调，罗马尼亚共产党不断地阻碍临时政府的运行。一方面，共产党联合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成立全国民主阵线（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NDF），通过暴力或威胁接管工厂车间，为工人垄断资源的直接分配（食物定量配给）。这样，罗马尼亚共产党便控制了群众动员能力（Golea 1988：53－59）。全国民主阵线发动工人举行群众游行，制造障碍和暴力事件，进行反对临时政府的攻击性宣传。另一方面，联合委员会（The Allied Commission）利用停战协议，使军队和警察力量瘫痪，通过向盟军增兵而消灭部分罗马尼亚军队（Golea 1988：60），逮捕政府成员，全体一致地（*en masse*）指控他们是法西斯分子。同时在行政部门进行大规模肃清，清除其中的“法西斯分子”，同时

在共产党刊物和公开演说中指控政府阴谋破坏停战协议的这种条款。苏联的军队和坦克占领战略性的公共机构，把工厂拆散作为战利品。空军（Military squadrons）被解散（Deletant 1999：67）。苏联军队在街上巡逻；大部分警力被解散，按照苏联命令进行逮捕。建立市民团体，与警察一起巡逻，侵入人民的私人生活。在两个月内，据说有 9 万罗马尼亚人被逮捕，有些逮捕有很好的借口，有些逮捕根本没有任何借口（Deletant 1999：74；Golea 1988：65）。

苏联人努力利用这两项工具（罗马尼亚共产党与停战协议中的条款）制造了一个恐怖氛围。他们接连迫使两位内阁成员辞职，协助罗马尼亚共产党增加政府战略性职位的数量，在自由选举之前渗入辖区和关键企业。同时，为了实现战略目的，把共产党员人数从 1000 增加到超过 100 万[①]（Deletant 1999：82）。1945 年 3 月引入了土地改革法，超过 50 公顷以上的地产都要被没收，总共没收了 143219 项个人财产。把没收的绝大部分土地分给农民（Cretzianu 1956：56）。在半年时间里，共产党占据的部委职位从 1 个增加到 14 个，受苏联偏爱的总理格罗查（Groza）上任了。1946 年自由选举之前，[②] 以及自由选举之后，发生了几次大规模逮捕浪潮，目的在于威慑人民群众，[③] 为清算反对党打好基础（Deletant 1999：79）。

然而，直到制度上的接管之前，经济上仍然一片混乱。在这个被战争蹂躏过的国家，红军在军事联盟那一年以及随后两年里的抢掠，导致了经济危机。停战协议的经济条款使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根据该协议，罗马尼亚要以 1938 年的世界价格支付一大笔商品（例如，石油产品，木材、谷物），这意味着要支付双倍的价格。共产党通过故意破坏生产来夺取政

① 成员数量增加分为以下几个步骤：1945 年吸纳了前法西斯钢铁卫士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因为密谋反对政府而在 1941 年被取缔，但现在工厂内被给予负责的职位；吸纳从前的家庭佣人，他们汇报了雇主情况。1946－1947 年，军队单位被纳入，包括在苏联的那些战犯；为苏联军队服务的罗马尼亚管理人员。1948 年，通过社会民主党（SDP）合并而增加成员，包括已经加入新的官僚机构（人民参议会）的那些人，加入集体和国有农场的农民，改革了的教育系统中的学生和老师（Deletant 1999：84－85）。

② 共产党 1946 年 11 月的选举中弄虚作假，为不存在的投票人投票，参见 Golea 1988：83。

③ 在高山地区存在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化的游击队集团，他们被逐渐清除。

权的战略，也大大加重了危机：从 1944 年 5 月末直到 1947 年春，共产党不断地发起政治煽动。在乡村和城市进行广泛的逮捕，洗劫工厂和车间，所有这些都使生产变得不稳定。这些行动包括在罗马尼亚撤走技术设备、农用机械，严重地干扰了工人的活动。这种行为反映了共产党及其苏联顾问的政治态度：在完全垄断权力之前，他们会一直破坏国家和社会的正式结构（Georgescu 1991：435－437）。签订于 1947 年的和平条约使经济进一步遭受蹂躏：赔偿要求夺走了全部战舰，以及罗马尼亚商业船队的主要部分。苏联没收了大量的石油开采设备，所有铁路运行车辆的 50%，以及所有的汽车。结果，国民生产立即下滑（Georgescu 1991：434－435）。所有以上因素累积成灾难性结果：

1947 年夏天，罗马尼亚出现了空前的经济混乱。通货膨胀螺旋式地急速上升。整个国家的生产下降到 1938 年产出的 45%，国民收入减少了一半，生活成本上升，灾难性的干旱使农业中的危机更为严重，再加上货币改革，[①] 导致罗马尼亚人民陷入严重的饥荒。在许多地区饿殍遍野（Cretzianu 1956：51－52）。

在这些环境下，1947 年 3 月进行了自由选举，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竞选中获胜。[②] 斯大林继续支持乔治乌·德治作为罗马尼亚国内共产党领导人。这种支持在乔治乌·德治被选为总书记时得到证实，而 Pauker 和 Luka——从前的莫斯科人——被任命到共产党书记处和政治局（Deletant 1999：169），担任部级职务。[③]

① 秘密准备的货币改革有以下几个起因。在引入货币改革之前政府偿还了全部公债，购买了全部谷物，支付了解聘雇员的补偿，征用了所有商品存货，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然后宣布货币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对该体制的受偏爱的机构和阶层实行有差别的补偿（Georgescu 1991：435）。

② 自由选举的结果：政府集团获得了 84% 的选票。在 414 名议会代表中，348 名是执政党党员，66 名是反对党党员（Deletant 1999：78）。

③ 他们担任了外交部、财政部、和战争部的这些职位。他们应邀参观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基地（Giurescu and Fischer-Galati 1998：438）。

垄断子域

从政治权力垄断开始

在获得左派集团的议会多数之后，共产党开始根除竞争性的党派，根据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指示逮捕这些党派的领导人物。对他们的指控是密谋反对国家安全。在很短的时间内，国家农民党（NPP）的所有领导都被捕了（Deletant 1999：80；Giurescu and Fischer-Galati 1998：432-433）。逮捕程序得到了斯大林的批准，由苏联代理外长 Vishinski 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代理机构协同进行。[①] 1947 年夏天，国家农民党和国家自由党被解散。

1947 年 11 月，社会民主党和罗马尼亚共产党发表了两党合并的声明。这是通常蓝图（the usual blueprint）的下一步，此前和此后都出现了公开地或潜在地对反对合并的那些人的冲突、压力和肃清（Castellan 1989：238）。在 1948 年 2 月的第一次会议上，联合政党（罗马尼亚工人党[RWP]）再次选举乔治乌·德治为总书记。同年，一个具有灵活态度的政治家帕特拉什卡努（Patrascanu）被肃清并打入监狱，他是第一届临时政府中唯一的共产党代表，也是德治政权的潜在威胁者，把帕特拉什卡努打入监狱是稳定无可争辩的个人权力的第一步（Deletant 1999：52）。米契尔国王被迫退位，并于 1947 年 12 月 30 日签署了退位声明，否则就会受到内战的威胁。这份退位声明是由德治和格罗查提出的。国王一退位，新的苏联式宪法就宣布了（Deletant 1999：8 Giurescu and Fischer-Galati 1998：439-441；Castellan 1989：239）。

通过成功地消灭反对党派、合并社会民主党、迫使米契尔国王退位，政治权力的垄断就完成了，选举议程也结束了。并且，共产党成了精英政党：党员筛选（查证过程）从 1948 年持续到 1950 年。通过筛选，从共产党中清退了 192000 名党员（Deletant 1999：50 52，83；Castellan 1989：

① 1947 年 2 月与罗马尼亚签订和平协议之后，实行了更多的逮捕。3 月 20 日有 315 名反对党党员被逮捕，5 月 4 日又有 600 人被逮捕。后者是反对集体化的农民，代表反对党的教师、医生、牧师，大多数人不到六个月被释放。目的是威胁广大群众，为清算反对党准备基础（Deletant 1999：79）。

251）。下一步就是建立政党的基层组织以作为一种制度权力——尤其是要在政治上垄断国家和经济。

建立和垄断国家官僚机构

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councils）被建立起来。这种官僚组织的结构和职能的基础是：1950 年 1 月模仿苏联而通过的关于“民众委员会（popular councils）”的法律。地方政党组织紧密控制了每一个行政层级上的民众委员会。地方委员会被授权去发动群众，能够依靠秘密警察和民兵（Castellan 1989：240）。在这种建设过程的同时，也为占据干部职位而准备干部**“材料”**：对精英干部加强教育和意识形态培训（Deletant 1999：85）。

基于 1947 年 11 月通过的法律，建立了**司法**制度（人民陪审员 [people's assessors][①]）。这些陪审员是政党提名的。他们坐在法官旁边，人数总是超过法官人数，所以，官方传递的总是政党的意愿。他们的工作依靠苏联式司法制度，以及 1948 年 4 月被采纳的苏联式宪法（Castellan 1989：239）。肃清也是基于这一制度（Deletant 1999：86）。1949 年 1 月，针对叛国和经济破坏确定了死刑。1949 年第 83 号令中定义了反革命罪。基于该政令，对于抵制 1945 年和 1949 年土地征用和土地改革的那些人，将被处以最高年限为 15 年的强迫劳役（Deletant 1999：130）。[②] 1950 年 8 月，死刑被扩展到反对国家独立和主权的罪行，工人疏忽导致公共灾难、盗窃和破坏军用设施、密谋反对国家以及从事间谍活动（Deletant 1999：130）。

教育被国有化；教会也变成了政府的附属机构：他们对教会有所宽容，以换取教会的服务；科层被肃清，减少（被认为是）反政府者的数量。东正教在法律上得到承认，而罗马天主教则被废除。

垄断经济资源

在互联线向外延伸到社会领域的同时，经济资源也被垄断了，国家所

① 受人民委托，代表人民进行审判。

② 考察这一时期的法庭记录可以发现，在 1949 - 1960 年间有 134150 次政治审讯，至少涉及 549400 位被告人。送进了劳改所的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审问或宣判。他们被送到劳改所，是根据内务部的命令，而内务部又是遵照德治和苏联顾问的建议（Deletant 1999：135）。

有权也被建立起来。劳动力被垄断：除了自愿的付费劳力和被征人伍的士兵之外，罗马尼亚的古拉格（集中营）被组织起来，主要为大规模建设提供廉价劳动力（Deletant 1999：214；Cretzianu 1956：78；Castellan 1989：244）。1950 年 5 月通过了一部新的劳工法，该法律强调按劳分配、假期和八小时工作，但是禁止罢工，并引入一套强制推行的规范体系（Castellan 1989：241）。

1948 年 6 月 11 日通过的一部法律，造成了新体制的经济危机。根据这部法律，主要的工业和采矿业公司都要实行国有化，对银行、保险以及运输企业也是如此。私有股权被充公，并且这些私有股份的所有者受到威胁。在国有化之后，政府控制了 90% 的工业生产，只有那些小工厂和苏联－罗马尼亚合资公司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幸免（Castellan 1989：240）。

农业也被垄断了。在农业中，土地所有权完全从私人手中被夺走。从前允许私人拥有 50 公顷土地，现在也被无偿征用了（Deletant 1999：87）。为了在农业中建立网络，1949 年 3 月，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宣布把全面集体化作为目标。该过程最初进度缓慢，使工人党停止“劝说”而于 1949 年冬天开始了一场严肃的运动，激发了几次起义，但遭到血腥镇压。通过再次引入死刑，使恐怖达到新的高度（Cretzianu 1956：57－58）。80000 多名农民被逮捕，其中有 30000 多人在公开审讯中遭受折磨。尽管实行了恐怖政策，但集体化进程仍然因为农民的抵制而进展缓慢。在这一时期，私有农场仍然占据着绝大多数农业生产。直到 1950 年 8 月，安全部（秘密警察）和民兵强迫和批准成立了 1000 多个集体农庄，而不顾这些地区的具体条件（Deletant 1999：136－139）。1952 年 7 月底，德治号召加强反**富农**运动，[①] 成千上万地逮捕他们（在 1951－1952 年间有 22000 富农被捕）。而且，迫于苏联的反南斯拉夫压力，把生活在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塞尔维亚人和德国人驱逐到其他地区，这些人自 1951 年以来被认为是对安全的威胁。

事实上，一夜之间秘密警察和民兵就进驻了，使 17000 个家庭背井离乡，搬迁到没有住房和饮水、供应得不到保障的移民安置区（Deletant

① 根据苏联当年的定义，富农是指拥有大片土地的中产阶级农民。

1999：87）。

把没收来的土地集中到国家或集体的农场。结果，在总面积1500万公顷的农业用地中，60%被迫变成了集体农场，30%变成了国家农场，只有9%仍然保留在私人手中（Deletant 1999：141）。随着集体化进程，依附线也被延伸到农业之中，以保障资源攫取、消除潜在抵制。

建立政党官僚机构

建立了苏联式的政府和经济，并根据组织、活动和职位结构把互联线向外延伸，从而垄断政府和经济，然后再建立政党官僚机构，以便控制这些互联线。在中央和地方层级，都建立了与非政党领域的机构和活动结构相对应的政党机关的部门。在政党组织内部建立了妇女、青年、农民、工会、运输、供给、工业和商业等部门。这些部门反映了该组织结构必须通过互联线来覆盖到非政党领域。这些部门将控制政党的农业大变革、经济工业化和社会转型等方面的规划（Deletant 1999：85）。

向外延伸互联线以垄断信息：媒体变成从属于中央委员会的鼓动和宣传部门（任何信息的发布都不能脱离他们的控制）。国有化浪潮和教育中的肃清，使政党干部得以上任，形成互联线。

在苏联监督下形成政党团体（Party body），苏联具有超级监督权力。这一团体把持着覆盖转型了的诉讼体制和战略性机构的互联线，被授权发动逮捕和审查罪犯。它的职能是确保部委和其他中央机关、地方国家权力和行政机关、官员和其他公民服从法律。这些政党机构被分为12个主管职位，其权力包括对军事、国家安全、起诉犯罪、监督法庭活动、视察监狱等方面的指挥（Deletant 1999：130）。内政部（Ministry of Interior）利用这一法律下令从SSI、Siguranta和Jandarmerie中逮捕了1000名官员。共产党指定人员接管他们的职位，接受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代理机构的领导（Deletant 1999：73）。

与较大聚合体建立关系

随着网络建立并延伸到所有子域，资源攫取在制度上获准，苏联作为一个较大聚合体中的上级单位所进行的资源攫取也被制度化了。个体行动先于制度化。第一个共产党统治下的政府（格罗查）在1945年最终与苏联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经济协议：在许多战略性领域建立联合公司。直到

1952年，这些联合公司不断地扩展，延伸至石油、运输、银行、木材、汽油、化学、建筑、金属、拖拉机、铀等生产领域。建立合资企业要求双方贡献等额资源。然而，苏联人贡献的是前德国和意大利在罗马尼亚的财产，这些财产在1945年波茨坦协议中被划给了苏联。（他们还欺骗性地加上了战争期间被德国没收的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的财产）。苏联人的贡献甚至包括红军在占领时期缴获的战利品。这些合资企业被授予的特权是治外法权。[①]（Cretzianu 1956：53）。

1949年2月，罗马尼亚政府领导与莫斯科签署了友好条约、经济合作与互助协定（Cooperation and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COMECON或经济互助委员会），准许苏联人进行资源攫取和分配，这时，罗马尼亚便在制度上与苏维埃集团联结起来。

与结构相符的自我再生产的目标和工具的发展

基于以上政治垄断制度框架，罗马尼亚国内的政治上垄断的经济和重叠的政党科层，与较大聚合体融合在一起。于是，与结构相符的自我再生产工具开始发挥作用。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授予其广泛的权力和大量的人事编制。国家计划委员会在资源攫取和分配上的操作和偏袒，被斯大林的加速发展战略进一步激化了。[②]

① 根据Cretzianu的说法，这些合资企业服务于苏联人的短期利益，帮助他们拆开特定的原材料基础。例如对于Sovromlemn，罗马尼亚把属于国家、教会和私人的所有林地作为最初贡献入股。1952年宣布了一项大型的重新造林工程，以弥补林木减少。重新造林计划的所有负担都由罗马尼亚人承担。在石油勘探中也发生了类似的过程。罗马尼亚人的贡献是生产了国家石油总产量的75%。在这一赔偿方案中，产品的低价格使其他非合资企业破产。它们在1948年被国有化，很快又在1950年被清算，最后被SOVROM吞并（Cretzianu 1956：54）。

② 经济互组委员会（又称COMECON、CMEA、CEMA、或委员会）的成立，起源于1949年由苏联、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达成的公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经互会的确切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因为当时的政治和经济一片混乱。然而，约瑟夫·斯大林想加强苏维埃对东欧小国家的控制，降低一些国家对马歇尔计划（参见术语表）的兴趣，这是经互会成立的主要原因。该组织的表面目的是让成员国“交流经济经验，相互扩展技术援助，在原材料、食品、机械、设备等方面相互帮助”http：llwww. shsu. edu/-hisncp/CMEA. html。

国家计划委员会确定了1949年第一个年度计划，其目标很高：与1948年相比，通过大规模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投资，力求实现［工业产量］40%的增长率。1948年末，几个工业部门达到或超过了1938年的水平——例如，电力、煤炭产量、汽油、钢铁工业。而在1949年计划之后又制订了1950年计划，其目标是工业生产水平要比战前几乎翻一番。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所谓的“民众委员会”来动员全国人民（Castellan 1989：240）。

这些宏伟计划在1950年被克里姆林宫进一步强化，苏联决定强加一个技术改良计划，该计划具有更大比例的军事负担。这增加了军备和重工业产品的需求。在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国家，产出计划都被上调，并且更加强调重工业。随后便发生了通货膨胀和消费品短缺，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劳动条件变得更加恶劣，标准却逐步提高，从严惩罚的规章纪律被引入，大大增加了强制性劳动力集中营和奴役劳动的数量[①]（Cretzianu 1956：77－78）。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1－1955）把目标进一步提高，增加了经济和社会张力。该目标是在五年之内使生产翻一番，主要在于工业投资（51%），而农业投资只有10%，社会工作（social work）为22%。进一步，这种投资的42%投向基础生产设施，9%投向消费品产业。工人的生产率必须增加57%（Castellan 1989：244）。主要来自农业的资源被剥夺或转移到重工业。1950年，农业贡献了近40%的GNP，而只获得整个国家投资中的11.1%（Shafir 1985：108－109）。

---

① 例如，多瑙河－黑河运河工程至少有八个单独的劳改所，40000多名囚犯，20000多名移民。到1952年，大型劳改所如雨后春笋，遍及罗马尼亚全国，使用强制性劳动。劳改所作为一种官方体制，直到1954年迫于国际压力才被减少或暂停（Cretzianu 1956：79）。

11.3　匈牙利自我掠夺型模式的确立

起点和接管的道路

苏联军队在1944年9月到达匈牙利边界。一个莫斯科派的匈牙利共产党集团（活动于莫斯科的匈牙利共产党国外委员会的领导们）与红军一起，在1944年11月7日进入解放区，建立了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权。这些莫斯科人宣传共产党的纲领（program）和运行规则，并开始实际运作活动。由于他们与红军的密切关系，这些莫斯科人致力于解决国家层面的问题（Szabó，é. 1960：6）。共产党的中央领导层，联合反法西斯、反德国、民主党、工会，建立了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Hungarian National Independence Front）。[①] 他们接受共产党的纲领，国际上赞成在这个废墟国家设立临时中央政权，这也支持了这一纲领（Palasik 2000：22）。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在匈牙利解放区组织了选举，建立了临时政府，在苏联军队的积极支持下于1945年初实行了土地改革（Pet and Szakács 1985：37－40）。临时联合政府和临时国民大会的程序以及席位和最高职位的分配，都是由苏联领导层具体决定的（Palasik 2000 22）。

当临时政府于1945年1月20日在莫斯科签署停战协议的时候，苏联领导层实际上已经完全掌控了匈牙利的未来发展（Palasik 2000：28）。根据这一协议，匈牙利政府必须撤退到1939年划分的国界，并组建8个空军中队（squadrons）以支持盟军反击德国。匈牙利必须提供1亿美元的战争赔款给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2亿美元的战争赔款给苏联，并且这些赔款要按1938年价格计算（Petö and Szakács 1985：21；Rév 1990：iii）。基于苏、英、美三国首脑1945年的波茨坦决议，匈牙利必须把德国的财产转交给苏联。在1947年底的最终会谈之后，这包括了400家企业和几百项不动产（森林、企业和土地）（Petö and Szakács 1985：22）。就像在罗马尼亚

① 民族独立阵线的党派（成立于1944年12月）包括小农党、匈牙利共产党、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民族农民党。

那样，匈牙利被迫同意在其国内设立联合控制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苏联人领导，将完全控制匈牙利国内外政策（Palasik 2000：28）。

根据停战协议，在战争结束之前，匈牙利政府必须让苏联使用匈牙利的工业和运输公司、全部能源、运输和通信及仓储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匈牙利的出版、戏剧和电影制作、境内外旅行、政党融资都需要得到联合控制委员会的同意。在布达佩斯、各个大型城市和战略性企业都设立了代表团。中央和地方政府决策都必须首先得到联合控制委员会的批准（Palasik 2000：29）。

1945 年 1 月 15 日，离签署停战协议只有几天，布达佩斯从德军手里被解放出来，非法活动的国内共产党领导层（曾在 1924 年脱离莫斯科集团）建立了国内中央领导地位，对莫斯科派的首要地位构成了挑战。在一个月内，1945 年 2 月 22 日，国内共产政党组织就被收服并很快合并到莫斯科组织。在这之前几天，国内共产政党组织的领袖 Pál Demény 被莫斯科集团所指挥的政治民兵逮捕入狱。Demény 被监禁了 11 年，最终还是活下来了（Palasik 2000：80）。

临时政府中最重要的那些职能是根据联盟协议来分配的。公安部及其内部的政治调查部门都由共产党来组织和控制，他们占据着地方公安组织中的大多数职位。公安活动受到联合控制委员会的密切监控（Palasik 2000：58－59）。俘虏收容所从属于公安部下的政治部。拘留的标准被扩展了。1945 年末，仅布达佩斯就有 10000 多人被拘留（Palasik 2000：63，73）。共产党在内务部（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占据了几个重要职位。驻扎在布达佩斯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也紧密控制内务部内部所设立的政治调查部门。

在 1945 年 11 月 4 日的议会选举之后，小农党（Smallholders' Party）赢得了多数席位（58.1%），而共产党意外地只获得少数席位（16.6%）。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的成员成立了新的联合政府。匈牙利联合控制委员会主席 Marshall Voroshilov 反对新的联合政府，要求内务部接受共产党领导（Hám 1986：15）。到了 1946 年春季，这一目的实现了，共产党控制了内务部和公安部。

在 1947 年 9 月 15 日和平协议被批准之前，共产党很快便开始废除和

削弱多数党派（Hám 1986：47；Palasik 2000：28）。逐渐地、系统性地进行接管。接管的方法类似于罗马尼亚的情况。共产党使用特别议会工具（extra-parliamentary tools）：筹备大规模游行，媒体造势"把反动势力驱逐出公共舞台"，反复地进行治安整顿，审讯反匈牙利共和国的反苏联武装密谋，逮捕和威胁党派领袖。所有这些行动都由联合控制委员会的苏联总部来协调（Palasik 2000：145－146，154）。

这种危机情形被 Voroshilov 的直接干涉和政治经济勒索恶化了：小农党被迫撤出机构，卫星组织被重创，关键的支持人物被开除党籍（Hám 1986：16）。迫于大规模逮捕和蚕食战术的压力，[①] 进入特别议会的多数党在两党磋商中作出了妥协。然而，这些协议留下的只是没有兑现的承诺以及共产党的进一步要求（Gati 1990：30；Hám 1986），这得到来自苏联领导层及其地方代表的持续压力的支持。

多数党的努力是徒劳的，从议会代表人数来看，他们仍然没有获得政府官僚机构中同等比率的席位（Petö and Szakács 1985：141）。尽管他们反复要求，但是共产党没有放弃在过渡时期争夺国家行政职位。相反，他们继续扩张和渗入中央和地方行政的关键职位，以弥补被小农党占议会多数的劣势（Petö and Szakács 1985：64；Hám 1986：16）。[②]

小农党右翼很快就被小农党分离出去，而在几次阶段性的审讯中，中间路线被"揭穿"，并被起诉在 1946 年末到 1947 年组织了反对人民民主的阴谋。1947 年 5 月，这些最终导致对小农党领导成员的逮捕和阶段性审讯。总理和国民大会主席被迫辞职，流亡国外。国民大会主席逐渐失去了

① 蚕食战术（Salami tactics）是用威胁和联盟来克服对立的一个渐近过程。用这种战术，侵略者可以影响并最终控制某个（一般是政治上的）领地，一块一块地吞食。"（*Wikipedia*，http：//eiiwikipedia. org/wiki/salami_ tactics）这些战术旨在削弱政治反对派，阻止社会民主党右派和小农党左派之间的中央左翼联盟（Swain 1992：37）。

② 小农党在中央和地方行政的战略地位中属于少数派，尽管它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以下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在公安部门，多数党占据了 7% 的领导职位，而左派集团大约占 60%。对于不同部委，多数党占据了 13.6% 的国家部长职位、22.5% 的部门领导职位，左派集团占据了 63% 的部长职位、61.7% 部门领导职位。48% 的地方政府一把手，8% 的副职属于多数党，34.4% 的地方政府领导、71% 的副职属于左派集团。（Palasik 2000：155 － 158）。

权力，多数党[1]陷入深层次的政治危机（Hám 1986；Gati 1990：25）。最后，多数党左翼被关进了共产党包围圈（Hám 1986；Palasik 2000：308；Petö and Szakács 1985：85）。结果，小农党失去了58个议会代表席位（Palasik 2000：256）。

1947年8月的新选举在一个与从前有所不同的氛围中进行。在这一次国民大会选举中，在政治和道德上都被削弱的前多数党所获席位（16.5%）只有1945年选举所获席位（58.2%）的四分之一。共产党赢得了24.3%的席位，从而成为新议会中最大的党。然而，这些成功没有得到斯大林的赞赏，斯大林基于内部报告谴责匈牙利政党领导拉科西（Rákosi）屡次高估共产党的社会支持，低估竞争党派的社会支持（Palasik 2000：257－261）。

国际因素形成了新气候，也有力地形成了国内条件。联合政权中的关系逐渐平静下来。随着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一个新的、更具进攻性的苏联政策思路被发布了。实际上，这意味着苏联人加快了在东欧的国内接管（Gati 1990：111－121）。苏联基于停战协议驻军匈牙利的期限即将到了，但在和平条约中又被延长。该条约承认苏联主要的战略防卫利益，容许苏联军队长期战略性地驻扎在匈牙利，以保证入侵（防卫）奥地利的通道的安全（Deletant 1999：276）。

国内政治危机（苏联培训的共产党所煽动的）加强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指导，导致共产党在匈牙利的加速和激进地扩张，以及整个接管过程中更加粗暴的行政措施。

子域的垄断化

政治领域的垄断化

竞争对手的右翼被解散，社会民主党的右派被分离，成百上千的非共产党政治家被迫开始政治流亡（Hám 1986：109 －126；Gati 1990：123）。下一个任务就是把竞争对手民主党的剩余部分合并入共产党，以达到议会多数并垄断左派。合并发生在1948年6月，方式与罗马尼亚情况相同。[2]

---

① 参见Tibor Ham（1986）撰写的文档研究详细地描述了发展的历史。

② 这一合并在György Marosán的回忆录中有详细描述，他是左翼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对这一合并起着积极推动作用（Marosan 1972）。

匈牙利工人政党机关内的部门接管了社会民主政党机关的管理工作，准备废除后者的各个部门（Szabó，é 1960：29；Marosán 1972）。

1949 年 4 月议会解散、进行新选举之前，1947 年当选的 411 名代表中有 249 人（60.6%）仍然当选为代表（Palasik 2000：308）。在 1949 年 5 月的选举中，共产党在政治领域仍然没有实际的外部竞争者：政治领域的逐渐垄断化几乎走到了尽头。为了准备选举，共产党在全国各个组织的支持下，采用了一个广泛的、进攻性的煽动计划。煽动、阻碍、右翼党派的削弱、对其选民的胁迫或关押，使 95% 的选民被迫来到投票站。95% 以上的选民把票投给了人民阵线（the People's Front）的联合名单。大量的双重计票欺骗使结果出现明显的偏差和夸大（Swain 1992：37）。尽管 30% 的代表不属于匈牙利工人党，并且有些部长大臣还是农民党和小农党的成员，但是他们在那时已经失去了政治分量（Palasik 2000：310）。

就像在罗马尼亚一样（Deletant 1999：84－85；Castellan 1989：251），在权力稳定化之后便开始修改从前宽松的党员资格（Szabó，é. 1960：29；Gati 1990：105－106）。从 1948 年 9 月到 1949 年 3 月，100 万党员中有 30 万被开除党籍（Swain 1992：43）。

内部竞争对手也被清除。新权力关系的稳定化一开始就对这些竞争对手实行肃清和处死。对党内"间谍"和被指控所谓阴谋颠覆政府的人实行装模作样的公审。目标主要是前社会民主党和非莫斯科人，包括 1940 年代在西方从事非法工作的匈牙利共产党。他们当中许多人在 1949 年 10 月被判处死刑；其他人被关进监狱直到 1953 年斯大林逝世，那时莫斯科派领导的权力已经被大大削弱（Urbán 1989；Szász 1968；Palasik 2000；Swain 1992：39）。

垄断化与国家行政部门的重组[①]

自 1946 年初开始，部委内部开始了重组和裁员。这些行动通过保留和扩张共产党 1945 年选举之前在过渡政府时期所获得的职位，进一步巩固了共产党的统治。这种重组还包括建立国家官僚机构，管理和紧密控制国有经济。早在 1946 年，共产党就已经控制了最高经济委员会的运行机构秘书

① 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描述，参见 Petö and Szakács 1985：104－120。

处的领导权，从而控制了该委员会。① 最高经济委员会正式集中了经济执行权力，其任务和权力由政府委派，确保经济平稳运行。该委员会在经济管理中具有关键作用。它的扩张性活动随着共产党的经济政策而调整（Petö and Szakács 1985：65－67）。

1948 年初，当斯大林要求加速接管的时候，共产党控制工业部，代表社会民主党的工业部前部长被迫辞职并流亡国外（Petö and Szakács 1985：97）。工业部的部门根据分支机构被重组，共产党员被派去作为工业的部门领导，推动国有化的准备工作，直接管理生产，这照搬了苏联模式。1948 年初建立了工业董事会，并根据分支机构来加以组织，它们大多数都由工业部各个分支部门监管。工业董事会拥有国有企业的财产权力，如任命管理层、调查经营、物资流通、定价等，也承担法律责任。它们的任务还有，按照国家计划办公室的政令和直接命令，基于企业的计划来为它们的分支部门准备汇编计划。1948 年 5 月，随着从属于工业董事会的工业中心的建立，企业失去了法律自主（Petö and Szakács 1985：104－105）。

整个银行体制被单一化，职能被集中于少数几家银行。物资和价格办公室被废除，其任务被转交给国家计划办公室（其职员主要由共产党骨干组成）和最高经济委员会（Petö and Szakács 1985：86，106 108）。国家计划办公室的角色从顾问和协调者逐渐转变为整个经济系统的监管者。它的任务和权力在 1948 年中期被扩张。最后，国家计划办公室接管了最高委员会的权力，导致后者在 1949 年中期被解散（Petö and Szakács 1985：110－112）。于是，企业被迫根据该计划办公室规定的计划指标（frame numbers）更加详细地准备它们的计划，并更加频繁地汇报计划执行情况。②

垄断经济和资源

匈牙利经济的导向在 1945 年 8 月就被决定了，当时根据赔偿协议和联合控制委员会对经济的垄断决策能力的监管，苏联与匈牙利签订了一项经济协议。协议确定了两国贸易十年期特征的基础——用农业、工业品交换

---

① 详情参见秘书处的共产党领导 Zoltan Vas 的回忆录，他是来自莫斯科的四位领导者之一，最初被任命为专员，负责为战后废墟中的布达佩斯提供食品（Vas 1980）。

② 计划过程的非理性，以及计划过度集权化的后果，在亚诺什·科尔奈 1957 年的著名研究中有详细描述（1959 年牛津出版社出版）。

原材料。协议包括在铝土（aluminous earth）和铝生产、矾土和石油采掘及勘探、水路和航空运输等战略性领域设立合资企业，直接攫取资源，因此这些企业变成这些分支部门的领头企业。就像在罗马尼亚一样，苏联在匈牙利所贡献的基本上也是根据波茨坦协议没收来的德国财产（Petö and Szakács 1985：91）。

右翼联盟政党的弱化，以及同时进行的政治垄断化过程、国家行政的渗透和重组、苏联导向的经济基础的确立，共同导致推动经济国有化的共产党压力增加。1946 年 5 月，矿山被国有化。1946 年 12 月，5 个最大的企业被国有化，1946 年底，电力基础设施被国有化。1947 年 11 月，银行及其附属公司被国有化，从而使战前金融机构的 78% 和制造业部门工人的 58%，都成为国有部门（Swain 1992：37；Petö and Szakdcs 1985：95）。1948 年 2 月，矾土和铝工业也被国有化（Rev 1990：iv-v；Petö and Szakács 1985：97）。

笼罩着连续不断的阶段性经济审讯的恐慌，支持了在匈牙利的部分外国资本的国有化（Petö and Szakács 1985：102），在这样的氛围下，该机会被用于推动更小企业的国有化。职工超过 100 人的工业工厂一次性地被国有化；1947 年 3 月，在没有联合政党、所有者和董事们的事前谈话、同意或警告的情况下，新的干部主管就接管了领导权（Petö and Szakács 1985：98－99）。1947 年 10 月，国家垄断产品（state monopoly products）也被国有化。敌对的经济、政治和道德约束导致了剩余私有领域的破产，他们的财产被转给了国家（Petö and Szakács 1985：100－102）。最后，在 1949 年 12 月，职工超过 10 人的工业企业和那些外资企业被接管了，这些企业拥有四分之三的劳动力（Petö and Szakács 1985：103；Rev 1990：v-vi；Swain 1992：38）。该过程以极快的速度发生：地方政党和国家组织超额完成了中央规定的任务。1949 年末，经济被国有化，连最小的工业企业也未能幸免。

为了更好地实行政党和国家的控制，国有化企业的活动范围被“合理化”。企业内垂直生产线被相互隔离，在历史上发展起来的企业关系被打破，类似活动被合并从而提高了专业化，企业数量减少。通过增加农业的制度化，很快就把农村地区卷入网络。集体化运动开始于 1948 年夏季，强

迫农民加入合作社。一方面，通过强迫农民迁移、义务劳动、农产品低价和恐怖行动，该运动也有助于增加强制性工业发展的人力需要（Urban 1989：39）。另一方面，城市部门新增劳动力的自我组织能力被削弱了。工会也被重组，削减到其最初规模的三分之一，而且重要职位被共产党占据（Petö and Szakács 1985：115 －120）。

政党科层与互联线的制度化

1944 年建立了中央领导权的第一个组织规则，以便联结分散的、自发形成的地方共产政党组织和经济单位内的共产党员，在它们当中建立科层。由于缺乏职员，这一期间建立了 9 个没有行政机关的地区书记处，而没有与国家行政对应起来。这些书记处监督几个较低层级国家行政部门的共产党集团的活动，以及县乡一级领导层的组织工作。非政党组织内部的基层党小组在 1945 年初有将近 300 名党员，在 1945 年中期已经有了 800 名党员，党员人数大大增加了（Szabó，é. 1960：48）。1945 年选举失利之后，任务被分权化到较低层级，以便更有效地动员。1945 年末，政党组织的分布反映了国家行政部门的结构，以及机构实体和经济实体的分布。在 1946 －1947 年间，随着其职能的演进，书记处成立了它们的全职机关（Szabó，é. 1960：50 －54）。

第一次合法的党代会召开于 1945 年 5 月 2 日（Szabó，é. 1960：3）。这次会议确定了中央领导书记处的组织、规章和设立（Szabó，E. 1960：5，8，45 －47）。秘书处从 1945 年 4 月 13 日开始由拉科西领导。从科层等级上看，秘书处介于中央领导层与政治局之间（Szabó，é. 1960：8 －9；Hegedus 1988：165）。

尽管共产政党科层的内部组织得到了发展，但是为了实现最佳的控制（重叠），它具有充分的灵活性，以便对国家官僚机构组织和职能的经常性重组。随着渐进的垄断化和国家官僚机构的重组，以及经济的国有化，正在形成中的政党官僚机构的部门也逐渐确定下来，尽管其职员数量由于国家官僚机构中的组织繁殖而继续增加。组织结构、任务、部门规模以及中央委员会行政的互联线的最外端总是不断地变化，更低的地区层级政党行政的各个部门也不断地变化。直到 1949 年末政党完全接管政治领域、国家官僚机构和经济之后，后者才确定下来。这些变化反映了社会各个子域的

急剧发展，以及它们对政党接管过程各个阶段和接管后重组的适应（Szabó，é. 1960：24－56）。

互联线首先通过政党控制的工会向外延伸到工业（Petö and Szakács 1985：54）。后来，随着国有化的推进，在企业内部设立的党委会与指挥他们的地区党委会之间建立了互联线（Szabó，é. 1960：27；Petö and Szakács 1985：54；Hegedüs 1988：163）。当合作社内部的政党组织基于1951年1月的政治局决议而建立的时候，便出现了新的互联线，这些政党组织所从属的地方政党组织，比工业所从属的地方政党组织级别更低（Szabó，é. 1960：54）。

1950年初，社会的主要子域已经被垄断化（Palasik 2000：320－322）。政党官僚机构被建立，科层被制度化。互联线从中央向外延伸到最远的地方。行政、经济、政治、警察和军队权力都集中在“四人帮，后来的三人帮”的手中：拉科西、格洛（Gerö）、（Vas）、法卡斯（Farkas）（HegedUs 1988：164）。[1] 在1948年他们任职时期，政党在它的框架内建立了所谓的国防委员会，在隐瞒公众的情况下运行了5年。实际上，该组织没有任何合法支持性的基层组织在政治斗争中却具有生死决定权：发起调查、逮捕、惩罚，包括死刑宣判（Palasik 2000：318）。[2]。

随着竞争党派的解散、潜在竞争对手的消除、经济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政治垄断、政党官僚机构的建立、互联线向外延伸，这一网络被建立起来，政党－国家体制形成了。与模式相符的自我再生产工具开始发挥作用。同时，这一结构使匈牙利的政党和国家科层更加有可能长期作为未来苏维埃集团的较大聚合体的下级单位。

经济发展与强制性资源调配作为与模式相符的自我再生产工具

在联合政府的三年计划（1947－1950）中，发展目标和优先领域被逐渐调整，以满足共产党的利益：把资源更多地投向工业及其内部的重工

① 作为政党国家融合的最后一步，稳定地依靠领导层核心，拉科西（Rakosi）成为1952年新成立的总统委员会主席，保留其第一书记的职位（Szabo，E. 1960：15）。

② 检举者在1949－1953年间调查了1017698件案子，其中511270人被处罚，30000人因政治指控而被关进监狱，30000人到40000人在没有任何审判程序的情况下被送进劳改所，70000个农民被划为富农，不断地受迫害（Berend and Csat 2001：293）。

业，更少地投向农业。结果，工业投资比重增加到35%而不是声称的26.5%，农业投资比重不到18%而不是声称的30%。由于缺乏投资所需的国外和国内资本，资源获取的唯一可能来源是攫取更多的百姓收入。因此，计划的生活水平增加，从80%下降到10%～20%（Petö and Szakács 1985：121－139；Swain 1992：40）。

从1950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工业化加速，重工业强制性发展，军事开支增加（Petö and Szakács 1985：151－189；Mezei 1989）。生产结构、制度结构和对外经济关系，都按照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强制性资源调配所规定的计划进行激进式转型，以便对抗西方国家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所预示的新帝国主义战争威胁（Petö and Szakács 1985：152）。

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机制上复制了苏联最初计划的发展路径，而没有考虑两国在自然资源基础上的差异。计划屡次被拔高。工业生产和投资的最初目标被翻倍。[①] 结果，重工业及其内部的原材料生产，消耗了绝大部分的资源（Petö and Szakács 1985：161）。

1950年后期，受到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和韩国战争的推动，拉科西和他的同事改变了优先领域：经议会批准的国防投资被推进到第一位，工业投资计划被翻番，尽管经济发展不景气。他们证明，为了应付尖锐化的内外阶级斗争以及加速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面对这种压力（Petö and Szakács 1985：155－156）。基础设施、轻工业和食品加工工业在投资中所占比重很小。领导层期望用奉献、牺牲、纪律和对群众中内部敌人的警惕，来实现250%的GNP增长。广化和深化的计划控制被引入，与经常被提高的生产标准相结合。政府容许通过身体压力和行政压力来完成计划[②]（Petö and Szakács 1985：155 157，199，234；Hegedus 1988：171－184）。

---

① 修正后的工业生产计划与1949年相比，包括310%而不是原来86.4%的增长率。在重工业，增长率被提高到380%而不是104.3%，投资计划被增加了70%。这样，对重工业的财政预算翻了一倍，间接军事投资占投资增加总量的比率从14%增长到18%。投资计划中农业所占比率从1949年的17%下降到1951年的12%（Petö and Szakács 1985：154）。

② 基于有关防止计划经济犯罪的所谓"1950.4法律"，惩罚"怠工"。该法律规定，偏离详细计划将判两年徒刑，情形严重时判五年徒刑。

1949年末，根据斯大林主义经验，集体化进程加速，从逐渐的、自愿的、不同类型的集体组织转变为强制推行（Petö and Szakács 1985：180）。通过依附于合作社的互联线、“逐级向下（rolled down）”[1]和中央计划，这种强制推行是为了能提供强制性发展重工业所需人力的调配，以及对农民的控制（Belényi 1990：475－476）。强制性转移比率逐渐提高、属于强制性转移产品的范围逐渐扩大、转移价格低、农业税急速上升、无限制的富农名单、保障提高转移目标的威胁，增加了私有农场的崩溃速度，迫使农民加入集体，否则就要忍受饥饿（Petö and Szakács 1985：184－188）。

1950年初，斯大林主义自我掠夺型模式及其自我再生产工具在匈牙利得以形成，并遍及东欧。随着日复一日的苏联帮助，匈牙利共产党就像其他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一样，把20年的苏联实验浓缩为几年。经常向上调整的生产标准和向优先部门的强制性人力分配，成为司空见惯的事（Belényi 1990：482）。

联结于较大聚合体与较大聚合体的影响

由于强制性资源调配，重工业内部原材料采掘上的投资，以及国内原材料的缺乏（相对于极端计划），导致生产和原料供应很快就滞后于满腔热情的投资计划。

一方面，苏联越来越多地用原材料交换低水平加工的匈牙利商品，决定了匈牙利在这一较大聚合体内具有很强的依附性（Petö and Szakács 1985：162，165）。[2] 另一方面，集权化的制度发展，强制性资源调配，社会权力和财产关系的激进式重组，被强加的领导班子和被强加的权力，尽管在速度上有效率，但是都需要付出代价。这些政策导致在受偏好和不受偏好的社会集团中脆弱的合法性和均衡；也导致了集权化的经济和社会张力，这些张力有助于提高这些国家在较大聚合体内部与莫斯科讨价还价的能力（Bunce 1983；1985）。

---

① 这一术语表示，把中央强制性的计划规定分解为层层下达的任务。

② 1951年以后，进口原材料的比率没有降到70%以下，而农产品出口却大大增加，结果，产量下滑导致国内供给急剧下降（Petö and Szakács 1985：165－166）。

11.4 中国自我掠夺型模式的确立

毛泽东及其与苏联的最初关系

在中国，建立政党－国家的内部政治环境，以及与苏联关系的外部条件，在最初都与其他两个被考察的国家不一样。苏联既没有合法理由也没有机会在军事上占领中国。毛泽东不是一个被强加的领导，而是一个自力更生的领导，他在党内享有声誉，在农民群众当中是一个民族英雄，因为他获得辉煌的军事成就。在中国没有国内共产党与莫斯科派共产党之间的对抗。中国共产党不像 1945 年的东欧共产党那样（除了捷克共产党之外），她不是一个弱小非法的组织，而是深深地扎根于农民大众，在反抗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军事武装的战争期间获得了它的合法性。在东欧国家，主要竞争力量（民族主义者）走向联合，后来在竞争性选举中被击败，由于 1949 年末的国内战争而被取缔。再者，中国共产党（CCP）具有多年的制度化经验，在延安时代就夺取中国的一部分，建立了地方政权。结果，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政治上都处于优势地位。竞争对手只出现在共产党内部（Schram 1966；Payne 1969；Pye 1976；Shambough 1992）。

然而，毛泽东的广泛国内声望，并没有得到共产主义集团中的国际承认，从而没有得到支持。斯大林对中国没有兴趣，也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夺取军事胜利。斯大林也不想把他的军事力量从东欧转移开。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只有苏联的帮助才可以稳定其政权。因此，甚至在苏联人完全从被占领的满洲撤军之后，毛泽东仍然在战争策略上与莫斯科保持密切联系（Riskin 1991：33；Westad 1998：5）。然而，毛泽东不能确保莫斯科支持其革命的任何长期承诺。尽管来自苏联的武器、货币和技术装备源源不断，但是没有迹象表明斯大林有意帮助中国共产党赢得国内战争。毛泽东多次屈尊想与斯大林面谈，但是一再遭到拒绝。

斯大林不相信中国的成功。甚至国民党（共和政体）在 1948 年开始溃逃之后，他仍然在拖延给毛泽东回信。甚至在人民解放军（PLA）在华

北攻破国民党政府的防线之后，他也没有作出相应的调整。甚至在1949年春季之前，斯大林仍然认为美国会介入、或出现地方反共叛乱、或国民党反败为胜。在斯大林看来，毛泽东不可能取得彻底胜利，因此他不想建立一个太紧密的联盟。1949年中期出现了突破。斯大林仍然不想会见毛泽东，但是接见了一个作为来自东北的商业代表团的高层共产党集团。在与斯大林的这次会晤中，刘少奇（代表毛泽东）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的整体利益，这让斯大林很高兴。这次会晤推动了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苏联承诺只要一个全面的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成立，它就给予直接支持（Westad 1998：8－11）。

1949年9月底，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国家。第一任政府是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联合政府，由中间派、反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集团以及民族资本家共同组成。在三个月的权力稳定化之后，1949年12月6日，拖延了很长时间的毛泽东－斯大林会谈终于在莫斯科实现（Westad 1998：10）。该事件加速了中苏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毛泽东在苏联逗留了几个月，与苏联顾问一起研究具体问题。苏联人承诺提供适度经济援助、派遣大批顾问。他们基于苏联经验，提供了在计划经济下技术发展、治理结构和快速工业化的技巧等方面的大量蓝图和文件。他们正式地进入联盟状态，在中国遇到攻击的情况下提供军事援助。但是苏联——就像在其他苏联导向的国家那样——也要求中国在几个领域和港口给予特别通行权，与中国人一起建立几个公司、开采中国的矿产资源。尽管通过1950年初的苏联顾问网络、中苏合资企业和贸易协定形成了直接联线，通过中苏友好联盟条约形成了军事关联，但是，中国没有变成集团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Lieberthal 2004：88；Westad 1998：11）。

建立该结构的主要要素

毛泽东艰巨的国内任务是把革命力量转变为稳定的基础结构。再者，他必须建立国家行政控制，以实现国家统一，因为在军阀时期，在不同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下形成了军阀割据。他必须建立治理机构、引入土地改革、降低通货膨胀和腐败。他必须加快工业建设步伐，开始把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Lieberthal 2004）。

在经济上，中国的形势并不比东欧其他被战争蹂躏过的国家好。国家

四分五裂、百废待兴；通信和社会经济基础结构被毁坏；在城市中存在饥荒、恶性通货膨胀和猖獗腐败。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斯大林的苏联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楷模。[①] 尽管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不愿完全照搬斯大林模式，但是斯大林模式的几个基本要素已经渗入中国共产党建立政党－国家的政治哲学。比如，加紧对经济计划过程的中央控制；着重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通过集体化来控制农村人口；最高领导在党和政府中的权威（Jian and Kuisong 1998：261）。用我们的话说，毛泽东的目的是复制苏联的政党－国家结构及其关联原则的主要要素。

从1949年开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先后建立了一些主要要素：政党和国家科层，建立和延伸互联线、覆盖非政党活动，职位和组织结构。同时，毛泽东和共产党由于经济成功而在人民群众当中的威望提高。1950年末，通货膨胀率被降下来。在1950－1952年间实行了土地改革。[②] 在1951－1952年间，在针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两次反腐运动中抑制了腐败行为，（Lieberthal 2004：92；Schurman 1968：318；Riskin 1991：46）。自那以后，更多的资本主义部门被纳入国家计划，由政府部门领导。[③] 1951－1952年的冬天和春天，发起了知识分子思想改良运动[④]。1951年春，反革命被镇压。从前国民党拥有的企业被没收，许多私有企业被收购（Riskin 1991：47）。

尽管中国的战略在其他方面都非常类似于斯大林化（Stalinization），但是有一个明显不同的方面，中国共产党不必像欧洲其他共产党那样渐进式地接管经济。中国的更大优势地位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实：1946年，国民党接管了现代大工业67%的重要部门，包括运输、通信网

---

① 亲近美国并不是一种选择，因为McCarthy时代对敏感的、灵活的外交没有什么益处，尽管蒋介石军队得到了美国的持续支持（Lieberthal 2004：88）。

② 根据Lieberthal（2004：90），这一时期至少有80000个地主被杀害。

③ 在这些行动之前，经济被分为四个部门：国有部门——所有企业对经济生活都至关重要；合作经济，获得优待；私有部门，受到鼓励和培养；国家资本主义部门——从属于国家优先权的私人生产（Riskin 1991：40）。

④ 这一运动动员大学学生批评他们的老师，强制改变大学课程，模仿苏联体制和教科书。

络、原材料、绝大多数银行业、被外国资本控制的国内外贸易。外资工业占国民工业总产值的35%，剩余部分由手工业组成（Riskin 1991：20）。

这些运动不仅扭转了宏观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它们还介入微观层面，撕开了社会中的最紧密的关系：

每次运动都强迫人民去挑战和否定他们根据传统标准所臣服的那些人：农民对抗村里的领袖人物，学生对抗老师，工人对抗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事实上，这些运动的一个特征是，它们迫使受害人提供与他们具有最密切关系［个人影响力网络］的那些人的信息，从而把传统社会关系从一个安全联结转变为一个潜在危险来源（Lieberthal 2004：93）。

这些措施不仅打破了紧密的社会关系，而且容许共产党把精英（如农业精英、工业精英、公务员、基层干部）从他们从前的社会位置上彻底地拉下来。利用这种运动，共产党在经济和行政领域确定了自己的社会基础，为建立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结构铺平了道路。

同时，最初困难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建立和扩张国家行政部门，建立覆盖国家和经济的互联线，把游击队、共产党军队和政党转变为一个统治精英阶层（Lieberthal 2004：96）。大多数党员是农民（1956年57%——Schurman 1968：133），他们绝大多数是文盲。在官僚机构稳定化之后，这些问题持续了几年，表现为官僚主义例行公事与革命性变化之间、农民干部与城市知识分子之间、中央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的深层张力（Lieberthal 2004：98－99；Schurman 1968：106）。毛泽东在权力斗争期间，经常利用这些张力强制推行他对付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战略（Chang 1976：2）。

为行政控制建立互联线和机构

最初的结构也导致了建立网络的初始特征。自1949年开始，一个政治－军事行政被建立，从行政顶层到基层都被强加了政党－国家－军事结构（Schurman 1968：308）。这是1949年为了建立中间层政治结构而创建的六个大行政区（Large Administrative Regions，LARs）的内部权力分配，这些行政区中有省和省属企业。大行政区具有政党－国家职能和军事权力，被给予了广泛的经济自由决断权（discretion）（Barnett 1967）。

1950年编制了政党和非政党科层（分别是 D_1 和 D_2）内的第一个正式的干部职位清单，以便接受中央委员会或地方党委会的管理（Burns 1989: xi-xii）。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核心内容的150家受苏联援助的大型企业，可能也在中央委员会的这一干部清单内。然而到了1953年，由政党任命的那些干部仅占到工业中管理和技术人员的20%（Riskin 1991: 44）。

中国网络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非政党官僚机构内的"双重审核"控制线。互联线不仅直接而且间接地重叠于战略性职位、组织和活动：它们延伸至设立于非政党机构内的控制网络。政党通过监督这些控制者而实现自我延伸。这种控制者网络在某些方面弥补了非政党机构内政党组织最初的缺乏和薄弱。官僚组织内这种特殊的控制链是一个间谍网络——"人民的控制通信员（people's control correspondents）"。它们服从各级国家机关的各级控制委员会，而控制委员会服从地方上的控制代理机构（Schurman 1968: 316－319）。

1952年，为国有金融和经济企业确定了临时组织规则，以控制中央、省和主要城市金融和经济机构的办事处。这些实体必须雇用一定数量的、具有技术专长的人，而这些人在政治上可靠，全职从事控制工作（Schurman 1968: 322）。随着 D_2 线从行政部门扩展到非政府领域、非经济领域以及被选举的职位，这一过程持续进行（Barnett 1967; Schurman 1968: 341）。在政党科层中引入"向下两级（two levels down）"控制，促进了决策和互联线的集权化。[①]

互联线向外不仅延伸到经济的官僚主义管理，而且直接延伸到经济和经济组织："领导层选择已经扩展到国家控制的范围之外，包括经济企业和服务单位"（Burns 1989: xii-xiii），明晰了军事管理者和公务员的责任。在1950年代中期，互联线的密度进一步增加，延伸到被任命的和被选举的职位之外，延伸至选举候选人的控制（Burns 1989: xvii）。

---

① 在我们的术语中，这意味着政党科层中特定层级的D2线延伸到国家科层中相应低两级的层级。因此，政党科层的特定层级不仅有权控制那些直属组织的活动，也有权控制那些从属于下级的组织的活动。例如，1955年，中央委员会批准主要干部职位的人事变动不仅在中央层级，而且在省和地区层级（Burns 1987: 37）。

形成与结构相符的工具

建立集权化互联线和政党组织的同时，也在国家权力中建立了资源攫取组织、经济管理组织。1950 年，政府发布了从工业和农业中攫取和分配资源的一系列经济指示。1951 年，建立三级预算管理体制，引入了中央政府与省之间的收入分享原则（Huang 1996：151）。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资源攫取被制度化了。1952 年，建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宣布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150 家关键企业形成了中央计划的核心。

恢复时期的增长绩效非常突出。工业和农业中几乎所有重要产品的产出都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Riskin 1991：53－54）。但是，单位资本产出却非常低。

斯大林逝世与毛泽东的集权化战略

斯大林逝世影响了中国尚在形成中的政党－国家网络，并且与东欧国家相反，中国仍然处于经济增长的阶段。毛泽东对斯大林逝世的反应是矛盾的。这位受人尊敬的世界共产主义领袖的逝世，除了引起悲痛之外，也给中国随后两三年中的发展带来了国内和国际上的重要变化。在毛泽东看来，他的理论、政治、军事成就获得国际承认的时候终于到了，他可以革新中苏领导之间从前的科层关系以及几次羞辱性关系。

毛泽东的这一期望突出反映于以下可喜的事实：在赫鲁晓夫赢得最初的权力斗争并担任党的第一书记的不久之后，他第一次国外旅行就是到中国。赫鲁晓夫的访问对中国人来说具有重大象征意义，因为是他来拜访毛泽东，而不是相反（Westad 1998：15－16）。谈判对于资源攫取和吸引也产生了积极的结果：赫鲁晓夫准备把一个海军基地、苏联在合资企业中的股份①移交给中国，并保证向中国政府提供进一步的贷款②和技术援助

① 这些合资企业有着战略上的经济重要性，是工业建设计划的核心。总的来说，他们吸收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所有资本建设投资的一半以上（Riskin 1991：74）。

② 1950 年代，提供中国总进口 45% 的大部分苏联进口都用出口品支付，但 27% 由苏联提供信贷资助。援助的融资部分采取低息贷款形式。这些贷款用来购买资本品，包括整套工厂设备，军事设备，军事库存，以及四家合股公司中的苏联股份，这些公司后来移交给中国单独控制（Riskin 1991：74）。

(Westad 1998: 16 - 17; Riskin 1991: 74)。[①]

然而事实表明，通过占据从前经济和行政精英职位、构建网络、创造和实施资源攫取工具，即使再加上战略性的苏联援助，也不足以满足工业发展计划。必须引入新的措施来促进面向工业的强制性资源调配。这些新措施加速了网络的演进，该网络在斯大林逝世的时候只得到了局部性的发展。这些措施意味着依附线延伸到并更深地渗入经济子域，也意味着互联线集权化和资源攫取进一步集权化。只在两年之后便出现了强制性资源调配所导致的结构性约束，这时，巩固了的行政控制与高度结构张力结合在一起。

网络集权化以便资源攫取

新措施意味着结构的进一步集权化，新互联线延伸到农业控制。从1954年开始，尽管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倾向进行了仔细的批评（他在苏联表现出明显的分权化偏好［Westad 1998: 18］），但是中国农民仍然被强烈地鼓励进入较低层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同年，大行政区相对于中央已经变得权力太大，于是被解散了。大行政区的任务被集权化，随后在1955年便是省和企业干部责任的集权化（D_2线），它们从前是隶属于大行政区的。在干部集权化的同时，从地区到中央政府也进行了企业的行政再分配。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和群众组织内部，政党核心集团的形成也使互联线变得更加密集（Burns 1989: xii - xiv）。随着D_2线扩展到了非在职个人，政党进一步渗入社会和经济生活（Barnett 1967: 314）。

网络在农业中的形成和深化与资源攫取

1955年，为了在制度上重叠和控制农业，进行资源攫取，在毛泽东的要求和各省的利益推动下，合作社的形成加速了（“高潮”）。1956年初就完成了集体化，比官方期限提前了一年。这时，制度化的农业集体化控制了92%的农户。又过了一年，毛泽东制订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① 这些项目包括许多钢铁厂、发电站、机械制造厂以及建设过程中各个方面的援助。另外，在1950年代，有10800名苏联的、1500名东欧国家的技术员和专家来到中国；约8000名中国工程师和熟练工人在苏联接受培训，7000多名中国学生在苏联的学校接受教育（Riskin 1991: 74）。

（APCs）从低级向高级转型的计划。[①] 为了执行这一计划，毛泽东更加依赖于地方政党领导，这些地方政党领导渴望实现毛泽东的愿望，反对毛泽东的北京同事（Lieberthal 2004：94）。全面集体化通过在国家科层中扩展和加深 D_1线，使互联线 D_2进入农业，从而容许了更大的控制和攫取能力。

毛泽东尽力实现全面的经济垄断。他把运动扩展至私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Schurman 1968：xxv）。在成功地垄断这些经济领域之后，政府活动转向城市经济计划和管理的细节问题。

这时，中国已经形成了自我相似的交织网络。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的时候，其机构背景还只是部分地被建立起来。直到1956年才建立这些相应机构，如，中央计划机关，负责长期资本投资控制、短期执行、物资供应的机构，以及中央和地方统计局。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央直接监管的物资和企业的数量快速增长。该体制的模式是自我掠夺型的，但它具有自己模式特征。政党和国家科层（D_1）延伸很远，也很严格；互联线被集权化，扩展到尽可能多的领域，尽可能深地渗入非政党领域。依附线不仅延伸到党员个人，而且延伸到一般政党组织外的那些行为人，并扩展到个人和组织生活的每一个领域。

在决策过程中，政党和国家被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政党组织不仅融入到非政党组织，并在非政党决策中处于首要位置（Schurman 1968：308），而且政党职位和政府职位通常由同一个人担任（Shuhfan 1987）。这意味着政府最高领导也占据了（被委派的）政党高层行政头衔。政党组织与国家组织的位置也存在交织现象：最高政府机关和政党机关都位于受政府预算资助的同一集团（compound）内（Lieberthal and Oksenberg 1988：40）。特征在于：D_2线的密度（在机构中相互联结的政党小集团），同时具有制度化的控制结构（控制网络），军队的临时的制度作用，关于大行政区作用的聚合体层级。

该网络的集权化程度体现于资源攫取和再分配的集权化：第一个五年

---

① 这里，成员根据他们所做的工作获得报酬，而不是根据他们所投入的资本获得报酬。失去以前优势的较富裕农民仍然留在较低层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计划期间（1952－1957），中央政府直接监管投资总额的87%。[①] 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capital goods）都是通过这些直属部委建立的渠道来进行分配的（Huang 1996：63－64）。国家预算急剧上升，约占到1952年GDP的22%、1957年GDP的29%。国有企业利润在政府收入中的比重上升。1950年代末，这部分利润占总收入的3%以上（Riskin 1991：71－73）。

工业产出超过了资本建设和现代工业产出的宏伟计划增长率。重工业产出、特别是资本品产出，在这一时期翻了三倍，到1957年达到工业总产值的一半，而消费品增加了85%（Riskin 1991：8）。同时，农业绩效显示了越来越大的困难。谷物偏好被规定，不容许单方面生产。由于集权化，行政管理完全变成官僚性的；政府低价收购使农民失去兴趣，其他产品被储藏起来。生产开始出现停滞，食品谷物供给减少。在农业中几乎没有剩余，不足以向工业供应原材料，也不能满足宏伟的工业化计划所需的城市食品供应和出口（Riskin 1991：6）。

11.5 结　论

在三个国家的政党－国家制度化期间，自我掠夺型模式的建立遵循了苏联模板，受到苏联专家的密切监督。在政治接管、全面建立政党－国家要素、保证关联和运行原则、发展与结构相符的工具、对资源攫取和调配的偏好等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逻辑。政治接管的战略和手段（国内事务和警察职位中行政权力的获取，骚乱和恐怖的协调，党内外政治竞争对手的抓捕，社会民主党左翼的合并，等等），具有更加明显的相似性。三个国家通过经济和行政接管建立各自的政党－国家要素时，也存在同样的逻辑：首先把从前的经济精英与他们的财产分离开，把知识精英和行政精英从关键职位上分离开，然后垄断整个子域（直到组织），在关键的工业部门建立本国与苏联的合资企业，为苏联建立起战略性输入渠道。在这一过

① 1953年总投资增长到超过GDP的20%，并且在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都保持这一比率（Riskin 1991：71）。90%的投资通过财政预算而得到资助，其中70%来自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控制了约1000种产品（Huang 1996：63－64）。

程的同时，根据政治优先性在中央和地方层级对国家官僚机构、军队、公安、司法、执行机构进行渗透和重组，并建立基础结构。在三个国家中，农业中的接管遵循了类似的战略，通过土地改革从而剥夺从前所有者的占有权而在制度上做好准备，最初逐渐的、后来强制性的集体化，容许了制度、活动和职位等方面的控制。在中央和地方层级建立反映官僚职能和制度结构的整个政党官僚机构，并把互联线延伸到垄断化子域，建立直到个人的自我相似单位，情况也是这样。运用同样激烈的手段，把资源和人力从农业调配到工业（价格剪刀差、强制性国家收购、低固定价格、工业中社会保障），把生产要素从垄断化的经济、行政和知识职位上调往建设基层组织（通过强制性的集中营奴役劳动），下达到个体组织的中央行政计划的实施确保了资源调配的实现。通过对企图破坏计划的人实施持续的身体和现实的威胁，惩罚性法律提高了行政计划效率。

尽管具有自我相似性，但是由于个体特征，相同模式的各种类型最初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最初对苏联军队的政治立场差异限制了苏联的影响力：罗马尼亚被占领之前的反法西斯政变，匈牙利的法西斯政变，以及中国获胜的国内军队。共产党获得社会支持上的机会也存在差异：在两个欧洲国家共产党得到的支持都很小，并且对于匈牙利，被强加的莫斯科派领导恶化了这一情形，对于罗马尼亚，国内统治缓解了这一情形。相反，在中国，毛泽东作为一个民族英雄，与他的共产党一起赶走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国内战争，因此取得了广泛的合法性，苏联的影响力就相对较小。差异还在于：苏联对这些国家的防卫和帝国目标，苏联通过停战协议而获得的工具，处理面对国内合法性问题的国内领导或莫斯科派领导的不同条件。根据国家规模、地理政治区位、经济和社会发展、强制性工业化所必需的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的差异，对于苏联军队占领和苏联利益两方面也具有不同的合法可能性。一方面，差异性导致在苏联建立更大（集团）聚合体时具有不同的攫取能力、面临不同的约束。另一方面，这些差异性决定了制度化水平的基础，不同密度的科层线和互联线的基础，这些正在形成中的政党－国家受苏联影响的程度不同，讨价还价能力也不同。以上差异性还决定了具有或不具有制度化的较大聚合体基础，也影响了国内网络、国内控制工具、互联线最初结构的建立和最终稳定化在演进和速度上的差

异。在这一网络框架内，这些差异为国内领导提供了的机动空间，以及保持该结构凝聚力、处理国内权力冲突、限制对手和稳定个人权力的不同战略。这些差异还影响了为实现以下目标而进行权力再分配的方向：在再生产约束硬化条件下进行自我再生产的过程中恢复凝聚力，适合潜在的较大聚合体和外部条件。

这些多样性的相互作用大大影响了进一步自我再生产的前景：不变的形式，模式内的重组，暂时崩溃和模式转变的机会，以及新模式的类型。

12 模式转变与维持

前文追溯了三个国家自我掠夺型模式中网络的起源和结构特征，让我们现在转向这些模式发生变化的环境。回忆本书第一部分的假定，IPS 模型预测，在自我掠夺型模式中发生模式转变之前，该结构将出现暂时性崩溃。出现这种暂时性崩溃的原因在于：经济急剧下滑，政治领导层内的权力冲突，领导者权力不稳定，社会张力增加，外部突变（例如，较大聚合体内上级单位中领袖的逝世）导致中央权力的隐藏力量下降。外部突变及其结果挑战了本书所考察的这些国家中自我掠夺型模式的稳定性。在三个政党-国家中，这些突变的起因是：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匈牙利1956年革命，罗马尼亚1960年代初德治逝世和齐奥塞斯库上台，中国1950年代末期的大跃进和19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将分析，不论这些挑战是否因苏联压力而起，为什么它们最终导致了罗马尼亚的模式维持，匈牙利和中国的模式转变。

从 IPS 模型的角度来看，存在以下问题：在较大聚合体的模式改变时，罗马尼亚如何维持最初的自我掠夺型模式？像德治和齐奥塞斯库这样的个人领袖如何从统一的集团政策转向西方，而没有导致个人后果或苏联入侵？匈牙利政党-国家作为一个较低级聚合体，在较高级聚合体（苏联）稳定的时候，如何转变模式？匈牙利结构在暂时性崩溃之后是如何恢复其凝聚力的？当领袖（毛泽东）的个人政策实际上松弛了（blew up）这一结构时，如何恢复该结构的凝聚力？在赫鲁晓夫执政期间，毛泽东在独立的自我相似单位内偏离斯大林路线的后果是什么？如何以及为什么在匈牙利和中国出现了不同的结构模式？个体特征（地缘政治区位、规模和历史

机会）在结构发展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2.1 历史背景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之后，权力斗争开始了。这位全能领袖的逝世突然使苏联动荡不安。这一事件松散了集团内联结苏联和卫星国的互联线和科层线，同时也降低了每个国家国内领导的隐藏力量。它也席卷了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从前没受到过挑战的问题，挑起从前不可思议的权力冲突。1953年6月斯大林逝世后不久，斯大林在恐怖时期的主要助手贝利亚（Beria）被逮捕处死。1953年之后建立了政党纪律委员会（Party commissions）调查古拉格集中营制度（Gulag system）、平反问题[①]以及斯大林时代所招致的特殊犯罪问题。[②] 结构凝聚力的突然松弛，为新的苏联领导以反斯大林化名义着手改革提供了某种机动空间。[③] 赫鲁晓夫倾向于集体领导，而不是集权化的个人权力；压制并在数量上超过保守派，而不是对他们实行大规模肃清。他在制度上作出努力，把国家官僚机构中的权力再分配给政党，把重点从意识形态转向经济，把权力从中央下放到较低层级。在经济上，赫鲁晓夫想通过增加消费而不是增加投资，实现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到农业的转变，从国家到社会的转变。实行分权化的同时，赫鲁晓夫计划依靠激励来加快经济增长：废除收入税，缩短工作时间，追加投资于轻工业和农业（Linden 1990：30，90，105；Hough 1980；Grossman 1983）。在国际上，赫鲁晓夫逐步走向有限制的和平共处而不是对抗，他倾向于让较大聚合体的下级单位以自己的方式建立社会主义，而不是规定一个统一

---

① 反斯大林化（1956－1964）的早期阶段，释放了近1000万劳改所里活下来的或被强迫流亡的人，并为另外500－600万在斯大林25年恐怖统治时期死去的人平反（“死后恢复名誉”）（Cohen 1986：79）。

② 斯大林在1935－1939年间的肃清，至少清除了100万党员，政党精英事实上被整个地屠杀了。军队领导在1937－1939年间被斩首（Cohen 1986：55，113 114；Rough 1980：79－108）。

③ 根据Bunce的全面分析，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领导权继承都会带来改革，因为继承者需要获得合法性、实现社会稳定（Bunce 1981）。

的方案。

在这一基础上，赫鲁晓夫否定了几个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禁区”，例如，过度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二者都需要执行压迫性的制度。赫鲁晓夫的这一否定有可能降低国家机关的安全职能以及它的某些行政职责（Cohen 1986：63；Linden 1990：109）。他承认国家的逐渐削弱，而把重点转向党。赫鲁晓夫强调，国外在军事上追求革命性的阶级斗争意味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即将爆发，这不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这一事实导致没有必要强制性发展重工业，可以放松军事负担（Linden 1990：91）。转向和平的目的在于释放资源，容许消费增长，恢复轻工业和农业，增加地方政党权力，削弱中央国家机关的权力。

赫鲁晓夫重组斯大林主义结构、改变再生产哲学的激进步伐，在政党领导层、政党机关、军队、国家官僚机构、国际共产主义集团内都遇到了广泛的抵制。[①] 结果，他的国外和国内政策都经历了多次摇摆。这些摇摆反映了赫鲁晓夫在面对以下问题时的政治脆弱性：持续不断的国内权力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冲突，较大聚合体、卫星国以及西方国家的发展。这些频繁的变化和权力斗争的累积影响，与国际发展交织在一起，在较大聚合体内、下属或平级单位内产生了随机性的影响。这些影响不时地扩大或缩小机动空间，促进个体特征。赫鲁晓夫不能长期稳定他的权力，最终在 1964 年 10 月被他的政治局同事的协同投票所降职，勃列日涅夫取而代之（Linden 1990；Cohen 1986；Floyd 1963；Bunce 1983；1985；Grossman 1983）。

在赫鲁晓夫十年任期内，卫星国在聚合体内的讨价还价能力增加了。在这一过程的初始阶段伴随着科层内依附线的放松，这是斯大林逝世以及随后的反斯大林化过程所导致的结果，然后，莫斯科对其下级单位的隐藏力量进行削弱。赫鲁晓夫宽容各国自主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并强化了这一影响。在较大聚合体以及苏联所发生的事件，导致成员国中地方领导对群众的隐藏力量增加。对苏联发展和隐藏力量下降的反应，导致了集权化努

① 参见：Liudeu 1990：33，91，85；Westad 1998：1－45；Jian and Kuisong 1998：246－295；Griffith 1964；Floyd 1963.

力加强，作为与模式相符的反应，接下来就是经济急剧下滑，社会更加不满和动荡。这些因素一起硬化了整个集团中的国家内、相邻自我相似单位内的再生产约束。同时，不稳定性增加了东欧与苏联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促使苏联人追求稳定化（Bunce 1983；1985）。结果依个体情况而异。较大聚合体和苏联体制的动态运行的影响，结合于国内经济特征以及领导层的动机、技巧和国内合法性，扩大了集团各个单位的机动空间。

罗马尼亚领导成功地把普遍张力转换为民族主义，寻找国内和国外替罪羊以维持凝聚力，从而维持了传统的结构。在匈牙利却相反，由于国外和国内的发展，出现了公开的精英冲突和人民起义，随后是经济下滑、更大的机会窗口、来自军队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暂时性网络崩溃。重建的结构最初就带着不同的特征：随着战略性的经济利益深深地融入网络，一个自我解体型结构形成了。在中国，经济政策摇摆结合了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这两个政党－国家的趋势。在最初推动进一步集权化之后，努力的方向被逆转了。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网络也从上面开始被暂时地清理，同时发起连续的、深化的分权化运动，有导向的群众动员被用作一种建立替代性结构的工具。从动荡中产生的这种结构——随着经济利益一体化和分配和攫取能力的分权化——逐渐稳定下来，形成自我撤离型模式。

12.2　罗马尼亚自我掠夺型模式的演进与维持

不稳定时期

直到1950年代初，罗马尼亚才建立了政党－国家结构，这为具有国内特征的自我掠夺型模式的特殊运行铺平了道路。有时候，再生产约束硬化之后，又被更小或更大的权力分配中的重组和经济政策的暂时转变所软化。然而，解决方法并不总是平缓的、明显的。罗马尼亚自我掠夺型模式并非在一次动摇中幸存，而是在两个潜在动摇时期都幸存下来，在这些时期出现了网络局部性和暂时性崩溃。第一次是在1953年前后，当时，由于斯大林逝世、随后的反斯大林化过程和权力斗争，结合国内社会和经济张

力增加，导致了再生产约束硬化。

第二次动摇开始于1965年，在罗马尼亚再生产约束硬化的同时，发生了德治逝世、齐奥塞斯库上台、赫鲁晓夫降职、勃列日涅夫继任等一系列事件，并且这一时期苏联－罗马尼亚政治关系出现了严重冲突（Crowther 1988：106－107；Bunce 1999：75；Ratiu 1975：52－98）。然而，德治和后来的齐奥塞斯库都努力稳定权力、保持体制的最初模式、软化再生产约束。在后一部分，我们将阐明有助于罗马尼亚在这两个关键时期（尽管存在严重的稳定性下降挑战）维持最初模式的具体原因。

1953年自我掠夺型模式的首次挑战及其解决方法

1950年代初，由于强制性掠夺加剧和五年计划加速，所以再生产约束很快就硬化了，并且受到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战争准备的进一步刺激。在1950－1951年间，通货膨胀持续攀升，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1951－1952年间，食品供应跌入新的最低点。1952年，使用奴役劳动的巨大的劳动力集中营，通过劳动力强制性再分配，增加了攫取、降低了劳动力成本。为进口机器产品而强制性出口原材料，为工业投资而极大地限制消费，造成了经济和社会的严重不平衡（Cretzianu 1956：77－79）。

到1953年春季，工业化和改良装备的政策导致东欧所有卫星国出现资源耗竭的明显迹象。生产下滑，原材料短缺，生活水平下降，到处是工人抗议（Cretzianu 1956：82）。

单位（罗马尼亚）和较大聚合体（集团）内的再生产约束硬化和凝聚力松弛，造成了权力精英的公开冲突和更多的社会不满，导致罗马尼亚就像东欧其他政党－国家一样，出现了权力关系转变。然而，在德治已经在国内领域消除了他的主要政治对手——自由主义者和莫斯科派——的时候，罗马尼亚的再生产约束才开始硬化。因此，在权力动摇[1]之前就已经对所谓的对手实行了肃清。这使德治有了喘息机会，通过发布把重点转向

---

[1] 德治除掉莫斯科对手的好借口是1952年来自斯大林的肃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命令（Castellan 1989：252－253；Fischer-Galati 1991：138）。但是，这一肃清与肃清犹太复国主义者没有直接关系，与莫斯科集团也没有关系：斯大林只不过为肃清提供了机会、模式和工具（Deletant 1999：146）。

消费的新政策来稳定权力。

消灭政治对手，加强对较大聚合体的依附线

德治在权力结构内如何实现相对统一？由于对莫斯科的忠诚，德治成功地使斯大林开始怀疑德治的莫斯科派对手，控告他们是右派修正主义。德治指控他们破坏货币改革，阻碍重工业发展，把数千富农伪装为中农，鼓励资本主义，牟取暴利，阻碍建立集体农场（Deletant 1999：240）。[①] 然而，消灭对手不仅确保了他的权力，而且使德治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代理人建立紧密关系，让他们在安全部门和内务部担任高级职位，从而向斯大林保证他的忠诚，也从较高聚合体实现他的政治稳定（Deletant 1999：147）。

在斯大林1953年逝世的时候，由于莫斯科的凝聚力突然下降、权力斗争和改革驱动力，德治声称已经从权力中肃清了斯大林主义者。德治指的是他从前控告其为“右派异端”那些莫斯科人。苏联内部的权力斗争，对集团国家的更少注意，也使德治有机会让苏联同意他处死[②]其最后的、最害怕的对手——帕特拉什卡努（自1948年以来就被关押）。帕特拉什卡努作为一个中间派政治家，他本来有可能利用反斯大林化之风和来自莫斯科的改革鼓动而上台并取代德治（就像匈牙利的伊姆雷·纳吉［Imre Nagy］那样）。处死帕特拉什卡努使德治从这一潜在威胁中解脱出来（Jowit 1971：126）。

根据苏联范式在网络内推行正式的和暂时的自由化

1954年4月的政治局会议决定处死帕特拉什卡努，使德治从潜在威胁中解脱出来，同时，德治表明了改革主义态度和遵循新的苏联路线（Deletant 1999：246）。为了证明改革主义立场，德治让政党和国家行政部门在网络的较高层级上正式分离。德治暂时辞去总书记职位，保持总理职位。模仿苏联做法，形成集体领导。在集体书记处的四个成员齐奥塞斯库、Mihia Dalia、Janos Fazekas 和 G. Apostol 当中划分了政党领导权

① 在苏联议员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和控制下，安全调查员执行逮捕和审问。

② 在1954年4月政治局会议上批准了这一死刑的虚假指控：反和平罪，作为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地主的代理人罪，在英美帝国主义帮助下领导一群叛徒暴力颠覆民主政权的严重叛国罪，传递罗马尼亚国家安全信息的严重叛国罪（Deletant 1999：246）。

(Crowther 1988：53)。

暂时停止强制性资源调配

硬化再生产约束不仅吸引——即使在形式上——在莫斯科看来是使德治合法化的制度改革，而且还导致暂时性的投资抑制，以及对资源调配通常方向的修正。1953 年 8 月，德治发表声明，公开承认从前经济政策的失误，并承诺将创造一个“新气象”（Castellan 1989：252－253）。谴责莫斯科派从前的强制性道路。根据“新气象”，工业化步伐要减速，1953 年的工业投资也要减少。资金被转向住房和消费。采取步骤结束配给（rationing)。原材料的出口下降，因为这些资源要转移到其他领域，原油和木材的攫取已经达到极限——不得不限制技术设备和机械商品的进口(Crowther 1988：53；Cretzianu 1956：82)。1955 年要增加农业资本投资，并且要比 1953 年翻一番。农产品数量由于强制性转移而减少，在这些转移中欠账被冲销，税收被降低。增加经济诱导，以便联合社会主义部门、鼓励畜牧业。制定决策以增加商品供给、提高市场零售价格（Fischer－Galati 1991：130)。

在实际中，由于投资缺乏和生产率下降，重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的目标都必须降低。再者，消费品生产增加的很大部分被迅速出口到苏联（Cretzianu 1956：82)。“新气象”不再是 1955 年就结束的过渡性政策，1955 年各个国家在军事上都完全一体化加入华沙组织，在经济上完全融入新的区域（集团）五年计划，全部都处于苏联最密切协调的之下（Cretzianu 1956：80－81)。

1957 年，在政治局内击败他的斯大林主义对手之后[①]（Fischer-Galati 1969：66)，赫鲁晓夫觉得有足够的能力在集团内部增加压力，以实现劳动经济分工和经济政策自由化（Crowther 1988：61；Giurescu and Fischer-Galati 1998：455)，从而重新实现经济一体化。基于这一战略，罗马尼亚 1955 年

① 被赫鲁晓夫污蔑为“反党”集团的对手，在政治局中占多数席位。在忠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帮助下，赫鲁晓夫击败了他的对手。在斯大林统治的政治恐怖时期都非常活跃的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Kaganovich)，伏罗希洛夫（Voroshilov)，布尔加宁（Bulganin）和马林科夫（Malenkov)，被当作保守派和独裁者而被赶下了台，对他们的罪行却没有恰当解释（Cohen 1986：108)。

12月提交给党代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成为1955－1961年区域计划的一部分，降低了罗马尼亚在经济互助委员会[1]中作为原材料供给者的地位[2]。在政治上，集团的区域计划要求自由化、反对强制性工业化，这与1950年的全面工业化计划是相反的（Cretzianu 1956：93）。

苏联拒绝附加任何保证向罗马尼亚出口其工业化所必需的设备或原材料。在新的区域五年计划（1955－1961）中，罗马尼亚没有获准继续推行强化性工业化政策，它在区域组织中的角色是原材料、电力、特别是谷物的生产者（Cretzianu 1956：98）。

罗马尼亚如何能够——尽管苏联通过网络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紧密施压和监督——避免全面的结构自由化，同时加快强制性工业化，从而维持最初的模式？

在竞争性单位之间相机行事以增加讨价还价能力

除了消灭对手之外，通过残酷镇压各地可能引发像匈牙利革命那样的集结运动，[3] 德治在罗马尼亚内部以及对较高聚合体都获得了政治稳定性。该政体通过防暴机关的力量在1956年克服了动荡，维持了秩序，增加了德治在莫斯科的政治资本（CroMher 1988：54）。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德治证明了自己是莫斯科的忠实合作者，进一步提高了在苏联眼中的声誉。基于这一政治认同，德治通过在国际领域实行两面派手法（two-faced maneuvers），增加了罗马尼亚在与苏联关系中的讨价还价能力。1950年代后期，德治发现在中国有另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政治盟友，并且中国是一个集团外的成员，因此使自己能够充分利用中苏冲突。

以上事实以及苏联人当时难以有力地控制社会主义阵营，使罗马尼亚

---

① 经济互助委员会（也指COMECON，CMEA，CEMA或委员会）。

② 那时，*sovroms*（合资企业）被国有化了。什么使苏联把合资企业转交给当地国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我认为通过这些企业加速剥夺利润和掠夺原材料到1953－1954年被耗竭了。同时，由于经互会框架内的经济协议，材料资源的攫取在那时已经在制度上得到了控制。

③ 这些被压制的集团包括：对生活水平不满的工人，想要赶走苏联军队的学生，1956年在匈牙利与他们的民族紧密联结在一起的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人。然而，因为领导层中对德治的批评有限，持不同政见有识之士很少，断断续续的动荡并不能转变成群众运动。

有机会利用这一点，在集团内迫使苏联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作出让步（通过这些关系来放松严格性）（Giurescu and Fischer-Galati 1998：148－149）。大多数攻势在于德治可以利用北京抵制苏联从军事上控制社会主义阵营。对于中国来说，这导致他们拒绝加入华沙组织，对于罗马尼亚来说，这导致了与中国人一起联合施压，迫使苏联于1958年从罗马尼亚撤军（Georgescu 1991：453；Crowther 1988：60）。[①] 这些让步有助于罗马尼亚从萧条中复苏，罗马尼亚经济自1953年后期开始一直处于萧条状态（Montias 1964：129）。总之，网络内外的条件和较高聚合体，以及德治在国内和国际领域所采取的行动，为德治稳定国内和聚合体内的政治权力提供了足够时间和政治资本。

利用网络内的攫取能力增加对较大聚合体的抵制能力

不仅是政治动机有助于德治改善罗马尼亚讨价还价的能力。当时，罗马尼亚特定的自然资源基础也使她比集团内其他国家更少地依靠苏联的原材料和能源供给。[②] 罗马尼亚人可以向西方出口原材料（绝大多数是农产品），获得硬通货来支付进口，从而能够把1958年以来巨大的贸易总量从苏维埃集团中转移开。罗马尼亚党领导层的统一为抵制苏联提供了力量，这显然对德治有利（Fischer 1989：60）。

利用网络外替代性资源降低对较大聚合体的依附性

当赫鲁晓夫1956年重申与集团内国家地位平等、与集团外国家和平共处的时候，吸引替代性资源的政治机会便出现了（Giurescu and Fischer-Galati 1998：447－450）。苏联不赞成并反对帮助罗马尼亚实现强制性工业目标，这驱使罗马尼亚更强烈地寻找网络外（在西方）的替代资源（Montias 1964：131），从而在国家层面上软化了网络内再生产约束。

1958年11月全体会议上一致认为需要大力加强国家的经济以抵住外

---

① 罗马尼亚的外交政策是机动的，许多学者描述了其对中苏冲突的充分利用（参见：Ratiu 1975：36－38；Almond 1992：61；Fischer-Galati 1969：68；Giurescu and Fischer-Galati 1998：453，456，458－459；Crowther 1988：62－63）。

② 1950年代末，罗马尼亚在能源（石油和天然气）生产方面仍然可以自给，并且拥有潜在的水电资源。虽然他们从苏联进口铁矿石和煤，但苏联人对罗马尼亚的经济杠杆作用比对其他集团成员国要弱。

部压力、巩固国内共产党政权。会议决定加快国家的工业化、农业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确保具有足够的资本增加罗马尼亚与西方的贸易，实现其宏伟目标（Georgescu 1991：453－454）。

亲近西方的提议开始于1958年11月。罗马尼亚表明态度愿意从西方企业接受信贷，能够在美国市场和西欧实现几百万美元的采购（Montias 1964：136－138）。西方乐意接受这些提议（Ratiu 1975：27－28）。[①] 当罗马尼亚软化其再生产约束时，她能够凭借从西方得到的更多外汇，更多地进口苏联拒绝给予的机器和设备，从而更快地扩张工业（Montias 1964：137－141）。

> 它［政党全体会议］还决定向群众提供更高的工资，为他们的产品提供更好的价格，改进住房，以及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拥有在祖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参与意识，从而极大地满足老百姓的经济需要。这些决议的意义到1960年变得十分明显。在1960年6月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德治总结了国家的经济成就，并概述未来的经济目标（Georgescu 1991：453－454）。

所有以上提到的罗马尼亚政治因素，为德治建立了一个足够强大的保护层，使德治能够追求自己的经济目标：进一步发展重工业，尽管苏联领导层和集团成员越来越不满。1958年政党全体会议之后，发动了一场全面运动以实现农业社会主义化，从而延伸互联线、实行进一步攫取。结果，经营私有农场的农户从1955年的88.5%降低到1962年的不到7%（Crowther 1988：59）。在1961年原有模式和动态运行的最高点，德治担任了新成立的国务委员会的主席，这样他便再次同时担任政党和国家的最高职位（Shafir 1985：68）。

抵制苏联攫取和政治经济自由化的压力，在网络内被宣传为反苏联姿

---

① 这一动力导致外贸结构在1958年以后发生了巨大改变。在1958－1964年间，进口总额中从苏联进口的比重从57.7%降到了37.7%，对苏联的出口从50.2%降到39.8%。另一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急剧上升，进口将近翻了一倍，从21.5%上升到39.9%，同期（1958－1963）出口从24.9%上升到32.8%（Crowther 1988：61；referring to Montias 1967：164）。

态和民族主义形象。在国内网络内提高合法性和凝聚力的这一机会，[1] 促进了罗马尼亚领导层的更大的敌对反应，以及反对苏联统治行为的国内宣传（Crowther 1988：135）。根据有些学者的描述（Jowit 1971：218；Fischer-Galati 1969：178，both referred by Crowther 1988：62；Georgescu 1991：458－459），莫斯科与布加勒斯特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上升到这样的水平：1960 年代初，赫鲁晓夫试图从罗马尼亚共产党内部推翻德治政权，并考虑实行军事干预。然而，成功的国内政策获得了群众支持，领导层一致拥护德治的领导，以及赫鲁晓夫 1962 年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失败，共同导致赫鲁晓夫取消了这些行动。国际失败削弱了赫鲁晓夫控制共产主义运动的能力，鼓励了中国对修正主义领导的批评。这使罗马尼亚具有更多的机会策划和抵制苏联压力（Crowther 1988：62；Fischer 1989：62－63）。

由于西方的资源支持，罗马尼亚在较大聚合体内的讨价还价能力增加，以及国内“合法性”的增加，进一步软化了罗马尼亚的再生产约束，而国内权力关系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然而，通过获取网络外替代资源来获得聚合体内的相对自主，需要付出代价：这也决定了罗马尼亚更加依赖于外部条件的动态运行，必须在国内维持强制性资源调配。

对苏联的集团内霸权和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权的抵制，以及罗马尼亚的独立声明，在 1964 年 4 月被公开化了。罗马尼亚领导层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努力从经互会的经济发展和合作规划中独立出来。来自苏联及其忠实盟友的经济压力，加上中国不能提供可行的经济替代，迫使罗马尼亚政府在 1964 年后期越来愈转向西方，在国内和国外寻求对其共产党政府合法性的明确承认（Georgescu 1991：457；see also Montias 1964：144－148）。

---

① 除了众所周知的苏联对民族独立的威胁之外，在社会上创造国内凝聚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反对匈牙利的民族情感不断上升，认为匈牙利威胁到罗马尼亚的领土完整，反对其国内最大少数民族（即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他们被指控为分裂主义者（Crowther 1988：131；Giurescu and Fischer-Galati 1998：156－157；Fischer 1989：245－246）。

1965 年自我掠夺型模式的第二次挑战及其解决方法

对罗马尼亚自我掠夺型模式的**第二次挑战**发生在 1965 年。那时，赫鲁晓夫已经被迫辞职（1964 年 10 月），勃列日涅夫 1965 年接管了政权。也是在这一时期，乔治乌·德治逝世，广泛的强制性资源调配导致罗马尼亚政党－国家体制内再生产约束硬化、社会张力增加。生产线扩张使重工业投资不堪重负，[①] 显示出困难即将来临的迹象（Crowther 1988：69－71）。在 1964－1965 年间，未完工的投资项目数量迅速增加，生产急剧下滑。资本生产率和投资效率的增长率在 1962 年初就开始下降了（Crowther 1988：69，referring to Montias 1967：58－59；Spigler 1973：15）。工业工人数量增加，加剧了生产下滑的张力（Crowther 1988：106）。集体化速度过快、农业中资本投资不足，导致低水平的增长和生产率。

罗马尼亚这些发展的综合效应，迫使政府采取激进的紧缩政策：投资增长急速下降，[②] 同时，集团国家和莫斯科的改革主义路线的压力增加，造成国内潜在的党内冲突。而且，1965 年 2 月越南战争的爆发，突然削弱了与西方建立的联系，迫使[③]罗马尼亚不自愿地重新融入苏维埃集团。当时，罗马尼亚与西欧贸易的总量和比重都将近翻了一倍：占罗马尼亚对外贸易总量的 25%（Georgescu 1991：454）。

齐奥塞斯库作为德治的政治接班人，[④] 他面临的挑战是必须在这些条

---

① 在 1950－1965 年间，经济中的投资增加了 74. 8%；工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从 12% 上升到 19.2%，而农业劳动力从 74.1% 下降到 56.5%。根据罗马尼亚的数据，工业产量在同期增加了 649%，诸如机械制造之类的优先发展部门的增长率更高（Crowther 1988：63－64）。

② 在 1963－1965 年间，投资增长又回落到年均 9%，而 1959－1962 年间为 23%（Crowther 1988：69，参见 Monfias 1967：66）。

③ 追求民族主义政策的乐观主义，以及通过与西方加强联系而从苏联控制中独立出来，突然被 1965 年 2 月越南战争的爆发中止了。这一事实使得罗马尼亚在政治上进退两难，不便于向对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成员怀有敌意的“帝国主义者”寻求经济和政治支持（Georgescu 1991：461）。

④ 本书的目的不是详细描述齐奥塞斯库的发家史。自政党－国家体制成立的一开始，他就拥有重要的职位和角色，处在恰当时间恰当地点，担任战略性职位，证明自己是德治忠实的政治伙伴（参见：Fischer 1989；Almond 1992；Gilberg 1990；Pacepa 1989；Deletant 1995）。

件下巩固自己的权力。他的主要战略与从前被德治的政治能力克服了的危机时期基本相似，只有重点和顺序有所不同。改革主动性、民族主义和向西方开放，也被齐奥塞斯库用作稳定自己权力、软化再生产约束的手段。更详细地说，新领导层在再生产约束硬化条件下的稳定化，导致主动推行机构改革和经济改革。[①] 然而，齐奥塞斯库是利用网络自由化来削弱、后来消灭了潜在对手。除了获得自由化的利益之外，齐奥塞斯库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通过公开的反苏联立场和民族主义立场（Georgescu 1991：464－465）、加强与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提高他在国内的合法性（Crowther 1988：69；Georgescu 1991：465）。西方资源保持了再生产约束的软化，为苏联拒绝支持的强制性工业化提供了替代资源。在1963－1965年间，推行暂时的经济紧缩政策，降低增长和投资速度。采取有限步骤增加消费，[②] 放松意识形态。

在国家科层中试行[③]自由化

齐奥塞斯库的具体战略是在国家和政党科层中试行自由化。在自由化的框架下，推行组织改革以提高直接民主。大国民议会（Grand National Assembly）及其常务委员会的作用在1965年加强了，以便在立法中增加受欢迎的程度（popular input）。让一些重要的政府机关——国务委员会（Council of State）、内阁（Council of Ministers）、最高法院、财政部法律局长——负责立法（Fischer 1989：90－91）。地方层级的民众委员会也发生了类似变更，以便在群众与政府之间开通新的沟通渠道（Crowther 1988：76）。然而，延伸至那些法庭的互联线仍然是集权化的，直接民主仍然是一个假象，它只不过是中央当局出于政治目的而发动群众的一种新的工具（George scu 1991：463）。

---

① 从这一点来看，齐奥塞斯库的方法与新领导者（无论西方的还是东方的）稳定新获得政权的一般行为特征，没有什么不同（Bunce 1981）。

② 修改后的1966－1970年计划承诺实际工资上升25%，消费品生产上升65%。除了工资增加之外，还要采取措施改善工作条件，引入新的养老金制度，某些消费品价格下降，允许经营私人餐馆和公寓，家庭设施得到改善（Fischer 1989：89）。

③ 这一术语来自评价齐奥塞斯库制度改革的文献（如 Almond 1992：68；Shafir 1985：107）。

1966 年成立了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新的国家级组织，其成员由各个合作社全体大会选出的城区和地区代表来委派，并受到党的紧密控制。然而，确定农业部门发展速度的是农业委员会，它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全国总工会紧密联系工作。国家级农民工会要努力减轻农业计划持续集权化所造成的各种困难（Fischer 1989：86）。

在政党科层内重组网络（互联线与反馈）

1965 年，齐奥塞斯库宣布抵制政党和国家内的集权化，对网络试行机构改革。他在政党法令中禁止领导岗位上的身兼数职，从而废除反馈和人事融合。[①] 当时，这种现代改革主义运动看来与其他改革中的东欧国家的运行是一致的。事实上，齐奥塞斯库是利用这一决定消灭其竞争对手[②]（Crowther 1988：68；Fischer 1989：72，79）。

在 1965 年第九届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入党条件被改变以拓宽党员的社会基础。代表大会所公布的群众参与意愿（而不是德治的领袖政党态度［vanguard party attitude］），点燃了市民们在齐奥塞斯库的指示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希望。特别地，齐奥塞斯库号召思想开放（参见后文中毛泽东 1950 年代中期发起类似的“百花齐放”运动），在各级政党组织开展批评工作。齐奥塞斯库把自己表现为一个自由派改革家，鼓励艺术家、作家、学者和技术知识分子的创作自主。他号召各种观点要公开碰撞，认为艺术表达需要多样化的风格和形式。他承认世界文化以及与外国艺术家进行交流的重要性，尽管他警告人们要对其持以批评态度。他的演讲意味着要与国家少数派达成和解，强调后者对罗马尼亚文化的贡献（Crowther 1988：75；Fischer 1989：13）。他发动运动，以把这些知识阶层纳入党内（从而使隐藏的、执不同意见的代表浮出水面）。同时，他的日常工作还包括飞行出访，与普通老百姓建立联系，控制中央指示在地方的落实情况（Crowther 1988：76；Fischer 1989：72）。

当齐奥塞斯库在政党组织内部负责干部管理的时候，政党中央委员会

---

① 参见后面有关中国部分，1980 年代中期具有实际影响的类似行动。

② 例如，Dragic 是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成员，当他被免除内务部部长职务的时候，在秘密警察署内被切断权力基础的直接控制权。下一步是在 1967 年免去他在秘书处的职位，后来在 1968 年被开除党籍（Crowther 1988：67）。

委员扩展到包括那些晋升到战略性职位的人。[①] 在不解除其他委员职务的情况下增加那些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以避免冲突。在 1965－1967 年间，实际上没有高层领导被降职。中央委员会委员数量的增加改变了投票比率，使之利于齐奥塞斯库（Crowther 1988：67），同时试行扩展集体决策讨论会和发言权。

其他机构改革也起到了相似的作用。由于增加了中央委员会委员数量，所以又成立了一个执行委员会（EC），这使原来政治局委员人数几乎翻了一倍。然而，除了执行委员会之外，还成立了规模要小得多的常务委员会，以处理日常问题。常务委员会的委员选自执行委员会，由齐奥塞斯库的支持者组成，他们很大程度上是作为齐奥塞斯库的顾问而不是作为一个集体决策讨论会（Fischer 1989：77）。因此，集体决策讨论会的拓宽削弱了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影响力。

工业中与形式相符的经济改革

1967 年晚期，经过两年的热烈辩论之后，中央委员会 1967 年会议提出了一项改革计划。尽管严格的中央计划和对重工业的偏袒都没有改变（Crowther 1988：83；Fischer 1989：86，112－113），但是该提案中包含了一个适度的增长速度。它还倾向于赞成消费品生产和农业生产。它建议制度创新，改进计划指标，由管理层进行集体决策，在国家科层内实行有限的行政分权化，[②] 以及政党部分地撤出经济决策。[③]

然而，经济改革只集中于分配问题，而互联线却变得更加集权化；直

---

① 从 1945 年开始，齐奥塞斯库担任了以下职位：农业事务省党委，集体化运动时期的农业部副部长，军队高级政治部指挥官兼国防部副部长，在政党组织部、中央委员会秘书处负责组织工作，后来又负责中央机关的干部政策、人事选拔和监督干部任命（Crowther 1988：67）。

② 建议如下：（1）设立非常大的、半自治的工业协会（见匈牙利 1960 年代的类似组织：Voszka 1984），接管无所不管的中央部委的许多决策权；（2）大力改革工资和银行制度，以便提高生产激励；（3）加强计划指示器；（4）通过现有供应系统分权化，改进企业原材料供应条件（Crowther 1988：83；Shafir 1985：120）。

③ 这里的建议是：罗马尼亚共产党应该从直接控制计划制订退一步，让它接受内阁的指导；政党领导者要限制自己只制订大规模的、长期的计划（Crowther 1988：83）。根据这些计划，中央委员会机关的经济部门应该被取消（Fischer 1989：112）。

接民主削弱了可能的反馈，而攫取能力仍然是集权的。因此，如果本来要被分权化的那些行为人没有显著的抵制能力，那么分配措施就可以在任何时候被逆转。

而且，在实施之前，决策分权化的改革计划就遭到网络内中央经济部委和政党强硬路线者的强烈而有效的反对。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向中层精英下放有限的权力。这种利害关系由齐奥塞斯库自己所煽动。尽管他赞成应该在技术上改进行政效率，但是他不赞成放弃领导层的直接控制。这使他开始转向反对知识阶层。1969 年，齐奥塞斯库发起针对知识阶层的第一次攻击，并利用改革作为武器反对中层精英（Crowther 1988：83）。结果，改革计划的与形式相符（form-fitting）发生得更快。

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提倡民族主义以稳定权力

民族主义具有多方面的原因。齐奥塞斯库鼓吹国家统一、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地位平等、不干预原则。齐奥塞斯库在 1965 年上任之后，几乎立即就重新开始了民族主义运动，声明罗马尼亚与苏联在政治地位上本来就是平等的（Fischer-Galati 1969：71；Fischer 1989：74）。

罗马尼亚没有支持苏联 1968 年 8 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Almond 1992：65），并且在防止苏联入侵的借口下，在 1968 年 8 月再次引入“爱国卫士”民兵力量，并让他们保持警惕。

民兵有 900000 人，直接向罗马尼亚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负责，向政党领导提供武装力量，平衡罗马尼亚军队对华沙条约的服从（subservience）。齐奥塞斯库公开指责苏联“公然侵犯一个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并警告说，在类似情况下，罗马尼亚将会为捍卫独立而斗争。这场运动进一步增加了他在国内和西方的声望和认同度，从而增加了他对苏联的讨价还价能力和抵制能力。1969 年成立了国防委员会。它是一个由齐奥塞斯库领导的联合的政党－国家机关，负责所有的国家防卫和安全事务。该国防委员会对中央委员会、大国民议会负责，或者在大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对国务院负责——由齐奥塞斯库主持工作（Crowther 1988：93）。

齐奥塞斯库的行动可以作为一种工具，使罗马尼亚远离苏联建立集团内劳动分工的压力。它也有助于找到替代资源实现政党权力在国内的合法性，把资源继续强制性地调配给重工业（Fischer 1989：96）。这些行动提高了罗

马尼亚的国际声誉，从而提高了罗马尼亚在聚合体内部、网络外部的潜在资源吸引能力和抵制能力。扩大的资源吸引潜力增加了该体制维持软再生产约束和国内现状的能力（Crowther 1988：So，93；Fischer 1989：143－145）。

然而，在采取这些行动的同时，罗马尼亚反复向苏联人保证她将继续忠守华沙条约，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密切关系（Fischer 1989：96）。对于齐奥塞斯库的两派手法（double-sided maneuvers）也许可以作如下解释：一方面，当时与西方的贸易有限，并且西方在华沙条约军队进入布拉格时袖手旁观；另一方面，苏联在1968年仍然是罗马尼亚最大的贸易伙伴。罗马尼亚与经互会国家之间的贸易至少占了其总贸易的55%（Ratiu 1975：84）。在苏联方面，勃列日涅夫在和解方向上也采取了几个步骤。勃列日涅夫承认，赫鲁晓夫不应该反对罗马尼亚的工业化计划，因为这造成了罗马尼亚远离莫斯科行为的负面影响。1969年初，经互会会议强调在独立思想、自愿合作和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实现新的统一。[①] 罗马尼亚加入莫斯科国际投资银行，后者在体制上不再像从前那样运行。罗马尼亚也同意长期的经互会计划，以及经济一体化行动（Ratiu 1975：83－86）。

网络的进一步集权化

基于国内外合法性和再生产约束软化，齐奥塞斯库在1968－1969年间对网络实行进一步机构重组。基于充分的准备和有力的措施，齐奥塞斯库清除了1965年以前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政党指挥团中的一半成员，并选出新的支持者取而代之。而后者都是来自齐奥塞斯库从前活动中提拔的中层领导（Crowther 1988：68）。这时，齐奥塞斯库已经准备在该领域公开逆转先前的自由化措施，并采取了行动。

随着德治的最后两个亲密合作者 Dragici 和 Apostol 被开除，齐奥塞斯库再也没有理由禁止身兼数职。1967年12月政党全体大会废除了1965年的在政党和国家科层内禁止身兼数职的规定。齐奥塞斯库开始空前累积他

① 与从前的五年计划时期相比，1970年经互会内的协议指出要在经互会五年计划中贸易增长37%。俄罗斯交付给罗马尼亚的铁矿石、煤和炭、有色金属在数量上都要大大增加。罗马尼亚交付给苏联的除石化产品和消费品外，还包括轻工业产品和钢管。当20年的苏联－罗马尼亚友好协议续签到1972－1990年时，这些产品的交换数量又进一步提高了（Ratiu 1975：83－86）。

的政党和国家职务（Crowther 1988：68）。清除所有对手，重组网络，取代德治的支持者，在1968年末齐奥塞斯库感觉自己已经足够稳定，可以公开甩开德治的记忆和斯大林主义名声（Shafir 1985：69－70）。

1967年12月引入行政改革，这增加了中央政府下属的行政区域单位的数量，从16个省变为40个县。这一增加使齐奥塞斯库可以在地方机关的战略重要职位安插他的支持者（Crowther 1988：68；Fischer 1989：204，224）。同时，16个前省委书记中的绝大多数被提升到中央委员会机关中任职，但是在较低层级，150个前区委书记和市委书记中的85%，由于素质、纪律和道德基础等原因而被革职。另外，重要企业中的240个经理、总工程师和总会计师失去了工作。所有这些降职都声称是为了改进职业教育、建立高伦理标准（Fischer 1989：203－204；Almond 1992：67）。事实上，这些行动意味着互联线的进一步集权化，以及职位和权力的累积。

向外伸到地区层级的互联线不仅被集权化，而且被缩短了。党代会决定，每个郡（县）党委会第一书记处的领导应该同时担任郡人民委员会主席职位，在较低层级也应该如此（Crowther 1988：68；Shafir 1985：104）。这种运行进一步增加了县级政党和国家内部的相互依附性（融合）。

在1969年第十届党代会开始之前，融合了的40个县级职位的领导都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这次运动在政党科层内创造了行政层级的可靠反馈，同时通过中央委员会的作用下降，融合国家科层的职位并直接由中央政党控制。在党代会之前，一半以上的常务委员会委员、将近一半的书记处成员和执行委员会委员，已经辞职或被排除在外（Fischer 1989：209）。最初的领导权危机已经解决，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稳定下来。

随着对齐奥塞斯库在网络内稳定权力的抵制能力由于以上行动而下降，在中央层级的软再生产约束条件下，决策被进一步集权化，强制性资源调配被进一步实施。与结构相符的再生产工具再次全速发挥作用。通过网络内强制性攫取和接近较大聚合体来获取资源。经济战略争论得到了解决：再次调整战略，继续偏袒重工业、牺牲轻工业和消费，提高1966－1970年间的生产和生活标准。但是与期望相比，重工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而农业和生活水平增长速度更低：

根据1969年8月罗马尼亚共产党第十届代表大会下发的指示，不仅要维持工业化的速度，而且要加速。结果，投资率（已经占GDP的30%）再次有趣地上升，资本品仍然被优先考虑，尽管矛盾在1966－1967年计划中就已经变得明显（Crowther 1988：86）。

12.3　匈牙利权力结构中的模式转变（1956－1964）

通往暂时性崩溃的道路

国内领导权的稳定性下降

在斯大林逝世之前，匈牙利的莫斯科派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太稳定了。在匈牙利，苏联反犹太肃清（anti-Semitic purges）的压力，[①] 导致领导莫斯科派的和中央委员会机关内的某些重要干部被降职。它也导致斯大林直接下令肃清秘密警察的头头和亲信，谴责他们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代理人（Lovasi 1990：13－29）。残留的匈牙利莫斯科派领导担心自己很快就会遭到斯大林的阶段审讯（staged trials），类似于他们在国内建立的审讯一样，不是没有根据的：他们大多是犹太血统（Hegedus 1988：193－194；Gati 1990：103－104），而犹太人是斯大林审讯的国内目标之一。

随着斯大林突然逝世、改革派领导赫鲁晓夫上台，潜在的威胁转变为权力的不稳定。斯大林罪行的主要帮凶贝利亚（Beria）被处死，以及赫鲁晓夫夺权之后的国内权力斗争，增加了不确定性。它使到目前为止的经济政策、意识形态以及支持它们的政治压迫和身体压迫，突然变成非法的了（Bunce 1983）。结果，在对手和上流社会看来，这削弱了强加的亲苏政权和匈牙利莫斯科派领导的隐藏力量。

在1950年代初，隐藏力量下降的同时，计划与实际经济绩效之间、事实与承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由于原材料与加工部门之间的扭曲，重工

---

① 苏联1949年开始了新一轮的反犹太运动，当时的主要目标是在世界范围内镇压犹太复国主义。同年还对领导层中具有犹太血统的政治对手发起了肃清运动——范围没有1930年代那样广。到1952年末，苏联的反犹太运动波及全国，类似战略对邻国国内的肃清造成了影响（Cohen 1986：142；Hegedüs 1988：192）。

业生产不顾原材料能力，价格脱离经济绩效，导致张力逐渐增加。随着农业出口增长超过生产，[①] 机器和建筑维护被忽视，分散的、未完工的大规模投资数量大大增加，导致这些张力进一步加剧。质量下滑和假冒伪劣商品造成了库存积压、投入材料的浪费性使用瓶颈问题等（Petö and Szakács 1985：189－212－233）。

强制性重工业和军事发展需要强制性调配资源。通过价格指数差异从农业和消费中攫取资源以进行大规模投资，通过降低质量隐性地抬高价格，恶化住房条件，在车间增加产量定额，降低实际工资——1952 年比 1949 年降低了 82%（Hegedus 1988：199），实际上强制性地出售政府债券，以进一步攫取资源。强制性资源调配导致生活水平下降、群众不满、社会张力上升[②]（Petö and Szakács 1985：212－233）。深深侵入私人生活的中央决策加重了这些恶劣的环境：例如，制定法律禁止在有三个孩子之前进行流产，严格压制宗教信仰活动。全面短缺使商店门前的购买排队越来越长，这增加了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官僚机构）的苦难。在 1952－1953 年间，匈牙利社会濒临崩溃（Hegedus 1988：186－187）。

尽管经济和社会张力在累积，隐藏力量丧失、从内部攫取的能力下降，但是匈牙利领导层直到 1953 年中期才开始修正经济政策。在政策调整期间，只有执行机关被谴责没有完成计划。计划的部分内容被修改，一些中层干部被降职。同时制订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被认为是过高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直接延续，其规定在 1954 年之前将工业产出和 GNP 翻一番（Petö and Szakács 1985：233－234）。

在赫鲁晓夫担任政党第一书记之后，一个由苏联选择的匈牙利政党和国家代表团应邀进行政党间讨论（inter-party discussions）。[③] 匈牙利领导层

---

① 农业产量远没有达到预期数量，部分地区因为灾难性的气候，部分地区因为生产激励缺乏：工业逐步发展导致价格剪刀差日益扩大，农民抵制集体化和强制性转移。

② 1953－1955 年间党员人数下降反映了政党的不稳定和党员不满，因为被开除党籍的人数超过了申请入党的人数（后者本来就一直在减少）——尽管开除党籍的做法已经所有抑制（Szenes 1981：9）。

③ 它只包括莫斯科派领导层最核心的部分以及更大领导层圈子中的年轻一代。

在苏联积极有力的压力下，进行了自我批评（Hegedus 1988：199－203）。这意味着谴责以下做法：个人崇拜、忽视集体领导、政党与国家融合、强制性工业化及其内部重工业的强制性发展、强制性集体化、警察镇压。苏联领导层反复警告必须重视社会评价。建议限制个人的影响力。在政党与国家最高职位分离之后，人们要求伊姆雷·纳吉[①]担任总理，前四个莫斯科派领导中有两个应该被降职。一些年轻人代表也应该被提升至政党和国家中的更高职位（Hegedus 1988：202；Gati 1990：13 4－135）。

站在赫鲁晓夫一边的匈牙利代表团的直接压力，影响了匈牙利随后的行动。然而，对错误和个人责任的详细自我批评，只允许让政党中央领导知晓，而没有公布，甚至没有通过党内封闭式渠道进行发布。这些行动对个人的影响很小，大部分职位改变了，但级别上并没有多大损失。[②] 从前制定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关键人物仍然没有受到损害，就像在苏联的那些人一样，当然贝利亚（Beria）是个例外（Hegedus 1988：204，212－213）。

机构改革局限于部委合并和行政部门的大量裁员。然而，在经济上，他们不得不立刻修正五年计划和经济政策，降低增长率和投资计划，重组投资以改善消费。他们决定降低价格，增加工资，减轻农民负担，放松政治压迫。[③]

---

① 伊姆雷·纳吉也是莫斯科集团中的一员，他被强迫进行自我批评，并于1949年被清除出了政治局，因为他批评了政党在富农问题、快速集体化、缺乏与中农联盟等方面的过度政治化行为（Hegedus 1988：173－174）。在1951年初，纳吉官复原职，被中央领导层重新选入政治局，任命为书记处成员和采购部部长（Hegedus 1988：173－176）。Aron Tóbiás（1989）主编的书中收录了纳吉的政治历史档案。

② 在这四个领头的莫斯科人当中，拉科西仍然是政治局委员和政党第一书记；另一位杰出的成员Gerö成为负责经济的副总理、内务部部长、政治局委员；另外两个从政治局中退下来，同时有新成员加入。在最高权力分开后，纳吉成为总理（Petö and Szakács 1985：243－245）。

③ 从1953年中期到年末，做出的具体决定如下：降低合作社的强制性转移，取消未完成转移的罚款。伊姆雷·纳吉宣布了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计划包括大幅度削减投资、加速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加工业、鼓励工商业中的小型私人企业、取消富农名单、加强法制、停止警察镇压、宣布特赦、关闭俘虏收容所。合作社成员的自留地规模被增加；不能满足当年转移任务的合作社转移期限被取消，其他债务获准延期偿还。对于增加农业投资、农民退出和/或关闭合作社的权利，都出台了正式的规定（Berend 1974：223；Hegedus 1988：205；Rév 1990：viii）。

然而，修正后的经济政策很少被成功地执行，因为这种逆转发生在网络内可供攫取和调动的资源最少的时候。只有增加依附性、从较大聚合体吸引资源，才有可能完成目标。同时，紧缩政策及随后集团内国家的进口减少，限制了增加出口的机会。由于激励缺乏、投入和产出混乱、劳动纪律恶化，导致生产下滑。严峻的衰退期和农产品强制性转移的延迟，对上升的张力犹如雪上加霜。降低生活水平提高的期望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不得不实行进一步的紧缩政策。

由于赫鲁晓夫与保守派之间权力斗争的盛衰沉浮，使莫斯科的情况难以预测，从而导致经济和社会张力日渐上升。紧缩政策决策、激烈裁员、生活水平方面新的紧缩计划，不能被证明是对 Rdkosi 及其集团所推行的严重经济政策失误的结果作出的反应，因为政党决议仍然是不公布的。因此，不能证明这是正确的紧缩，很快就导致各级行政上的抵制，以及从前享有特权部门的经济管理者的抵制（Petö and Szakács 1985：265；Hegedüs 1988：224）。

拉科西与纳吉这两位高层领导之间在管理风格、个人信仰和抱负上很快就出现了鲜明对比，导致了公开冲突。拉科西的名字变得与左派（或斯大林主义）路线联系在一起，纳吉的名字变得与右派（或改革派）路线联系在一起，后者得到了越来越多知识分子的支持（Petö and Szakács 1985：263）。同时，关于经济不平衡的原因以及需要采取的步骤，在政治精英中出现了强烈的不同意见。明显的经济问题支持了保守派路线。在拉科西的劝说下，政治局宣布右派的偏离使政党难以实施正确的经济政策，这应该由伊姆雷·纳吉个人负责。纳吉不想进行自我批评，于是在 1955 年 3 月被罢免了政党和国家职务，后来从党内被肃清。

强硬路线者重新偏袒重工业，再次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他们撤销从前引入的减负，增加了小农的负担，而增加工人的工资。但是，增长率仍然很低，而对外贸易赤字和外汇债务不平衡却很高。

群众内部张力增加，并被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届代表大会进一步加剧。匈牙利领导层推迟对这次会议作出反应。会议对领导层变更的影响，就像对政党自我批评和经济政策路线的影响一样，是不清楚的。1956 年，即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的第一年，张力进一步增加，领导层被迫承认不可能全面完成计划（Petö and Szakács 1985；Berend 1974）。国内原材料短缺，

技术发展没有得到改进。农业生产比预期要低，对外贸易平衡近于赤字而非盈余。谷物生产不足以供给所有人口，但是又不得不增加谷物出口以平衡对外贸易。然而，由于1957年国内人口的谷物需求比1956年翻了一倍，所以1958年谷物进口要1956年的基础上翻三倍。公共投资没有完成，而工业计划却超额完成。关键能源供给不足使匈牙利领导人转向苏联求助，同时向西方增加举债（Petö and Szakács 1985：291）。

政治精英阶层中的冲突随着未完成的计划一起增加。越来越大的社会张力最终导致拉科西于1956年7月17日在苏联的强制下辞职，并根据南斯拉夫和苏联的要求，恢复纳吉的党籍。这一变化不是激进的，因为取代拉科西的是莫斯科派领导层中的另一个成员格洛，纳吉仍然被动，尽管其支持者的期望很高（Gati 1990：134－135）。

以上因素的累积影响如下：（1）较大聚合体内的权力转移与经济政策，从而国内莫斯科派领导层的隐藏力量降低；（2）网络内经济下滑，同时张力增加；（3）经济困难和生活水平下降导致社会张力增加；（4）失败的改革和经常变化的政策路线，反映了苏联及国内的权力冲突；（5）政治精英阶层内的公开冲突，导致苏联强制拉科西辞职，格洛取而代之，10月13日恢复纳吉的党籍（Szenes 1981：17），这些都进一步恶化了社会上普遍的不满和不信任。这一过程在支持波兰10月23日剧变的和平游行中达到顶点。然而，他们很快发展为公开反对政治领导层。[①] 大学生与知识分子、后来与产业工人联合起来抗议（Gati 1990：135－138；Kopácsi 1989；Lomax 1976）。这种反抗波及整个国家（Gati 1990：141）。政党中央领导层再次提名伊姆雷·纳吉担任总理，得到赫鲁晓夫和普通民众的支持（Gati 1990：136）。

随着1956年的起义，全国的行政都瘫痪了，政府崩溃了。网络内的互联线被打破，中央和地方政党机关、机构内的政党机关以及军队、警察，在几天时间内就崩溃了。党员人数从900000下降到1956年12月1日的38000（Gati 1990：154；Szenes 1981：22－32）。

在赫鲁晓夫派来的两个代表Mikoyan和Suslov的压力下，政治局免去

① 在10月内部政治冲突最激烈的时候，政党领导层恰好外出在贝尔格莱德（Szenes 1981：17）。

了格洛的政党领导职务，卡达尔取而代之。[1] 苏联更加相信纳吉能解决危机，并且就像控制波兰事件那样，对纳吉的自由化主张作出了妥协（Gati 1990：142）。匈牙利工人党被取缔，成立了一个新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实行集体化领导，其中包括中立派议员。可怕的秘密警察被废止，一些战前政党重新开始活动，强制性转移的体制被取消。政府要求苏联从匈牙利撤军，明确表示准备退出华沙条约，变成不结盟国家——得到了苏联的同意。

10月31日，苏联人准备根据匈牙利的要求，开始组织撤军。然而，就在同一天——此前经过几个聚合体国家的秘密讨论，以及毛泽东的故意施压——莫斯科决定推翻伊姆雷·纳吉政府（Tóbiás 1989；Gati 1990：143；Jian and Kuisong 1998：264－265）。尽管苏联根据前一天的协议已经开始从布达佩斯撤军，但是在1956年11月1日，又有新的军队从苏联和罗马尼亚进入边界，重新布置在匈牙利。纳吉立即作出反应，声明匈牙利的不结盟态度（Gati 1990：145）。

赫鲁晓夫作出这样的最后决定，也许是由于他当时在国内与保守派的斗争中、在共产主义集团中的地位，由于毛泽东接管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愿望而被大大削弱了。赫鲁晓夫的新外交政策路线——和平共处和自主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面对保守派对手的权力日益增长，看起来濒临崩溃。保守派由于1953年的东德事件、1956年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而占据了上风（Cohen 1986；Westad 1998；Linden 1990：8 > 91；Jian and Kuisong 1998：276）。

结果，匈牙利作为较大聚合体的一个从属单位，其体制崩溃的进程被苏联用武力中断和逆转了。亚诺斯·卡达尔（János Kádár）突然从纳吉的支持者转变为赫鲁晓夫指定的继承人，在苏联军队的武力支持下成立了革命工农政府（Revolutionary Workers' Peasants' Government）（Gati 1990：145，154－156）。起义遭到血腥镇压，由于罗马尼亚的积极参与（Ratiu 1975：33；Almond 1992：57－60），以及中国有力的政治支持（Linden

① 亚诺斯·卡达尔（János Kádár）从1945年1月开始担任布达佩斯警察局副局长，1948－1951年间担任内务部部长，1951－1954年被拉科西逮捕入狱，1956年7月重新担任中央领导层书记、中央领导层成员、政治局委员，在苏联军队支持下上台的前几天，在政治危机关键时期大力支持伊姆雷·纳吉的决定，公开反对苏联大使Andropov（Palasik 2000：59；Gati 1990：153－154；Szenes 1981：16）。

1990：8；Jian and Kuisong 1998：276），匈牙利的政治领导们被逮捕。接管之后便是大规模的逮捕和处死。[①] 伊姆雷·纳吉和他最亲密的同事在1958年被处死（Berend and Csató 2001：297）。在苏联监护下开始执政的政治领导层相对较快地重组了政党科层，[②] 重新建立了网络。这一重建过程导致一个模式转变，在1960年代中期得到发展和稳定。

在新模式中重建网络

我们以下将列举1956年之后在网络中重新建立机构、互联线以及互联线目标的重要阶段，[③] 而不考察主要的历史细节。1956年的教训、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在苏联所发生的改革和社会观念的影响，演化出新结构的特征。以上决策包括以下变化：

干部管理的分权化

政党决定以更加分权化的方式重建其权力，以避免权力个人化，迎合苏联的趋势。结果，中央的某些决策责任部分地下放到较低层级的科层。这意味着互联线被再分配于更低权限范围，而没有减少所控制职位、组织或活动的数量。地方政党组织以及在部委而不是在中央政党机关内运作的那些人，被分派了更重要的角色。[④]

裁员

在临时执行委员会（PEC，Provisory Executive Committee）1956年12

---

① 在随后的4年中，有400人被处死（Berend and Csató 2001：297）。

② 早在1956年11月，临时领导层（IL）与许多政治权力一起成立了一个组织委员会（OC）。其主要目的就是要组建政党；开始群众组织的（动员）工作；解决与建立新政党机关有关的个人组织问题。参见 Institute of Party History Archives（IPHI）288 f. 6/1，3. s. u.：Quoted in Balogh Sándor，ed. 1993. *The minutes of the provisional leadership bodies of the Hungarian Socialist Workers' Party*，Vol. 1. Budapest：Intera Ltd.，59。这本书介绍了1956年11月11日到1957年1月14日期间的情况。

③ 这里我翻阅了大量的政党决议，对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史协会的档案以及该党下发的文件进行了整理和分析。以上政党文件的详细目录可见于 Csanádi 1997b。

④ Politburo Resolution on the nomenklatura list of the CC，the Politburo，and the Secretariat.（288，5/171 s. u.）；Resolution on the Party's cadre work CC，February 5，1957（288，20/2 s. u.）.

月23日会议上，以及在临时中央委员会（PCC，Provisory Central Committee）1956年12月28日会议上，已经明确了削减政党机关权力的主要内容。[①]该临时执行委员会决定把政治机关的规模精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②]在实际上，它只被精减了一半。[③] 这些行动不单单是1956年事件的结果。在苏联所发生的变化中也同时出现了相似的过程（Bunce 1983）。

决策集体化

为了限制政治决策中的一人权威，制定决策的权力从政党机关转移到了它的各个团体。这样做的目的是，例如，削减政党部门和群众组织在新组织的中央委员会中的权限。对于组织部门所监督的组织和干部来说，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从前的决策和指示权威也被限制为指导性的。[④]

缓和压制，把部委置于集体政党控制下

从前的政治部和政治恐怖行动组织已经于1956年10月解散了。[⑤]1957年，剩下的在政治上具有战略性作用的部委和司法机关的干部，通过几根互联线与最高政党机关联系在一起。[⑥] 在那场运动之后，恢复了政党在社会中的首要地位，而不是政党领导的个人权力，就像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之后所发生的一样（Cohen 1986：105－144）。

互联线目标的重建与互联线的延伸

① Balogh Sándor ed. 1993. *The minutes of the provisional leadership bodies of the Hungarian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Vol. 1. Budapest: Intera Ltd., 274－298.

② Institute of Party History Archives（288, f. 5/1, s. u.）.

③ 详细的人事数据参见：Balogh（1993）, op. cit., pp. 68, 235.

④ April 8, 1957 Resolution of the Secretariat, regarding the nomenklatura and structure of the HSWP CC. Institute of Party History Archives（288/20/49. s. u.）.

⑤ Akadémiai Kislexkon, Budapest, 1989: 64.

⑥ 内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军队总司令、司法部长、最高法院院长都被正式地处于中央委员会的集体监督之下。政治局决定在军队、国内安全部队、边防部队、布达佩斯公安部门、工人民兵的国家少尉以上指挥官等位置任命政党书记，从内政部和国防部副部长到它们的部门领导。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干部包括国防部和内政部的更多单位的指挥官和领导，指导县警察局局长。在不同行政层级，它们内部的其他地区组织和政党组织由该层级的党委管辖。资料来源：Resolution of the Politburo on the party supervision of the MI and its organs. November 12, 1957. Institute of Party History Archives（288, 5/ 49 s. u.）（Repealed on March 7, 1967）.

在分权化和政党机关权力削减的同时，发生了另一个过程。社会上分散的集团被集结为可控制的组织，如，律师职业中心的建立，私人农民集中进入各种形式的合作社，企业合并，匈牙利爱国主义人民阵线的巩固。①同时，他们努力在这些组织内建立政党小组（受地方党团体的监督），保持对这些集团的利益的控制。社会子域内目标的制度化容许互联线同时延伸、繁殖和深化，② 控制资源攫取。

在考察期，正式的国有企业及其领导任命仍然直接从属于中央部委，尽管国有企业在投入－产出决策和使用剩余资源方面相对自主。至于国有企业的干部管理，除了那些受到反馈的之外，其他企业领导都由企业总部所在地区的地方党委负责。重叠于职位结构的互联线多少有所削弱，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决定发展的时候，绩效和专家意见比政治可靠性更加重要。③

通过增选扩大反馈为网络创造经济利益

一方面，随着农业从 1958 年末到 1961 年初的重新集体化，出现了选派经济利益决策的经济背景。④ 通过集体化，互联线再次控制了农业。⑤ 通过这一过程，许多农业组织及其地方和全国性团体，在它们自己的科层内

① Resolution for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Hungarian Patriotic Peoples Front (HPPF) PB (288, 20/14 s. u.).

② Resolution on the tasks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 PB (288, 2019 s. u.) July 30, 1957. The placement of party-employed secretaries in larger machine depots. PB (s. u. 288, 20/20) June 13, 1958.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regional party committees in organizing the economy. PB (s. u. 288, 20/32) November 29, 1960. The party's guidance in amalgamated enterprises. PB (288, 20/240 s. u.).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solution entitle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s of the large investment plants, for party guidance, and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entral party organizers", CC Department of Construction and Transport (288, 20, 350 s. u.) June 2, 1963.

③ Plan for the supervision of people in leading and confidential positions following the abolition of the Secretariat for Personnel Affairs. PB (288, 20/33 s. u.) April 25, 1961.

④ 参见 Petö and Szakács (1985) 和 Ungvárszki (1989).

⑤ 例如，这开始于 1960 年 2 月 12 日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合作社运动（AC）形势和改进的决议，通过这一运动，全国 70% 的耕地掌握在政府组织和农业合作社手中，并且，这是这些领域被融入网络、置于政党监督之下的一种方式。Institute of Party History Archives (288. 20/12 s. u.).

或通过互联线获得了更强的政治讨价还价地位。政治讨价还价能力和抵制能力在随后的合并运动中变得越来越强，这些运动横扫了整个农业，推动了始于经济领域的跨科层反馈的出现和强化。[①]

在 1959 - 1964 年间，工业部门内发生了类似的强大的经济利益一体化和反馈，从而提高了接受反馈的那些行为人在网络内的抵制能力。[②] 在工业企业合并以及固定资本集中导致负责这些企业的决策者的权力增加之后，出现了他们向各级国家和政党科层的反馈。

例如，在政党中央机关的干部名单中可以追溯这一过程。在政治局的名单中——与从前的政治局名单相反，从前的政治局名单中只有较大城市的代表被提拔到中央干部职务——包括许多大企业的全职党委书记。[③] 而且，1963 年初的政治局决议把企业和国家农场领导纳入中央委员会的干部名单。[④] 同年的另一个政治局决议把该名单范围进一步扩大，增加了另外 25 个企业经理。[⑤]

另一个反馈例子是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决议，列出了工作在特大型投资项目的 20 位全职政党组织者。根据该决议，政党组织者必须向中央委员会的政党和群众组织部门、工业、农业和交通部门定期汇报这些投资项目

① April 7, 1959 Politburo resolution on the building up of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party and the Communist Youth Federation (CYF) organizations. (在 1959 年 7 月 1 日完成！[文件页边空白处的批字])。Institute of Party History Archives (288. 20/26 s. u.).

② 参见 Petö and Szakács (1985), Schweitzer (1982), Voszka (1980; 1984; 1988), Berend and Csató (2001: 303), 以及 1959 年 3 月 10 日成为重组基础的政治局决议："On the tasks, members, and work plans of the committee to be sent out to prepare the changes to be undertaken in 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 and the economy". Institute of Party History Archives (288. 20/68, s. u.).

③ February 23, 1960 CC Resolution on the nomenklatura list of the CC, Politburo, and the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rty History Archives (31/1/211 s. u.).

④ February 5, 1963 Politburo Resolution on the CC jurisdiction list. Institute of Party History Archives (288. 20/25 7 s. u.). 在这一文件中提到的企业只是部分地包括其经理是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企业（参见 the minutes of the 7th and 8th Congresses of the HSWP [Budapest: Kossuth Könyvkiadó]: 545 - 550, 412 - 418).

⑤ June 25, 1963 Politburo Resolution on the supplement to the CC sphere of competence list. Institute of Party History Archives (288. 20/257 s. u.).

的进展。[①] 向中央直接汇报战略性投资项目情况，意味着向更高决策层级的反馈。

资源的分配和攫取

资源分配和攫取的方式主要还是集权化的。在此方面，地方政府和党委局限于利益协调。政党和国家科层内的纪律要求（D_1）不是非常严格的，政党的职责（D_2）被相对地分权化，被选择的经济利益——重要的合作社和国有企业的经济利益——对各级政党和国家科层都具有强反馈（I_3）。这意味着在结构的不同层级，存在来自经济领域的较强的抵制能力和吸引能力。

1960 年代中期形成了新权力结构的主要特征，网络内行为人的相互利益提高了结构的凝聚力，从而使该体制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稳定。这一稳定性的基础是：通过 D_2 相互联结的依附线，以及总体上的组织变化，该结构有可能渗入新的经济领域，挖掘新的资源，从而加强政治权力的经济基础。同时，这种反馈体制确保了把政治上重要的经济利益及其监管和考虑纳入网络内，并且，从接受反馈的行为人的角度看，这种反馈体制确保了他们讨价还价能力的增加。

特定模式稳定之后，在权力结构内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只有或小或大、短暂的或持久的摇摆，其中伴随着制度结构内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但没有破坏其主要特征。因此，模式特征仍然普遍存在。新模式稳定化的时候正是赫鲁晓夫被降职、勃列日涅夫上台的时候。领导权的更替意味着苏联政策又恢复了保守路线。匈牙利的新模式仍然可能通过莫斯科在政治和经济上直接施压和通过较大聚合体施压而发生剧变和逆转。然而，正如我们在罗马尼亚例子中所见，勃列日涅夫主要关心的是苏联国内和聚合体国家的社会安宁和政治稳定（Bunce 1983；1985）。1960 年代中期的匈牙利，在集团资源的资助下（Petö and Szakács 1985：310），在苏联军队出面的保护下，这些条件都具备了。再者，政党－国家中主要经济利益的结合，使匈牙利的新模式保持着权力长期稳定的前景。

① August 1961CC Secretariat Resolution. Institute of Party History Archives（288. 20/34 s. u.）.

12.4 中国的分权化-集权化摇摆与模式转变（1957-1977）

到1955年，问题已经很明显：未加工的和加工过的农产品的出口增长率已经下降，消费品生产的增长率也有所下降。即使重点优先的资本品部门也受到影响（Riskin 1991：70）。尽管当时加强了行政控制，但是这些现象背后存在重要的结构张力。这硬化了再生产约束，迫使领导们不得不改变原有的战略。

再生产约束全面硬化

网络内张力增加，与苏联关系日益紧张

在1956-1957年间，多方面因素表明，为了提高攫取能力、摆脱中央分配负担、解除政治高能而经济低能的官僚机构，必须重新调整权力关系。其他一些不同性质的紧张局势也加速了这一调整。据可得文献，这些紧张局势部分是个人原因造成的，如毛泽东不适应国家事务——城市经济计划与管理——在价值、优先权和工作风格等方面与战争年代截然相反的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另一类张力是社会性的：城市精英与非城市精英之间，农民干部与城市知识分子之间，尽管苏联模式鼓励城市精英学习管理技能和其他技能。造成紧张局势也包括形成外部约束的一些政治因素，如，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第二十届党代会上的演讲中大肆揭露、批判斯大林。这一演说对中国领导人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Lieberthal 2004：99）。匈牙利1956年的起义，在几天之内就瓦解了它的中央集权式斯大林主义结构（Westad 1998：18）。这一系列事件使毛泽东意识到，如果放松阶级斗争，右派偏离将非常危险。同时，这些事件也发出了苏联国内权力斗争的警告，这是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领导层中必须面对的（Linden 1990）。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的外交政策分歧和政治敌对，使得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

从苏联吸引资源的能力下降

到1956年，中苏领导层之间张力上升意味着，中国向苏联偿还的贷款

开始超过苏联提供给中国的新的经济援助。在 1957－1958 年间，许多苏联贷款到期，而且苏联不再提供新的贷款。因此，中国在 1955 年之后的还贷期限很短，每年都要支付大笔的利息。中国也因这一经济压力而成为净资本输出国（Riskin 1991：76）。苏联援助不再足以提供大部分的投资资本。结果，来自苏联的资源减少所导致的自我再生产约束硬化，很快增加了从国内攫取资源的驱动力（Lieberthal 2004：99）。

从网络内吸引资源的能力下降

到 1957 年，由于农业生产滞后，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受阻，导致形势进一步恶化（Chang 1976：22）。再者，集体化与国有化的加速发展，以及无法控制的地方投资，导致严重的经济失衡。中央对经济的调控越来越没有效率。过度投资、整体经济扩张、过度强调生产和数量造成瓶颈和财政困难，而失业成了持久性问题。

1956 年的农业欠收进一步恶化了能源和原材料短缺、有些部门生产能力闲置、有些部门出现瓶颈、通货膨胀压力等问题，最终来自苏联的资源减少迫使中国共产党调低了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也迫使中国共产党像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那样，开始着手某些自由化运动。必须缩减 1957 年的资本建设规模，调整针对农村集体、手工业合作社、刚转型的工商企业的政策（Riskin 1991：110）。为了缓解张力，毛泽东还采取几个步骤来获得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拥护。他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团结知识分子，引入工资改革迎合工人的要求，逆转农业集体化高潮，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安抚农民。在保持反斯大林主义政策的同时，公开批判“一言堂（one-man management）”。在努力缓解张力的同时，在经济单位内部实行政党机关的制度化，以增强政党控制，削弱替代的控制体制（Schurman 1968：xxv，284－287，350－352）。

然而 1957 年初，为重新达到均衡而实行的自由化和稳定化同时也导致了政治上的不稳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放开了知识分子的批评，扩大了对自负无知的政府官员的社会不满。这场运动提出了关于模仿苏联的基本问题，置疑中国共产党垄断政治权力的公正性。批评渐渐扩展到地方政党官员，这些官员发现自己遭到日益严厉的攻击。工人们也通过罢工和其他有组织的活动来表达他们的经济利益（Lieberthal 2004：101）。因

此，通过削减投资、重新分配资源以取悦民众、政治自由化来增加网络凝聚力的努力，却带来了政治上的不稳定，这些都硬化了再生产约束。并且，再生产约束硬化的原因还有：中苏冲突升级以及与西方的关系恶化，导致没有机会从网络外增加资源。

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毛泽东明确表达了对苏联模式中过度集权化、官僚化和知识分子作用的不满。这种负面经验迎合了毛泽东反对进一步集权化的倾向。[①] 该体制需要新的工具来提高资本形成和攫取能力。从IPS模型的角度来看，中国网络内出现的所有特殊张力的性质，强化了新方法在权力再分配中将采取的方向（Goodman 1986：2－17）。

因此，现在需要的是这样一个战略——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相比——它将应更加注重农业、降低集权化、给地方（和/或企业）更多主动权、把中国冗余劳动力转化为优势而不是劣势。这些目标恰好符合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倾向：基于行政分权化的动员战略（Riskin 1999：111）。

针对再生产约束硬化的分权化的第一次摇摆：大跃进（1958－1961）

对于"过度集权化和官僚化"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通过国家科层内的激进式权力重组，以及强制性地把资源调配到战略性产业，在国家官僚机构中实行资源攫取和分配的行政分权化（自力更生）。二是通过增加企业的决策能力来调动网络内资源，在国家科层内部进行权力再分配。

在毛泽东1956年的著名讲话中谈到了第一个方案——行政分权化——的理由（Lieberthal 2004，App. 3）。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讨论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提倡"调动中央和地方政府两种积极性"和"用两只脚走路"的思想，这里指的是中央和地方的产业。通过强调中国与苏联相比较的一些独特性质，对斯大林主义结构的这种背离被证明是正确的（Qian and Xu 1993：160）。于是，毛泽东迅速利用了赫鲁晓夫对实现社会

① 毛泽东天生喜欢自下而上地发起运动，不像其他人那样喜欢自上而下地发起运动。另外，他喜欢地方胜过喜欢中央，喜欢政治承诺胜过喜欢技术专家知识，喜欢群众和政党干部胜过喜欢官僚机构，喜欢精神激励胜过喜欢物质激励。他还怀有持久革命的信念（Piskin 1991：116）。

主义存在多种途径的认可。然而，尽管方法不同，但其思想本身与赫鲁晓夫的思想没有什么差异，都是试图将权力从中央重新分配给地方。毛泽东与齐奥塞斯库的方法没有什么不同，但他们的动机则相反——前者是分权化，后者是集权化。他们三个都有同样的目标，那就是提高攫取能力从而产生结构凝聚力、稳定个人权力。实现相同目的具有不同方法，这说明自我掠夺型体制内具有相当大的机动空间，并且，由于结构内抵制能力的差异使它们造成不同结果。

分权化的激进措施

分权化运动同时意味着以下思想：镇压持不同政见者，消除对于行政分权化的可能抵制和反对——如果他们赞成集权化或者赞成市场——并消除政党精英中的潜在对手。1957 年中期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次反右运动，压制“百花齐放”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右派知识分子和右派倾向。[①] 这次运动也波及提倡第二种经济政策的那些人，他们主张所谓的市场导向，使国有企业拥有更大自主权并依赖市场（Schurman 1968：142）。

到 1957 年底，在行政分权化的同时，又发动了一场新的反右运动：党内持不同政见者在各个层级被肃清。在同一时期，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和统战部针对为各民主党派工作的干部的调动问题，发布了新的规定，这些民主党派是公众批评的发源地（Burns 1989：xi；Schurman 1968：142）。

压制性政治运动和行政分权化结合在一起。分权化意味着行政权力和攫取能力重新分配到较低级的政党和国家科层，削减中央的权力。分权化在农业中和工业中有所不同。在工业中，这一运动意味着整个结构中的下属企业、资源和决策都分权到较低级行政部门，强调自力更生。在农业中，这意味着决策能力在公社层级的集权化。这也意味着对经济的政治垄断延伸到了私人财产，D_1 和 D_2 线通过家庭延伸到了个人（Barnett 1967：341）。

除了行政分权化之外，重点也发生了转移：从国家官僚机构转移到政

① 这一运动的本质与“通常的”做法没有什么差异。全国的地方官员接到命令，要在本单位揭露和谴责规定数量的右派。在 1957 年整个夏天和初秋，近 400000 名城市居民（包括许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并投入监狱（Burns 1989：xi；Lieberthal 2004：101；Jian and Kuisong 1998：265）。

党权力，从知识分子转移到农民干部，从物资动员激励转移到精神动员激励，从中央分配转移到地方自力更生。

更详细地说，工业中的分权化开始于：通过国家和政党对非战略性产业内国有企业控制的分权化，降低中央的分配负担和攫取能力。仅仅保留了战略部门中的1200个单位的管理权,[①] 大约8000多个企业的管理权（D_1）从中央部委转移到各个省（Huang 1996：37）。分权化延伸至轻工业中绝大多数经济单位和重工业中较小的企业。它们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以便吸收地方失业人口，为农业提供技术背景（Schurman 1968：84；Huang 1996：64－65）。1957年，延伸到这些经济单位的互联线也被分权化到省一级，省级干部名单中的那些经济单位依次分权化到较低层级。企业内的政党机关也获得了更重要的政治地位（Burns 1989：x；Schurman 1968：351；Goodman 1986：3）。

各省还被赋予了为本省生产进行计划和分配的权力。1958年9月宣布的附加措施大大强化了这一趋势，在该措施中，各省有权为当地所有企业（即使从属于中央的企业）制订计划。各省有权全面控制其辖区内的日用品分配、生产原料分配和劳动计划。同时，中央规定目标的数量大大减少。75%的中央分配物资和大量的监督程序都转交给地方政府（Huang 1996：37；Shirk 1990：234）。随着权力向较低层级转移，各县市控制了原来由省管辖的一些小企业。

在所有这些运动的同时，实行了广泛的机构重组，合并和取消了许多中央部委和中央办事处。在1958－1959年间，许多干部也被调任到较低层级的政府（Chang 1976：63）。

由政治推动的国家科层内决策的分权化，进一步扩展到企业内部。反对管理的政治偏见从以下事实中可见一斑：企业内职能部门的许多专业化管理活动被分权化到[②]由技术员、普通工人和行政干部组成的各个小车间

---

① 中央部委保留了对近1200家企业的控制，其中大多数是冶金、化工、能源、精密仪器制造和国防等战略部门的大型企业，从前大都由外国拥有或在苏联帮助建立起来的（Huang 1996：37）。

② 这些包括：财务统计工作、定额计划、质量控制、技术控制、检查、纪律、维修保养、工资、奖金、福利工作（Piskin 1991：120）。

生产集团。诸如计件工资和个人奖金之类的物资激励被广泛取消。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职能区分被打破，管理人员的奖金也被取消，而非物资动员激励的作用大大增强（Riskin 1991：122）。

自上而下的计划过程出现逆转

计划的制订是自下而上地进行的。省政府必须汇编下级政府及其下属企业的计划（Riskin 1991：105－106）。地方政府所制订的计划必须提交中央并获得批准。目标由中央来确定，中央向地方政府分配明确的资源，但执行情况和执行结果是不可控制的，因为省级政府拥有两套目标：向中央提出的非常保守的目标，而为当地发展确定的雄心勃勃的目标（Riskin 1991：116）。融资计划和技术设计也不再要求中央检查。而且，如果项目超出省界（above the province limit），只要不需中央资助和分配物资，那么省政府也有权批准。

从1958－1960年开始，随着互联线、经济单位、分配能力在国家官僚机构中的分权化，工业中的一些攫取能力也被分权化了。这场运动是这样进行的：企业利润的20%留给地方政府，80%上缴中央（Riskin 1991：105；Chang 1976：56）。除了那些战略性的和大型的重工业企业之外，其他中央下属企业也是采用这一利润分成。类似的利润分成措施也被引入商业领域。中央政府不再控制每一笔收入和开支。预算外征税也可由地方发起筹集（通常是资本投资），而不需上级政府批准（Chang and Yijiang 1994：57－58；Huang 1996：65）。

由政治推动的农业中决策分权化

省级政府的定价权被大大扩张，它可以控制谷物转移配额以及谷物计划购买和供给的未来增长（Riskin 1991：106）。为了逐步增加农业产量，根据十二年农业规划（Chang 1976：71），强调劳动力的全面动员。农民被期望去改善和建造灌溉和水利保护设施，收集肥料，采用先进的耕作方法。农民动员是政党干部的任务：花费少量的钱并依靠群众去扩展地方工业、增加农业产量以满足农村需求；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运输成本。1958年中期，公社——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单元——被组建起来（Chang 1976：85），每个公社覆盖几个乡镇。在1958年，攫取和再分配能力被委派给公社而不是集体，引入免费供应，个人生活资料（甚

至厨房器具）被公有化，小型农用工具、家畜被公有化，农民也不可以从事小家庭副业（Barnett 1967：341；Chang 1976：102）。然而，由于激励低、干部“命令主义”、劳动时间长、缺乏物资激励、普遍的农民不满，导致这些措施在几个月内就被修正。尽管如此，领导层在1959年仍然强制公社实现过高的生产目标（Riskin 1991：122）。

大跃进期间的经济分权化意味着攫取和分配能力的分权化，以及把对这些能力的政治控制权下放给自我类似单位的较低级聚合体。然而，分权化并没有降低（更确切地说是增加了）政党对于国家科层的控制，以提高生产动力。地方党委的领导层相对于生产部门的领导层而言，具有优先权。政党非常广泛地侵入国家行政，以至于在经济和法律领域、公共安全和司法组织中，政党职责与国家职责之间界线不清（Barnett 1967：123，196）。

政党对国家和经济的渗透，还向下延伸到农业中的最低层。在公社层级，政党的首要位置更加明显，公社领导层的互锁（interlocking of directorates）甚至比较高层级更加厉害。在公社中，政党、国家和经济事务大量重叠，在大队层级，这种重叠甚至更为严重（Barnett 1967：368）。

通过科层线的深化，该政体还试图全面动员中国农村劳动力（包括妇女），他们相信劳动力可以代替资本。公社成立托儿所，年长一点的人从事烹饪，公众食堂取代了私人就餐，以半军事化的方式组成基层工作组。大力加紧地方政治控制；首要重点放在非经济激励上。动员群众从事超长时间的劳动，以生产最终的集体产品。公社控制了其管辖区内所有的农业、工业、商业以及政治、军事和文化事务，该政体期望公社能最终变成共产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单元（Barnett 1967：315）。

权力再分配中的自我相似行为导致失衡

网络内权力再分配没有伤及结构中自我再生产的自我相似的动态运行。事实上，再分配强化了这种动态运行。真正发生变化了的是，通过资源攫取和分配决策的分权化以及计划权限向下属单位分权化而导致再生产约束突然软化。这一转变——由于自我相似性动机[①]——导致投资过热、

① 例如，增长动力、资源储藏、积蓄等。

通货膨胀压力、大规模失衡、空前巨大的预算赤字、建筑分散且质量低劣、重视积累、忽视消费和生活水平[①]（Riskin 1991：108－109；Chang 1976：63）。数十万个小鼓风炉把6000万人从秋收转为炼铁。并且，采矿和矿石运输都发生在1958年的收割旺季。1958年至少建成了750万家新工厂和车间，其中600万家是在公社及其下级单位的支持下，在自力更生运动中建立的。在自力更生运动期间，夸大收成的报告使中央作出更加不成比例的估计，导致忽视了收割工作。1959年春出现了食品短缺，农村地区严重不稳定（Riskin 1991：126）。

所有以上发展都危及整个体制的自我再生产。针对张力和失衡，领导层开始意识到了这种情形下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于是采取措施纠正糟透了的过度跃进。在一次自我批评的讲话中，毛泽东承认了计划的必要性，并称大炼钢铁是一个灾难。收成估计也被向下调整，低水平的炼铁企业被关闭，较成功的炼铁企业则合并为几家生产单位。到了1959年底，公社的会计、税收和收入分配权利被下放到大队层级。许多土地、牲畜和工具的所有权也下放到大队层级。公共食堂被关闭，“免费供应体制”受到限制，重新引入按工分向农民支付报酬（Barnett 1967：342；Riskin 1991：126－127）。

所有这些变化都发生在一个农业危机不断加剧的环境下，这种农业危机是由于政府基于不可思议的高收成虚假汇报而实行过度征收所导致的（Riskin 1991：127），恶劣的气候条件加深了危机程度。在1959－1961年间的大饥荒中有数百万人丧生。该问题的严重性当时并未被国际社会所觉察（Lieberthal 2004：108）。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之间的冲突升级使这种经济和社会灾难进一步恶化（Jian and Kuisong 1998：273；Linden 1990：56，91，109）。结果，1960年夏，在饥荒日益严重、经济组织混乱、行政腐化的时候，1400名苏联专家突然间[②]

---

① 国家积累率从1957年的大约25%上升到1958年超过33%，然后——由于高积累率和农业收入下降——1959年达到最高约44%。

② “……新工厂的建设停工［……］，而许多动工了的建设却陷入混乱。根据俄罗斯人设计而建造的工厂所需的零部件再也得不到，在苏联帮助下建成的矿山和电站被关闭。关于新事业的计划被取消，因为苏联人毁约、不再提供设计图纸和设备”（Meisner 1977：249，quoted by Riskin 1991：130）。

全部撤出中国（Chang and Yijiang 1994：125；Lieberthal 2004：108；Riskin 1991：130）。到1961年，实际工业产量跌回到1957年的水平，而粮食谷物产出则下降到只有1957年的三分之二（Riskin 1991：134）。

回摆：有选择的（与形式相符的）重新集权化

中央的重新集权化努力表明了它的再生产约束硬化。1959年，在中央与省之间的固定收入分成比率已经被取消，而采取年度计算的方式，这要求与中央重新讨价还价。省里保留的收入仅够用于被批准的开支。省如果在提高产量、削减成本、增加利润等方面表现出色，中央的"奖赏"只不过是多免除一点利润上缴。然而，由于从前分配的分权化和不同的攫取能力，导致各省具有不同的讨价还价能力，从而造成各省在收入分成比率上的广泛差异（Riskin 1991：107）。换句话说，中央根据各省抵制能力实行有选择的攫取和分配，导致集权化努力是与形式相符的。

这是因为，尽管中央收回了攫取和分配能力，但在中央委员会和其他有影响力的决策讨论会上，被选择的省的省委书记在该结构中仍然具有强大的科层内反馈（Goodman 1984；Chang 1976：146；Zhao Xiaobin 1996：141；Huang 1996：141）。反馈增加了那些被选择的省的抵制和吸引能力，以及它们对于中央决策的影响能力。在解散中幸存下来的较小企业提供了某些攫取和分配能力，这种经济力量强化了反馈。各省在调整税率、改变某些税种的税基等方面的征税权（攫取能力）扩大，以及预算外收入权的扩大，都有助于提高它们的经济实力，造成经济实力上的差距。财政权力在省内自下而上地集中，也提高了省的经济实力，符合集权化驱动力，减少了较低层级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Chang 1976：144）。然而，甚至那些省也只有有限的攫取能力和吸引能力，这些能力被更深地融入（反馈到）较高层级的决策结构。一方面，由于企业被授予一定程度的经济生产管理和运行的自主权，所以财政权力和干预能力的集权化受到限制。另一方面，1960年代初恢复中央委员会中的六大区域局，导致在省与中央之间出现了一个中间行政层级，降低和挑选各省的直接利益提升，并在经济上对各省进行协调和监督（Chang 1976：145－146）。

1961年之后，除了资源再次集权化之外，在网络内采取了进一步的具体措施，以实现权力向中央再分配。为了资源进一步集权化和管制省级行

为，内部权力分配采取了新的形式（Barnett 1967：123；Burns 1989：xvii）。在1960－1965年间的权力再分配在工业和农业有所不同。在农业中，网络从最底层撤离，而在工业中则实行了重新集权化和紧缩政策。

在农业中，除了决策分权化到大队层级之外，还实行了网络的相对撤离和绝对撤离。这一过程是这样实现的：允许县级以下的资源创造型生产，让它们自己拥有攫取和分配能力。1960年以后，根据政府指示，90%的农村劳动力仍然从事农业生产。[①] 结果，公社所从事的大多数非农项目都不得不终止（Riskin 1991：151）。公社被拆分为其从前规模的三分之一。自留地归还给农民，私有畜牧场得到鼓励。允许这些产品的自由买卖。不必缴税，也没有强制性收购，契约制度也得到认可（Riskin 1991：129）。在1960－1962年之后的三十年中，甚至大队的权力也受到限制，生产队变成了基本的生产和会计单位。[②] 除了网络撤离之外，重重工业轻农业的政治偏袒也有所变化。重点转移到了农业，把农业作为工业增长的基础，重工业增长被放慢。许多投资都出现了急剧削减，生产资料进口大幅度下降。[③]

在工业领域，网络中的变化反映了一种与农业**相反的趋势**。在许多行业中，集权化恢复到了1957的水平（Huang 1996：39）。针对国有企业实行资源攫取和再分配的自由决断权，从各省再次集权化到中央，在资源分配中实行更加严格的选择标准。与此同时，国有企业领导层的干部管理也被集权化了（Burns 1989：xi）。

这些严厉的措施导致1961年实际资本投资降到1960年的三分之一，

---

① 1961年12月发布的一个文件要求停止国家计划外的所有基本建设项目，关闭所有亏损的工业单位。它把地方国有工厂定位于手工业合作社，停止招募农村劳动力到工业部门（Riskin 1991：129）。

② 条例保护了这些生产队拒绝向公社和大队提供劳动力的权利（Riskin 1991：29，170）。生产队成员在内部分配自己的产出，而不是简单地从总产出中分得某一比例（Barnett 1967：357）。农业生产管理和产出分配再次回到小生产单位手中（Barnett 1967：317）。

③ 这是由于三个同时行动的干预：进口和出口能力同时减少所导致的全面危机，与苏联关系破裂导致迅速转向美国和日本，紧接着的粮食危机导致中国进口粮食谷物的数量大规模增加（Riskin 1991：155）。

1962 年又下降了 44% （Huang 1996：64 – 65）。在 1959 – 1962 年间，中国总出口下降了 30% 以上，总进口下降了 44%，[①] 开始了一次长期经济衰退（Riskin 1991：157）。

在 1962 年，又发起了一次激烈的投资削减计划，资金管理被再次集权化（Huang 1996：64 – 65）。与农业中的行政放宽和容许某些市场激励相反，在工业中，国有企业被禁止在市场上销售其产品或通过双边协议向其他工厂供货（Riskin 1991：161）。

国家积累率从 1960 年的 40% 降到 1962 年的 10.4%。在 1961 – 1962 年间，大部分县市和公社一级的企业都亏损并被关闭。投资削减导致城市失业增加。于是又采取了几项措施把劳动力重新转移到农业，并阻止劳动力流动（Lieberthal 2004：109）。财政资源也转移到农业。在农业部门和支持农业的工业部门中，投资有所增加。[②]

除了投资削减和重新分配收入分成比率之外，对从前分权化了的国有企业的控制，从而对大部分攫取和分配能力的控制，也被再次集权化。到 1963 年，在 1957 – 1958 年间下放给了地方政府的、由中央控制的企业的 87%，以及那一时期四分之三由中央分配但其控制权已交给地方政府的商品和物资，都重新归中央管辖。集权化（尤其是财政计划的集权化）据说比从前集权化时期更为强烈（Riskin 1991：158）。

因此，大跃进时期的分权化是短暂的、可逆的。可逆性也许是由于以下几个因素：（1）在国家科层中的机构分权化和经济分权化，同时增加了政党在中央和地方层级通过互连线对国家和经济事务的控制。（2）资源的再次集权化也并不是从零开始。中央已经保留了部分攫取能力，其直接决定了中央在地区间再分配资源时有选择的分配能力。再者，攫取和分配能力的分权化主要是针对非战略性行业，而针对战略性行业和经济单位仍然保持控制。中央还通过干预来间接地保留分配能力：中央决定各省资本投资的水平和性质、大部分重要工业和农业商品的产量、总开支及其使用构

① 在这些年，农业出口下降了 60% 以上，而农业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却从 1959 年的 4% 上升到 1965 年的 47%（Riskin 1991：157）。

② 与大跃进时期相比，在农业机械重工业、化肥和杀虫剂方面的总投资比重翻了一番（Riskin 1991：152）。

成、总工资结构（Riskin 1991：107）。（3）重新集权化是可能的，因为在1960－1962年间的社会和经济危机通过互联线对权力分配具有直接的政治影响。这场危机削弱了地方权力，加强了中央权力，并暂时迫使毛泽东接受其同僚所提出的新经济政策（Chang and Yijiang 1994：141）。

在这种新的政治形势下，地方权力是短暂的（short-lived）。因此，各省很难抵制资源和决策权的集权化。但是抵制能力是**有选择的**，因而新的权力分配不会出现1950年代中期那样的格局。

对于新成立的权力关系中的经济管理，精英内部的权力争论升级

在1960年早期，工业和农业都开始复苏（liberthal 2004：iii）。然而，权力关系并未理顺，并且在经济和社会的不同领域、不同维度，都显示出多种模式的混合。一方面，这一情形形成了驱动力，以及混合实施与结构相符的资源攫取和分配工具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一情形也导致张力上升，使得政党中央内部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派系争论尖锐化，竞争对手们都想争取各省的支持。

在集权化、阶级斗争和农业市场化问题上的权力争论再次升级。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计划失败导致了经济和社会灾难，毛泽东对政党的控制被大大削弱，灰心丧气的农村政党干部强烈谴责允许农民私有耕种、生产责任制和自由市场的政策。毛泽东觉察到这些发展将危及中国集体农业和社会主义道路（Chang 1976：142）。他抱怨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务院的财政与贸易办公室已经变成了独立王国，同时抱怨刘少奇正在走“右派政策路线”（Chang and Yijiang 1994：142）。

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1962年8月），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新政策。他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并警告人民要提防中国修正主义危险。然而他遭到党内许多官员的反对，这些官员提出的农业激励措施已经改善了农业生产，促进了1961年严重危机后的恢复，并在某种程度上解放了文化生活。毛泽东多次以促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形式进行干预，但都失败了，这表明了其他人对毛泽东的抵制。毛泽东无法领导农民从资本主义道路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强化针对地主、富农和反革命的阶级斗争。毛泽东不能强迫文学巨匠和机构停止宣传“修正主义”主题，不能通过介绍当代革命问题和新历史时务来教育群众，解决他所说的“人民内部矛盾”

(Chang 1976: 160)。

总之，1964 年中期以前，新形成的权力关系阻遏了（与形式相符的）由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在中央和地方发起的运动的效率。而且，到了 1964 年中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份报告，要求停止不久前在文学界和艺术界发起的整顿运动。这可能就是毛泽东采取更激进措施的时候了：建立中央委员会文化大革命小组，指导和监督一场彻底全面的“文化大革命”，以推行这次整顿运动（Chang 1976: 160）。文学巨匠、文化部委权威人士、中央委员会的机构和职员，都变成了批评的牺牲品。文化部被重组，但仍然没有反映毛泽东加强阶级斗争的更激进的要求。再者，面对中美冲突的威胁，刘少奇和邓小平认为 1964 年以来的阶级斗争运动过分了，并在 1965 年 3 月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决定停止这场运动。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党和国家领导层对毛泽东恢复“阶级斗争”号召的一次有效抵制，这一号召最终导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Riskin 1991: 180）。

因为中央政党机关和北京的政党领导集团都控制在对手手中，所以文革运动从上海发起，并得到了当时国防部部长、党中央副主席林彪的大力支持。毛泽东使用军队作为新的权力基础，与控制了政党机器的对手进行斗争，向文化战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宣战（Chang 1976: 163 - 167)。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下设立文化大革命小组。5 月 18 号文件号召批判和开除“资产阶级代表”，说他们“已经逐渐混入”政党、国家、军队和各种文化组织（Chang 1976: 167; Riskin 1991: 186）。[①]

毛泽东的激进目标在中央和省级政党组织中遭到了广泛而普遍的抵制，他在党委会里的支持者只占少数。毛泽东没有其他选择，只有扩大冲突范围，借助“群众”来战胜党内对手。（Chang 1976: 182; Lieberthal

---

① 根据 Lieberthal，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以下几个目的：改变继承人，训练治理国家的庞大官僚机构，使中国的年青人亲身体验革命，用他的话说叫唤起整代革命接班人，在各个政策领域进行实质性改变以减少几个领域中社会和阶层不平等（Lieberthal 2004: 112）。

2004：112）。

针对再生产约束硬化而实行的分权化的第二次摇摆：文化大革命（1966－1976）

权力再分配：破坏党中央和国家机关、消灭对手

通过在机构上废除网络和他的意识形态对手，毛泽东解除了网络内抵制以及这种抵制所导致的冲突。依靠军队支持和动员群众，毛泽东废除了中央国家官僚机构；实际上也废除了政党官僚机构，消灭了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对手。不稳定的结构是脆弱的，无力抵抗毛泽东反对政党和国家科层的全面运动（相反，在同一时期的苏联，赫鲁晓夫在强有力的制度化权力结构中采取温和措施去反对斯大林化、实行权力再分配，却失败了）。

中央的文化大革命小组（CRSG）取代了总政治部，在人民解放军中也成立了类似的小组，由中央委员会的文化大革命小组负责监督。干部作为一种体制很可能在派系斗争的压力中崩溃。在此期间，党领导废除了从前在各种经济系统中负责人事任命的部门。由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小组（由毛泽东的妻子江青领导）成员及其同盟等少数几个人控制的特别安排（ad hoc arrangements），取代了中央委员会机构（Shambough 1992：154；Burns 1989：xvi-xvii）。

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提倡其个人崇拜，与军队形成同盟，动员城市青年（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工人）。这些集团首先被引导去反对大学行政部门，其后是反对政党和国家机关、中央计划，对中央的政党、国家、军队组织以及北京市党委的对手和意识形态竞争者进行人身攻击。[1]

群众参与在1967年1月之后达到高潮，当时他们在毛泽东派政党领导

---

[1] “1966年8月，在政治体制顶层串连好了他的文化大革命联盟后，毛泽东发动红卫兵去攻击政党。大部分红卫兵是城市高中生和大学生。毛泽东下令关闭学校，却不让学生回家。他鼓励学生成立红卫兵集团，引用当时的训词，去‘革命’、‘与修正主义做斗争’、‘揪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推翻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个当权者，破旧立新，炮打司令部。同时，他指示所有高层领导不要镇压红卫兵，而要与他们面对面，给他们答复”（Lieberthal 2004：113）。

层的逼迫下，对整个权力结构发动了一场空前的全面进攻，以从“资产阶级掌权者”手中夺回权力。红卫兵和“造反派”参加骚乱，占领政党指挥部和政府大楼，驱逐并且在许多时候用手铐抓捕政党和国家官员，使政党和政府当局陷入瘫痪，在社会公共秩序中制造混乱。在没有军队和警察干涉的情况下，他们毁坏了旧文化，屠杀他们认为会实行抵抗的人（Chang 1976：182－183；Lieberthal 2004：113）。

到1966年底，由红卫兵和毛泽东的宣传队所导致的制度混乱和个人崇拜，不仅为毛泽东罢免其对手铺平了道路，而且为他消灭旧的集权化结构铺平了道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仅政党和国家机关，而且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权都遭到了严重侵蚀。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没有召开，在1967年早期所有省级职位都被军队有效接管，中央拥有任命所有省级官员的权力（Diao Tianding，Chen Jialin and Zhang Hou’an 1989：87－88；in Huang 1996：91，fn. 2）。

攫取和分配能力的分权化

对权力分配的另一个冲击——在许多方面是持久的——是对资源分配和攫取的管理。负责投资协调、监测和计划的中央经济机构遭到最严重的破坏。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员减少到五十人。统计局被并入国家计划委员会，作为它的一个统计部门。建设银行系统被撤销，并入中国人民银行（PBC）。在1969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仅有12个职员负责监督投资基金管理，在全国大约有2600个职员负责这类业务，相比之下，文化大革命之前共有17000个职员负责这类业务。结果，中央政府完全失去了其运行控制：不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控制地方层级的计划和结构投资项目。在1967－1971年的3年当中，财政部没有任何地方投资支出的记录（Huang 1996：65）。

从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发生了一次为时更长的资源分权化。例如，在1966年，小企业所生产的钢铁、水泥、化肥、煤炭和农用机械都由地方来分配（Huang 1996：37）。

在1970年，大约2400个关键企业再次转交给各省经营（Huang 1996：37），干部体制崩溃了。在1970年代早期，由于意识形态原因，以及不能控制经济运行，导致剩下的中央行政部门开始把大量的投资决策（分配）

权力下放到地方。财政部的折旧基金管理被重新分配给企业及其监管机构（1967 年开始，1971 年完成）。基金的重新分配使地方监管机构大大受益。这是因为存在着相应的企业从而攫取能力的分权化（Huang 1996：65）。

在 1970 年代初，数以千计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被交回给地方政府控制（Wong，C. 1985；Sun 1997：13；Granick 1990：39－44）。而且，在 1970 年代，地方政府（尤其是省级政府）越来越热衷于创建由其控制的新国有企业，并把这些国有企业的产出用于本地。结果，国有企业部门内的总投资中，地方的固定投资所占比重由 1969 年的 14% 上升到 1970 年代后期的超过 40%。在那些年中，新增了大量的中小型国有企业。由于不可能把这些国有企业纳入中央计划结构，导致建立了多层次、基于地区的体制，从而把许多计划和协调职责转给地方政府。在 1970 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对许多小型的、科技含量低的投资项目进行投资管理[①]（Sun 1997：13）。

随着攫取和分配能力增加，地方能够为它们自己的项目提供资金。在 1974 年，为了认可地方政府日益增加的投资责任，中央正式拟订了一个划分投资管理的计划。在这一安排下，投资组合中约 40% 由中央政府管理，约 30% 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剩下的约 30% 由地方政府管理（Huang 1996：280）。

建立另一种结构

在权力争夺的同时，形成了另一种结构。成立了一个所谓的联合领导层，由群众、军队和老干部的代表组成。这些领导们在革命委员会里一起工作（Lieberthal 2004：114；Riskin 1991：186）。

尽管攫取和分配能力分权化了，但互联线和科层内依附线的层级是不清楚的。在中央、省和省以下地方政府，存在很大程度上的行政控制重叠。而且，也存在多重的、重叠的指挥链：不同层级的政府管理着企业经营的不同方面（Huang 1996：280）。互联线的层级不清，企业在国家官僚机构内有多重从属关系，把持多个职位，共同导致模糊的依附性和经济混

① 例如，油田维护，商业流通网络的基本建设，对农村工业进行投资补贴，当地政府对此提供融资，负责监管。

乱。而且，由于运输中断、工人纪律性松散、统计机构遭到实际破坏，共同导致了经济停滞（Lieberthal 2004：116）。

使分权化了的权力分配制度化，让红卫兵复员

到1968年底，资源攫取和分配能力已经被分权化。红卫兵四分五裂，然后相互敌对，使国家面临国内战争的威胁。内部不稳定与外部威胁同时存在。借鉴勃列日涅夫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原因，这时存在苏联入侵的潜在危险。苏联可能已经认为入侵中国的时机到了，因为中国在政治上变得不稳定，且背离了所期望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些因素可能促使毛泽东试图重建被破坏的政党、为许许多多的干部平反，这在1970年代初加快了步伐。

毛泽东号召军队重建秩序，建立另一种结构，把红卫兵送到遥远的农村，到那里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激进的红卫兵领导被迫去执行这一决定，1800万（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1200万）红卫兵被派遣到遥远的乡村。这一替代性结构的基础在于军队及其在每个政党和国家机关中的政治工作部网络的互联线（Chang 1976：175）。人民解放军的三位元帅被提拔到政治局，可靠的军团被调到北京（Lieberthal 2004：113）。在1969年春，执行文化大革命的中央委员会文化大革命小组被废除，它的18个成员中有13个被肃清（Riskin 1991：188）。

> 于是，人民解放军实际上接管了中国的行政管理，军代表进驻了所有重要的学校、工厂、医院、剧院和其他城市工作单位。[……] 人民解放军有权控制经济、政府、警察和社会单位的管理，但是这又导致军队各个层级上的紧张和政治冲突（Lieberthal 2004：5 116）。

当时，最高层领导间的派系斗争和阴谋普遍存在，直接聚焦于病中毛泽东的继承人问题。毛泽东的潜在竞争者是林彪和周恩来——二者都想把自己的妻子提拔进入新的政治局，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原来就是政治局委员。据说林彪组织了一次阴谋反对毛泽东的行动，但在实施之前就暴露了，他死了（当试图逃往苏联时飞机坠毁在蒙古）并受到舆论谴责。1973年，邓小平重新得到毛泽东的重用。在毛泽东逝世前的三年中，周恩来领

导的“温和派”与江青领导的“激进派”之间展开了拉锯战，毛泽东则在他们之间进行平衡。温和派在总体上控制着政治系统的执行机关，而激进派控制着宣传和文化机构，两派在不同时期交替地占据上风。在严重的内部冲突期间，出现了政策路线的迅速改变，有时镇压反对激进派的群众游行，有时镇压反对温和派的运动。1976 年 1 月，周恩来逝世，8 个月后毛泽东逝世，10 月，激进派头子被逮捕并受审（Lieberthal 2004：118）。

1977 年，中央政府收回战略性部门中大多数大型企业的控制权，首次尝试逆转行政分权化，在混乱中恢复秩序（Huang 1996：37）。然而，这时候，新打造的权力结构是不可逆转的。对从前分权化了的攫取和分配能力进行重新集权化的努力失败了，因为在从前结构的暂时性崩溃、实际消灭对立利益的时期，新的权力模式有足够的时间去实现稳定。

12.5　结　论

维持和变化的具体历史证明了 IPS 模型的有效性。它使我们有机会通过时期选择以及与模型动力相互作用的这些不同个体因素的累积，考察这种结构与超出模型范围的大量个体特征[①]之间的相互影响。

我们可以利用三个政党－国家的历史在以下方面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比较：网络内再生产约束硬化和凝聚力松弛，以及较大聚合体的上级单位或国内重大意外因素。在对这些案例进行比较的时候，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同组合显示了有趣的结果。

在那些案例中，我们从时间上比较了两个相似的案例（罗马尼亚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中期），尽管上级单位和网络中的意外条件不同，但是相似的集权化战略带来了相似的成功结果：结构现状和领导者个人权力得

① 例如：领导者的动机、性格、战略、死亡、更替，国内或莫斯科共产党，权力斗争及解决策略，宏观政策，意识形态，国家规模和版图上的差异，地理政治位置，体制形成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阶层化水平，政治条件和此前的历史，历史和文化传统，追求强制性工业化的原材料条件，对外贸易中的开放性——受影响程度。这同样适于较大和较小聚合体层级，等等。

到了稳定。在另两个案例中（中国在1950年代中期和1960年代中期以后），目的在于行政分权化（而不是提高凝聚力）的在时间上的相似战略，导致了结构的解体和暂时崩溃：首先是削弱了领导者（指毛泽东——译者）的地位，其次是暂时强化了领导者的地位。两个再生产约束硬化的案例发生在较大聚合体内在空间上的相似条件下（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但一个结果是巩固了初始模型（罗马尼亚），另一个结果却是暂时性崩溃和模式转变（匈牙利）。在第一个案例中，自由化被用来消灭对手和集中权力；在第二个案例中，自由化则巩固了对手的地位并导致崩溃。对于匈牙利和中国这两个案例，尽管存在不同的条件（有较大聚合体或没有较大聚合体），但是两个结构在内部权力斗争中都出现了暂时性崩溃。然而，在匈牙利案例中，支持改革派领导的自发群众运动促进了这种发展，尽管保守派努力维持这一结构；而在中国案例中，是毛泽东为制服潜在对手而发起的群众运动促进了这种发展。匈牙利案例中保守派失败的原因，恰恰是中国案例中毛泽东成功的原因。同时，尽管内外条件截然不同，但是两个国家都导致了模式转变。但是转变后的模式是不相同的。

在自我掠夺型模式中，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具有不同结果的自我相似性以及具有相似结果的差异性，都是由于这种模式中相对较大的机动空间，从而个体特征和个体战略具有更大的作用。较大聚合体的存在和动态运行、依附关系的强度、通过依附关系而发生的相互作用的实际强度，在不同程度上限制或促进了这些因素。

苏维埃集团的较高聚合体中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政党－国家体制，是被强加的而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相对中国来说，其空间相对受到更多的限制，在中国不存在这些因素。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政党－国家体制暂时获得了自下而上的巨大的机动空间。斯大林逝世以及赫鲁晓夫上台之后苏联国内的权力斗争，使注意力从成员国那里转移开，苏维埃集团的凝聚力变得更加松散。更松散的凝聚力加强了特定单位自上而下的潜在机动的内在特征。

赫鲁晓夫在国内巩固了他的权力之后，便开始通过强制性劳动分工（资源攫取和分配）来恢复苏维埃集团的凝聚力，而这种分工对罗马尼亚是不利的。德治并不想退出这一较大聚合体，他利用个体特征在苏维埃集

团框架内获得了更大的讨价还价能力和抵制能力。这些个体特征包括：一方面，国内领导层而不是莫斯科派领导层，在中苏关系破裂中相机行动，迎合民族主义、实现凝聚力的反苏联立场；另一方面，假装实行自由化，积极参加镇压匈牙利的革命，从而与赫鲁晓夫的政策保持一致，这样便可以掩饰集权化、消灭潜在对手，同时，发展与西方的贸易关系，弥补国内资源和苏联资源的缺失，以便推行莫斯科不赞成的强制性工业化。因此，在较大聚合体内增加对莫斯科的抵制能力的相同因素，也立即促进了在国内恢复网络的凝聚力。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便允许以一种未改变的形式来软化网络的再生产约束。

当德治逝世时，罗马尼亚开始经历又一次动荡冲击。在这一事件发生的时候，正逢莫斯科出现剧烈的权力斗争（最终导致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苏联领导层变化导致罗马尼亚在苏维埃集团内面临不利劳动分工的压力上升。罗马尼亚在较大聚合体内的形势恶化的时候，其国内再生产约束也开始硬化（导致凝聚力松弛）。这是由于强制性资源调配的偶尔限制以及领导阶层变换所导致的政治不稳定性。尽管这些不利因素在积聚，但是齐奥塞斯库还是实现了权力稳定、结构恢复以及自我再生产约束软化。齐奥塞斯库所利用的工具与德治曾成功实施过的工具非常类似，只不过实施力度大大加强。这些策略性工具如下：暂时性自由化，通过假装的分权化来掩饰集权化，基于反苏联立场的民族主义，西方的资源和政治支持，向发展中国家开放以便在有利的条件下提供更多资源。当权力稳定下来之后，从前伪装的集权化策略便转变为公开的手段。

在匈牙利，自我掠夺型模式在1950年代中期就完全形成了，再生产约束硬化，凝聚力丧失和权力斗争迫使暂时的优先权摇摆，政策路线在强硬路线者与改革派共产党之间经常变化，激起了越来越多知识分子和公众的不满（支持自由主义领导），最终导致公开起义和网络暂时崩溃。公开起义被镇压，自由化和不稳定的领导者（liberalizing and destabilizing leader）想通过切断互联线和宣传中立来退出较大聚合体，但是上级单位（指苏联——译者）废止了这种企图，并给匈牙利强加了一位新的领导者。新领导层的战略反映了匈牙利以和平方式再次融入较大聚合体，依靠它并在它的强制下消灭了对手和不稳定要素。部分地通过在过去战略错误及其经济

政治后果中吸取教训，部分地通过与赫鲁晓夫的自由化战略、政策路线和优先权保持一致，匈牙利建立了新的权力结构。新结构的建立基础在于集中控制资源的攫取和分配、控制主要经济领域、控制和整合主要经济利益，实现方式包括强制性集体化、农业合作社的相互联结和合并、工业企业及其反馈的相互联结和合并、从制度上抑制过度个人权力和个人崇拜的潜在可能性。

在斯大林逝世时，中国的网络仍在形成过程中，网络外突变与网络内再生产约束硬化没有相遇。毛泽东是国内的共产主义者，不是被苏联强加的领导者，而是合法的领导者。斯大林的逝世，不仅促使毛泽东试图取代苏联在社会主义共同体中的领导地位，造成中苏之间在国际领域里的权力斗争升级，从而中苏关系破裂，而中国对莫斯科的经济和技术依赖性是毫无疑问的。并且，斯大林的逝世也导致了中国加快网络建设步伐——集权化、扩张和深化——尽管苏联不赞成。强制性资源调配所导致的，就像在其他两个国家一样，首先引起了优先权暂时转变，促进了局部性自由化和知识分子的批评。但是，不稳定的外部和内部因素的迅速积聚，导致毛泽东改变了策略。这些因素包括：允许批评地方和中央行政权力，权力冲突导致外部突变有可能加剧再次出现的权力斗争，在苏联、波兰和匈牙利的反斯大林化和局部崩溃使群众不满公开化，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揭露了斯大林主义的本质面目。自由化被行政分权化（大跃进）所取代（尽管苏联不同意），赞成自由化和集权化的那些人被镇压和肃清，因此更加依赖地方领导。行政分权化是可操控的，这是因为毛泽东由于集权化而获得了更大的机动空间，因为集权化的结构刚刚形成，还没有稳定的既得利益集团抵制分权化，因为由战争时期的农民政治干部组成的地方领导们赞成增加其攫取能力和分配能力。分权化与基层工业化运动结合在一起，以实现和赶超工业化社会。将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的做法被体制动态运行所强化，这一方面导致过度投资和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导致经济灾难、饿殍遍野，从而导致了整个体制的再生产约束硬化和凝聚力松弛。在凝聚力恢复之后的攫取和分配能力的再次集权化是有选择性的（与形式相符的），这种选择依赖于地方政党和国家领导层在分权化时期所获得的不同讨价还价能力。再者，这种选择还依赖于不同的经济

子域：在工业生产中，实行严格的网络集权化，在自我再生产最为困难的农业中，实行网络局部撤离，容许出现自留地和商品买卖。

集权化的工业和农业从危机中恢复使毛泽东更加担心他的地位会受到削弱，因为这种危机源于他从前的经济政策失误，而网络从农业中撤退却导致了经济复苏的成功。毛泽东担心中央行政和小农阶级的右派偏离，阶级斗争和群众的革命教育的停止，集体主义削弱，总之是担心偏离社会主义道路。他试图发起运动纠正偏离，但屡次失败，因为中央政党和国家机关、地方政党和国家机关、小农阶级中的既得利益和抵制使这些运动与形式相符。借助于政治局下设的文化大革命小组的群众运动，在军队以及由城市青年和革命造反派工人组成的“红卫兵”群众运动的支持下，毛泽东摧毁了中央政党和国家机关、地方政党和国家机关、文化机构，并消灭了个人对手。在摧毁机关的同时，毛泽东实行了企业、攫取和分配能力的分权化，并在军队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替代性结构，该结构渗入从前由政党占领的所有机构。经济混乱所导致的派系斗争再次出现，期望的领导权继承使经济陷入混乱之中，中央的再生产约束硬化，激进派或改革派的轮换统治导致经济政策摇摆不定。在毛泽东逝世以及改革派战胜激进派的时候，这种分权化的结构及其既定利益有足够的时间来实现稳定。

在这一章，我们证明，自我掠夺模型的个体特征对该模式的形成、恢复和变迁的影响，指出了具体结构的特征和体制特征如何与这些行动相互作用。接下来我们将证明，这些模式特征如何促进和谑除个体特征，导致模式特有的自我再生产行为和工具，以及体制特征的影响。

13 运行：实施与结构相符的自我再生产工具

在这一章，我们将描述新的模式中与结构相符的工具的发展，以及幸存下来的最初模式中传统工具的维持。IPS 模型预测，每种模式将迫使自我再生产工具适应特定的权力分配，而那些不符合该模式的工具必须在形式上适合权力关系。我们将描述罗马尼亚被恢复和稳定了的自我掠夺型模式，它促进了权力的进一步集权化和强制性资源调配。在匈牙利，新的权力模式在 1960 年代后期如何迫使引入资源调动型改革，在中国，新的权力模式在 1970 年代末如何推动资源创造型改革？这些资源攫取工具如何被强制去适应这两个国家的结构模式？这种适应的具体迹象是什么？在较大聚合体中，这些过程如何阻碍或促进这种调整？

13.1 历史背景

赫鲁晓夫被政治局的保守派对手降职，留下一个再生产约束硬化的体制，他的激进式改革措施和集团网络中纪律松散搅乱和动摇了其中的利益关系。到了 1960 年代中期，许多官员和市民都认为改革后的、局部地反斯大林化的苏联陷入了危机。经济短缺、通货膨胀、过度饮酒、离婚率上升、孩子蛮横无礼，所有这些都表明政府再也没有能力管理、更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社会（Cohen 1986：124－125）。对于较大聚合体来说，苏联帝国显然正在变成一个经济负担。对于苏联来说，发挥区域霸主的作用与拥有集团中最大的国内市场和最丰富的自然资源，二者显得越来越不相称。

这恶化了苏联在集团内的贸易条件（Bunce 1985）。随着越来越多的卢布贷款扩展到弥补东欧贸易不平衡，低质量的东欧商品被运往苏联以交换苏联的原材料和能源。结果，苏联供应的初级产品大大减少，苏联再也难以实现硬通货贸易（Bunce 1983：147）。

用我们的话说，勃列日涅夫在国内网络和集团的较大聚合体中都遇到了再生产约束硬化，因为苏联在这两个领域的攫取能力都变弱了。于是，集团国的吸引能力变强了。针对再生产约束硬化，勃列日涅夫（不管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开始模仿匈牙利模式。他把赫鲁晓夫从前支持和反对的利益都融入网络，以稳定中央权力。结果，一个来自经济领域的密集的反馈网络，包围了互联线和科层依附性。除了反馈之外，结构稳定性也被政党和国家机关中几十年之久的稳定地位巩固了。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经济更加复杂，社会要求更高，还有赫鲁晓夫时代残留的冲突。所有这些因素在1964年把苏联推向一种利益调解模式：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直接融入政策过程，同时增加政府福利以培养群众支持，从而实现冲突最小化和生产率最大化（Bunce 1983：131）。

战略性领域的选择——与赫鲁晓夫压制和削弱“传统”利益、支持新利益的方法相反——符合从前享有特权的阶层的利益，因此没有激起抵抗。[①]在网络内和聚合体内再生产约束硬化（由于攫取能力弱化）的条件下，勃列日涅夫努力实现了稳定化，从而把苏联的自我掠夺型模式转型为一个自我解体型模式。

勃列日涅夫所建立的自我解体型模式对强制性资源攫取具有巨大的内部抵制能力，很快就要求实行与模式相符的措施：资源调动型（分权化）改革。在1965年，通过网络内分权化实行了经济改革，以便资源调动型改革“提高资本使用效率”（Bunce 1983：141）。关于苏维埃集团（较大聚合体），苏联开始分权化分配负担、增加压力，以提高攫取。最终在1960年代后期，苏联开始在更大共同体内把国防负担分摊给成员国，并通过提高

① 这里我们不得不削弱模型的这一理论预测，即模式转变必然发生在网络暂时崩溃之后。看来由于混乱环境（由于再生产约束自上而下地持续硬化和在集团内持续硬化），导致避免崩溃和稳定结构的措施的相互作用、领导的实际的机动空间、个体战略、实际条件，可能促进自我掠夺型模式中创造反馈而不发生暂时崩溃。

出口原材料的价格、对区域劳动力分配施加压力来促进攫取。根据 IPS 模型，东南欧将成为苏联经济的腹地，而其他成员国将专业化于劳动密集型的机械和消费品生产。这使苏联可以使用和出口本国原材料来交换高技术产品（Bunce 1983：139－140）。

然而，国内攫取手段和集团内攫取手段很快失败了，必须面对国内和集团内的持续抵制。在国内，它导致来自具有更多反馈的传统部门的更加有选择的分配的更大压力。这导致在农业和其他抵制干预的能力更弱的部门再次实行集权化、硬化再生产约束。在更大聚合内，苏联的攫取努力显然没有导致剩余（生产率）的大规模增加，而剩余增加是国内社会各界的共同愿望（Bunce 1983：142－143）。原因不仅在于存在抵制，而且在于可供攫取的资源太少，因为集团成员国在国内的处境与苏联一样。它们也想得到更多资源和原材料，也需要迎合公众偏好以保持稳定。然而，稳定是至关重要的。集团凝聚力的松弛导致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不稳定，导致匈牙利引入自由化经济改革，导致罗马尼亚面临地区自治的压力。为了对这一失败进行补偿、增加资源以供国内分配、想办法从集团负担中获得减免，苏联越来越依靠从两个网络外攫取资源，而不是改变现状。在集团内获得减免、降低分配负担的理想方式看来是跳出网络到国际领域，并鼓励集团成员国向西方开放。这样，苏联便可以在集团内减少原材料分配，增加硬通货出口，实现国内分配目标。“于是，转向国际事务不只是回避国内冲突；它也是勃列日涅夫资助社团主义事业（corporatist deal）的唯一选择”（Bunce 1983：145）。勃列日涅夫对意识形态贸易导向的放松，迎合了集团内从属单位的实际利益，或者是因为像罗马尼亚那样的合理赤字，或者是因为像匈牙利那样的从内部攫取资源的日益困难。集团国具有从网络外部吸引资源的驱动力，而西方银行此时正好需要放贷。从便宜的石油美元累积的贷款，暂时减轻了所有单位的资源需要和苏联的分配负担，个体模式的再生产约束得到软化。

在这一时期的罗马尼亚，德治逝世了，齐奥塞斯库接管了政权。在外国资源的资助下，齐奥塞斯库的权力稳定化导致了一个文化和经济领域的自由化时期。权力稳定化以及政治领域内可逆转的假装自由化，没有伤及自我掠夺型模式。再者，在罗马尼亚，文化自由化逐步地与保持政治制度

的集权化特征相结合。在权力稳定化之后，与模式相符的工具被恢复，来自网络外的资源维持了罗马尼亚的强制性工业化。在匈牙利，这些工具适合了稳定化了的模式：通过分权化而实行的资源挖掘型改革，根据反馈而实行的有选择的分配与外国贷款累积和有选择的分配交替进行。直到1970年代后期，这些措施容许在模式内保持权力分配、经济增长、生活水平稳定上升，而再生产约束没有明显硬化。在中国，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以及随后的对“四人帮”审判，为重建支离破碎的政党－国家结构清除了障碍。然而，网络的恢复只是反映了从前稳定化了的权力分配。而且，稳定的内部抵制能力——由于分权化了的攫取能力、强反馈、分权化了的互联线——经常导致宏观层面上的再生产约束硬化，以及与形式相符的资源调配和资源挖掘型改革。通常，再生产约束硬化导致许多事情都需要上级批准——由于有选择的再分配硬化了较低层级的再生产约束——导致下级有更大动力实行开放，在国内网络外和国外网络外寻求替代资源。

13.2　罗马尼亚1965年之后的持续集权化

罗马尼亚的改革意图随着权力稳定化很快就淡化了。用我们的话说，分权化改革根据权力关系迅速与形式相符了。

在提倡改革的每一个其他领域，只有那些不打破现有权力关系的变化才被实际执行——罗马尼亚仍然是一个经济受到最严格控制的国家之一。1970年代初，改革实际上被废止，集权化在没有潜在抵制能力的情况下增强了（Crowther 1988：84）。

不必要像1960年代末那样作出妥协，齐奥塞斯库和他的支持者完全可以从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开始，让罗马尼亚重新获得全面发展。计划的年度投资增长率为11.2%。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增加到34.1%，而1969年为28%（Spechler 1983：37，referred by Shafir 1985：121）。

在1972年7月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全国大会上，政党领导们以狂热的

最终姿态号召在四年半时间内完成整个计划（Fischer 1989：177）。随着这些变化，罗马尼亚官方报道的增长率大致为其他东欧国家的两倍。积累率上升到32% - 34%之间，到那时为止是经济互助委员会中最高的。目标是以最快的速度把罗马尼亚转型为发达工业国家（Crowther 1988：102）。

放弃改革努力、加速生产计划，同时通过网络重组而实行机构上的进一步集权化。在1960年代，假装施行民主措施，而实际上把政党和国家科层内的决策以及互联线都集权化了，从而发生了权力朝着集权化方向再分配。发生于1970年代的进一步集权化则有所不同。1970年代集权化的特征是，除了在政党和国家科层内进一步集权化之外，还采取各种措施公开合并现有的政党和非政党机构（或创造融合性机构）。类似地，我们可以追溯融合政党和国家职务（由同一个人担任）的措施。从齐奥塞斯库家族成员所担任的职务可以看出，采取这些措施的时期也发生了私人关系与官场关系的融合。

政党和国家科层中连续不断的网络集权化

引入干部轮换体制以“积累个人经验”

各级政党领导的轮换开始于1971年2月，一直实行到整个1980年代，利用这种体制，可以把官员在中央与地方政党机构之间进行调换，也可以把官员在政党与政府机构之间进行调换（详情参见 Nelson, ed. 1981; Nelson 1981: 226 - 227, referred by Shafir 1985: 73; Gilberg 1990: 96 - 99; Fischer 1989: 191）。这一工具可以保持齐奥塞斯库的下属不至于长期服从一个机构而累积太多的权力，这也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采用过的措施。因此，可以平缓地阻止地方利益的制度化。它也使齐奥塞斯库有可能消除身边的强势人物，避免他们成为潜在竞争者。这些措施有助于在行政机构内消除对实施1971 - 1975年五年计划的抵制。[①]

通过融合的高层机构实行机构权威的集权化

① 在1969 - 1973年间，33个部级单位中只有5个保持未变，在1971 - 1973年间正式宣布轮换制之后，至少13个政党领导被从布加勒斯特调到地方任职（Crowther 1988：89）。

1972 年，罗马尼亚共产党全国大会决定通过融合的高层机构实行机构权威的集权化，把这“作为降低行政平行关系（parallelisms）和提高政策实施效率的一种方法”。在理论上可以证明这一政策能够增加直接的“无中介（unmediated）”民主（Crowther 1988：90）。新成立的机构要正式推动“政党在社会生活中的组织一体化”，促进群众参与。[①]事实上，它们只不过进一步把中央和地方的决策过程并入融合了的较高层级组织，置于政党的直接控制和参与之下。[②]

例如，中央层级的融合是最高工人参与组织（supreme participatory workers' organization）——工人控制经济社会活动的中央委员会（the Central Council of Workers' Control Over So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创立于 1972 年）的目的。该组织由工人和具有政治奉献精神的专家担任职员，其特殊职能是对商业和生产进行直接监督，以确保完成发展计划。实际上，它们处于上级政党团体的直接控制之下，对这些政党团队负责。因此，它们可以作为补充的、有力的机制，通过这些机制，上级政党领导可以调动和控制“公众活动家”，“评论企业管理者的行为：不论他们是政党干部、管理层干部，还是工会干部”（Crowther 1988：100）。

融合机构的另一个例子是由齐奥塞斯库任主席的经济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该委员会必须向齐奥塞斯库领导的国务院和内阁汇报工作。在 1973 年，该组织变成主要的政策制定和监管团体。它接管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一些职能。联合政党/国家的领导们，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通过内阁，制订和审查了一份蓝皮书计划。该蓝皮书宣布，统一的全国社会经济计划必须包括最小的经济部门，“任何人无权进行计划外的建设”（Shafir 1985：122，参考曼内斯库 [Manescu][③] 和齐奥塞

---

① 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 1971 年 11 月全体会议决定促进大众民主改革（Crowther 1988：100）。

② 这样的机构有全国科技委员会、国防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中的问题委员会、社会经济发展最高委员会、工人控制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央委员会（Crowther 1988：90）。

③ Manescu，1961－1972 年任罗马尼亚外交部部长，1967 年担任联合国全体大会第 22 次会议主席（这是第一次由共产党担任这一职位），1989 年领导了罗马尼亚的改革运动，2000 年 6 月逝世。——译者。

斯库在这一时期的声明）。作为重新改组的一部分，全体行政职员都被大大裁减，下属经济单位的计划自主性受到限制。技术与物资供应部被赋予了检查资本使用的更多权力，中央计划者再次控制了投资（Crowther 1988：103）。

地区层级的机构融合

1975年，在大国民议会和地方层级的人民政务会（Peoples' Councils）引入多个候选人之后，各地党委书记也变成了当地的阵线主席。同时，阵线辖区单位的执行办公室的人员被并入政党和人民政务会的办公署（Shafir 1985：96 97，参考 Nelson 1982：87；Nelson and Winter 1982）。

通过监督庇护组织对非政党职能实行接管和制度化

在政党内建立了庇护组织，直接受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它们在科学和文化领域具有广泛的自由决断权。这些组织取代了有关国家机关的职能，以便政党实行更严密的控制。[①]政党内新成立的基层组织据说成了1970年代初发起的新的反知识分子运动的结构背景。这是对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技术和文化精英的一次打击。[②]（Crowther 1988：97）。由于这场运动，导致政党内的知识分子代表减少了。禁止传播与齐奥塞斯库不同的观点：文化机构遭到攻击，抵制齐奥塞斯库政策的意识形态方向的那些中央和地方政党领导，全部从权力职位上被降职或撤职（Crowther 1988：98）。

通过选举改革实现政党的深入渗透

由于大量的“参与”革新，1975年引入了多个候选人选举，以便为大国民议会席位提供代表。大国民议会本身是一个融合的机构，因为中央委员会政治执行委员会（PEC）的所有成员和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和候选

① 例如，新的科学院创立于1970年，直属于中央委员会，作为加强控制传统研究院的替代方式（Fischer 1989：176）。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委员会创立于1971年，取代了控制文化和大众传媒的文化艺术国家委员会。1974年通过了一部出版法——适于所有的大众传媒。该出版法的使命是贯彻和加强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政策（Fischer 1989：184）。1975年，国家委员会下令创建一个新的出版印刷委员会，直属于中央委员会和部长委员会。这一新机关有权禁止任何被视为非法材料的出版和发行，有权批准出版和发行，控制印刷等方面技术设施的采购（Fischer 1989：185）。

② 在研究和管理部门，数千经营和技术专家被视为威胁或日益阻碍了中央领导权，因此被解雇，调至更具“生产性的”岗位。

人成员，都是大国民议会的候选人。[①]政党在该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密切监督由政党控制的社会民主党和全国统一阵线所组织的提名和选举。这一过程使齐奥塞斯库能够平稳地从大国民议会中撤掉他不喜欢的那些共产党员。地方人民政务会也引入类似方法，在群众组织提名的多个候选人当中进行挑选（Almond 1992：68；Crowther 1988：100；Fischer 1989：233－238）。

经济利益向中央委员会集中

为了加速重工业生产，通过增加战略性企业向中央委员会的反馈，最重要的经济利益被置于更紧密的政治控制之下。尽管在1969年只有2%的人从事生产活动，[②]但是到了1974年，给予中央委员会的经济反馈增加了，这一比率上升到9%（Fischer 1989：203）。增加的经济反馈自然使对战略性经济领域更加容易实行更紧密的政治控制，也更有可能方便当选者的利益提升，促进强制性的再分配路径。然而在这一时期，最高行政职位的轮换被加快；技术人员成千上万地被派遣到更低的职位；齐奥塞斯库增加了对政党和国家机关的个人控制，决策权力实际上在1974年就被掏空了，这些条件使得通过它们的反馈和可能的关联变得非常不稳定，造成集权化干部管理中更大的依附性而不是利益提升可能性。

通过减少中间组织而实行集权化

国家科层内决策的进一步集权化发生在1973－1975年间。在1974年，1960年代中期建成的工业中心被减少了一半。剩下的工业中心并入部级管理组织或大型国家级企业（Crowther 1988：101）。在1973年和1975年，政府再次集中了对外贸易决策权。由中央分配的产品急剧增加（从1973年的180种增加到1974年的720种）。1974年的计划禁止没有中央机构特批的分权化投资和进口，为每一种进口产品都设立一个专门的办事处。工业企业和地方下属单位的数量也被减少（Shafir 1985：121，referring to Jack-

---

① 在多候选人选举期间，约40%的大国民议会候选人（占在候选人的76%）落选了。但中央委员会的限制性执行委员会成员都被提名并选举到大国民议会，只有9%的候选人落选（Fischer 1989：233－238）。

② 1969年，中央委员会所有成员中约80%是政党或国家官员，大多数在县级或县级以上，15%的人在科学和文化领域，5%的人在军队中（Fischer 1989：203）。

son 1977：891）。

中央委员会内部个人权力的集中

组织变化不仅有助于进一步集权化和权力融合，而且有助于职能、职位的集权化和融合，以及职员增加。

（1）**中央委员会职能的集权化**。在1974年第十一届党代会召开之前，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在提高效率的名义下被废除（Shafir 1995：74）。根据1974年初中央委员会预备全体会议的决定，新办公署应该包括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共和国主席（齐奥塞斯库）、中央委员会的所有部长、总理以及几个其他国家和群众组织的领导。但是，在政党第十一届代表大会上接受了新的规定：从政治执行委员会中只选出5个人。新的常务办公署向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负责，而不是向中央委员会负责。该办公署的人数更少、年龄和阅历更年轻，根据改变了的从属关系，它意味着对齐奥塞斯库潜在挑战更小了。它实际上变成一个私人顾问团，而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地位的单独实体（Fischer 1989：213；Crowther 1988：89）。

（2）**政党和国家最高职能中的职位融合**。1974年，齐奥塞斯库担任共和国主席一职，因此不再担任1967年以来一直担任的国务委员会主席。在较高层级，政党和国家的一把手仍然融合为他一人担任。齐奥塞斯库通过设立单独的主席顾问办公室，并把一些很有声望的人物安置在那里，使他在国家科层中的个人权力得到大大强化。该办公室发展为一个重要的决策场所，包括实际上得到主席信赖的官员，以及从该办公室调到书记处、内阁或政党主席职位的官员（Shafir 1985：74）。常务办公署、书记处、国务委员会和内阁都是由齐奥塞斯库控制的法定团体（Fischer 1989：213）。

（3）**战略性国家职能与融合职能的累积**。除了1965年担任第一书记、1969年担任总书记之外，齐奥塞斯库还在1967年担任国务院总理，在1967－1974年间担任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海陆空三军总司令（Crowther 1988：68）、社会经济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Crowther 1988：103）、全国劳动人民委员会主席（Shafir 1985：99）。[1]

---

[1] Shafir所列举的齐奥塞斯库的职位，涉及1984年常务委员会成员的国家和融合职位（Shafir 1985：99）。

1974 年，他成为共和国主席（Akadémiai Kislexikon 1989）。

家族接管：私人子域与官方子域的融合

融合、集中和集权化的职位逐渐被齐奥塞斯库的家族成员占据和积累。仅次于齐奥塞斯库的政党和国家最高职位落入他的妻子手中。[①]齐奥塞斯库的儿子占据了几个高层职位，[②]齐奥塞斯库夫妇的两个家族中近 25 个成员都占据了另外一些高层政治职位。[③]

“开放”网络、获取资源以保持软自我再生产约束

在自我掠夺型模式中，机构权力的进一步集权化，为网络内进一步攫取资源铺平了道路，在该网络内不存在有意义的内部抵制能力。单位和个人缺乏抵制能力不仅仅是结构性的。在机构和个人等各个社会层面上都布满了秘密侦探（Deletant 1995；Pacepa 1989）。

被攫取的资源用于出口，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材料，以保障钢铁和炼油工业的全面增长，[④]，交换机器和工程产品。用农业和工业原材料与西方交换工业制成品和技术（Crowther 1988：140）。

亲近西方

为了与西方建立关系，罗马尼亚共产党启动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架桥（bridge-building）”项目。在第 5 个五年计划时期，罗马尼亚与法国和西德签订了长期技术合作和贸易协议。与西方建立桥梁关系可以追溯到

---

① 齐奥塞斯库的妻子埃琳娜·齐奥塞斯库（Elena Ceausescu）于 1972 年 7 月被选入党中央委员会，1973 年 6 月被选入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1977 年被任命到政治局执行委员会常务局，1979 年成为第一副总理和国家科技委员会主任，1988 年成为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干部任命委员会主任（Fischer 1989：171－173）。

② 尼库·齐奥塞斯库（Nicu Ceausescu）在 1973 年成为全国学生会主席、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成员。1975 年，他被选入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然后进入共青团的中央委员会秘书处作为办公室成员。1979 年，他成为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然后在 1982 年成为正式成员；1980 年成为国家议会代表，1983 年成为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相当于一个部长，1984 年成为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治执行委员会成员。

③ 内政部政治委员会秘书，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副主席，国家农业和食品工业委员会秘书，中央审计委员会成员，国防部常务副部长，副总理，全国工会副主席，等等（Crowther 1988：118－119；Shafir 1985：74－81）。

④ 1971－1978 年间，来自农村的净移民率是前二十年的年移民率的近两倍，甚至大大超过最初集团化运动期间的移民率（Crowther 1988：105）。

1959年，在1964年由于类似原因而获得了动力（Crowther 1988：61，133；Georgescu 1991：459；Giurescu and Fischer-Galati 1998：164）。

然而，两种情况下的重点有所不同。齐奥塞斯库把德治的倡导发展为一个核心战略。1971年，罗马尼亚变成关贸总协定（GATT）成员国。[①]为发展工商业，罗马尼亚1971年开始与西方建立联合公司（Georgescu 1991：464）。1972年，罗马尼亚成为加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罗马尼亚作为第一个向西方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声望大增。结果，美国1975年把最惠国待遇扩展到罗马尼亚（CrowLher 1988：136）。

再者，即使开放的目的不是为了自由化，但是如果罗马尼亚能够与西方——特别是美国——联合起来反对苏联，那么后者也完全愿意容忍罗马尼亚的独裁主义政治。西方更加愿意接受齐奥塞斯库的外交政策，[②]是因为齐奥塞斯库政权在努力脱离莫斯科，而这种"民族主义"路线必然涉及国内改革和自由化（Gilberg 1990：100-101）。齐奥塞斯库充分利用每一次公共论坛强调非干预的必要性，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本国经济政策的权利和义务（Fischer 1989：137，138）。这样，他在国外满足了西方的期望，在国内迎合了民族主义情感和"围攻心理（siege mentality）"（Rady 1992：121）。机动操作使齐奥塞斯库能够放出流星火焰般的工业目标，获得低息贷款，进口高技术产品。

与西方经济建立联系本身就是保持国内和谐的一个必要因素，它容许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层在1970年代初稳定地（即使缓慢地）增加消费，同时还保持工业化的快速步伐，而不需要推行经济改革（Crowther 1988：137，referring to Tsantis and Pepper 1979：175）。

亲近发展中国家

1976年，罗马尼亚宣布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Crowther 1988：139），并得到"七国集团"的承认。结果，自1974年开始，它从发达国家的普

---

①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② 1970年代末，欧洲和美国承认他鼓吹西方民主方面的政治价值：迪斯尼乐园荣誉公民，法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奥地利、西德和英国向他颁发的国家和皇家奖章（详见Gilberg 1990：100-101）。

惠制（General System of Preferences）中获得好处（Shafir 1985：112）。而且，齐奥塞斯库在国内和外交政策上采取了几个步骤，"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事务"，成为发展中国家最主要的声音。他广泛发展重工业和加工出口的基础在于，从兄弟发展中国家以低价增加石油进口，用罗马尼亚的低级、过剩的机械品去交换。罗马尼亚与最不发达国家发展关系在直到1975年仍然是有利的，当时，布加勒斯特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平衡中仍然——至少在官方——显示了巨大盈余（Crowther 1988：139；Shafir 1985：114；Gilberg 1990：117－118；Radu 1981）。

参与世界市场提供了技术和资金，使罗马尼亚超级集权化的经济机制更长时间地幸存下来，否则这种机制也许早就失灵了。因此，这对于罗马尼亚共产党避免其他东欧国家所采取的改革并尝试一种非社会适应性的战略，起着关键的作用（Rady 1992：145）。

用我们的话说，增加从网络外吸引资源的能力，就有可能在软再生产约束下资助自我再生产，而完全不需要在网络内实行重大的结构改变。这也有可能同时增加罗马尼亚在较大聚合体中的抵制（苏联）能力，因为它获得了替代资源。

网络的极端集权化、内部缺乏对攫取的抵制能力、强制性资源调配以及国外资源供给，使罗马尼亚在1976年之前实现了显著增长（Crowther 1988：104）。总估计GNP增长率在1965－1970年间为4.6%，在1970－1975年间上升到6.2%（Shafir 1985：109）。在第5个五年计划期间，总投资的83%被分配到生产性部门，其中有50.3%是用于工业。钢铁、机器制造和化工等行业占全国投资的比重1960年为28%，1975年增加到46%（Crowther 1988：101）。实际工资、消费和农业也实现了增长，但没有达到计划的速度，而工业投资目标被超额完成了（Crowther 1988：104）。

然而，实现目标的代价是使经济极端地**受制于**对外贸易、对外贸易和外部债务的外部变化，更一般地说就是极易受到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事实证明，难以处理的正是这些变化。

13.3 匈牙利分权化改革的发展（1968－1979）

先占驱动力（Preempting drives）

到了1964年，不仅在权力部门实现了机构上和政治上的稳定性，而且通过机构和组织结构、职位和减少轮换（low rotation），也实现了权力部门内部在机构上和政治上的稳定性（Petö and Szakács 1985：371）。从1957年开始，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改进成为经济政策的内在部分。赫鲁晓夫外交政策越来越偏向于相互竞争、在苏联国内和集团内反对政治对抗，进一步推动了匈牙利的经济增长。

赫鲁晓夫认为应该结束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角色，因为社会主义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应该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在二十年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基础上使经济增长达到并超过西方的水平。这种观点被中国大跃进时期的发展进一步强化，有力地影响了整个东方集团（特别是在匈牙利）的中长期经济政策战略、计划协调及其向上修正（Petö and Szakács 1985：376－433）。

因此，紧缩和适度调整经济的措施，[①]只是暂时性的（Berend 1974：95；Berend and Csató 2001：302）。关于经济管理自由化的改革思想被搁置了好几年，而保守路线获得了推动力（Petö and Szakács 1985：3 40－368）。到了1958年中期，一贯的经济发展战略，全面发展工业，来自苏联方面的、对农业重新加速集体化的新的动力，都走在最前头（Berend and Csató 2001：302）。新的大规模投资，继续完成多个未完成工厂的决策，对反馈经济利益的贪得无厌的要求，很快就超出了最初计划的负担。尽管在部门之间保持了更加平衡的投资分配，以及GNP中积累率下降，但是压力仍然指向加快增长速度。由于集团内传来的战略意图，导致经济扩张步伐在

① 例如，简化但维持原有中央计划和价格制度的那些措施，从1957年中期开始废除农业中的义务转移和强制性集体化，等等。

1959年进一步加速。为适应20年集团计划，发展速度又被进一步向上调整。[①]保持发展适合国内特征的最初计划被忽视了。但是，新项目受到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劳动分工条件的限制（Petö and Szakács 1985：391-400）。投资在GNP中的比重再次增加，损害了消费。对外贸易出现赤字，西方债务超过年出口，增加的债务中绝大多数是短期贷款，以履行经济互助委员会中的国家间协议。随着债务存量增加，匈牙利也开始陷入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债务关系中（Berend and Csató 2001：307）。到了1960年代中期，整个集团和每一个集团成员国的再生产约束都硬化了。[②]用于加快全面工业增长的资源被耗竭，经济增长速度——以及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倾向——下降了，最终导致强制性的投资削减、更加严格的选择，从而缩小了享有特权者的范围（Petö and Szakdcs 1985：394，408-409；Berend and Csató 2001：307）。

除了用“传统”工具[③]针对再生产约束硬化作出通常反应之外，凝聚力的松弛使保守派更加愿意接受改革思想，使改革派路线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同时，苏联方面对集团内稳定性的需要使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在再生产约束硬化的时期，先后都更加宽容集团成员国内的改革主义倡导。[④]这些国内条件和集团条件增加了匈牙利的机动空间。在这样的环境下，匈牙利社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于1964年12月10日决定实行一种新的经济规制：

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根据（经济）条件的要求及时调整当前的经济机制（包括计划、金融、价格体制和物质激励）。主要目标是更有

---

① 计划在1960-1980年间，GNP增长四倍，工业生产增长五倍，农业生产增长两倍以上（Petö and Szakács 1985：391-400）。

② 关于社会主义集团中投资周期的动态变化，参见Bauer 1986，关于计划周期，参见Soós 1987。

③ 例如，求助于经济和部委领导的责任心——社会主义意识，反映问题的决定，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工作纪律的决定，得到更多合法推断的支持，提高标准，削减劳动力，检查库存，反对经济和官僚机构中铺张浪费的期望姿态，对私人小企业提高税收（Petö and Szakács 1985：412；Berend and CsatO 2001：308）。

④ 根据“市场社会义”路线发起类似的改革正在酝酿，在这一时期，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已经实行，而苏联正在争论中（Berend and Csató 2001：310）。

效地使用国民经济的生产要素，增加企业自主性和责任性，抑制官僚主义（Petö and Szakács 1985：412－413）。[①]

从那以后，权力分配的稳定特征**开始**更有力地**形成**自我再生产工具。

机构调整

网络内重组，以分开政党与国家决策

根据1966年末的党代会决议，政党机关要取消在政党与国家活动之间的重叠部分，减少干预。[②]除了强调需要规范管制之外，政党领导还采取实际行动来加以贯彻。他们根据重组后的国家机关的模式来转变中央政党组织的内部结构，把重点放在职能部委而不是直属部委。中央委员会的直接干预分支部门被取消，由经济政策部代替，以便促进更规范（非干预主义）的管制体制。就任经济管理者职位的干部必要条件也被重新评价，重点考虑的大多是经济专家。[③]因此，在理论上，首先考虑的是职业适合性，其次再是政治忠诚和思想纯洁。

引入新的经济机制（NEM）

1968年1月1日开始全面的经济管理改革，用“有指导的市场模式（guided market model）”取代中央行政模式或“指令性”模式。新经济机制建立在间接管制的基础上，[④]辅之以总体上的规范。后者意味着所有经济行为人必须考虑的宏观管制（例如，税收、工资管制、企业收入分配、信贷政策标准等）。目的是在国家科层内把决策权下放到企业，增加企业自主性，强化市场作用，使企业适应市场。这种改革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行政

---

① 以Rezsö Nyers为首的专家集团，在中央委员会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领导下，被授权制定这一方案，要在1966年初之前呈交给中央委员会（参见the results in CC Document on the Reform of the Economic Mechanism 1966）。

② Resolutions of the 9th Congress of the HSWP, November 28 to December 3, 1966. “The further strengthening of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party”（1968）. *Resolutions and documents of the HSWP*. 1963－1966（Budapest：Kossuth Könyvkiadó）, 561, 560, and 562.

③ 同上，563.

④ 间接管制意味着中央不再用个性化的规则来指挥个体经济单位，而采用与整体经济有关的总体原则和调解手段——规范。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5月25－26日会议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会议记录中，详细解释了这些原则和调解手段（Budapest：Department of Canvassing and Propaganda, HSWP CC——stored by M. Cs.）。

管理和企业管理的行为模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然而，这些自由化和分权化改革嵌套于网络的制度框架中。这些条件决定了实施过程和所采纳工具在形式上快速适合了权力分配的流行模式。根据政治理性标准，通过熟悉的依附和利益提升渠道引入和运行新经济机制（Csanádi 1984）。历史文档证明，通过网络的惯常相互作用没有发生变化。早在 1968 年 2 月的第二个星期，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一份报告，描述了为监督下属企业执行而在各个分支部委建立的执行委员会（operative committees）实施新经济机制的最初运行情况。分支部委还要向新成立的中央委员会经济政策部汇报工作，设立该部门是为了处理规范性的任务。[①]通过各级政党科层中一周一次的"思想汇报"，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地区党委还要像部委那样进行同类的考察。[②]

再者，随着间接管制的引入，那时已经产生的反馈变得更加重要。没有了直接指令和强制性计划，改进资源吸引和干预的可能性的动机，促使政府更加看重选择标准和抗辩者，以强化和增加反馈。除了更早的反馈可能性之外，还出现了无数的新变型（Csanádi 1980；1984）。综上所述，该网络的自我相似性结构及动态运行特征——干预和抗辩的强制性、选择标准——仍然保持原样。

与形式相符的过程

实施改革导致了可喜的经济绩效。1966－1970 年五年计划的目标被超额完成，市场——即使受到紧密管制——纠正了从前（自我掠夺型）模式的一些扭曲。供给大大改善，产品品种也增加了。食品不再短缺，消费品短缺迅速缓解。[③]国民经济增长率和生产率都上升了。结构变化使经济部门的生产更加平衡（Berend 1990：190－193）。随着西方对匈牙利经济的积极评价，许多短期西方贷款被转为长期贷款，以支持结构变化和现代化（Bozzai and Farkas 1989：17）。

---

① 参见 Népszabadság, February 11, 1968, "Report to the CC Economic Policy Department on the reform of the economic system", MMMI, August 1968 (stored by M. Cs.).

② Experiences surrounding the reform implementation. Dated December 16, 1968. 15th district's committee of the HSWP (stored by M. Cs.).

③ 这一点尚不清楚，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功于新经济机制或者增加的西方进口。

在实施分权化的标准改革措施的同时，改革者还将大量的特殊工具——临时性免责（exemption）——融入与结构相符的管理体制。安全舱口（Escape hatches）有助于企业逐步地适应市场条件，以便在内部供给和社会主义贸易急需[①]方面弥补行政约束[②]。

再者，为了逐渐引入以及在那些利益攸关者的压力下，在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几种“违规（breaks）”：集中分配劳动力和资本，集中规定工资界限，中央与分支部门之间协商确定工资计算方法。中央大致地确定贷款优先领域。根据中央政策指示，通过国家控制的和国有的批发商分配最重要的原材料（国内的和进口的）和部件。超过中央规定数量的，要经过中央批准。由分支部委来执行企业发起的或地方党委协调下的合并，这为受偏袒的企业提供了人力和新的固定资产和投资途径。中央政策的优先权决定了哪些企业的中长期计划要纳入国家计划考虑当中，以改进这些企业的发展能力。中央发起和资助的长期技术发展规划，确定了可能包括哪些企业。在改革过程的第二阶段，这些违规和免责中有许多都将被取消。[③]

然而，在引入新经济机制期间必然出现矛盾，企业间的收入差异，经济单位内各职位之间的收入差异，很快发展为政治张力。政党通过互联线和反馈可以直接感觉到压力、抵制和不确定性，很快引起了政治反映，各级政党机关敦促分支部委实行干预，以弥补企业的再生产约束硬化。[④]

经济管理政策必须面对规范管制与需要紧紧控制企业管理之间的张力，这进一步强化了对企业事务采取行动和干预的必然性。企业、地区和较高层级的政党机关经常向部委反映不满，这种不满十有八九会刺激部委的干预。作为一种反应，官僚机构内批条子（circulated memorandums）和

---

① 这种情况下的紧急需要是指，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基于双边协议而同意交付的数量。

② 对于个体的、特殊的补贴以及引入这些补贴的原因，详见 Csanódi 1980。

③ 当局认为，随着引入可兑换货币、增加适于自由价格制度的产品、接近世界市场价格、打破垄断和拆分大型企业、资本流动、劳动力流动等，它们会逐步消失（Berend 1990：194 - 198）。

④ “Resolution of the 10 Congress of the HSWP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arty and on its thr ther tasks”, November 27, 1970, in *Resolutions and Documents of the HSWP*. 1966 - 1970（Budapest：Kossuth Könyvkiadó）, p. 697.

命令迅速增加，容许被选择的个别企业偏离规范的管制（Csanádi 1997b）。

然而，不仅分支部委和政党机关认为必须实行这种特殊的、个体性的管制，而且财政部也被迫进行类似的干预。他们在干预的时候不顾以下事实：价格、收入、成本和规范管制的扭曲，恰恰是他们自己提供的补贴所产生的影响。他们也谴责保护企业免于市场竞争的补贴（Deák 1972）。但是，由于得到反馈的企业及其“法律顾问（solicitors）”的抵制和吸引能力，中断补贴分配的每一次尝试都失败了。废除的补贴再次出现，免责打破了一般规则，分配仍然遵循从前的路径来进行，以适应讨价还价的能力（Csanádiné 197 1980；1984）。

政治和经济管理中的保守派的声音强化了这种机制。保守派力量正在更大企业内依靠并加剧工人对企业内、企业间和分支部门间收入差距拉大的不满（Berend 1990：201－231）。

暂时的、特殊的免责和违规（根据讨价还价能力和有选择的照顾）的做法很快就在网络内扎根，在决策体制中越来越盛行。如果营利性很低，那么就有可能从中央政府获得免责和补贴（Deák 1972；Csanádiné 1979；1980；Antal 1985）。进一步，如果企业被认为赢利过多，就有可能被征收特殊的税。在借款人不满足贷款要求或还款标准的情况下，仍然有可能得到贷款。中央确定的优先贷款是如此细致，以至于其中绝大多数直接安排给受偏爱的经济单位。中央甚至允许一些企业不经过批发流通环节，直接从生产者那里采购。有特权进入国家计划的那些企业消息灵通，并可以对国家计划框架内确定的不可避免的未来管制、投资战略、分配目标造成影响或提前准备（Csanádi 1997b）。总之，再生产约束对一些企业仍然是软的，而对另一些企业却变硬了。

1970年代初，不仅资本、产品和人力流动显示了对损害规则进行个体化干预，而且1968年引入的部分自由的价格形成也越来越受到中央条件的约束。[①]这些干预被市场观念证明是正确的。[②]到了原本决定1972年开始的

① “The effects and curbing of price movements (1968－1974)”, Document of Price and Sales Tax Department, Ministry of Finance, 1974: 11 (stored by M. Cs.).

②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producer price system”, report of the National Materials and Price Office, 1972: 59 (stored byM. Cs.).

改革第二阶段（Berend 1990：200），稳定化了的模式及其动态运行减缓了（absorbed）改革，与模式相符的资源攫取和选择性分配工具已经得到发展，并变成制度化的了。

被软化的结构自我再生产约束，通过稳定化了的与模式相符的手段，受到反馈、要维持现状的那些行为人的压力，被保守派增加的张力，以及集团内社会政治稳定性的压力，导致了改革过程的暂停。结果，卓有成效的改革者被降职，保守派政策再次占据主流。改革在形式上适合与模式相符的自我再生产工具。[①]

与模式相符的选择性软自我再生产以及与形式相符的自我再生产工具

表11列出了1970－1979年间的再分配工具、再分配目标的特殊性质、再分配标准。该表格还显示了企业中的这种动力根据结构模式特征导致了什么样的有选择性。[②]

对匈牙利再分配在1970－1979年间的10年期分析（详情参见Csanádiné 1979；1980；1995；1997b），考虑了该时期内所发展的几种资源分配工具。各个中央部委、办公署和国家银行运用了这些工具。这些经济政策、财政货币工具和准货币工具直接或间接被用于获取资源（人力、产品和资本）。这些工具包括：补贴，贷款（以及在这些贷款中投资所要求的自有资本比率），参与中长期国家计划的特权，对被选择的企业实施更严格的统计监督，在长期技术发展计划中的关键企业，绕过批发商、直接从生产者那里获得原材料供应，以及企业的集团化（合并）。[③]我们考察和分析在1970－1979年间，这七大优势在大约450家机械工业企业中的分配

① 制度化与形式相符最明显的迹象是政府对“密切统计监控”的50家战略性企业的选择和界定。选择是政治性的，基于中央委员会1972年11月的决议，以及之后经济委员会1973年1月的决议（Szalai 1983；Csanádi 1997b）。

② 30张图表附录更详细地显示了以上结果，Csanádi 1997b。

③ 匈牙利的调查资料是基于企业统计数据、银行报告、财政部数据和二手资料（区别对待由于不同原因而入选的企业的部委和政党通知）。我还使用了以下备忘录：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委员选举（包括企业经理和他们的附属机构），地方（县和区）党委和执行委员会集团的选举（包括企业经理和他们的附属机构），部委报告（显示其地区分布的企业的名单和地址的出版物）。我也得益于与政党官员、政府官员和经济管理者就选举和整合标准问题而进行的几次会谈。

情况。

表 11 暗示着政治理性标准如何造成以上特权在企业间有选择的分配。它显示了在匈牙利具有吸引能力的那些企业的特征，以及缺乏吸引能力的那些企业的特征。总之，它指出了企业层面上再生产约束的有选择性。

企业分组的标准是基于初次访问的经验和档案分析。分组标准为：

（1）大、中、小企业（分别为 I.、II. 和 III.）。

（2）在任何一级政党决策科层上，企业管理者有或没有被选举的政党职位（如果有这一职位为 P +，如果没有这一职位为 P -）。

（3）是否是企业总部所在地的最大企业（如果是最大的企业为 R +，如果不是最大的企业为 R -）。

表 11　被选择的机会与具有不同特征的各组企业间讨价还价能力差异：机械工业 1970 - 1979　（%）

Slze - groups	P + R +	P + R -	P - R +	P + R -	P +	R +	R -	P -	N	Ch%
I.	90.5	74.3	64.3	40.8	84.0	85.0	54.8	46.0	43	68.1
II.	42.9	36.3	36.3	27.7	43.5	38.1	30.4	28.9	119	31.6
III.	—	—	—	1.4	—	0.0	1.4	1.4	291	1.4
Enterprise No. (N)	20	20	20	386	47	40	413	406	453	-
Chances % (Ch%)	78.6	36.4	36.4	8.6	65.0	57.5	11.6	10.0	-	15.6

符号 N：该组中的企业数量；Ch（机会）：该组各个企业得到的特权数量，除以该组所有潜在可分配特权数量乘以该组企业数量。

表中数字通过指出某组企业得到的特权与获得以上七种特权的可能性之间的比率，反映了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如果某组满足以上所提到的任何一个政治理性标准（I.，P +，R +），那么它就可以经常分配到特权（与平均值［15.6］相比）。如果满足这些标准中的任意两项，那么获得特权的机会更大，如果同时满足这三项标准，那么获得特权的机会几乎为 100%。

结果指出了根据融入网络的不同程度以及特定国有企业在中央和地方的不同战略重要性而实行的体制性选择。企业满足的标准越多，获得以上

大多数特权的机会就越大。

根据这些标准进行重复分配，指出了相互交织的经济和政治领域，意味着一个体制性的政治理性选择。它反映了网络内正在形成一个基于政治理性选择标准的工业结构，也反映了再分配的固定路径的特征，在这些路径上，（根据融入体制的程度）有选择的软再生产约束普遍存在。而且，它显示了根据权力关系而在形式上与资源分配措施相符的模式。

它还揭示了经济单位努力适应分配标准和期望的原因，以及尽可能地融入权力网络的原因。这些驱动力明显地强调了本书第一部分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努力实现增长、储存资源、积累反馈，都是为了更好地提升利益和实行更有效的抵制。

在微观和宏观层面都存在资源调动、资源攫取，以及经济政策决策的与形式相符。这甚至体现于明显的分裂症（schizophrenic），但是在现实中，这体现于决策者与体制相符的政治理性思维模式，例如，在制定新的总体规则的时候，要同时认真考虑如何对付要求例外的那些行为人。运行（攫取和与形式相符的分配）的相同结构性特征，在各个组织和机构的行为模式中可以得到反映。一方面，为摆脱分配负担、迫使企业适应市场条件而取消企业补贴的反复的——反复失败的——努力，经常地但只是部分地、暂时地中断了与模式相符的再分配过程。另一方面，为了攫取更多资源、弥补企业间日益增大的收入差距（减少大企业的收入），政府开始征收个体生产税（individual production taxes）。公开的目的是要集中企业“太高的”或“不应得的”显著收入，因为这部分收入被认为来自国家管制转变、操纵、利用市场漏洞，而不是产品质量改进。那些接受反馈的企业的抵制和吸引能力，以及网络内的选择标准，重新建立了通常的再分配路线（Csanádi 1980；1987：173，Fig. 3.3；Falubíró 1981）。

上述结构和行为特征说明，再生产约束在宏观层面周期性硬化的原因在于：有选择的软再生产约束、选择的驱动力，以及紧缩政策和投资周期（Bauer 1986；Soós 1987）。它们还形成了在网络内调动新资源的驱动力，以及随后根据权力分配而与形式相符的过程。然而，从 1972 年到 1970 年代末，再没有发生重大的资源调动型改革。在农业和工业（部分在网络外）中，基于国有基础设施和直接发展网络，有过创造补充资源的微小努

力。尽管满足个体利益的所谓次等经济快速地渗入网络，但是它的“过量（excesses）”一直受到限制，在体制崩溃之前一直被限制在模式范围内（Gábor and Galasi 1981；Gábor 1986）。

13.4　中国资源创造型改革的发展（1978－1994）

新模式中政党－国家结构的恢复

决策集权化、恢复中央机构和实行党政分开的措施

在结构内从自身上废除以前潜在抵制、偏袒较低层级的过程，在替代结构中逐渐形成了通过分权化的攫取、分配和反馈来发展新的抵制能力的机会。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前，权力再分配及其制度化过程已经发展到不可能逆转的程度，形成了新的模式。

1977年，新的中央领导（包括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者和以陈云为首的中间派）开始从事网络的恢复工作。特别地，这意味着重建政党和国家的高层机构，以及其中的互联线。这些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恢复中央控制，实现政党与国家责任的分离，[①]加强政府的集体决策讨论。中国共产党逐渐恢复了人民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较低层级引入、在较高层级要求直接的多候选人选举（Senger 1985：194）。[②]国有企业中的革命委员会被废除，军队的结构性角色被解除并被撤回总部。政党宣布不再把政治运动作为一种动员工具，从而废除企业党委会的主要职能和机构制裁措施（You 1998：90）。

重建中央政权包括：第十二届党代会决定大大减少省级常务委员会委员的数量，从而降低省级领导（被选举的职位）的反馈可能性（Shuhfan 1987：28－29）。禁止行政职位的累积：官员不能在担任政党委派的职位的同时，还在其他官僚机构中担任多个行政职务（Shuhfan 1987：21，28－

① 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出版于1978年12月；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Shuhfan 1987：25）。

② 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1980年1月正式生效。

29；Senger 1985：193）。[①]而且，在 1978 年，55% 的政党官员被替换（Huang 1996：109；Li 1998：394）。随后，在 1980 年，进入党代会的党代表选举开始引入无记名投票，而在党代会上选举党委委员也引入了无记名投票，这导致政党领导的个人权力下降。在投票过程中，候选人数量必须超过预定席位的数量。直到 1981 年，700 个县、市和行政区根据这一程序召开了党代会（Senger 1985：191）。在干部体制中再次引入了“向下两级责任（two-levels-down responsibility）”[②]。这种措施涉及互联线相对的再次集权化，从而政党权力的再次集权化（Burns 1989：xvii）。

从邓小平恢复中央政党机关的方式中，我们可以察觉到把政党与经济分离的运动。在从前被废除的部门中，只恢复了组织部和宣传部，而没有恢复与经济活动有关的经济政策部门、经济分支部门。不仅从组织和互联线的角度，而且通过法律手段来限制政党的活动。被采纳的新修订的宪法在党章（Party Statute 1982 年 9 月 6 日）和宪法（1982 年 12 月 4 日）中也可以得到反映。它要求政党不能超越宪法秩序的框架（Senger 1985：195）。

还有其他的党政决策分开的重要运动：政府权限内的所有决策，都要由国务院和/或各级人民政府讨论和制定。各个政府实体不必等待来自本级党委党中央的指示。党政分开运动在司法体制中也较为明显：1980 年正式宣布，废除由党委会审查和批准法庭决策的惯例（Senger 1985：193）。

然而，对经济的渗透并没有停止：直接通过保留下来的干部职责、组织和宣传工作，通过企业内和其他非政党组织中党员的党纪（Shuhfan 1987：28－29），来实现这种渗透：

> ［政党可以］严格监督和控制工作在［……］非政党组织中的党员。党委会可以向他们直接发出指示。党员要服从这些指示。通过党纪可以确

① 例如，上海市党委书记，除了是政治局委员之外，还担任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席，南京军区政委，上海市委党校校长，上海市中国人民顾问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卫戍部队司令部第一政委（Shuhfan 1987：22）。

② 在“逐级向下责任制”情况下，某个特定政党组织负责其下级的组织、活动和职位。如前文所述，在“向下两级”情况下，它的责任范围中增加了一个受到控制的层级。

保党员的服从（引自 Senger 1985：195）。

容许忠诚的党外人士占据重要职位，只有干部才能实行政党的控制，这或多或少弱化了非政党组织中党员的严格监管（党章第36条，1982年4月）。

不仅非政党机构中的职位结构和党员资格，而且经济活动和组织结构，都被互联线间接地环绕：在中央、较低层级的非政党机构、经济组织中保持政党组织的稳定，国家机构中政党的核心集团仍然没有被触动。地方层级出现了同样的发展：根据中央指示实行党政分开，但没有恢复省级和省级以下党委的经济部门。然而在实际中，他们仍然全面控制属于他们辖区和政府部门的经济（2000的访谈）。保持企业党委和干部责任、维持非政党机构内与政党核心集团和党委之间的互联线，意味着保持政党组织的互联线能够直接延伸到经济活动，间接地通过企业所属的那一级政府延伸到经济活动。

因此，通过中央和地方政党机关的责任，以及直接地和间接地重叠非政党机构内的职位、组织和活动结构，在中央和地方层级恢复了政党、国家与经济之间的互联线。[①]而且，尽管邓小平一直努力把政党从经济和行政决策中分离出来，但是，在国有企业层级，党组实际上仍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拥有决定每一件事的权力。[②]

所有这些措施都在恢复网络，同时在网络内实行权力再分配，把权力从省级政党集中到中央（集权化），从政党集中到国家（Senger 1985：193）。然而，通过恢复主要要素和关联原则，恢复了熟悉的运行原则。因此，从国家和经济中分离出政党活动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

尽管在中央层级重建了网络，恢复了运行原则，但是，文革期间稳定

---

① 到1987年，地方政党组织在特定地点还在组织上遵循了经济分支，以便更好地监管和控制政府组织中分支部门，管理经济活动（Lieberthal and Oksenberg 1988：343）。

② 从1978年开始直到企业法的最终通过，其中费时几年，经历了几次上下波动，企业法将企业定义为一个经济实体，确定了经理的领导角色，以及在管理、政治、经济问题的单独责任，这限制了企业党委的权力（You 1998：47－56）。

下来的特殊权力分配模式仍然没有根本改变。稳定的权力结构抵制了重大变化，尽管由于一些反馈和互联线被废除，攫取目标被集权化导致它们在制度上或多或少有所弱化。然而，在第十一届党代会召开的时候，其他领域又建立了新的反馈，当时，所有省委书记被选入中央委员会，[①]因此增加（保留）了他们的吸引和抵制能力。

然而，不仅决策权的再分配，而且旨在从地方层级重新集中资源的努力，都受到了稳定了的新模式的挑战。在经济上，1970 年代末留给改革派领导的是 1980 年代初的分权化投资体制、分散的资源基础、高度分权化的工业结构（Huang 1996b：67）。中央政府直接拥有 83000 家企业中的 3%（Wong，C. 1986：585），国有部门工业总产出的 9%（He and Wang 1984：6，参见 Huang 1996：37）。中央领导试图在网络内重组攫取分配能力，以实现中央的利益。然而，财政重组在从前发展并稳定下来的权力关系中遇到了障碍（结构性约束）。

通过资源目标集权化来调配资源

首先是以有利于中央的方式对资源目标（企业）的从属关系实行再分配。这一运动发生于 1977 年，当时中央政府重新控制了战略性部门（能源、钢铁）的大多数大型企业。接下来，在 1982 年和 1987 年，中央在石化、汽车、非铁金属工业建立了三个全国性的公司，在这一过程中，这三个部门的企业从属关系被再次集权化。然而，总而言之，再次集权化没有超过 25% 的工业产出（Huang 1996：37）。

随着战略性企业从属关系的集权化，政党不仅在战略部门再次集中了战略性投资（分配）决策，而且再次集中了地方的部分攫取权限。而且，这一运动直接影响了这些企业的互联线向部委党委和中央委员会部门的再次集中。

然而，除了直接从企业收入中获得新的攫取来源之外，对于集权化的

① 从 1954 年到 1977 年，越来越多的省党委第一书记成为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或预备委员（他们都参加了 1977 年第十一届代表大会）。自 1950 年代末以来，许多政治局委员同时也是省委书记，或者从前是省委书记（Goodman 1984；1986；Huang 1996：10）。

战略性企业还出现了新的反馈机会——抵制和资源吸引能力。对于中央下属的国有企业（其领导本来就是中央委员会委员，或者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及其干部（除中央委员会委员之外）由中央委员会管理的那些企业，都出现了有选择的讨价还价能力（Burns 1987：40）。因此，资源调配努力在形式上是符合权力关系的：它们软化了接受反馈的国有企业的再生产约束，从而强化了中央再分配资源的固定路径，导致中央的再生产约束硬化，刺激中央努力实行进一步攫取。

从中央对网络外吸引来的资源进行分配的有选择性，也可以看出这一与形式相符的过程。早在 1977 年和 1978 年，国务院就提倡通过增加石油出口来放松对使用外国资本、大规模进口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以降低成本的限制（Lieberthal and Oksenberg 1988：211）。在 1979 年，最高领导决定在许多工业中通过吸引外国投资、向外国企业提供成立合资企业的机会，来寻找外国资本和技术。[①]合约签订于 1983 年，建立合资企业的制度基础结构已经具备了。在 1979 年，最高领导还决定接受外国贷款以改进海上勘探。1981 年，中国加入世界银行，可以获得低息贷款和管理帮助，以便提高沿海开采技术（Lieberthal and Oksenberg 1988：223）。与形式相符被“批准”，因为这些行动集中于政府再次集权化了的、有能力施加快速发展压力的战略性部门（Lieberthal and Oksenberg 1988：213）。

资源调动型改革与资源调配的与形式相符

从 1978 年开始，通过战略性企业（攫取目标）的从属性质的集权化而直接调配资源，以及从网络外吸引资源的同时，还采取了进一步的资源攫取措施。资源调配努力与资源调动型改革结合在一起。财政责任（分配负担）的分权化和偏向中央（攫取可能性）的新的收入分成计划，与调动资源的自由化改革结合在一起。

向地方政府和中央下属企业连续地引入了几个收入分成计划（Wong，C. 1991；2002；Hoffman 1998：17－43；Li and Xiang 2002）。在实行收入分成计划的同时，还实行了全面价格自由化，把财政责任（开支）向地方政

① 引入法律和条例与国外资本和合资企业有关（参见 Lieberthal and Oksenberg 1988：259－260）。

府和国有企业分解。这些行动旨在增加国有企业的效率和地方预算自主性，从而调动可攫取的资源。

然而，攫取能力向中央的再分配，责任向较低层级的再分配，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没有恢复对中央的均衡。中央在政府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下降，从改革前 10 年的平均 50% 降到改革后 10 年的平均 28%（Walder 1995b：280）。自我再生产工具或者在形式上直接符合权力模式，或者在面临抵制或相反政策的情况下不能付诸实施（Naughton 1996：128；Huang 1996：86 – 87）。对改革的以下批评明显地反映了与形式相符的过程：

> 尽管已经发生了广泛的、重要的财政分权化计划，但是，财政合理化计划的每一个要素都被挫败。要素价格没有改革，产品价格没有重新组合，投资机制没有改革。增加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也没有成功，因为大多数企业仍然非常有效地从属于官僚机关。从改革合理化的角度来看，[……]，这一过程已经失败了（Naughton 1996：135 – 136）。

与形式相符一般被认为是自由化改革的失败，它的产生是由于较低层级的权力关系和自我相似动机——有选择的软再生产约束和增长的驱动力。该体制的结构和动机特征一方面造成并硬化了中央的再生产约束，而另一方面，在被选择的省和属于较低层级的具有更大讨价还价能力的国有企业当中，推动了通货膨胀和过热投资。

尽管中央作出了努力，但是从 1981 年到 1984 年，中央与地方投资活动之间的比率增加到有利于地方政府，通过这类事实我们可以揭示与形式相符过程的结果。不需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的投资越来越多，进一步提高了这一比率（Huang 1996：68）。这是由于有选择的地方政府再生产约束软化。可以通过以下事实来追溯其原因：在 1979 – 1984 年间，地方政府积极参与专业银行的地方支行，[①]致力于扩张地方的工业能力（Huang 1996：37，

① 到 1983 年，国有部门投资的 15% 来自银行贷款，45% 来自企业自留资金（Naughton 1996：128）。

41）。同时，价格自由化允许价格上涨，二者通过收入分成协议都增加了地方收入，由于体制动态运行而推动通货膨胀和地方投资扩张（Hofman 1998：21）。

根据模式特征，在整个结构再生产约束的频繁硬化中可以揭示出以上自我相似的动态运行的结果（Bachman 1991：222；Wong，C. 1991：693；Qian 1996：436；Qian and Roland 1998，1155）。在短暂的紧缩时期（强制性资源调配）可以观察到这一现象，这些时期随着网络内短暂的资源调动型改革的实施而变化，而这些改革由于自我相似的动态运行而导致了过度投资和通货膨胀压力（Huang 1996：130）。在紧缩之前，由于未实现的期望、通货膨胀、较低层级的投资过热、腐败等改革副效应，导致了改革派路线弱化。于是，副效应有力地支持了强硬路线者，导致机构改革和经济改革的与形式相符的紧缩和暂时回撤（Tong，Y. 1997）。

从1979年开始，中国政府在1979年、1980年、1981年、1983年、1986年、1987年、1989年、1990年、1991年决定实行紧缩政策。在采取这些行动之前和之后，都出现了通货膨胀时期：1977年、1978年、1982年、1984年、1985年、1988年、1992年（Huang 1996：14，127－175）。频繁的紧缩和放松意味着改革者在网络特征内的机动空间受到限制，但是对于保守派来说也是如此。再生产的动态运行说明网络内对中央攫取和紧缩措施存在很强的抵制能力，对中央有选择的分配和自由化存在很强的吸引能力。[①]这种与形式相符的过程是中央和宏观层面聚合体的再生产约束频繁硬化的原因。再生产约束的频繁硬化，为反复紧缩以及紧缩后制订越来

---

① 我正在用间接证据来支持以下观点：结构中权力分配决定讨价还价能力。由于企业的从属关系以及企业内的从属关系，所以，攫取能力分散在不同层级，从属企业的规模随着行政层级降低而下降，有选择性比在匈牙利更加复杂性，在匈牙利，企业的从属和攫取是集权化的。基于此结构，在同一层级不同讨价还价能力的行政单位中，普遍存在有选择性：沿着逐渐降低的行政单位的科层层级，沿着逐渐降低的从属于这些不同层级的企业的规模，沿着从属于每个行政单位的企业的讨价还价地位。在此方面的启发性证据，参见 Goodman 1984；Huang 1996：10，252，Table 11；Li and White 1998：231－265；Cao refers to McKinnon 1994：73－93；Walder 1995a：273；Wildasin 1997：1144－1145；Csanádi and Lai 2003。

越偏向中央的新的收入分成计划提供了新的动力。[①]

再生产约束反复硬化还导致了在实行自由化的同时，反复出现分配负担及其目标的分权化的驱动力。它还导致中央分配的目标的选择范围逐渐缩小，寻找进一步获取资源的方法。选择范围缩小使地方层级上更多的行为人的再生产约束硬化。再生产约束有选择的硬化和软化，刺激了较低层级经济实体中有选择的行为。具有软再生产约束的那些行为人努力维持现状，具有硬再生产约束的那些行为人则有动力向下属实体施压以从网络中进一步攫取资源，进一步缩小特权者范围，进一步对负提进行分权化，和/或跳出网络去开拓更多资源。结果，在 1983 年短暂紧缩之后，从 1983 - 1984 年开始，自我再生产工具开始适应权力关系的特征。这样，在分权化的同时，自我撤离的过程——先相对后绝对的网络收缩——在部分领域开始了。

但是该过程在中国各地不是以同一速度发生的。在相同层级聚合体上的单位之间、在不同层级聚合体之间，适应性都是有差异的。在不同的经济子域（农业、工业）之间，适应性也存在差异，这依赖于该领域在自身网络中进一步攫取资源的能力。自我撤离还由于中央的地区偏袒政策而存在地域差异。

与模式相符的措施

网络内分权化弱化了互联线

网络内有限的攫取能力和 1984 年以来再生产约束反复硬化，驱使中央通过把分配任务和决策都下放给较低层级政府，从而逐渐摆脱财政负担。中央下属国有企业的分权化——供分配的资源没有分权化——导致了类似的结果，进一步增加了地方财政负担（Wong，C. 2002）。

在国家科层内和政党科层内都发生了决策分权化，这涉及互联线。在分权化分配责任的同时，中央也分权化了政治责任，这一努力受到地方党

---

① Brandt 和 Zhu 也描述了这一周期性的紧缩和通货膨胀，但对其中原因提供另一种解释。他们认为，政府所实施的周期性信贷控制政策是由于出口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两难冲突，这一点我同意。在他们看来，“周期的出现是由于政府在分权化下不完美地控制信贷配给，以及实施行政信贷控制的高成本”（Brandt and Zhu 2001：1，454）。

委的欢迎。在1983年7月，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门提出了一项计划，向下分配人事管理控制权，降低中央委员会直接管理的干部数量。到了1984年8月，官方报告说中央放开了从前由中央委员会部门所控制的2/3的职位，而把它们交给省级党委以及中央部委和办公室的政党核心集团。政党官员还限制党委会只对下一级行政科层有人事变动权，但对下两级却没有这种权力。取消了对中央委员会的一些跨科层经济反馈，因为几个企业的名字从中央委员会的干部名单中消失了，可能已经转给了较低层级。从1984年8月到12月，省和直辖市党委先后实行了分权化，把干部控制权分别交给地区、市和县党委（Burns 1987：38）。

根据邓小平将政党与经济分离、结束经济停滞的目的，工业生产中的互联线不仅被分权化，而且**被弱化**。这是与主要产业利益集团游说者（central industrial party lobby 受到反馈的行为人及其支持者）、从几个维度演进而来的基层党委（grassroots party committees）进行了几个阶段斗争的结果（You 1998：40）。[①]该观点与工厂经理责任制结合在一起，最终于1984年引入了一个试点，[②]给经理自主权、取消党委书记在企业的权力职位。[③]在企业内，厂长责任制取代了政党指挥体制。同时，明确规定党委书记的工作仅限于意识形态事务和总体政策监督。甚至政党对干部的控制也受到这些规定的严格限制，即经理有权选择自己的管理层。事实上，在实行工厂经理制之后，许多工厂的党委书记失去了他们的永久办公室和职员。在经理与党委书记之间，进行了多年的拉锯战（You 1998：48－52）。在这种斗争中哪一派占据上风，依赖于中央左派与改革派之间新的斗争的

---

① 邓小平把政党从企业中撤离的目的可回溯至1960年代初。基于应毛泽东的要求而派出的调查组的报告，以及派到11个省的中央工作组的报告，邓小平同志组织起草了“工业77条款”，阐明了“政党一把手的一言堂”问题（You 1998：40－41）。

② 最终法律在1988年4月生效，以法律形式重新确定了经理责任制。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政党很快就发布了一个补充文件，明确规定了经理是工厂政治和生产事务的核心，因此党小组应该充当辅助角色（You 1998：51）。

③ 1985年末，在一次反腐败的内部政治斗争中，保守派试图重新建立党委会集体讨论原则。这要求党委批准所有经理任命。这种抵制使改革暂停。然而，改革者在1986年克服了这种抵制。这一问题列入了关于企业内权威（经理、党委、职工代表大会）的条例的修正案中（Naughton 1996：206，220）。

暂时结果，这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而且，政党不再介入具体的经济决策，也不再介入把产品分配给工人时的日常冲突，也使责任再分配给经济管理者和工会，从而把工人们的不满重新导向经济管理者和工会（You 1998：85）。

在农业中，互联线不仅被弱化，而且被撤离。这一过程开始于1970年代末，[①]直到1980年代初，同时互联线从公社的权限中撤离。关键意图在于，通过农产品价格和制度自由化、税收减免、中央投资重新导向集体耕作，提高农业产量，缓解宏观的、乡镇和村一级的硬再生产约束。然而，农民迅速超越了自由化的边界，开始分割土地，把土地分配给个体农户。到了1981－1982年，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导致集体耕作解散为家庭耕作（see Kelliher 1992：67；Naughton 1996：140－158）。到了1983－1984年，公社被废除，乡镇和经济委员会接管了它们的职能，前者承担了政府运行职能，后者接管了经济管理职能（Naughton 1996：148）。从那以后，农户积极性大大增加了市场上的产品和家庭储蓄。在农业子域，网络绝对收缩为市场发展，从而为网络相对收缩铺平了道路，新资源从外部经济领域被吸入该网络。

资源创造型改革——双轨制与乡镇企业（TVEs）

政府对分配责任决策的分权化以及分权化的互联线，最终导致网络内较低层级再生产约束的选择性硬化以及攫取压力的增加。这可能是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总量增加的原因之一。[②]在网络内攫取能力不强的地方，这一过程**使得必须**增加从网络外攫取资源的能力：或者通过跳到网络外，或者通过改善国内外私人投资的进入环境（see Oi 1995, quoted by Sun 1997：14－15；Wong, C. 1991：708）。

由于再生产约束硬化使农业生产、工业和服务业必须自由化，所以所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代表大会第3次全体会议，1978年12月22日。

② 1989年，超过80%的预算外资金属于地方政府管辖的企业，地方政府经常宣称基本控制了这部分资金的使用（Wong, C. 1991：695）。地方政府通过征收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税费或向企业转嫁成本（道路建设、环境保护、宴会）来攫取企业的资金。由于没有有力的法律框架来保护企业免遭财务掠夺，导致这些做法越来越普遍，尽管颁布了大量的规定禁止这种摊派索取行为（Wong, C. 1991：708）。

谓的“双轨制”① 使行为人和经济单位可以部分地跳出网络，从而为自我再生产提供资源。地方政府很有可能通过部分地跳出网络来获取资源，地方下属国有企业可以基于中央批准和管制，在网络外买卖超出计划的投入和产出。并且中央还鼓励地方政府用农民储蓄积累（来自网络撤离和农业市场化的收入）来建立乡镇企业。

到了1984年末，北京的官员公开承认他们不能控制计划外价格，而准备接受计划外的完全市场定价。在1985年1月和2月，企业被正式地赋予权力以市场价格交易计划外商品。这一决策表明双轨制完全到位了，首次获得了清楚的合法性（Naughton 1996：220）。

根据双轨制，在完成义务上缴任务之后，国有企业可以以市场价格销售超过计划定额的产出，从市场购买投入，以增加生产或扩张生产能力。② 在国家计划经济的周围已经可以出现辅助市场的广泛网络。对于普通的中间商品、工业机器、许多轻工产品、绝大多数农产品，都存在某种类型的市场。

尤其在农村地区，市场变得广泛存在，新的农业产业化方案已经开始结出硕果（Naughton 1996：135），在农村没有可供攫取资源的国有企业。③ 通过以农民储蓄的形式从网络外抽取资源，它导致了服务业及国家工业生产和出口的某些细分市场上农村乡镇企业的崛起（Perotti et al. 1998：158－

① 关于双轨制，参见本书脚注81。

② 这一可能性很快就成为增加企业自主性的具体措施。1984年5月通过了《权利法案》：企业有权以市场价格销售超过计划的产品，工厂经理有权提名自己的管理团队，但要得到上级认可，有权从厂外雇用技术职员，每年增加3%的工人而不需要外部审批，有权投资于其他企业（Naughton 1996：207）。1984年10月共产党“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企业中引入工厂经理责任制、给予经理自主权、取消党委书记的权力职位；在完成强制性国家计划的前提下，企业有权制订总体生产计划；把工资总额与利润挂钩的体制，增加企业对工资分配的控制；工厂与上级监管部门就利润上缴签订长期合同（Naughton 1996：205）。

③ 例如，沿海地区的这种动力最强烈，因为那里几乎没有任何国有企业（由于毛泽东的国防政策）。

159)。这些新的经济单位通过地方政党和国家行政部门与网络紧紧联系起来，从而增加了互联线的密度。因此，网络在农业领域的绝对收缩，促进了网络在其他（服务业和工业）领域的扩张。乡镇企业雇用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有机会利用迄今为止仅由国有企业所享受的垄断利润。它们可以进入长期短缺所形成的细分市场,①针对增长中的需求开辟一系列新市场——例如，建筑市场。它们可以利用双轨制，在国家计划外从国有企业那里获得原材料和市场份额（Perotti et al. 1998：158 – 159)。于是，乡镇企业意味着供地方政府在网络内通过双轨制而进行攫取的新的目标和资源，软化地方政府的再生产约束，促进网络外领域的增长（网络的相对收缩)。

到了1980年代中期，非国有部门的份额,②在工业中为50%，在小商业中为60%（2000年的访谈)。乡镇企业生产很快就从国内发展到国外市场。根据《中国日报》的报道，在1980年有48家乡镇企业的产品具有国际市场开拓能力，而在1991年有80000家乡镇企业向海外出口（Smyth 1998：793)。那时，乡镇企业在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88年的16.9%增加到1991年的20.6%。这一数字在1993年又翻了一番（Perotti et al. 1998：161)。

向国有企业进行决策分权化和自由化的效应，以及企业内政党的权力减小（You 1998：48),③ 既没有改进网络内的市场行为和效率，也没有改进上级单位的资源攫取能力。国有企业税收贡献大大降低，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19.1%下降到1985年的6.6%（Sachs and Woo 1997：27)。经理在1984年末被谴责失去了对工资增加的控制和投资决策的失败（You 1991：65)。还有，格雷夫等人（Groves et al. 1994）基于769家国有企业

---

① 在最初进入后，非国有部门赚得的超额利润逐渐下降，从1978年的40%降到1990年的13%（Jefferson, Singh et al. 1999：145)。

② 接受我们访谈的人包括非国有部门的乡镇企业。从IPS模型的角度来看，这并未排除以下事实：乡镇企业也属于网络的组成部分。

③ 1983年末政治局通过了一项决议：用“主管责任制”取代“政党命令制”，这是基于邓小平同志在计划的城市工业改革框架内的经验试点，这一改革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发起（You 1998：49)。

样本在1980－1989年间的数据进行了计量经济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自主权增加提高了工人收入，但没有显示利润增加、国家补贴下降的趋势（referred by Qian 1996：444）。在较低层级地方政府也存在类似的行为。尽管本地人民拥有乡镇企业，但是镇和村一级政府（TVGs）行使产权，利润要上缴给镇和村一级政府，他们利用这些利润来改进本地生活，而不是向成功的企业再投资或减少债务（Smyth 1998：791）。网络内决策分权化和双轨制的发展，带来了高速经济增长，但是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角度来看却没有带来效率，也没有导致不同的行为。增长（作为网络内主要运行行为）的驱动力，在没有效率约束的情况下，仍然保留在特定的背景中。地方政府具有很大激励去干预企业经营，从地方下属企业攫取非正式的税费收入，尽管这是中央政府反复禁止的。[①]尽管自从1988年开始，企业有合法权利去拒绝将企业资金转移到地方政府，但是实际上仍然在发生这样的转移（Naughton 1996：231）。而且，随着互联线的分权化，以及将有关国家科层控制的党委逐级向下的责任（one-level-down responsibility）转移到地方党委一级，经济扩张的机会在制度上被给定了，因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地方分支机构，变得更加依赖于地方党委。

企业和政府（地方和中央）在再生产中的分权化过程、负担转移、未改变的扩张的——自我相似的——行为特征，反复导致中央政府的再生产约束硬化，以及地方级和中央级企业及地方政府有选择的硬再生产约束。

到了1985年，有12个省出现赤字，并得到了中央补贴（Wong，C. 1991：706）。在1985年，11个省被允许把国有企业出售给集体，或把它们转型为集体经营形式（Naughton 1996：219）。据估计，在省级以下，1986年全国只有三分之一的县实现了财政上缴，其余三分之二的县都得到补贴。预算问题在1987年和1988年进一步恶化，特别是在县一级。尽管实行了分权化改革，但是面临长期的资金短缺，努力奋斗只不过是为了完成被安排的任务，许多地方政府发现它们自己只有很少的机动空间（Wong，C. 1991：706）。拖延上缴的企业利润和间接税在1978年占GDP的

① 如上所述，1989年，80%以上的预算外资金属于地方政府下属的企业，地方政府经常宣称基本控制了这部分资金的使用（Wong，C. 1991：695）。

24.7%，在1989年下降到占GNP的10.7%。亏损的国有工业企业的比重从1986年的13%增加到1991年的30%。发生亏损的国有工业从1986年的67.5%增加到1988年的73.6%，然后下降到1991年的66.4%。同时，亏损额（总量）增加了七倍（Jefferson, Singh et al. 1999：144）。[①]

符合IPS模型的与模式相符的选择和分配的观点，在中国自我撤离型模式中，行政级别越低、下属国有企业越小，亏损企业的比重就越大。出现这一特征的原因在于，再生产约束在较低层级和更小企业中硬化的频率越来越高。[②]

资源创造型改革——外国资本的渗透与网络的弱化

网络内有选择的退化过程同时形成了在网络外创造资源的日益上升的动力。这为国外和国内私有企业的兴起从而网络外领域的增长铺平了道路。[③]在1984-1986年间，利用外国贷款实现的投资价值翻了四倍，同期，FDI增长了60%（Statistical Yearbook 1999：594）。向FDI开放沿海地区、为国内和国际资本创造优惠的商业和管制条件等方面的政府决策，进一步促进了这一过程（Bell et al. 1993, in Woo 1998：159）。在网络外创造资源的动力、政府灵活性及法律中介，导致了与外国人建立合资企业、雇员股票所有权、小型国有企业的资产出售或租赁给管理层和雇员、国有企业出售给外部投资者、破产清算（liquidation）、现金资产证券化（equitization）和谨慎的产权改革（Zhang and Yi 1995, referred by Sun 1997：14-15）。

① 这一时期亏损企业合并的主要形式是并入（调配到）绩效较好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这为双方都提供了资源：亏损企业得到安置，而兼并企业则控制了亏损企业所占有的土地，成为扩大劳动力和工资总额并将亏损企业业务纳入自己企业的一个机会。1987年到1989年中期，在27个省，有大约3424家企业（大部分但不全部是国有企业）被2857家企业接管。损失转嫁给了工人，他们获得更低的收入（Sun 1997：17-18）。

② 亏损集中于大多数由县级政府监管的小型国有企业。90%的亏损企业是小型企业，60%的小型国有企业没有赢利。Qian的观点是，小型国有企业无力与乡镇企业和国外企业竞争，因为它们缺乏技术、人力资源、规模经济和垄断势力。它们生长在非国有企业与大型国有企业之间的夹缝里（Qian 1996：122）。

③ Wong描述了国有部门财政压力增加所导致的非国有部门增长，而Qian认为非国有部门增长是由于国有部门自主性增加（Wong, C. 1992：708；Qian 1996：431-432）。根据以上所论述有选择的发展，这些观点之间没有矛盾。

到了1980年代后期，与模式相符的自我再生产手段及其对再生产动态运行的影响，被全面推进。通过分权化、双轨制、建立乡镇企业、改进私有企业的法律和经济条件，从而在网络外创造新资源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动力，不仅通过提供新资源而软化了网络内自我再生产约束，而且通过发展网络外领域而同时促进了网络的相对收缩。这一过程进一步通过国内外资本的渗入而促进了网络的弱化。而且，通过在网络内创造替代领域，它有助于掏空网络，并与分权化和再生产约束硬化相结合，通过网络的绝对收缩为其进一步解体准备了基础。

13.5　结　论

本章分析了每一个稳定化了的模式如何发展其与模式相符的自我再生产工具。所有三个政党－国家都采取了最小抵制的路线：它们选择了逐渐转向网络外获取进一步资源，而不是改变网络内的结构。这显然是软化再生产约束、保持现状的更容易的选择。给定内部资源耗竭或者由于结构性原因，在再生产约束硬化的条件下选择了开放。结构性原因在于遇到内部对进一步攫取的抵制，和/或由于从较大聚合体吸引资源出现了约束（由于苏联结构中发生了同样的过程），或者因为没有更大的聚合体。随着转向西方和/或国内私有资源的趋势，与网络有关的外部预算约束变化的影响，以及它在网络内与再生产约束硬化的相互作用，在三种模式中都变成自我再生产中的一个突出因素。

我们追溯了罗马尼亚在每一个稳定时期之后，实施偏重重工业的强制性资源调配的通常工具的自我强化式动态运行。我们揭示了德治和齐奥塞斯库在保持现状的方式上的相似战略。他们通过补充国内攫取、从苏联吸引资源、获取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的投入品，来实施这些战略。罗马尼亚可以不受限制地从网络外吸引资源（软外部预算约束），这导致了网络再生产的软约束。同时，这一趋势导致自我再生产受外部资源的影响渐进而稳定地增加，而强制性资源调配的措施造成的国内张力不断上升。

在匈牙利案例中，我们在新的模式中追溯了再次集权化和强制性资源

调配的与形式相符的企图。我们还追溯了在再生产约束硬化的条件下，领导层对改革措施的接受程度，以及那些措施的逐渐与形式相符、直到变成与模式相符。这一过程包括自由化和分权化改革，这种改革使中央可以规范地攫取被调动的资源。通过最初暂时性免责的稳定化，根据政治理性原则、讨价还价能力有选择地分配资源，以及通过有选择地攫取额外收入，来实施这些措施。废除或减小个体特权以降低受管制市场的扭曲，都反复失败了，这显示了有选择的抵制和吸引能力的稳定性、模式的稳定性、一般规范有选择的适应性。

在中国，成功地重建了中央机关，但是没有成功地重新集中战略性企业和投入，也没有成功地把政党从经济决策中分离出来。中央一直努力规范资源攫取，但是由于有选择的抵制能力而不得不反复地与形式相符；相反，攫取和分配决策上的分权化，以及与此同时进行的互联线的分权化，共同造成了通货膨胀和过度投资。网络内资源调动型改革的多次不成功，刺激了分配能力有选择的分权化，导致成功了的地方和层级的再生产约束有选择的硬化，在这些地方由于有效的抵制而缺乏从下级单位攫取进一步资源的能力，或者，根本没有下级单位可供攫取或没有资源可供攫取。因此，再生产约束硬化提高了跳出网络的动力，这得到中央的积极推动，以便中央缓和自身再生产约束硬化和分配压力。这种网络内分权化改革过程的影响，同时伴随着在网络外通过不同手段而进行的资源创造型改革，使得一直存在实施与模式相符的自我再生产工具的动机。这些措施为网络的再生产提供了资源，但增加了网络外领域，从而相对地缩小了网络，同时提高了竞争压力。这些自我支持的工具，如我们下一章所见，导致了网络以各种方式、在各个维度逐渐解体。

14　运动中的陷阱：自我毁灭和转型的模式特有性道路

这一章详细考察与模式相符的自我再生产工具的逐步升级。根据 IPS 模型的预测，这些工具的逐步升级源于自我再生产的动态运行（陷阱）。当面临国际影响和/或网络外的国内竞争压力的时候，网络内再生产约束硬化以及预算约束的持续硬化的累积影响，导致这些工具被更频繁地实施。我们将揭示：在每一种模式中，再生产约束由于实施与模式相符的措施而硬化的迹象和具体原因。国际环境和/或较大聚合体如何影响（1）每一个被考察的国家中与模式相符的措施的发展？（2）给定地理政治条件，在罗马尼亚再生产和预算约束硬化的时候，导致社会暴乱的张力上升的方式？（3）相同的国际条件如何导致匈牙利加速解体、政治转型、崩溃和经济转型？（4）在中国，网络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如何导致网络绝对收缩、经济转型加速，而政治解体减缓？

14.1　历史背景

到了 1970 年代后期，累积的债务、集团单位还款付息的压力、所有单位及较大聚合体内硬化了的再生产约束，共同导致集团及其成员国都更加频繁地实施与模式相符的措施。苏联陷入了泥潭：在自己的网络内获得反馈的那些行为人以及集团单位都希望获得苏联的更多分配，而内部和外部（集团和西方）都不愿意贡献资源。罗马尼亚掉进陷阱：它需要超常规地发展重工业，但国际原材料价格却意外地上涨，国际资源突然下降。罗马尼亚对苏联资源的依赖性增加，而苏联却越来越不愿意提供这些资源。因

此，西方和集团的约束都迫使罗马尼亚从它自己的网络内进一步攫取资源。这些发展促使齐奥塞斯库逐步加强实施与模式相符的措施——集权化和强制性资源调配——尽可能地加速资源的攫取和集权化，推动出口和偿还债务。由于在国内网络内获得反馈的那些行为人对外国资源膨胀型（resource-inflated）经济和政治力量进行了有效的抵制，所以西方和集团的相似影响不容许匈牙利再次引入强制性资源调配。在匈牙利，再生产约束硬化导致更频繁地实行紧缩，这些紧缩政策发展为一个限制螺旋（restriction spiral），导致为挖掘资源而反复实行的分权化改革，而反馈利益和行为仍然没有改变。

在勃列日涅夫逝世之后，在两位老一辈领导人的短期继承时期，戈尔巴乔夫在以上再生产约束硬化的条件下开始执政。他首次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推行大多数资源挖掘型改革，这种改革自 1968 年以来被逐渐应用于匈牙利。苏联改革的深入加速了它的结构解体：来自国有财产的政党资金和巨大的国有价值，被剥离并转移到私人手中。这一过程通过特权职位上的政治和行政机关已准备就绪的早期私有化而飞快地推行（Solnick 1996；Kryshtanovskaya and White 2000；Black et al. 2000）。在全面私有化的法律被提出和实施之前，这一过程推进到了巅峰。[①]在集团内，戈尔巴乔夫首先采取措施，在国内生产、直接投资贡献、鼓励企业间联系等方面对集团国实行更严格的国家层级协调，从而提高资源攫取。但是，他的努力在较大聚合体中遭到抵制，部分原因是较低层级单位在面临自身的再生产约束硬化时，无力作出贡献（Bunce 1989a；1989b；1989c）。

再生产约束在较高层级单位、所属单位、较大聚合体本身中同时硬化，再加上外部压力，共同导致戈尔巴乔夫在较大聚合体内所积极推动的网络自我撤离（绝对收缩）的加速。来自聚合体内较大单位的压力上升，

---

① “1987 年开始，1988 年第十九届政党协商会之后加速，地方和地区政党职位安排实行竞争性选举。地方权力部门对他们的预算具有更大的权限（1990），中央鼓励他们通过商业活动去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大约开始于 1990 年第二十八次党代会，地区政党官员开始准备他们的‘黄金降落伞（golden parachutes）’*——使用政党资金建立地区银行和企业，其中有许多在 1991 年 8 月政变后都派上了用场。1991 年 6 月，中央政党资金的 6 亿卢布被转移至商业组织，使这些资金不受政党即将崩溃的影响”（Solnick 1996：229 –230）。

* “黄金降落伞”是指官员为卸任以后在经济上提供保障的某种安排。——译者。

在硬再生产约束和外部约束的条件下耗散了下级单位的隐藏力量，这为个体模式的体制崩溃和转型特征铺平了道路。

在1989－1990年间，下级单位在各自的发展或解体阶段、在它们所在的模式中几乎同时崩溃。在这些单位崩溃之后，那些关系和较低层聚合体被打破，这些聚合体本来是通过政党和国家机关以及形成国家层级的互联线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在融合没有遵循组织（历史、文化和民族）演进的情况下，网络破碎的同时也伴随着国家框架破碎，后者大多是由地方政治力量发起的。[①]结果，苏联分解为15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分解为2个国家，南斯拉夫分解为5个国家（Bunce 1999）。基于其行政和政治理性，集团国与苏联之间的经济联系在一夜之间被切断，经互会的行政机关被解散，造成了转型早期的混乱和危机。

个体特征和模式特征共同决定了崩溃的类型、解体的顺序和结构各要素转型的顺序。模式特征也影响了解体和演进的强度：崩溃的暴力，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深度和强度，骚乱的程度，与转型有关的速度和方向，[②]以及它们引起的不确定性的水平。换句话说，模式特征影响了政治转型期间的经济条件，以及经济转型期间的政治条件。

在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推动集权化和加强资源调配，以最大可能地资助浮夸的重工业，偿还国外债务，把社会张力增加到极点。这一过程最终导致体制的剧烈崩溃，这时周边政党－国家的多米诺崩溃导致了机会窗口的出现。在齐奥塞斯库那里失宠的共产党，在高度混乱、深重危机、高度累积的不确定性时期接管了政权。政治解体和转型过程与经济解体和转型过程的重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妨碍了宏观稳定。在匈牙利，深化改革使承诺与现实成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降低了政党的合法性。卡达尔

① 中国结构不同维度的类似趋势的可能性和障碍，详见 Goodman and Segal（1994）和 Goodman（2000）。

② 如，CEEC（中东欧国家）内部以及CEEC与CIS（独立国家联邦）集团之间的危机程度和复苏速度上的差异（根据实际GDP、单位资本实际GDP、负债“Countries in Transition 1995. Bulgaria, Croatia, Czech Republic, Hungary, Poland, Romariia, Russia, Slovak Repubhc, Slovenia, Ukraine”. WIIW Handbook of Stastistics, Vienna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pp. 35, 37）。

和一些老共产党员的降职、新一代干部的发展和接管，没有阻止政党的解体过程。再生产约束硬化、来自苏联和西方的资源减少、还本付息，共同加速了改革和权力再分配。负担和互联线的分权化，以及互联线的撤离，再加上横向利益集团的发展，共同导致了温和的崩溃。共产党改革派在新议会中形成了一个小反对党，在这种政治转型之后，相对平缓地开始了经济解体和外国资本的强有力渗透，通过人力和资本逃到转型了的领域而掏空僵化的结构。经济转型过程伴随着经济危机、累积的不确定性、短期行为，但是匈牙利恢复和稳定所花的时间比罗马尼亚要短很多。

中国在集团及其成员国（包括苏联）由于模式特有的、个体的原因而发生的全面崩溃中幸存下来。然而到了 1990 年代后期，由于网络外领域增长，同时网络内再生产约束频繁硬化，这些相同的特征也使竞争压力日益增加。这种共生性导致模式特有性工具被加速实施：再生产约束硬化刺激了分配负担分权化，吸走潜在收入，更多经济单位倒闭和私有化（切断[cut-off]）、资产剥离（掏空）、资本渗透（弱化）导致网络在经济子域加速解体。网络内张力在外部压力下进一步增加，促进解体向政治领域推进，这已经显示了一些迹象。

以下章节的篇幅要长很多，结构也与前几章稍有不同，因为导致解体、崩溃和演进不同顺序的模式特征以及模式对转型的影响，都也不允许把它们作为独立的章节来展开分析。

14.2 罗马尼亚的发展与转型

14.2.1. 对再生产约束和外部约束同时硬化的适应及其后果（1976－1990）[①]

集权化、权力集中、排除异己、从西方和发展中国家获得资源，共同

① 特别是关于罗马尼亚转型，从经济、政治和历史角度进行经验研究的现有英文文献很少，也很零散。没有揭示共产党的命运，以及民主化和制度建设的历史。现有文献集中于崩溃后东欧国家的主要问题：稳定化、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Hunya 1998, 1999; Earle and Telegdy 1998; Popovici and Brindusa 1998）。但是，即使这些问题在现有英文文献也很少论及。

软化了罗马尼亚的再生产约束。在 1970－1975 年计划时期，罗马尼亚的硬通货债务几乎翻了一倍（Crowther 1988：140 Shafir 1985：110），而石油和消费品价格都飞涨。[①]但是罗马尼亚在第 6 个五年计划中（1976－1980）仍然坚持实行强制性工业增长，实施与结构相符的措施，尽管再生产约束出现了明显的硬化迹象（Crowther 1988：138）。

1974 年开始的国际石油危机不仅增加了进口成本，而且削弱了[②]罗马尼亚的出口市场，实际上只在一夜之间，原来的大量贸易盈余就转变为巨额赤字，从前的贸易顺差转变为 13 亿列依[③]的赤字（Crowther 1988：138 referring to Annual Statistic 1980：498－501）。

最初的反应——资源集权化、切断进口、更多出口转向西方

罗马尼亚对危机的最初反应是，网络进一步集权化，限制从西方进口，把准备出口到经济互助委员会的产品转向硬通货市场。罗马尼亚的领导们还削减了借款。这些措施使罗马尼亚在 1975 年实现了总贸易平衡。但是，从经济中挑选出来的硬通货产品有限，于是罗马尼亚被迫寻找进一步的解决方法（Crowther 1988：138）。

1976－1980 年的第 6 个五年计划继续推行原来的政策，但是除了劳动生产率和投资之外，其他指标都稍有放松，以避免在第 5 个五年计划中遇到的困难。新战略依赖于向发展中国家扩张工业出口，以获得补偿石油进口增加所需的硬通货。同时，从西方的进口减少了。这种转向非常快（Crowther 1988：138；Shafir 1985：113）。发展中国家在罗马尼亚总贸易中的份额从 1970 年的 7% 提高到 1980 年的 25%。罗马尼亚从发达国家进口的比重从 1975 年 42% 的最高点跌落到 1980 年的仅 27%。这一减少至少可

① 1973－1974 年石油价格上升对罗马尼亚来说并不是灾难性的，因为罗马尼亚生产的精炼石油产品的价格也上升了（Fischer 1989：249）。

② 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术语的意思是，罗马尼亚的产品在销售中逐渐不能收到硬通货。

③ 列依是罗马尼亚的货币单位。——译者。

以部分地平衡与石油生产国之间的巨额赤字。[①]

到了 1980 年，罗马尼亚与“南方”国家之间的联系大约有 85% 是建立在“联合公司（joint company）”业务的基础之上，大都与采掘工业或炼油有关（Shafir 1985: 111 referring to Radu 1981: 253）。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很大一部分贸易是基于合资企业，建立这些企业的目的是要从中东、非洲和亚洲获得原材料产品。罗马尼亚要用完工项目的产出去逐步地偿还外国援助贷款（Crowther 1988: 138）。在 1973 – 1978 年间，基于西方贷款和与“南方国家”的长期采掘协议，罗马尼亚的炼油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Shafir 1985: 110）。由于自 1976 年开始罗马尼亚的炼油能力增加，所以它被迫逐步增加原油进口，以补偿国内攫取，从而把罗马尼亚转变为一个石油净进口国。即使这样，到 1981 年，罗马尼亚的三分之一炼油能力仍然是闲置的（Shafir 1985: 110, referring to Luftman 1982）。

第 6 个五年计划（1976 – 1980）规定投资每年要增加 12.7%（Spechler 1983: 37, referred by Shafir 1985: 121）。国民收入中分配到投资的比重从第 5 个五年计划的 34.1%，增加到第 6 个五年计划的 36.3%。集中建设工业得到了强化，工业投资比率增加到总分配额的 58%（Crowther 1988: 102）。重工业获得了绝大部分投资资源。如往常一样，国内资源主要来自对农业的掠夺：1950 年，农业贡献了将近 40% 的 GNP，而只获得全国总投资的 11.1%。在 1976 – 1980 时期末，工业部门仍然从投资中从获益，工业投资比农业投资要多 3.5 倍（Crowther 1988: 108 – 109）。

第 6 个五年计划的一些宏伟目标是：劳动生产率不切实际的增长；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能源供给；农业生产提高；极大地扩张与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Giurescu and Fischer-Galati 1998: 193; Georgescu 1991: 469）。“然而，在 1976 年，能源危机全面冲击了经济，消费增长下降到 3.1% 的年增长率。布加勒斯特开始采取补救措施，以对付开始于 1978 年的经济崩溃威胁”（Crowther 1988: 140）。

然而，在第 6 个五年计划的中途，罗马尼亚共产党恢复了从前的工业

---

① 为了从罗马尼亚挤出更多硬通货产品，同时服务于民族主义者的目的，罗马尼亚的犹太人和德国少数民族被允许移民，并以现金“出售”：移民个人的出境签证由德国和美国付费，变成了一种营利性的商业活动（Gilberg 1990: 103）。

化动力。在最后几年，再生产约束明显硬化，出现了**现实危机的迹象**。“虽然损害了农业和消费品，但罗马尼亚经济在1978年以前一直飞速增长。过度多样化的可怕结果，以及钢和石化工业不负责任的发展，浪费了罗马尼亚的自然资源、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这在1979年就变得非常明显了”（Giurescu and Fischer-Galati 1998：190）。

再生产约束和外部（预算）约束持续硬化

再生产约束在几个领域出现硬化，这部分是自然原因所致，部分是政治原因所致。[①]到1978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齐奥塞斯库的国际地位下降。这里的主要原因在于几个方面的变化：苏联**改革**（重组），西方越来越反对侵犯人权，对罗马尼亚犹太人和德国人征收移民税导致的负面形象，最惠国待遇丧失，与法国的关系冷淡，西方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在匈牙利社会主义要求具有“人情味（human face）”，在波兰团结运动（Solidarity movement）兴起。所有这些因素使齐奥塞斯库在国际上失去信任，使他难以获得国际资源，削弱了罗马尼亚抵制集团内变化的能力（Georgescu 1991：469；472；Giurescu and Fischer-Galati 1998：192，196）。

债务累积失控了。[②]在1981年末，偿还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必须针对1982年和1983年的贷款重组协议进行谈判（Crowther 1988：140，141 referring to Radio Free Europe Research Romania/Situation Report January 13，1983：6）。在非工业和工业领域都开始出现了强制性发展工业的负面影响。更熟练的技术工人从农业转移到工业，造成了农业中的张力。[③]到了1970年代末，再也不能依靠这种残酷的转移。结果，流入工业领域的工人增加

① 人均资本消费、服务可得性、劳动力激励效果仍然很低。住房供给、零售贸易和实际收入没有实现目标。经济绩效日渐下滑：纯原料产品年均增长率从1971－1975年间的11.3%下降到1976－1980年间的7.3%。1970－1975年间GNP年均增长率是6.2%，1976－1980年下降到3.9%，1980年出现了－1.6%负增长（Shafir 1985：109）。

② 1970年代后半期的硬通货债务每年增长36%，至1979年达67亿美元，1981年达103.5亿美元。

③ 1971－1978年间来自农村的净移民率比过去20年的年增长率增加了近两倍，大大高于最初集体化运动中的净移民率（Crowther 1988：105）。尽管有这么高的流动比率，但是工业需求有限，只能吸收很少的新工人。

速度下降到前五年的一半。这对工业增长造成了强有力的影响。到了 1977 年，工业产出和资本生产增长率都下降了（Crowther 1988：105）。原材料部门、劳工组织、未完工投资项目的存量增加等方面的问题，导致工业进一步下滑，张力进一步增加（Crowther 1988：106）。

在几年坏气候之后，农业中的潜在出口产品减少。长期的结构性问题，缺乏激励、投资偏重工业、一次毁灭性的地震，使形势更加恶化。在 1979 年之后，这些影响达到了危机程度（Fischer 1989：250；Giurescu and Fischer Galati 1998：194）。

这些经济困难产生了政治反响。在 1977 年 8 月，35000 - 40000 个矿工在 Jiu 地区抗议政府。直到齐奥塞斯库亲自接见矿工，承诺改进他们的经济条件，这一抗议才结束（Giurescu and Fischer Galati 1998：191；Georgescu 1991：469；Gilberg 1990：121）。

采取与形式相符的资源调动措施软化再生产约束和预算约束

再生产约束和预算约束硬化导致后来于 1978 年 3 月在网络内发起了改革（Crowther 1988：106 - 107；Fischer 1989：252）。从 1979 年开始引入一个所谓的新经济和财政机制。它基于计划的轻微分权化（使企业对它们自己的计划更加负责）。在理论上，企业可以与自己所选择的供应商建立联系。还试图用奖金把工人和经理的激励与产出和生产成本相联系，这种奖金随着利润指标增减而增减（Rady 1992：139）。

然而，在新管制的制定和实施期间，与形式相符已经开始发生了。投资主要由中央决定，中间组织（总部）和企业仍然收到详细的计划指示。企业自主权仅限于生产效率问题。再者，由于战略性工业的利益提升可能性，补贴而非改进的效率决定了农业（extractive industries）中的趋势（Shafir 1985：124）。

在引入的机制的其他方面也发生了与形式相符：该机制处罚工人没有完成利润计划，而不是激励工人超额完成利润计划。收入依赖于中央决定的个别标准。劳动力流动受到严格限制，对违反劳动合约者施以重罚。[①]

---

① 合同迫使工人在一个地方待五年时间。工人获得的工资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工人直接领取，另一部分在这五年时间里积累在银行。如果违反合同，工人就得不到积累在银行的钱，计算养老金的工作年限也会因此减少（Shafir 1985：125）。

而且，当局可以暂时或永久地转移企业（或农业单位）的全部职工，而在强制性调配所导致的失业期间，没有社会援助（Shafir 1985：125 －126）。

在新经济和财政机制被引入的同一年（1978），原油价格再次上涨，但精炼石油产品的价格没有上涨，后者是罗马尼亚的最重要出口产品。伊朗革命和哈梅内依·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①] 的出现（advent），使供给问题进一步恶化。它终止了齐奥塞斯库与绍德（Shah）[②] 之间的“特殊关系”。结果，伊朗不再允许罗马尼亚用劣质商品交换石油。这种改变了的关系导致了更高的石油价格，于是罗马尼亚增加了对以硬通货支付苏联石油输送的依赖性。伊朗－伊拉克战争进一步恶化了形势。罗马尼亚在这方面的脆弱性可以在以下事实中得到证实：在1981年末，罗马尼亚石油进口的80%以上来自发展中国家（Fischer 1989：249；Gilberg 1990：6 Giurescu and Fischer Galati 1998：192 －194；Shafir 1985：11；Almond 1992：129－130）。

国际事件的影响大大增加了引入新经济和财政机制最初的不确定性。不确定的关系与被降职（通过人事调换）的更大威胁结合在一起，使政党和企业官员没有积极性从事组织创新。惯常措施和惯常行为在形式上很快就符合了有限的改革（Fischer 1989：252；Crowther 1988：157）。

到了1979年，尽管有迹象表明经济疲软的原因是过度多样化和基于不切实际的资源预测的工业增长，但是罗马尼亚在1979年拟订1981－1985年的经济计划时，仍然确定了甚至更高的目标[③]（Giurescu and Fischer Galati 1998：193；Georgescu 1992：470）。“在1980年，罗马尼亚显示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倒数第二的经济绩效，在随后几年中情况进一步恶化”（Rady 1992：141）。

对再生产约束和预算约束硬化的常规反应

为了缓解短期收支平衡中的赤字，布加勒斯特引入了新的紧缩措施。中央政府减少进口，进一步压低国内生活标准，增加消费品和农产品的出

① 霍梅尼是伊朗宗教领袖。——译者。

② 绍德是伊朗国王。——译者。

③ 下一个五年计划目标的陈述中也存在矛盾的地方：在完成从前计划任务之后再降低生产目标（Rady 1992：139）。

口（Shafir 1985：119；Rady 1992：148；Fischer 1989：251）。食品出现短缺，食品价格翻了三倍，农村市场消失。从1981年开始的27年之后，面包再次实行定额配给。采取新的措施进一步限制消费和基本食品（如糖、食用油、咖啡、面粉、玉米和大米）的储存。实际上买不到肉。[①]负担和责任被分权化：人民委员会要确保地方食品自给自足（Shafir 1985：117）。在1982年2月，220种不同食品的价格平均上涨了35%。能源危机造成几次价格上涨，于是，在1982年和1983年，对分配给公众的燃油和电力实行了数量限制（Shafir 1985：118）。

然而，增加内部攫取和出口，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源去进口过度扩张重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和技术。[②]结果，对外贸易出现了下滑的过程。[③]这种进口的急剧减少，减慢了现代技术的引入和老工业设施的现代化，并很可能阻碍而不是促进罗马尼亚的未来经济发展（Maier 1983，referred by Shafir 1985：114）。

到了1980年代初，现实情况［……］变成罗马尼亚依赖昂贵的国外石油去加速发展过度扩张的石化工业，依赖昂贵的铁矿石来满足巨大的钢厂的需要［……］，提高了罗马尼亚的外债水平，给定出口市场疲软、国内劳动力不能在工业和农业中完成高度集权化计划经济不切实际的目标，这些外债已经超出该国家的偿还能力（Giurescu and Fischer-Galati 1998：193；and see also in Georgescu 1991：470－471；Gilberg 1990：65）。

持续增加的债务，电力、供热、食品的短缺，价格上涨，强制性的农

① 罗马尼亚生产的肉出口到西方。1980年代初，甚至在西德的美国军队也享受着从罗马尼亚进口的牛肉和猪肉（Almond 1992：131）。

② 如，罗马尼亚用西方贷款建起的炼油能力比该国国内石油产量大三倍。在Slatina的炼铝厂消耗的电量几乎等于罗马尼亚国内消费者消费的电量（Almond 1992：129）。

③ 1980年，从发达国家的进口增加了4%，出口增加了6%。1981年，西方进口减少了22%，出口没有变化。1982年，进口减少了43%，出口也减少了约26%（Maier 1983，referred by Shafir 1985：114）。

产品出口，共同导致生活水平在1983年比1982年下降了20%（Georgescu 1991：471）。在捍卫祖国尊严和领土完整、反对外国（苏联，西方，甚至“修正主义的”匈牙利）干预的名义下，这种牺牲被证明是值得的。重点被置于实现美好的共产主义未来（Giurescu and Fischer-Galati 1998：195）。

东欧各国的硬通货债务一直在累积，面临相似的还本付息困难。波兰是第一个谈判延期还贷的国家，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也获得了贷款延期。但是，齐奥塞斯库决定加快而不是延期偿还贷款，这部分是因为他估计获得这种延期要更加困难（由于他在国际领域越来越不受欢迎），部分是因为他可以在自我掠夺型结构内镇压对进一步攫取的抵制。

第二年，他［齐奥塞斯库］宣布罗马尼亚将在1990年之前偿还100亿美元的全部外债。结果，他提前一年就实现了这一目标。整个还债运动伴随着一个日益尖锐的反对“金融寡头政治（financial banking oligarchy）”运动，它们盗取［……］人民的收入，更加可悲的是，盗取了整个国家的收入（Rady 1992：64）。1981年，齐奥塞斯库公开谴责西方的利息率是一种“新形式的剥削”，并号召结束“金融帝国主义”（Shafir 1985：119 see also Rady 1992：148）。

在随后几年，战略反映了网络内的加强攫取和强制性资源调配。1982年，食品出口增加了12.3%，而进口降低了66.8%（Rady 1992：141－142）。1983年，在新经济和财政机制的框架下，取消了工人最低工资，引入了全球一致标准，报酬被联系于实物单位的产出。并且，这时便有可能以自由化的名义解雇工人并关闭整个单位。实际上，它有助于摆脱负担（Shafir 1985：124－126）。偿还促进了网络内的加强攫取，从而促进了与结构相符的措施的进一步发展。

凝聚力下降，与结构相符的措施的发展

政治精英在面临经济可能崩溃的时候，不是去寻找改革途径，而是变得更加强权，加紧控制国内政治活动的所有渠道（Rady 1992：130）。

齐奥塞斯库强化了**已被调动起来的群众参与**和民粹主义，并扩大网络重叠、控制和动员的能力。在这一政策下，三分之一的成年人被明确地吸

纳为党员（Rady 1992：167）。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罗马尼亚党员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最高（14%）（Fischer 1989：256）。

齐奥塞斯库加强了**干部轮换制**以减少潜在抵制。在政党书记处、内阁、县第一书记，轮换制得到了格外的强化，特别是在涉及战略性生产领域的行业：采矿、石油、农业和外贸。降职依赖于齐奥塞斯库的个人决定（Fischer 1989：255）。

齐奥塞斯库把资源吸引的重点从网络外转向较大聚合体。与生产石油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逆差，已经驱使布加勒斯特去号召经济互助委员会在能源和原材料来源上"自力更生"，放弃从其他国家的硬通货进口。1983年，共产主义国家在罗马尼亚进口中所占的比例上升，从1980年的40.5%上升至将近53%。然而，这一转变的代价很高：苏联人没有兴趣去满足罗马尼亚的野心。布加勒斯特必须用硬通货或高经济价值的产品去购买石油（Shafir 1985：115－116）。

获取资源的动力被扩展到任何现有的机会。例如，在1983年，关于提高犹太人和德国人的移民费问题，罗马尼亚与西方产生了冲突（Giurescu and Fischer-Galati 1998：196）。在1982年，齐奥塞斯库对罗马尼亚移民引入了其他收费，以收回罗马尼亚为这些人支付的教育成本。齐奥塞斯库最终在西方压力下让步，谈判的结果是罗马尼亚作出妥协。与更重要的西方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没有被打断，最惠国（MFN）地位被恢复，贷款被重新安排（Rady 1992：145）。

偿还外国债务的驱动力增加了强加于罗马尼亚人民的极端困难。电力配给减少了冬天的日供电量，降低到一个电炉上每小时一巴（a single bar）的价值，在布加勒斯特，冬天的煤气压力低得不能做饭。在12月，规定工厂和办公室的最高温度不能超过44华式摄氏度（Rady 1992：65）。小私有土地所有者必须把他们的产品交给政府收购办公室，以政府决定的价格在"自由"市场上出售剩余商品。到了1988年，已经出现了营养不良、艾滋病、环境灾难（Rady 1992：66）。

到了1988年，当局决定禁止使用冰箱、真空吸尘器和其他家用电器，敦促人们在冬季把食品储藏在室外，节制使用电梯和中央供热，等等。街

道照明在1979年就已经被减少，现在在城郊被全部切断，而在城市，只有主要的街道才有（微弱的）路灯。成立了检查组，如果发现有人违反规定，将施以严格的惩罚。然而，在官方宣传中，齐奥塞斯库的统治经常被称作“灯光年代（years of light）”（Shafir 1985：118；see also Rady 1992：64）。

在冬天那几个月里，禁止使用私人小汽车（政府解释说这是为了防止在冰雪道路上出现事故）。餐馆在黄昏之后立刻关门。获得药品和抗生素是非常困难的。罗马尼亚人只能用硬通货购买处方上所列出的药品，或者通过旅居国外的亲戚来获得这些药品（Rady 1992：64）。

以生产成本最优化的名义开始了社会阶层的实物调配：从1988年3月开始引入“系统化（systematization）”，通过把农业人口集中到被选择的村庄来实现整个农村的重组，从而实现农业生产最优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系统化和农业用地的解放，意味着村庄数量的减少，从13000个降低到5000－6000个，给1100万村民造成伤害。村民们被行政性地合并到一个更大的单位。农民被强制拉进没有管道的集体大楼（工农综合楼）（Rady 1992：68），然后把农民从这些综合大楼运送到他们的集体或附近的工厂。空荡荡的村子被拆除，土地由国家农场来耕作。没有公布计划迁移的村庄名单，使农村居民一直处于焦急状态。关于选择拆除哪个村庄的具体决策，在政治上是理性的——例如，少数民族是主要目标。① 只提前几个星期才告诉村民要推掉他们的房子。另外，还要求村民们亲自去从事这些破坏工作。要求在2000年以前用推土机去破坏文化、文化价值和小农生产（Rady 1992：69－70；Almond 1992：176－180）。

资源攫取和强制性资源调配还包括将要出生的那些人或动物。为了提高出生率，禁止妇女和家畜流产（Rady 1992：70；Almond 1992：182－183）。

从网络内攫取来的资源，不仅用于偿还外债、资助重工业，而且用于

① 同时，农村的小农场生产了全国肉产量的1/3以上（40%），罗马尼亚的牛奶和鸡蛋产量的1/3，水果产量的1/4，但大规模计划中忽视了这一点（Rady 1992：69）。

宏伟项目投资，以增加民族尊严，反映社会主义和齐奥塞斯库的胜利。由于那种原因，布加勒斯特的名胜古迹被认为与社会主义的胜利是相矛盾的，于是被摧毁了，并在齐奥塞斯库亲自控制下以新斯大林主义风格（Neo-Stalinist style）进行了大规模重建（Giurescu and Fischer-Galati 1998：198；Almond 1992：153－171）。

升级的结果：社会内部张力增加①

系统化的计划及其实施在罗马尼亚全国拉起了警报。地方起义被报道。计划还激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对。美国和德国政府试图对罗马尼亚增加压力，让其放弃这些计划。匈牙利议会正式地表示反对，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齐奥塞斯库的计划激起了布达佩斯1956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国内活动家组织了4万匈牙利人游行，抗议破坏乡村和文化价值（Rady 1992：70－73）。

自从1980年代初以来，累积中的张力就激起了敌对的早期迹象。在1983年，据说发生了军事政变，反对齐奥塞斯库偏袒安全部（Securitate）的工资歧视和削减预算（Fischer 1989：265）。在1984年，发生了没有组织的公众抗议，但是由于当局及时的恐怖行动，这些抗议没有联合为一次大规模游行（Rady 1992：73）。在1987年11月，数万工人的游行队伍通过Brashov中心，要求猪肉、面包和牛奶。然而，这些游行者缺乏组织和明确目标，被齐奥塞斯库的安全部队残酷地镇压了（Rady 1992：73－74；Giurescu and Fischer-Galati 1998：199）。对系统化的忧虑与国际关注结合在一起，鼓励了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在罗马尼亚国内发表见解，通过BBC和自由欧洲之声加以报道（Almond 1992：193）。

内部和外部的因素，造成了再生产约束和外部（预算）约束同时进一步硬化，②使其政治忠诚度面临极大的张力（Rady 1992：75）。政党内部反对已经开始显现，老共产党员的反对激起1980年代中期的公开冲突。在

① 这里我承认Valerie Bunce所界定的崩溃的某些因素：党内公开冲突和机会窗口。对于罗马尼亚情况，自由化和持久危机是它没有考虑的因素（Bunce 1999：131）。

② 这些包括：经济困难、系统化、国际压力上升、齐奥塞斯库在国际上日益被孤立（Almond 1992：192）、国内局势日渐紧张、开始出现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

1989年3月，保守派（the old guard）的六个杰出成员在一封公开信中要求当局立即停止系统化政策，恢复法制，停止践踏法律。他们被软禁了（Rady 1992：75；Almond 1992：193－199）。

较大聚合体框架中的机会窗口与突然崩溃

与结构相符的方法的进一步发展，使网络内的社会张力增加到极点。同时，较大聚合体也苟延残喘，濒临崩溃。波兰、匈牙利、东德政党－国家作为较大聚合体的下级单位出现了连续崩溃，而戈尔巴乔夫对阻止他们崩溃的非干预政策显示了自我撤离的迹象，这些都预测了集团的未来。戈尔巴乔夫的国内改革和对集团国的政策，瓦解了来自齐奥塞斯库背后的“威胁意识形态（threat ideology）”的隐藏力量，对齐奥塞斯库的权力施加了限制。但是在十六届党代会代表的欢呼声中，齐奥塞斯库蔑视任何压力，宣布他的计划永远有效（Giurescu and Fischer Galati 1998：200）。

社会张力增加，在较大聚合体中其他集团国的体制崩溃，以及齐奥塞斯库在国内外的地位弱化，提供**一个机会窗口**，鼓励群众表达不满。

在特兰斯尔沃尼亚（Transylvania）的小城市Timisoara点燃了星星之火，很快扩展到全国，导致了以上的所有发展。Timisoara过去属于匈牙利，因此具有相当多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在该城市有位持不同政见的匈牙利族牧师，叫László Tökés，他坚持抵制妥协的上级牧师的命令和地方安全部门的压力，拒绝离开他的教区去另一个地方。这位忠诚的匈牙利支持者，在他住宅周围围起了一圈铁链，以阻止安全人员把他拖走。当地的罗马尼亚人与这些匈牙利族人团结起来。这种抵制在Timisoara激发了群众不满，不久便演变为流血事件。当时正在访问伊朗的齐奥塞斯库已经命令他的安全部队控制住了局势（Giurescu and Fischer-Galati 1998：476；Almond 1992：203－206，221）。

最初，政府向公众隐瞒了Timisoara事件的真相，宣称这是国际上企图颠覆罗马尼亚的共产主义政权。然而，Timisoara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布加勒斯特，引起了公众的骚动。齐奥塞斯库不能或不愿意对危机作出反应，[①]

① 最严重的迹象之一是在Timisoara的军队拒绝向群众开枪，尽管齐奥塞斯库已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Georgescu 1991：476）。

也许他不知道最终的危险，仍然想运用通常的工具来恢复罗马尼亚的秩序。他下令在布加勒斯特大广场举行群众游行，支持共产主义体制，特别是支持他自己（Georgescu 1991：281 – 282；Giurescu and Fischer-Galati 1998：201）。与往常一样，罗马尼亚全国各地大约有 100000 工人被运送到大广场为他的演说喝彩和欢呼。然而，他根本就无法完成他的讲话。人群中出现了反齐奥塞斯库的叫喊，持续地打断他的演讲。齐奥塞斯库很快就被迫从大楼中逃走。军队和部分安全警察拒绝向人群开枪的命令。剩下的忠诚的安全部队人数太少，无法恢复秩序。这个政党 – 国家在面临革命的几个小时内就崩溃了。由失宠的老共产党员、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军队领导组成的民族拯救阵线（The National Salvation Front），掌管了罗马尼亚的政治领导权。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试图逃跑，但被抓住了，很快就被秘密军事法庭宣判和处死。据说，新领导层迅速地处死齐奥塞斯库夫妇，是害怕一旦这两个人有机会讲话，他们会失去刚刚获得的个人声望。根据官方的说法，迅速地处死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原因是担心如果这两个人还活着的话，忠诚的安全武装可能会恢复齐奥塞斯库政府（Rady 1992：117 – 119；Georgescu 1991：283；Almond 1992：224 – 236）。

14.2.2. 解体与演进重叠——体制崩溃后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同时发生

累积的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

由于在罗马尼亚在体制崩溃之前，没有发生政党 – 国家结构中任何一个要素的解体和演进，因此所有这些过程都是同时发生的。在这些因素中，没有哪个因素可以为另一个因素的转型形成其稳定性。大幅度衰退为政治转型提供了经济条件，但实际上没有形成阶层化的社会，政治或利益集团形成了经济转型的政治条件。罗马尼亚经受了剧烈的体制崩溃、迅速的解体和政治气候的快速形成，它努力采纳多党制和民主统治。制度化的互联线立刻消失了。崩溃的第二天，共产党作为垄断权力把持者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它的基础结构暂时被掏空。事实上，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再也没有出现在罗马尼亚的政治生活中。罗马尼亚共产党绝不是自我解散，党员从来就没有机会正式退党（Pasti 1997：83）。

骚乱处于其巅峰时期，伴随着高度张力的延续及不确定性的累积。在

齐奥塞斯库时代失宠的小部分共产党员在革命期间获得了声誉，赢得了选举。环境不利于快速发展：从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来看，罗马尼亚对体制转型完全“没有准备”（Hunya 1998：242）。尽管选择了激进的政权变更，但是由于强烈的经济改革和私有化，使罗马尼亚社会在政党－国家时期没有经历改革，对社会安全怀着很高的期望。同时，到了1990年代初，罗马尼亚的贫困率在东欧是最低的。到1990年代末，作为崩溃前和崩溃后的特征同时存在以及解体和演进同时发生的明显标志，腐败在崩溃后国家中是第二高的。[①]在1993年，罗马尼亚通货膨胀率达到300%（Bejan 2000：58）。社会利益是非制度化的，因此无法清楚地描述，但是社会被动员起来，导致了暴力的集体行动，暴力的政府反应（Gabányi and Hunya 1994, referred by Flunya 1998）。因此，人们一直面临生活艰难，而政府却反复作出无法兑现的承诺，提高人们的期望，这最终导致社会中的欺诈持续不断，并长期存在。

在经济危机条件下政府干预时期延长

尽管政党崩溃和消失了，但是政党－国家的其他要素（具有垄断职能的国家科层、内部关联、国家垄断经济）却仍然存在。经济结构被极端地扭曲；企业绩效非常之低，并逐渐下滑；几个企业由于缺少投入和内部秩序崩溃而停产。企业债务和失业增加，[②]替代方法消失了。企业经理几乎没有任何市场经济知识。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持续的政府干预。1994年和1995年在降低通货膨胀方面所获得的成功（通货膨胀从1993年末的300%降低到1995年的28%）被逆转了，因为累积的再生产约束和预算约束开始缓和（由于1996年11月议会和总统选举之前，解体和演进重叠发生）。这立刻导致1996年中期的外部赤字增加、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增加（Bejan 2000：8）。

在以上这些环境下，干预的政治理性和资源分配的路径直到1996年还

---

① 参见：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ransition report 1999: 16; "The frequency and extent of the bribe tax,"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ransition report 1999: 225, referred in Bejan 2000: 7－9.

② Romania,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ransition report 1999: 257, referred in Bejan 2000: 7.

没有改变：来自私有化的收入被用于解救剩下的财务困难的国有企业。补贴和增加坏账的贷款被分配给更大的国有企业、农业和重工业，但轻工业的税收负担更重了（Hunya 1998：245）。

骚乱与私有化的不确定性

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下重叠的解体和演进所导致的骚乱和不确定性很高，且长期存在。直到2000年，政治领域的冲突和摸着石头过河（stop-go）的经济政策，反映了僵化结构、困难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所提出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左派获胜党失败了、分裂了。他们被中－右派取代，2000年前夕左派势力再次执政。在他们统治的时期，由于执行新经济政策失败导致的内部和联盟冲突，几届政府衰弱或改组。这几届政府都在实际上探索了私有化的几种形式和步伐，但是都没有取得实质性成功。从民族拯救阵线中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演化而来的所谓社会民主党，在1996年以前一直努力推行渐进的私有化和重组。除了稳定化之外，他们公开倡导：（1）大规模私有化（Earle and Telegdy 1998）；（2）管理层雇员购买中小国有企业；（3）购物券私有化。从1997年开始，中－右派民主大会赞成快速和直接的私有化。[①] 因此，僵化结构的解体是不容易的。

到了1998年，国有部门大大降低，而私有部门贡献了62%的GDP（Bejan 2000：38）。然而，私有化根据企业规模被有选择地得到推动。到了1998年，100%的小企业、34%的中型企业、19.7%大型企业实行了私有化（Bejan 2000：34）。再者，因为大型企业的倒闭速度较慢，所以，崩溃前基于政治理性选择的固定分配路径仍然在工业内普遍存在：大企业得到补贴，大多数未偿还贷款都属于前100家工业企业。国家垄断的撤离也是根据不同的经济子域而有选择地进行。私有化延伸到了农业，尽管新的协会与从前集体没有太大差异。私有化大多发生在商业和服务业，在工业中发生较少，在银行业中最少。

延迟引入法制

国家从重叠经济领域撤离，并不意味着经济立刻转型。转型，除了要

---

① *Privatization menu,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ransition report* 1999：109, referred in Bejan 2000：40.

求私有财产之外，还要求引入（衍生）几个其他的市场要素，但这些要素没有随着私有化努力而同时得到促进。这些要素包括竞争政策、治理[①]和企业重组、证券市场、非银行金融机构、银行业改革、利率自由化、制度和法律环境，等等（Bejan 2000：51）。由于齐奥塞斯库的强制性偿还政策，罗马尼亚在崩溃之后已经不是一个债务国。然而，该国家与国际金融市场隔离了。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受到限制，存在外国货币的总体短缺（Hunya 1998：242）。世界银行和 IMF 撤走了对转型至关重要的国际援助，这进一步恶化这种状况。罗马尼亚被认为风险太高，由于法律的不安全和通货膨胀而导致 FDI 撤走，国内投资者缺乏资源（Hunya 1999；Bejan 2000：36）。

14.3　匈牙利的发展与转型

14.3.1. 对再生产约束和外部约束同时硬化的适应及其后果（1977－1988）[②]

再生产约束和外部（预算）约束硬化

与罗马尼亚类似的外部条件和调整压力，在匈牙利激发了不同的——

---

① 微观经济管理是指税收和规制，而宏观经济管理因素是指政策稳定性、通货膨胀和汇率（Bejan 2000：60）。

② 很多优秀著作分析了匈牙利的转型问题：比如，针对减少规制、稳定化、通货膨胀、财政平衡和转型危机的研究（Lászó Antal，Lajos Bokros，György Csáki，Gábor Hunya，Gábor Karsai，János Kornai，Gábor Oblath，György Surányi），针对企业私有化和企业行为的研究（Iván Major，Péter Mihályi，Éva Voszka），针对银行私有化和债务危机、企业相互拖欠、货币政策的研究（Éva Várhegyi），针对贸易和价格自由化的研究（János Gács，András Nagy，Attila K. Soós，Wim Swaan），针对新政治、文化和经济精英阶层的研究（Erzsébet Szalai，Csaba Gombár，László Lengyel），针对民主选举、民主党派、市场和民主的研究（AttilaÁgh，László Bruszt，András Bozoki，András Körösényi，Péter Gedeon），针对失业和地区不均衡的研究（János Köllö，Károly Fazekas，Jenö Koltay，Róbert Gaál）。

与模式相符的——调整战略，导致与模式相符的自我耗竭过程。

1973年石油危机对匈牙利经济没有立刻产生影响。匈牙利政党和国家领导层认为石油危机是暂时的，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确信通货膨胀不会传到匈牙利国内。事实上，由于匈牙利国内价格结构以及匈牙利与苏维埃集团计算能源价格的模式，导致这种影响只不过被延迟了（Hagelmayer 1975）。由于可以从集团国进口便宜的石油，再加上一些国内附加价值，便可以以一个较高的价格出口到西方市场，所以匈牙利的贸易条件得到了改善。保持持续增长的经济政策仍然稳定；国家发展计划没有根据国际形势来作出相应调整；企业也类似地行动。已经包括在五年计划财政背景中的国外贷款，从1975年开始每年翻一倍，以资助刚性的经济增长和消费（Bozzai and Farkas 1989：30－37；Bauer 1983）。然而，反应迟钝的经济政策，就像它们在整个集团中那样出现了反弹，[①]反映了类似行为（Bunce 1985；1989c）。然而，匈牙利经济和经济政策对国际危机的反应越不敏感，几年之后需要支付的账单就越多。

从1977年开始，匈牙利在经济管理和政策领域感觉到与再生产约束硬化有关的张力。引发的问题反映了自我相似的动态运行现象：资源短缺，预算赤字，有选择的企业软再生产约束，过度投资，库存积压增加。结果是高水平的消费，出口增长未达到计划标准，但是进口增加比期望的更多，高水平的外债。

1977年中央委员会决议分析了这些变化和进一步行动，[②]承认从前旨在提高凝聚力的常规反应是非效率的。例如，进一步攫取，更加紧缩，抑制（holding back），集权化再分配以便更严格的选择，经济结构调整，注入新资源以促进结构变化，规制、工作风格及人员改变，等等。到了1978年初，自我相似的动态运行及其影响在国内激起的流动性张力增加，变成了一个需要严肃考虑的问题。

与较大聚合体的关系中的约束硬化，来自网络外的预算约束硬化，加

---

① 参见估计1970－1979年间集团国硬通货债务的表格，Bunce 1989c：245。

② The December 1, 1977 HSWP Resolution on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1978 plan of the people' s economy and the state budget, in Resolutions and Documents. op. cit. , 600 －632.

剧了流动性问题，因为这几乎是苏联和西方贷款容易得到的最后时期。再者，在这一阶段，匈牙利要开始履行还贷义务（Bozzai and Farkas 1989）。在经济问题累积的同时，经济政策领导层被迫公开承认了国家层面上产品结构现代化计划的失败，在增加苏联能源和原材料进口时遇到大量的内部和外部障碍（Pásztor 1983；Bozzai and Farkas 1989）。

在这一阶段，对金融和结构问题的常规反应显然不再有效。再生产约束硬化、张力、凝聚力损失的潜在威胁，有助于实施新的改革措施和经济政策上的观念转变。

激进的紧缩措施、优先领域转移、与形式相符

到了1978年后期，在硬再生产约束条件下，领导层被迫放弃从前的这一坚定信念：能够保持持续增长是社会主义试验的特殊力量（Bauer 1982）。在政治上很难承认，必须放弃1956年以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的首要性，而把经济平衡置于首位。[①]领导层必须面对过去几年来的经济失败（Bauer 1982）。对弱化了的网络凝聚力实施了新的、更激进的紧缩措施。采取措施阻止个人干预和被弱化的反馈。这一次，改革者与迫切要求紧缩的那些行为人的不同动机达成了一致。所有有关行为人从他们自己的角度都认为，必须实行部委合并，解散大企业，限制部委和党委的调解作用。保守者发现这些行为对集中权力是必要的，改革派则想通过这些措施提高对市场的适应性。然而，措施很快就与形式相符了（详见Csanádi 1997b：202－225；1985）。

在实行紧缩措施的同时，根据政治局的命令，在政治和政府的最高层级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开始全面分析复杂的经济管理问题。[②]来自这些委员们的报告确认了需要采取紧缩措施，但他们认为出现这样的危机形势，是由于整个经济决策和管理体制运行不好。

---

① Report to the EPC on the first six month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economy and on economic policy ideas of the 1979 plan of the people's economy, 14 August, 1978, DEP 63/a/S（M. Cs.）.

② Concepts on the evaluation of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main guidelines on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in the Sixth Five-Year Plan（Department of Economic Policy of the CC, 6 February, 1979: 3——M. Cs.）.

报告分析了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同时也分析了内部和外部金融平衡中的干扰。1979 年 2 月，政治局收到了由中央委员会的经济政策部提交的这些意见。通过描述新的、可吸收资源的危机前景，该文件探索了进一步改革和改变优先发展领域的政治决策。[①]

在两种可能性当中，从苏联获得硬通货贷款的可能性由于不切实际而被直接驳回，从西方吸收资本的可能性被联系于全面转变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匈牙利认识到，国民收入分配和整个经济政策必须有利于吸引净外国资本（总量要超过还债所需）。总之，匈牙利的领导们必须面对国家层面的**硬预算约束**，因此必须相应调整内部条件。

基于新的出发点，给定外部预算约束，不可避免地要对国内消费进行强烈压制（包括修改与生活水平有关的政治目标），因为没有资源来支持这种消费。被建议的措施同时包括自由化和稳定化努力，例如，引入反映世界价格的、新的综合价格体制。它们包括解散大型企业和非赢利企业。它们还包括合并不同部委，裁减其行政职能和职员数量以抑制干预，建立双重银行体制（two-tiered banking system），企业和基层领导班子选择的分权化。因此，由于再生产约束与外部（预算）约束同时硬化，所以越来越有可能在实行激进的紧缩措施的同时实行全面改革。

我们可以发现，除了同时实行限制性的自由化和分权化措施之外，还有国家决策潜能的增加和降低，模式特有的资源调动型改革，资源创造性努力和撤离的迹象。例如，1980 年经济政策委员会 1 月 28 日会议一致同意，在农业和工业部门基于国有基础结构大规模发展次等经济（局部市场）（Gábor and Galasi 1981；Gábor 1986）。在农业中，私有（家庭）农场耕作再次被当作是合作社耕作的补充部分（Berend 1990：280）。在工业中，国有企业内部建立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工作小组。他们在管理层同意下使用国有设备和投入。当为了更高的收入而加班时，这些工作小组再次变成生产性的；这种思想很快散布开，并动摇了原有的根基。在商业上，通过更多地把服务行业的小国有商店和餐饮网点以固定租期公开出租给家

① Report to the Politburo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Hungary obtaining foreign credit and on the plamied scheduling of the 1980 consumer price system, DEP-HNB joint report, February 4, 1979 in Csanádi 1997b: 216.

庭，部分地撤离服务业部门的科层线。这些商店很快变成税收来源（Berend 1990：284）。通过私有和国有资产的合作而部分地撤出网络，似乎在资源受约束的情形下提供了新的可吸收资源。

也是在1980年初，政府决定**扩大私有部门**，放松1970年代中期所确定的许多障碍，导致服务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小型企业在数量上的发展和扩张（Fekete 1984；1990；Berend 1990：278，290）。采取这种决策不仅确保了有更多的资源用于恢复结构，而且同时也通过促进所有制、职能基础、组织、利益和社会多样化及后来的多元化，为网络的相对收缩提供了平台。到了1980年代中期，小规模私有活动占了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Berend 1990：289）。

与形式相符的分权化措施

然而，紧缩和改革措施引起的资源调动效应，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期。旨在进一步集中决策和资源的这些努力，很快就与流行的权力结构和自我支持过程的强制性路径出现了冲突。这种冲突在模式的背景中有许多征兆。例如，关于1980年价格改革（旨在逐步引入世界市场价格）的第一批报告，解释了这种改革最初的一次性收入差异效应（one-off income-differentiating effect）。但是，这些报告也揭示了在这种最初差异化之后几乎直接的收入再平衡（re-leveling）（Falubiró and Gólik 1981；Mohos 1981）。这意味着，世界市场价格只能有选择地获得立足处，更加有助于维持生产、企业、收入、出口结构的强制性路径。

除一些特例外，解散大型企业的计划也失败了（Voszka 1988）。管理层重组的范围也受到限制。只有三个部委被合并。在一年之内，新部委——由三个部委合并而成，职员数量降低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并且被剥离了行政职能——的运作方式与从前完全相同。在那一年，企业调停的直接压力从分支部门转到职能部委（匈牙利国家银行、财政部、国家价格办公室）。结果，职能机关的行政干预范围拓宽了。同时，地方和中央政党机关的经济政策和组织活动增加，在这一领域安置的职员人数也增加（Csanádi 1985）。所有这些意味着，三个部委合并并没有停止经济干预，只不过是当局的权力关系被重组：更加有利于职能部委、地方和中央政党机关。促进自由化的其他措施衰退了。银行改革无限期推迟。企业管理层

任命的分权化在规划中被放弃（Csanádi 1997b：224）。

自我相似的行为、以上与形式相符的过程、从而通过强制性路径的权力结构再生产，很快地导致再生产约束再次硬化。恶化的国际形势导致整个体制的**外部（预算）约束硬化，提高了**再生产约束硬化的**频率**。之后便是重新开始的限制高峰。再生产约束硬化的影响范围扩大了，逐渐变成持久态势，造成长期衰退和“限制螺旋”（Antal 1983；1985）。

这些**陷阱开始主导**体制的运行。由于僵化的经济结构被扩张的反馈所支配、被苏联进口偏好所加强，体制能够调动的内部资源越来越少（Pásztor 1987；Szamuely 1986）。在西方的衰退时期，对国外贷款的还本付息义务、必须满足仍然受约束的进口要求，迫使匈牙利经济转变为强制性出口，这进一步促进了传统上具有特权的僵化工业结构（Nyers 1989：11）。苏联原材料和能源的不规则交货造成了相似的效应，由于匈牙利向苏联出口的贸易条件恶化，要满足这种贸易条件就需要继续增加从西方的进口数量。同时，由于不能进行调整，导致出口结构不符合世界市场需要（Kd-ves and Oblath 1981；Salgó 1989；Nyers 1989）。结果，在努力继续尊重偿债义务却不能从网络内攫取的时候，匈牙利被迫增加了越来越多的短期贷款（Bozzai and Farkas 1989）。

在1981－1982年间，匈牙利濒临金融崩溃。有一次连国家的黄金储备都卖掉了。匈牙利只好采取日贷款或周贷款的形式来维持偿还能力。储备只够支付不到三周的进口。保持不发生骚乱和崩溃的唯一出路就是，加入IMF以获取进一步的资源。当时的苏联总理柯锡金（Kosygin）在事先的磋商期间对此持消极态度。他警告匈牙利不要过多地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影响。然而，没有进一步的资源可供分配，苏联别无选择，只能把责任推给匈牙利领导层。在这次访问之后，匈牙利政治局对该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但是中央委员会进行无记名投票决定加入IMF。匈牙利无力支付加入IMF的入门费。在匈牙利国家银行主席对中国进行了一次短暂访问之后，中国政府为匈牙利支付了这笔费用（Bozzai and Farkas 1989：36－46）。

同时，由于内部条件和世界经济衰退，获得追加长期贷款的机会消失了，而为了还本付息，再加上利率上涨，只好增加新的短期贷款，这造成了债务上的滚雪球效应（Bozzai and Farkas 1989）。所有这些对增加出口、

寻找短期贷款、削减国内消费、提高价格、降低生活水平、减少就业机会、恢复改革积极性施加了更大的压力。

但恰恰是这种体制的运行吞噬了以这种方式可得的追加资源，从而无法偏离固定的路径。匈牙利的社会和经济决策者承受的压力增加了，他们没有重组或复兴经济。在体制内没有要素可以基于经济效率去停止模式特有的自我支持过程（Nyers 1989：12）。所以，在国内再生产约束和外部预算约束持久硬化（外部环境）期间，**自我支持过程中的动态运行陷阱强化了自我破坏的特征。**

14.3.2. 政党作为一种制度结构的解体

解体的早期阶段仍然是隐藏的，因为这一过程仍然局限于政治垄断结构的封闭式渠道。直到1980年代末许多问题才公开化了，这时候相互联结的依附线被打破了，政党科层内的依附性降低。

解体过程有几个层次。在第一层次，决策者行为模式改变，他们在结构内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第二层次，联结国家与政党科层的相互联结的依附线变得越来越稀薄，最终断开，同时独立横向形成的政治和利益集团纷纷涌现。在第三层次，大量的体制构成要素——政党科层和国家科层——逐渐解体或转型。解体的这些层次不必然是依序的。

解体的第一层次

到了1985－1986年，在经济、政治、政府组织的代表之间，依附关系开始出现明显变化。这一时期在国家层面上的典型特征是：社会张力凸显，遍及整个体制。经济领导层的目标总是不能实现（materialize），改革措施的利益效应也从来没有实现。承诺与绩效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经济不再动态增长，而是萎缩了。资本没有促进加工工业，而是继续投向重工业。价格没有降下来，反而出现上涨，生活水平继续下降。就业、供给问题和瓶颈出现，而实物交易基础上的讨价还价越来越普遍。期望实现内外收支平衡，但结果却是日益增加的外债和持续上涨的预算赤字。然而，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后改变了苏联外交政策，导致张力伴随着这些措施的实施而增加，各个政党－国家体制的整个隐藏力量在各个方面都有所下降。

由于一系列失败、张力增加、隐藏力量下降，导致权力结构的稳定性大大下降。不顾张力、失败而继续强制攫取资源，以及越来越新的改革的出现，在那之前就已经开始瓦解该体制的基本特征。这些导致了权力结构的加速弱化。

解体的第二层次

1984 年 4 月中央委员会决议确定了企业经营改革的基础，这标志着改革过程出现了新的转变。两年后，迫于紧张局势，中央委员会把政党在经济中的作用提上议程。[①]尽管中央委员会强调，为了实现中央确定的经济目标，不同层级的政党组织的责任更大了，但是中央委员会在权力结构内推行了经济合理化、精简机构、分权化以及后来的多元化过程。这些措施尽管减轻了中央领导层在资源分配中的负担，但是不经意地导致了这些工具的限制和弱化，通过这些工具，政党可以维持其政治垄断，无力扭转衰退和债务增加的趋势。

合理化包括党和国家科层内的机构变化。原来委员会委员资格是无限期的，现在只限任两期。中央委员会的三分之一成员每隔五年要改变一次。在政党和工会选举中要引入多候选人制度。非政党成员也可以担任重要职务。需要通过正式申请来确定的岗位数量将被扩展，这些岗位的任命都采用统一标准。[②]尽管所有这些步骤有助于调动和吸收新的熟练工人，但是它们也削弱了权力结构内某些重要政治职位的稳定性，以及把这些职位与政党联结起来的依附线的稳定性。

分权化措施包括在较低层级的政党科层中把更多权力委托给决策者，以这种方式改变 D_1 和 D_2 依附线的起始层级。例如，在选举区第一书记之前，不必再经中央委员会的事先同意，只要得到布达佩斯党委会（逐级向下）的预先同意就可以。这种决策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它使区委书记在与中央领导层的关系中拥有的自主权稍有增加。但是，另一方面，区委书记失去了一根重要的线，本来他们可以通过这根线向着决策结构中较高

---

① KárolyNémeth "On the cadre-work of the party——18 March 1986 session of the CC", *Pártélet*, 1986, No. 4.

② "March 18, 1986 session of the CC", in *Pártélet*, 1986, No. 4.

层级提高他们自身的利益，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那些行为人的利益。[①]

政党通过互联线能够实施的控制权，由于在1985年议会选举中引入了**多候选人制度**而被进一步削弱。这种行动多少扰乱了区党委书记的传统控制方式：规则上的这些变化导致党委的影响力不再与从前一样。互联线弱化，尽管根据政党文件，选举委员会的主席在区内仍然是地方政党的群众组织部的一把手，选举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委员由区党委推荐，但是候选人提名还是需要地方党委的事先同意。[②]政治垄断被打破从以下事实中可以得到反映：870名议员候选人当中，有176名最初是由公众推荐的，其中74名最终成为候选人。[③]

1984年，通过在国有企业中引入**新型管理模式**，类似的压力被施加于相互联结的依附线。[④]部委监督企业的权力被废除，他们不再拥有企业经理任命权。经理职位要公开竞争，由企业领导层、企业各部门利益的代表组成的企业委员会来任命。党委书记退出委员会，或者，如果参加选举，也只有一票普通投票权。任命的分权化还使区政党与部委的人事部门之间的紧密联系变成不相关的。经理的新的优势在于，能够把他/她自己的目标作为集体决策，并且他/她过去的决策也是集体选择的结果（包括他/她的提名），这也使得更加难以通过相似的互联线来施加影响。[⑤]该结构主要要素上的这些新变化，[⑥]意味着政党日渐失去了通过互联线实施监督和影响的能力，而经济管理者的监督和影响行为却得到了发展。

---

① Minutes of the 13 Congress of the CC, 28 – 29March 1985 (Budapest: Kossuth Könyvkiadó).

② The proceedings are based on the 25 July 1985 C C resolution "For the political and organisational preparation and completion of the 1985 unified parliamentary and council membership elections" (HSWP Institute of Party History Archives, 288. 20/21, s. u.).

③ 1985年议会选举的经验。(Budapest: The Social Science Institute of the HSWP, 1988: 14)。

④ 5007/1984 resolution of the SPC on the tasks of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of economic regulation, 7 March 1984 (M. Cs.).

⑤ Report to the ECS on the experiences and problems of the shift to the new forms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MF, 1986 (archived by M. Cs.).

⑥ 例如，经理岗位引入多候选人制度，对他们进行无记名投票，限制经理任职期限，从企业委员会的正式成员中排除企业党委书记，经理从分支部委中独立出来。

于是，在结构内维持依附和提升利益的可能性在整体上大大下降。依附线明显地变得越来越薄，因为作为利益提升的渠道，它们实际上没有任何力量保持分配能力被削弱的状态，有一些完全被打断。承诺与绩效之间的差距扩大导致党员当中的失望、不信任、张力增加。用于党员在物质、信息、职业等方面的优势逐渐消失，强化了这种不安全感。

不满和不信任被**体制合法性危机**进一步恶化。匈牙利政党－国家被迫放弃大量的传统优先权，至今看来这是明智之举。例如，中央计划的突出重要性和可靠基础，充分就业，生活水平的稳定增长，让公众参与所有的文化和艺术，免费医疗保健和教育，稳定的价格，稳定的政府养老金的购买力，政府提供住房或建造经济适用房，国家所有权的首要地位，工人的权力，排斥私人和国外资本，等等。

所有这些因素促使越来越多的党员**退党**。[①]退党人数越来越多，招募新党员越来越难，表明人们越来越不满。传统优先权的重要性下降，改革尝试反复失败，越来越新的攫取手段层出不穷，同时，剧烈张力、不信任和不确定性扩展到整个结构，已经使政党机关的活动陷于瘫痪。政党已经不能传递、协调、选择利益。因此，决策者作为抗辩者的从前理性关心（利用依附线、适应通过依附线传递的期望）逐渐消逝。

由于中央预算赤字和整体上的再分配问题，中央预算对地方政党机关的经费资助也被削减了。从那以后，中央持续不断地削减经费资助。最初，人员数量被减少，后来，资金缺乏又导致进一步裁员不可避免。这也破坏了控制和影响力的实施。

除了互联线的数量和强度下降、监督和控制的物质限制增加之外，需要监督的越来越大的**制度结构复杂性**进一步降低了施加影响的可能性。改革深化导致了组织、职位、财产、利益关系中巨大的多样性和差异性（Andorka 1992；Laky and Neuman 1990），它们使得不可能有效利用传统的互联线。

除了正发生的差异性之外，旨在吸引外资进入匈牙利的新法律与监督

① 在1988年和1989年，布达佩斯20%的党员（43702名）退党了（Report of the HSWP Budapest Party Meeting Preparatory 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Budapest party structure and the changes to it）。（Budapest PC，1989）（archived by M. Cs.）.

和控制的传统工具之间出现了日益明显的不相容。在国家行政改革的实施期间，它们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Kilényi et al. 1987）。这时（不是碰巧），机构内的政党活动被质疑，根据居住地而不是工作地来组织党员的思想被首次提出。

该时期是政党组织地方官员中大规模人事变动的开始。在1985－1989年间，80%的人事发生了改变。结果，专家在政党组织内部的比例增加了（Gazsó 1993）。这部分的由于更开放的、松散的结构所提供的机会，部分的由于需要处理更加差异化的环境所提供的机会。国家和经济领导层也发生了相似的人事变动（Lengyel G. 1990；1992a；1992b）。

由于以上所说的直接和间接的因素，大多数决策者无望通过依附线来提升他们的利益。因此，该体制失去了其行为人克服困难的意愿：从与其他行为人根本没有机构联系的那些行为人开始，直到不再能够通过 D_1 和 D_2 线来提升利益和有关反馈的那些行为人。即使在他们能够引起巨大的政治敏感性的时候，他们也缺乏能力和优势去吸引资源。

因此，决策者通过隐藏渠道的零散利益提升的利益和活动大大降低，这降低了相互作用的强度和体制的合法性。因此，体制很快失去了政治利益激发的行为模式（political interest－motivated behavior－ patterns）所产生的**凝聚力**。

解体的第三层次

再生产约束和外部（预算）约束硬化不仅仅发生在匈牙利：在所有的集团国以及集团本身都出现了这些变化。因此，谴责匈牙利体制不能正常运行、干预以及干预失败的原因，不再可以容易地转变为通常的“外部”因素。由于失去了苏联隐藏力量，苏联干预的威胁使这些张力不容易被抑制。这种形势有助于进一步快速弱化处理政党内外问题的意愿（readiness）。它增加了持不同意见者的机动空间，并促进了党内派系差别的表面化，这种差别导致了关于承认或否认危机形势及解决方法上的公开冲突（Berend 1990：246－258）。

然而，累积了最多反馈的那些企业的行为模式**仍然没有变化**，这些都促进了雪崩效应。政治权力的经济基础缩减到具有累积反馈的那些行为人的圈子，他们的行为模式——由于强制性路径——仍然由政治理性决定。

同时，这些行为人拥护过时的、仍然僵化的生产、出口、进口、职业和社会结构。因此，通过依附线而被垄断的总体责任，以及此前就被权力把持者为确保干预、汲取资源并进行有选择的再分配等方面的特权而激发的总体责任，产生了相反的结果。恰恰是这些依附线现在瘫痪了，并俘获了权力精英，因为它不能把责任直接转变为总体危机。由于体制的自我相似结构和特征，这也正是苏联以及其他集团国所发生的情况，但是中国出现的是相似陷阱。当时，戈尔巴乔夫——为了降低国内张力和逃避对周边国家的责任——把非干预作为他的政策的基石（Bunce 1985）。

政治领导层不愿意公开承认全面的危机。可转换债务从1975年的20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90亿美元、1987年的180亿美元，而可转换出口的价值停留在50亿美元（Nyers 1989：13）。政党组织内部的年轻一代——大多是技术官僚（technocrats），对领导层施加强大的压力，要求领导层面对危机，明确指出保守主义领导在这一问题上的责任。共青团、工会、国家机关中的年轻一代和地位逐渐上升的技术官僚也施加了同样的压力（Szalai 1994）。独立的科学界和文学界利用总体上的不确定性，公开发表他们的批评。在1987年，专家集团关于稳定化和全面改革的建议，[①]促使中央委员会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方案，包括改变结构的主要要素。[②]

然而，1987年中央委员会大会上所提议的方案没有被实施。尽管如此，但总体上的危机形势迫使安排了1988年5月的全国党代会，在会上，对危机作出反应的那些人开始发动经济和政治改革，旨在实现政党组织的民主化。这次大会上发生了两件政治大事：一是免去了亚诺斯·卡达尔的政党第一书记职务，而当选党主席——一个有名无实的职务。二是从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中剔除了年龄最大的和最妥协的成员，防止他们再次被

① 参见他们的概念，“转变与改革”，Medvetanc，1987，Vol. 7，No. 2，Supplement，5－318.

② 这些决议意味着在非常短暂的稳定之后，应该实施广泛的经济改革：体现国际竞争性的价格体制和价格机制，体现劳动的社会效用的工资改革，融入世界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关系的发展，所有权的多样性，社会主义农场的副业活动和私人活动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决议还强调，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对政治机构运行实行现代化（Berend 1990：257）。

选入中央委员会。[1]

中央委员会建议政党科层内实行决策分权化。更具体地，这意味着通过干部制度分权化来分化互联线，通过减少干部名单中的职位使互联线更稀薄，从国家活动中撤离互联线。中央委员会还决定在政党科层内撤离 D_1，例如，通过在更低层政党组织中实行无记名投票和多候选人制度，直接任命较高层级委员会代表的可能性。它强调通过信息自由、制定关于集会和协会的法律、废除官方工会垄断，使 D_1 线在国家科层内撤离。网络的相对和绝对收缩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得到进一步推动，这次会议宣布通过私有部门扩张和不受限制的市场而转向混合的所有权结构（Berend 1990：292）。这些措施进一步破坏了相互联结的依附线和政党内的依附线，[2]为出现从前被结构禁止的横向联合准备了基础。

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央决策难以实施。在地方层级类似的决定性会议的安排，变成旷日持久的权力斗争。在类似会议扩展到整个结构之前，由于地方党领导的抵制，而又没有确定先例，导致会议安排花了大量时间。例如，在布达佩斯，召开这些地方会议几乎花了一年时间。在党委书记更加有权力的县，斗争退化为粗鲁的策略。并非偶然，在整个国家，地方政党机关内的腐败在这个时候开始被揭露，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政党本身已经很高了的反感（Csanádi 1997b：248）。在不满增加和经济危机加深的同时，干部体制的分权化继续进行。保留在中央委员会干部名单上的职位越来越少（Csanádi 1988）。分权化还伴随着党委会的精简，这降低了反馈的数量。这一过程要求免去许多企业党委书记的职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增加的结果是：那些新当选的人不再是全职的政党工作者。他们都努力寻找或保持在企业内的民事工作。转变为或保留在民事工作中的党委书记的依附性，在他们的区干部职务被罢免的时候变得明确了。被取代的那些党委书记或者离开了企业，或者在企业内从事一些低层级的工作（作者的访谈）。

---

① July 14, 1988 session of the CC, in *Népszabadság*, 15 July 1988: 3－4.

② Secretarial Bulletin of the HSWP CC, No. 1, CC Department of Propaganda and Canvassing, 1988 (M. Cs.).

在 1988 年 7 月，中央委员会决定进一步进行干部分权化，[1]只保留 435 个最高层领导职位。中央委员会决议建议，各个较低层级的政党科层要进一步实施干部责任分权化。1988 年 10 月布达佩斯党委会废除了它的整个干部名单，加强了这一趋势（作者的访谈）。这种行动进一步削弱了各个区加强各自利益的可能性。这样，他们的职位被进一步弱化，从而导致进一步的分权化。

14.3.3. 政治转型的经济条件

封闭式渠道的开放，网络内外横向联系的出现

由于凝聚力迅速丧失，导致沿着 D_2 互联线的**封闭式渠道打开了**。各地区、活动、组织及决定者背后的隐藏力量部分地或者全部地消失了。个体领域从政治垄断依附性中解放出来。结果，以前被体制凝聚力所掩盖的**扭曲**，改革措施的吸收和与形式相符所导致的扭曲，或政治理性考虑对其他非政治决策的影响所导致的**扭曲，现在都显现出来**。从前一直被压制的分裂所爆发的累积张力，得到了缓解，并显现出来。

打破互联线、暴露的扭曲、表面化的压力等明显迹象，极大地促进了横向组织的出现，以及不同规模的压力集团的同时出现[2]：或者通过在传统机构中利用被长期遗忘的权力，或者不通过这种方式。这些集团在官方组织内部、组织之间圈子里或组织外部，越来越有力地提出他们的利益和要求。

在这些事件的过程中，政党失去了影响经济的所有能力。政党机关中管理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的职员被架空。能影响企业决策的仅剩下指导者体制（instructor system）的那些互联线（在 1986 年被大大削弱），以及企业内关键职位和被削弱的党小组中的党员党纪的那些互联线。但是，在干部权力（作为保持依附性的工具）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没有更多资源可供再分配的环境下，这些最终都完全无效率。随着政党的影响力下降，网络内活动的强度从传统的互联线转变为国家科层内的互联线（Szalai 1989；

---

① July 14, 1988 session of the CC, op. cit.

② Kurtán et al. , eds. 1989: from 699 ff.

1994）。互联线网的持续削弱以这种方式来改变结构内的权力关系：它增加了国家科层的权力，从而增加了在国家科层较高层级上有反馈关联的那些行为人的讨价还价权力。

政党科层内 D_1 依附线弱化的加速和扩散，进一步加剧了党作为一种制度权力结构的迅速崩溃。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在停止垄断状况和放松凝聚力的同时，政党内部权力冲突也逐渐公开化、激烈化，并扩散到整个政党科层。在党内利益差异化的基础上，伴随着权力结构的解体，党内也开始了政治党派多元化的过程。利益最初表现为观点差异，然后表现为一些倾向，最后表现为具体的竞争性平台。政党日渐分裂，争夺制度结构所有权的时机也成熟了（Ken 1991）。

随着互联线的打破，现在多余的政党机关开始解体。与此同时，所有通过利用政党科层内互联线或者 D_1 依附线而产生的那些反馈都变得无效了。政党作为一种垄断制度结构的衰败过程已经加速。

这时，互联线和党内线的打破（撤退）滞后于迅速解体事件。只有当政党机关的职员被减少、在党委书记的影响力已经被大大削减的时候，才取消全职的党委书记职位。在各派已经公开开始建立其各自的群众基础的时候，才出现了在党内建立平台（platforms）的可能性。只有当新的党派已经迅速成长起来之后，对共产党合法性的质疑才会提上议事日程。只有在许多新的独立协会、工会、经济和社会利益集团已经成立（没有互联线）之后，政党对几乎每一种社会组织和职位的权力的合法性，才会提上议事日程。只有当留下来的特权相对较少的时候，对既得利益者（the favored）的许多特殊让步才会被废除。一旦政党组织的影响能力和调停作用大大下降，政党组织在非政党机构内的合法基础便开始受到质疑。政党机关早已失去了许多职能，党员们正忙于寻找其他非党工作，但是政府没有明确解释政党机关在特定情况下的作用。当围绕政党干部体制问题展开讨论的时候，该体制已经起到了与最初意图相反的作用。这时，政党再也不能通过由干部体制所提供的直接关联来支配资源，相反，政党陷入了全面危机。

到了 1988 年末，互联线已经不能“覆盖”经济领域，更不用说社会和政治领域。由于所有的这些变化、压力和不稳定性，政治局在 1988 年

10月对新出现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忍耐力，为认可政党其他运动设立了一个非常简易的标准，并允许党员参加这些运动。[①]实际上，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HSWP）甚至给他们提供了政治联盟。

在1989年2月初的会议上，中央委员会承认需要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在这次重要会议上作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宣布1956年事件是一次受欢迎的起义，而不是反革命，在这次起义中出现了民主社会主义力量。[②]这一宣告使人们开始回顾和质疑该体制的合法性，因为它在苏联军队的支持下血腥镇压了1956年的起义。在2月中旬的会议上，根据中央委员会的记录，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放弃了作为领导党的主张，并宣布希望成为一个政治党派。3月，布达佩斯党委建议全面废除干部体制。[③]4月，布达佩斯党委也公开为在党内发展各种改革集团的横向组织而辩护，[④]尽管这与科层原则是不相容的。这也导致勉强接受竞争性平台的原则，这一原则在早些时候被直接拒绝。

在1989年5月，中央委员会开始发起全面废除干部体制。中央委员会宣布只在政党职位上实施其权限；并号召撤销政党领导的工人民兵——1957年建立的武装力量[⑤]——的从前决定。这些步骤进一步削弱了组织内政党集团的合法性，就像工人、民兵合法性被削弱一样。然而，将总部从企业转到地区组织的建议仍然遭到抵制。对于把吸收党员的范围从企业转到地区，政党组织最大的——也是有理由的——顾虑是，如果出现地区组织，他们将失去很大比例的党员。

在解体的过程中，在日渐上升的内外张力中，权力精英变得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善于接受来自网络内外的改革压力。由雷热·涅尔什（Rezsö

① "The October 4, 1988 meeting of the HSWP PC", in *Népszabadság*, 5 October 1988.

② "The February 10 - 11, 1989 meeting of the CC", in *Népszabadság*, 13 February 1989.

③ "Interview with the First Secretary of the Budapest PC", in *Népszabadság*, 18 March 1989.

④ 观点涉及：政治主动权、批评、思想自由、党内争论、平台形成自由。政党争论（HSWP CC Department of Propaganda and Canvassing 1989, No. 3）。

⑤ "The May 3, 1989 meeting of the CC", *in Magyar Nemzet*, 10 May 1989.

Nyers）领导的改革委员会建议全面变革经济政策：向世界市场开放，并把匈牙利经济融入世界市场；快速使经济脱离苏维埃集团，不再让国内生产服从于苏联的进口利益。该委员会还建议社会和政治体制实现民主化，实行财产关系改革，这两项措施都增加了民众支持（Nyers 1989：11－35）。

根据日渐强大的反对集团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反对者的要求，政府与新政治集团在1989年5月开始谈判。这些会谈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分量，合法性逐渐从议会转向这些谈判场景。[①]在几个星期内，谈判所达成的协议成为议会议程的重要内容。在没有这一特别议会论坛（extra－Parliamentary forum）通过或修正之前，议会再也不能对议案进行争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艰苦谈判来阐明对宪法以及所谓关键法律的修订：信息法、政党法、选举法的自由，以及对现有法律的许多其他重要修订。[②]

在达成协议之后，把该结构扭在一起的剩余互联线，与已被接受的变革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在1989年的前8个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有68000人退党，而只有2600人入党，最后只剩下724600名党员，而以前有790000名党员。[③]

政党转变为一个强大政治实体的有限机会

在政党权力最初逐渐削弱和解体的情况下，随着新党派成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空化和撤离、新政治结构的引入，政治转型进展迅速、平稳。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投票决定将政党转型为一个政治实体，并且在改革派的积极支持下，它自行解散了。最后一次党代会于1989年10月初举行。代表们承认并宣布结束垄断权力关系，主动抛弃从前的管理、权力、控制方法。在第4天，代表中的改革派，或者更具体地说，改革派共产党领导们在改革问题上说服了与会代表。改革平台推动了政党的组织制度民主化、简短的社会主义精神（socialist－inspired）党纲获得批

① 全国圆桌会议的参与者有：（1）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2）新的反对党派；（3）工会，以及新的和旧的社会组织（Vigh 1989）。

② Report on the June 27 － 30 1989 session of Parliament, in *Magyar Nemzet and Népszabadság*, 1 July 1989.

③ *Népszabadság*, 4 October 1989.

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机关的废除、匈牙利社会主义党（HSP）的成立（作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正式的［合法的］继承者）（Bihari 1989；Ken 1991；Lengyel，L. 1990）。政党财产的分配也提上了议事日程，自由选举已经开始。

实行了自由选举，有6个党派成功地进入议会。[①]主要由解散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老党员组成的保守左派，没有达到进入议会的最小额定人数比率（4%）。共产党改革派在自由选举之后变成一个小的议会反对党派。从前持不同政见的保守派右翼成立了第一届政府。

组成政府的新的中立保守派精英，由缺乏经验的中层知识分子组成。崩溃和政党－国家保护伞全面撤离之前的那几年衰退所造成的不确定性、社会和经济张力，引起了政治上的几次短期摇摆，使统治精英不受欢迎。这导致选民不稳定和形成极右派，但是没有出现重大的政治不满。[②]连续几届政府遭受了多次轻度危机，但是仍然幸存下来直到下一次选举。

14.3.4. 经济转型的政治条件

经济转型的法律条件

经济和政治转型过程的制度化，最初在权力逐渐削弱的共产党改革派与相对结构化的、稍微制度化的、逐渐上升的反对派之间的圆桌会议上进行谈判（Richter 1990；Szalai 1994；Bruszt 1990；Csizmadia 1995）。如前文所述，在这些谈判的基础之上，最初的议会和后来形成党派的反对集团**在崩溃之前就通过了**政治体制民主化议案。

由改革派领导层通过的有关经济转型的其他几个议案——一些是在崩溃的前几年，其他的是在崩溃前夕——加速了分裂的过程，减弱了

---

① 这些党派包括：保守的匈牙利民主论坛，有着二战前后历史背景的两个传统党派（小农党，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后社会党，两个自由党派（青年民主党，自由民主党）。

② 在转型的前几年，只有一次出于经济利益而发起的全国性罢工：所谓的“出租车司机罢工”，起因在于政府提高油价。沟通网络的迅速形成以及支持者的一致行为，使整个国家陷于瘫痪。这种突发事件很有可能转变为全国性剧变（Sik 1991）。

(eased) 经济发展。[①]在1989年，共产党改革派、新形成党派的专家们、拥有高度专业化知识的改革派政府官员共同成立了许多联合委员会，讨论所有权改革，其实这种改革早已通过企业经理发起的自发性私有化而非官方地进行了[②](Voszka 1993)。他们还讨论了金融和经济领域中许多其他的关键问题。该代表团认为必须成立一个议会认可的国有财产代理机构，并要在1990自由选举之前组织起来，对私有化进程实行管理和控制。然而，这些委员会被证明是无效率的，也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无效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部分原因在于观点模糊或各持己见——从古典的私有财产到工人控制，从国家所有权及其保值的渐进式分解到激进式分解（Szalai 1994）。部分原因是结构性的：当时政府和政党的官僚机构实际上已经空化和削弱，而反对党却由于议会选举尚未开始而缺乏合法背景。

相对迅速的稳定与适应

在1980年代末，匈牙利经济停滞，进出口账户巨额赤字，硬通货储备日益下降。开始于崩溃前最后一届政府的宏观稳定化，由于一些政治原因而在1995年上半年之前中止了好几次，这延长了经济危机和内外债务，导致了私有化进程的时松时紧政策，增加了贸易赤字和通货膨胀（Kornai 1993)。同时，国内市场萎缩导致工业和农业生产持续下滑，失业增加，外汇储备短缺（Csáki and Karsai 2001：23)。在1995年中期，在国际收支

① 例如，关于外商合资企业的法律，尽管有些限制，但是在1970年代中期就引入了。1982年，为小型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合法可能性，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限制。1984年，经理的任命被分权化了，权力被赋予了企业委员会。1987年创立了双重银行体制，把国家银行从前的商业职能和货币职能分离开，1988年通过了《企业组织法》；1989年通过了《公司法》，允许私人公司发行股票，雇用最多500人。创造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途径，外国公司可以拥有最高50%的股份。1988年引入全面税收改革，1989年资本品进口价格被自由化，并进一步延期至1990年和1991年（Gacs 1991)。在1989－1990年，通过了第一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综合法律，雇员也拥有了罢工的权利。1989年，代表雇主利益的组织和工会被规范化。1990年建立股票市场，同年首次起草了《竞争法》(Swaan 1993；Csáki and Karsai 2001)。

② 这些转型主要是因为不确定的经济和政治气候的压力所导致的。这种私有化的方式包括将企业转型为持股公司，将单位控制权转移给持股者而不是政府（Voszka 1993)。

平衡张力突然上升、匈牙利经济政策的国际信心下降之后，政府开始推行一套宏观稳定化政策，私有化步伐加快。结果，匈牙利经济的内外平衡得到了飞速改进，危急的金融失衡威胁消失了，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Csáki and Karsai 2001：35－58）。

宏观平衡条件仅仅是转型特征所导致的张力的一部分。主要的张力源于制度和行为因素：转型的演进本质赶不上崩溃的步伐。在短期内，经济政策的大幅度摇摆、骚动中决策的偶然性，导致发展方向上的高度不确定性（Bunce and Csanádi 1993）。但是，从长期来看，匈牙利在崩溃之前已经引入的法律规则，可以相对平稳地接管崩溃后仍保留在过渡状态中的政党和国家垄断职能（Swaan 1993：118－140）。在自由选举之后，一些法律被飞快地通过——增加了决策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以便形成新体制的法律框架。在1990－1994年的执政期间，议会作出了796项决策，其中的432项是法律及法律修订，364项是决议。从1994年6月到1996年9月，通过了另外257项法律和240个决议（Csanádi and Páczi 1996：15）。在这一早期阶段，最重要的法律是首先在1991年建立的、用于管制清算程序的《破产法》，1992年通过的允许国有企业转型为工商组织的法律，1992年通过的集体与个人劳动法（Csáki and Karsai，eds 2001：66－68）。

与不老练的、新生的、来自中层知识分子的政治精英相比，经济管理者和部委职员更加老练，因为后者经历了自1960年代末期以来的崩溃前渐近式改革中的学习过程。这些环境确保了更加灵活的适应性（Swaan 1993：129－130）。严格地依附于国有经济的所谓次等经济，对于新的经济环境来说并没有成为一个有效的学习场所（Laki 1991）。只有相当少的国内企业家才能够在崩溃中幸存下来，并扩展从前建立起来的业务（Laki 2003）。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小企业仍然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生长。根据1998年的一项调查，大约40%仍然保留了政府工作（Laki 1999；Laky 1999：134，referred by Rona－Tas 2001：189）。[①]来自部委、前政党机关的经济政策部门、

① 大小企业主都有着特殊的社会背景。大企业主受过高等教育，大部分是男性，生活在城市中，有的来自国有企业的稳定高层，有长期管理经验，是党员；有的是中层领导，在1980年代中期离开他们的国有企业，开始私人投机。小企业主也有相似的特点，只是在社会地位上较低一点（Laki 2003；1999）。

国家银行、商业银行的中高层官员——迫于上升中的政党的政治运动——逃离政党机关，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实际经验和关系下海经商（Szalai 1994：201－211；Csanddi 1991）。

在国家科层中切断依附线：国有财产的私有化

政党－国家保护伞的消失，并没有动摇占竞争性部门（包括农业和服务业）资产85%以上的国有部门。国有企业的经理几乎没有察觉到政党机关和互联线的废除，因为在发生限制螺旋的同时，政党的权力和利益调节能力在整个1980年代都持续下降（Csanádi 1991；Interviews）。然而，国有企业对新环境的适应充满了不确定的联系：萎缩的国内市场，经济互助委员会贸易的不确定性，在世界市场的低竞争力，螺旋式上升的债务，补贴急剧削减，导致金融和市场危机加深的对外贸易自由化。为弥补亏损和不确定性，把运行良好的单位与困难企业隔开，适应市场条件，对失去成为大企业的政治优势作出反应，1980年代末到1996年可能经历了一场累积的企业拆分和清算的浪潮（Voszka 2001：140－141）。

国有财产的私有化最初是通过不同的权力机构进行的。自1990年以后，由国有财产代理机构集中和管理。私有化形式多样，购买者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尽管解体具有渐近性，但是私人企业中的资本累积直到1980年代末仍然受到法律的限制；国内储蓄不足以购买更大的国有资产（Voszka 2001：140）。对国外的企业家来说，尽管匈牙利在东欧是对外国企业家最具吸引力的经济之一，因为匈牙利的政治相对稳定、法律条件较好，但是，投资于私有化仍然是有风险的和不确定的。与私有化有关的政治可接受程度是不稳定的，规则经常改变。除了这个主要的代理机构之外，很难识别参与私有化过程的机构，因为领导、机构及其内部结构经常重组，他们的职能也经常重新分配。结果，程序不断地变化，职员的专业知识受到限制，处理个人交易的那些人经常地和偶然地出现和消失。信息贫乏，关于待售企业的数据不完全，该代理机构的部分企业股票已经不存在。负责该过程的不同阶段的组织之间的协调和信息流动是无效率的，程序的内外控制也是无效率的。[①]这种不

① 根据我在访谈中所得的信息，在私有化机构进行私有化的第一阶段，交易是在一个方形习字簿中用铅笔登记的（Csanádi 1999：225－239）。

稳定的环境使得决策具有偶然性,[①]容易导致腐败，并造成经济和行政决策者当中的累积不确定性（Voszka 1997；Csanddi and Páczi 1996：31 –41；Csanddi 1999：225 –239）。这些情况抑制了许多企业家的投资行为，并使许多其他人故意寻求短期收益。那些跨国公司也进入了演进中的匈牙利市场，因为它们具有稳定的物质和基础设施背景，不必过分依赖于不稳定的国内环境（Csanádi 1999）。

在十年的时间里，政府撤出了从前生产性财产[②]的90%，银行系统中的80%（Macher 2ooo：58 –59；Kornai 2000：210）。尽管存在这种不确定性，但是通过私有化而吸引来的 FDI 存量从 1991 年的 280 万美元增加到 1999 年的 1980 万美元。在流入匈牙利的 FDI 总量当中，投资于私有化的外国资本比率为 38%。在 1990 –1999 年间，从私有化代理机构的所有购买中获得的外汇收入占总外汇收入的 8%（Macher 2000：53）。到了 2001 年，外国控股公司拥有了近三分之二的认缴资本。

在 1990 年代，匈牙利在转型国家中是外国投资者的主要目标。在匈牙利，不仅累积的 FDI 而且单位资本 FDI 都高于其他的前社会主义国家。这一过程有着显著而长期的影响。在 2002 年，这些公司雇用了匈牙利 14% 的劳动力，特别是在制造业（36%）和能源生产行业（25.4%），雇用率更高。在匈牙利经济中，控制外国所有权的是中小型公司，但大多数领头企业都处于外国公司和投资者的控制之下。在匈牙利“100 强”企业中，近三分之二是外国控股的。外国公司在匈牙利经济中朝阳部门（例如商业、服务业、银行业、高科技产业）的存在和份额大大高于平均水平。农业、建筑业、运输业和传统夕阳产业对 FDI 的吸引力较小（Winiecki et al. 2004）。

---

① 决策的偶然性由于以下事实而进一步增加：代理委员会要超负荷工作，作出数千决定，这些决定不仅涉及私有化，而且还有涉及转型、停产、清算、移交、拆分、破产、持股，在没有一个清晰的市场价格的情况下处理上百亿国有财产（Voszka 1997）。

② 大部分经济部门变成 100% 的私有，电信网络和部分能源产业也是如此（Valentini 2000：198 – 214）。国有财产维持在原子能、电力网、运输、广播网、森林和许多国有农场（Macher 2000：58 –59）。

随着国有财产大批解体、倒闭[1]或转移到私人手中，从前政党－国家体制的最后一个要素也消失了。来自私有化的收入主要用于降低公共（国家）债务。然而，解体、放松管制、引入法制、私有化、累积的国家债务减少，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高昂的内外债务、限制螺旋、腐败、通货膨胀、失业、破产、银行领域坏账累积、负债累累的和破产的企业，是当时经济、社会和从前体制所有遗产的特征（Kornai 1997；2000）。但是，到了1995－1996年，这些张力大大下降：匈牙利经济从危机中恢复，并开始增长。然而，国家所有权的解体在体制上与解除垄断无关，再分配的下降并没有严格地跟随这两个过程的演进。于是，有关私有化的几个命题被证明是一种错觉：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强有力关联并未消失；私有化并不没有自动地增加竞争，既没有创造市场结构的基础，也没有抑制政府补贴（Voszka 2003）。

在后文中我们将看到，相似的外部条件与不同的个体特征和模式特征，将导致截然不同的命运。没有嵌套于较高聚合体，没有被其解体和崩溃拖累，在地缘政治上远离危机，能够运用资源创造型改革，这些都使得中国的政党－国家能在同伴们的连锁崩溃中幸存下来。然而，自我再生产的与模式相符的工具（作为对再生产约束和预算约束硬化的反应）的升级，也将导致与模式相符的解体和演进。

14.4　中国的发展与转型

14.4.1　在1989－1991年多米诺崩溃中幸存

网络松解与撤离中的先期相似性（pre－empting similarities）

网络内国有企业和政府仍然没变的体制行为，以及双轨制的机会，不断驱动**快速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失衡**（Wong, C. 1991：706），导致宏观经济形势严峻。然而，1985年末1986年初出现的宏观经济的严峻形势，在1987年底由于政府开始实施减缓经济增长的政策而有所缓解（Nauhton

① 1991－1998年间，近700家企业和转型了的公司被清算（Voszka 2001：147）。

1996：269）。预算问题在1987－1988年间进一步恶化，尤其是在县一级（wong，C. 1991：706）。在放弃紧缩政策的时候，国有和非国有的制造业出口和投资都快速增长。中央政府投资保持原有的比例，同时，消费品和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并且被邓小平1988年的全面价格改革讲话进一步推动。推行全面价格改革的努力由于网络中具有讨价还价能力的那些行为人的抵制而失败了（McMillan and Naughton 1992：136；Naughton1996：190，198）。相反，引入了新的收入分成计划。

在紧缩与放松之间摇摆以及再生产约束反复硬化的同时，政党从中央和地方的国家官僚机构以及经济领域中撤离。这些行动集中于限制企业内党委书记、政府机构内政党核心集团的职能、职责和权力（Burns 1987：37；You 1998：77－88）。到了1986年末，改革者开始采取步骤使政党核心集团退出部委及其他中央政府团体（撤出并使他们更加稀少）。到了1989年春，四分之一的部委发生了以上变动。在政治与经济事务分开的口号下，政党的作用在整个官僚机构中都有所削弱（Naughton 1996：207）。1987年新的选举法规定，在县、区或市一级选举中，政府候选人至少要从10个当中提名。村委会组织法规定，在村一级选举中，候选人选择实行真正的竞争和参与（Shuhfan 1987：32，fn. 18；Tong，Y. 1997：174）。1988年4月引入了国有工业企业基本法。该法把工厂管理职责当作它的一个根本要素（Naughton 1996：207，referring to Clarke 1991：46）。该法不再允许共产党直接参与企业管理（Naughton 1996：279；You 1998：50－53）。用我们的话说，这些措施显示了网络解体的最初迹象，涉及互联线的撤离和弱化。权力再分配的这种分离过程包括使国有企业转型为符合市场的实体，以及分配负担分权化。

到了1989年，所有的内部、外部条件似乎都已经具备了：中国将在东欧体制崩溃连锁反应中发生崩溃。在中国也存在宏观经济失衡、网络的局部解体、通货膨胀、腐败、学生和工人的公开反抗。从几个方面出现了机会窗口：一位领导人去世、另一位改革派政党领导人不在国内、东欧政党－国家的连锁崩溃。①累积的机会本来可以加强上述解体和日渐

① 198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主要支持者胡耀邦死于突发心脏病。当强硬路线者发表反对学潮的社论、导致动乱的时候，邓小平的另一个支持者赵紫阳总理正在访问朝鲜（Tong，Y. 1997：191－193）。

增加的张力，并导致体制崩溃。但是，崩溃并没有发生。相反，实行了军事行动（Miles 1997；Salisbury 1989；Hicks 1990），同时发生了导致权力稳定化的剧烈的经济紧缩。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看来显然不可能的结果呢？

避免崩溃的结构原因和个体原因

最重要的差异是**结构性的和个体性的**。首先，由于体制和模式的特征，导致经济问题在于过度扩张，而不是像东欧体制那样出现全面衰退。第二，尽管这一时期在中央层级上反复遇到再生产约束硬化，但是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在宏观层面上**没有同时遇到**外部（预算）约束**持续**硬化，而在东欧国家却恰恰相反，并且东欧国家的这种外部约束持续硬化还导致外债累积。中国也不像东欧国家那样受西方市场的重大影响。第三，中国的再生产约束硬化发生在中央和分散的地方层级，而不是在宏观层面上，两位数的宏观经济增长为政党领导地位提供了合法性，保持了政党领导的政治稳定，尽管政党内部经常出现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冲突，以及紧缩与放松之间的摇摆。第四，不像东欧的国家，在中国，尽管出现了局部分权化、互联线的撤离和弱化，但是中国共产党牢牢控制了战略性领域和组织的互联线。第五，尽管存在很强的经济依赖性，但中国在制度上并不像东欧国家那样融入一个更大的结构，这直接影响她的命运（Shambaugh 1992：560）。因此，中国不像东欧国家那样，苏联及其集团的强大和削弱（尽管政治上非常重要）并不能对中国的命运起着决定性作用。此外，从地理上看，东欧国家都集聚在一起，而中国则远离这种连锁崩溃。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中国非常大，当时的通信设施比较落后。于是，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垄断传媒，阻止有关东欧事件的信息迅速传开。因此机会窗口在中国**只能是潜在的**，即：只有国家层面上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才有可能利用这样的机会。由于存在所有这些因素，所以，凝聚力丧失可以被逆转。但是，逆转是有代价的。

紧缩政策倾向与经济增长速度放慢

面对1989年的政治抗议，邓小平不得不利用左派的支持。作为交换，

强硬路线者重新加强了政党权力，把已经撤离的互联线重新延伸到经济[①]和国家[②]，并从制度上渗入军队，以确保军队的服从和忠诚。邓小平还在军队内部组织了全面的运动和肃清，直到军队的最低层级，以便消除在1989年对过去军队调配的不满（Shambaugh 1992：554，562，564）。

紧缩、抵制和与形式相符的资源集权化

在1989－1990年间，倡导改革和反对强制性计划都被禁止了。把利润留成方案扩展到所有国有企业（state－run enterprises）的计划被取消。已经分配到企业的财政资源被冻结，银行投资贷款被中止，城镇工资增长放慢。家庭收入增长被急剧削减，农村自由市场暂时下滑，把政党从企业管理中撤出的建议被放弃（Naughton 1996：121）。

经济遭受剧烈的紧缩。这是通过把资源强制性地向中央再分配来实现的。整整6个月没有向非国有部门贷款，所有的资源都注入国有企业，并发起运动查处小企业逃税。江泽民宣称，如果发现逃税，将使用破产法来关闭企业。这种政策甚至扩展到了小企业及其老板的私人财产。

这些政策的影响比政策制定者所预料到的更加矛盾。紧缩政策有选择的实施（与形式相符）。结果，在1989－1991年紧缩期间，300万家逃税的乡镇企业破产倒闭，或被其他乡镇企业接管，而几乎所有的亏损国有企业都被豁免（Qian and Xu 1993：152）。据披露，在严厉的经济紧缩措施期间，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总额比1986年有了大幅增长，1989年为最高，1990－1991年稍有下降。补贴占GDP的比重分别显示了同样的特征（Xu and Zhuang 1998：207）。与形式相符的类似原因导致保守性财政政策的失败，该政策旨在通过把资源强制性地调配给中央来增加资源攫取。为实现

① 强硬路线者坚持党在管理中的地位。1990年九号中央文件对企业中重建政党机关作出了具体指示。该文件还列举了党委书记要监察的具体问题：纠正"过度的"收入差距，改变与国家原则不相容的企业行为。重新主张政党的人事权，尤其对年轻经理选拔的人事权。企业经理失去了来之不易的自主权（Naughton 1996：279）。此外，党员资格从街道办事处重新转到了企业（2000年的访谈）。

② 国家机构中的政党核心集团又重新建立起来，尽管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取消他们的提议（2000年的访谈）。

这个目的，在 1989－1990 年紧缩期间，中央政府试图废除财政收入分成方案，实现投资决策重新集权化，[①]但是遭到以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广东省省长为首的各省省长的强烈抵制（Qian and Xu 1993：161）。地方政府团结一致表态，有能力为这一提议设置障碍。[②]尽管乡镇企业的信贷增长急剧下降，许多乡镇企业倒闭，但是地方贷款很快就恢复了（Naughton 1996：283）。

地方的攫取动力增加，中央的可攫取资源减少

紧缩政策还导致在较低层级上的强制性攫取通过融资和各种股权形式而增加。乡镇企业也具有寻找更多资源的动力，通常是通过乡镇一级政府或通过乡镇企业管理层来强制实施，这样才有可能筹集到资金（Smyth 1998：797）。资本短缺驱使许多企业转向股份制，把股份制作为一种融资方式。“结果，在 1989 年早期发生了一场‘股份制热’，[……] 发展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发布条例提醒企业，股份制应该集中于加强现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③]而不是建立新的‘试点’”（Shu 1998：385）。

总需求迅速下降缓解了短缺，但是也**把经济推向衰退**（Naughton 1996：279）。按规定的不变的名义投资支出（不考虑通货膨胀）使实际的投资资源总量下降了大概 30% 而不是 8%。居民削减了消费购买，居民储蓄急速上升。投资品需求急剧下降，进口下滑，出口迅速增加，生产和就业下降（Naughton 1996：280）。紧缩措施不能维持 1 年以上的时间，必须重新恢复增长，这是因为担心大规模失业和不满会像东欧那样导致崩溃。自 1992 年之后，网络的**绝对和相对收缩开始加速**。

14.4.2. 通过网络相对和绝对收缩来刺激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在政治和法律上承认私人所有权、市场经济和私有化

在 1989－1990 年间紧缩政策导致熟悉的经济收缩之后，利用一些通常

---

① 根据财政部的建议，税收早就应该重新划归中央财政收入，许多地方企业应该直接向中央政府上缴利润。

② 利益提升公开地发生，而不是通过封闭式渠道而发生，这是一种例外情况。并且，我们知道，1994 年引入新税收体制的时候，负担已经根据各省通过封闭式渠道的讨价还价能力而被有选择地分配。

③ 股权制企业（Shareholding enterprises）。

的手段又重新获得了增长的动力。此前一直受到严格压制的乡镇企业，再次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具有激进后果的类似合法化是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其鼓励了私人创业和求利生产，使私有企业快速发展。1992年第十四届党代会正式在政治上宣布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私人所有权的合法性被写入党章。第二年，人民代表大会又在法律上承认了私人所有权的合法性，这次大会把私人所有权写入了宪法。并且，党的十四大正式取消了中央计划作为资源配置机制。当时，计划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78年的超过90%降低到1993年的5%（Woo 1998：158）。参与市场活动的越来越多的激励和机会，来自于中央政府从网络内外攫取资源的能力下降。

中共第十四届党代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该文件虽然不提倡私有化，但是为私有化进程稍微敞开了一点门。对于小型国有企业，该文件强调有些经营可以采取分包或租赁的形式。另一些可以转变为合股形式的合作体制，或者出售给集体和个人（China Daily，Supplement，November 17 1993；Cao et al. 1999：120）。

资源创造：为网络内部和外部的FDI确定法律条件

同年，国有工业企业转变经营机制的规定，以及在几个领域给国有企业更多自主权，进一步促进了承包责任制。这一法令规定了公司的三种主要形式：合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全民所有制公司。通过企业转变经营机制的运动，该法令使经济领域的网络绝对收缩合法化了。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给出了国外和国内资本渗入国有企业的前景。根据这一决议，每一个国有企业必须转变为公司。大约10000家企业要转型为公司，重组或合并（Sun 1997：22－23）。在第一种情况下，中央控制的国有企业的股份要由政府持有。但是，意图是逐渐把这些股份分配给省、地方政府和银行。企业经营委托给管理层，他们负责盈亏。在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已经把“产权不清晰”确定为国有企业缺乏效率的关键原因（Woo 1998：155）。根据这次大会，实质上破产了的企业将可以实行破产。

地方私有化的扩张（绝对收缩）

在私有化合法化和在政治上被宣布为合法化之前，地方政府为摆脱无

法再向下级进一步转移的负担，已经开始了私有化的进程：例如，山东省诸城市在1992年就开始把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当时，该市三分之二的国有企业处于亏损或破产的状态。在诸城市，县一级监管的国有企业中大约90%的都已经被私有化了。四川省也在逐步地出售亏损的国有企业，广东省则连赢利的国有企业也出售，以便资助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清理不赢利的国有企业的债务（在挂牌出售之前）。黑龙江省在成功地出售了160家国有企业之后，已经宣布计划再对200家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Woo 1998：180）。

通过政府允许购买较小的国有企业，并使合资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合法化，政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地方政府行为施加了一种复杂的影响。它允许地方政府摆脱不赢利的累赘企业，从而切断科层线和互联线，然后为维持剩余网络获取一些资源。从长期来看，中央政府的这种认同促进了地方层级上网络的绝对和相对收缩。

FDI快速增加（网络的相对收缩和弱化）

随着政治开放和私有化扩展，FDI大幅度增加。与1980年代初的低增长相比，外国投资从1990年代开始增长。在1990－1992年间，外商投资项目的数量翻了四倍，合同外资额翻了七倍，实际利用外资额翻了三倍。[①]投向固定资产的FDI在1992－1993年间翻了二倍，FDI在固定资产总投资中的比例也翻了二倍（Xiaojuan 2001：4，Table 5）。

从1991年到1993年，外商投资项目的数量增长了6倍，合同外资额增长了10倍，实际利用外资额也增长了6倍。自1993年以后，虽然项目数量和合同外资额都下降了，但是实际利用外资额却仍然稳步增长。外商投资集中在沿海地区，主要是海外华人与当地伙伴采取合资和合作办企业的形式（Xiaojuan 2001：1，2，Table 1，Table 3）。1980年代FDI主要趋势是与集体企业合资，但是，到了1990年代这一趋势却相反，由于更加有利

① FDI在中国的扩展是不平衡的。进入中国的FDI绝大多数集中于开放的沿海地区。这是由于政策偏斜、对出口导向性投资的地理位置优势、由于国有企业稀少而形成的友好商业环境，以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祖籍在这些地区的海外华人具有投资吸引力。1980年，90%的FDI流入这些地区。在1990年代这一比率只稍微下降了一点点。

的环境，外商独资企业开始有了显著增长。这从以下事实中可以得到反映：1980 年代 FDI 主要投向服务业，1990 年代则转向工业活动。

决策分权化和鼓励投资很快变成了投资过热、通货膨胀和中央再生产约束硬化。与 1992 年同期相比，在 1993 上半年，工业产出增加了 25.1%（6 月份增加了 30.2%）。一些大城市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到 21.6%，而国有部门在 1991 - 1995 年间的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32.6%，其中 1992 年增长了 48.1%，1993 年增长了 44.1%。由于银行贷款和通货膨胀的大力推动（尽管储蓄下降），地方政府投资出现过热（Yang 2004b：67 - 68）。

国有企业贡献减少

同时，国有企业对中央预算的税收贡献逐步下降，占 GDP 的比重从 1978 年 19.1% 下降到 1993 年的 1.7%（Sachs and Woo 1997：27）。这部分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利润率下降，部分是因为其他企业及其税收贡献的增加。该过程导致 1988 - 1995 年间所有产业（天然气产业除外）中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迅速下降（Jefferson and Rawski 1999：28 - 29）。由于乡镇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国内私有企业的快速进入，国有企业的利润率下降。国有企业再也难以维持比非国有企业更高的价格和更快的赢利增长速度（Jefferson，Singh et al. 1999：147）。[①]在 1988 - 1992 年间，由于过度投资，导致国有企业的资本生产率也有所下降（Jefferson，Singh et al. 1999：147；Jefferson and Rawski 1999：31）。而且，所有部门的利润率总体下降，因为进入门槛和进口竞争导致了垄断租金下降（Jefferson and Rawski 1999：34，36；Jefferson，Singh et al. 1999：145）。这后者导致双轨制的优势逐渐下降。

尽管赢利减少，但是国有企业依然是工业税收的主要贡献者（1994 年占 65%），[②]这一税收额占了政府收入的 30%（Jefferson and Rawski 1999：38）。然而，独立核算单位的亏损仍在不断扩大，而挽救措施自 1986 年以来局部地、急剧地下降。这一事实意味着更加严格的选择，以及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再生产约束硬化而导致其下属的大量国有企业再生产约束硬

---

① 资本集约度、养老金、社会服务、住房是国有部门最普遍的问题，它们压低了被报道的利润率（Jefferson，Singh et al. 1999：149）。

② 税率根据企业性质而有所不同：1995 年，国有企业为 72%，集体企业为 60%，外资企业为 39%（Jefferson and Rawski 1999：38）。

化，这种形势被网络外竞争压力导致的预算约束硬化进一步加强了。

对中央而言，作为国有企业投资资助来源的国家预算（国家财政拨款）的比率下降，也意味着更小的分配能力和更严格的选择。这一比重从1983年的40.6%下降到1995年的4.9%（Jefferson, Hu and Singh 1999: 221）。网络内再生产约束硬化作为一个反应，加速了与结构相符的工具的实施。

回摆：加强中央攫取——与形式相符的效应

重新努力把权力再分配给中央

收入集权化措施再次与支出分权化同时出现，这增加了经济自由化，导致国有企业贡献降低。1993年下半年，中央的稳定化措施包括：以行政性国家命令强制实施的与市场相符的措施，以及通过党纪而实施的政治压力（Yang 2004b: 69）。[①]随着中央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率下降，中央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困难（Yang 2004b: 71），这会导致中央进一步失去经济控制权，（甚至）导致经济解体。

在1994年，引入了重要的全面税收改革，以便把资源再次导向中央，把负担下放给地方政府。新的税收改革在网络内实行收入再分配。它引入了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以及课税的细目。它也把国有企业的税收贡献降低到其他类型企业的水平（see Wong, C. 2002: 51, Appendix 1, Table 4.1）。在界定中央和地方在税收收入上的自由决断权的同时，还施加了很强的政治压力，以便使权力的制度再分配偏向中央（Wong, C. 2002; Li and Xiang 2002; Burns 1994: 470－471）。税收改革与一些行政措施结合在一起，这些措施旨在以有利于中央的方式重组攫取和再分配权力（Yang 200413: 72－76）。除了财政手段之外，还引入了几种其他手段，直接目标在于在互联线和科层线上再分配自由决断权。例如，专业银行地方支行的领导干部管理被再次集权化。货币职权被集权化，中

① 措施包括：信贷配给，对现金交易实施行政控制，提高国库券、银行存款、外汇券的利率以增加它们的购买吸引力。1993年6月，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尽一切可能去提高债券销售；禁止地方政府在完成国债销售配额之前发行股票和地方债券。还规定公司债券利息率不能超过国库券的利息率（Yang 2004b: 67）。

央银行拒绝按照地方政府的意图调整货币政策（World Bank 1996；Gao et al. 1999：117）。[1]中央银行从1995年开始设置了新的地区网络，把人事决策委派给地区组织，而不是地方政府（Wong，C. 2002：175）。1997年，商业银行的党委书记和管理层变成隶属于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2000年的访谈）。结果，全国范围的信用恐慌加剧，通货膨胀率也急剧下降，1997年从20%以上降低到大约2%[2]（Qian and Roland 1998，1157；Cao et al. 1999：117）。

国家税务局在各个层级都建立税收办事处，征集从地方税中分离出来的共享税和中央税。在1995年，新的预算法禁止中央政府从中央银行透支，也禁止以赤字对其经常账户进行融资。资本账户上可以实行赤字财政，但是只能用于发行政府债券。地方政府要保持它们的预算平衡。该法律严格地控制地方政府的债券发行，限制它们在金融市场上拆借。为了确保预算法的强制实行，引入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审计代理机构（Gao et al. 1999：116）。

以上措施支持了收入朝中央的再分配。由于一次性收入集权化，税收收入增加了中央的比例，从22%增加到56%（Wong，C. 2002：37）。同时，开支分配仍然保持不变（Li and Xiang 2002：11）。结果，在1994年，税收和财政改革，以及其他一些措施，进一步硬化了地方政府的再生产约束，而地方政府的反应是私有化和倒闭，因此，这些措施也加速了政党－国家网络在较低层级的绝对收缩（Csanádi and Lai 2003；Zhong 2003）。

然而，集权化努力又是有选择的，根据每个省不同的讨价还价权力而与形式相符：最初，为了缓和各省领导的抵制，中央作了妥协，以税收返还的形式进行财政补偿。结果，为税收改革铺平道路的那些措施，同时有助于它们与给定权力分配的形式相符（see measures in Wong，C. 2002：34，

---

① 在采取这一措施之前，70%的中央银行贷款是由其地方支行提供的（Cao et al. 1999：117）。

② 在实施这种集权化的同时，引入了几项货币制度，提高法制：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授权政府监管金融服务行业；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信托法；外汇管理法。

35，71）。与形式相符也许进一步反映于权力再分配措施的局部成功：国家税务局的地方分局很快就加入了地方利益网络（Wong，C. 2002：82）。

14.4.3. 1994 年之后经济演进与绝对收缩加速同时进行

1994 年以来较低层级上有选择的再生产和预算约束硬化及其反应

由于 1994 年的税收改革，以及把资源向中央集中的一些支持行动，地方政府的再生产约束更硬了。这是由于信贷压力和有选择的分配能力降低所导致的国有企业亏损和负债。地方政府的再生产约束硬化与收入损失有关：1994 年税收改革，国有企业补贴减少，像过去一样降低企业税收的约束，稳定的开支任务（尽管收入重新分配了）。

再生产约束硬化在省级以下更加明显，因为在这些层级上，中央政府没有规定地方税收的分配，共享税的再分配，税收返还，也没有规定将开支任务转嫁到省级以下的方式。最可能的情况是，这些根据省内和较低层级上的权力分配而有所不同。[①]据我们了解，1994 年之后，财政资源主要集中于省一级（Wong，C. 2002：46），而开支则由各级分摊。这一事实还是说明了省级以下吸引能力总体变弱（Wong，C. 2002：57）。我们也了解到，预算外资金——上级无法控制的地方收费——在 1994 年税收改革之后大大增加，以便补偿预算损失（Wong，C. 2002：101）。而且，税收改革之后，私有化和倒闭在较低层级加快，并向较高层级推进。[②]这种解决方案的趋势

---

① 这一假说在 Wong 的书中得到了强调，他描述了省级以下政府的收支分配，他们受到个体协商的约束（p. 101）。这反映了省级以下政府在讨价还价能力上的差异，例如，Wong 根据某个省所收到的税收返还全部、部分或没有逐级向下分配，把这些省分为三类（Wong，C. 2002：77－78）。

② 基于 IPS 模型分析，我们认为，对于省级以下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在税收返还最终被再分配的地方较高；在税收返还部分地被再分配的地方较低；在税收返还全部留在省一级的地方不存在。结合 Wong 关于税收返还分权化的数据，以及省级以下预算外资金的分散度（与财政预算资金相比），我们认为，在讨价还价能力和攫取能力都较强的省，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比率较低；在攫取能力较低（不论讨价还价能力）的省，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比率稍高；在省级以下没有攫取能力、也没有讨价还价能力的省，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比率最高。我们认为，具有财政赤字的省级以下政府也同时存在这种趋势（Wong，C. 2002：57）。然而，不幸的是，私有化的数据没有被系统地收集。因此，就目前情况来看，这类信息是不可得的。

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1995 年中期，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明确提出了“抓大放小”的口号（Gao et al. 1999：121）。地方国有企业仍然在亏损中运行。补贴亏损企业的最终责任被分权化。因此，地方政府负担过重，只好努力剥离这些负债运行的国有企业（Woo 1998：155；2000 年的访谈；Csanádi and Lai 2003）。

不仅预算外收入、私有化和倒闭增加了，而且，地方政府还尽力向上级隐瞒资源，即使在被强制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地方政府鼓励当地企业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隐瞒利润，在它们的控制下悄悄地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暗地鼓励自发私有化或地方收入逃税（Qian 1996：436）。

较低层级上外部（预算）约束硬化、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利润率下滑

到了 1990 年代中期，外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已经创造了中国工业总产出的一半以上（Cao et al. 1999：119）。结果，一些专家认为，国有企业的竞争压力已经达到了新的水平。这种竞争压力对地方政府监管的国有企业的影响要大于对中央政府监管的国有企业的影响，因为地方国有企业经常在竞争性产业中与非国有企业并存（Qian and Roland 1998，1157）。这些观点支持了 IPS 模型关于有选择地推进再生产约束硬化和私有化的预测。

到了 1996 年，**网络内经济增长**总体上**减缓**。这不仅涉及国有企业，也涉及集体企业。集体企业（大多数是乡镇企业）的利润率从 1980 年的 26. % 下降到 1996 年的 8. 2%，国有企业的利润率从 1980 年的 24. % 下降到 1996 年的 6. 5%（Smyth 1998：785）。国有企业的下滑在 1996 年之前就已经加速了。经过 18 年的逐步过渡之后，国有企业在中国工业总产出中所占比重从 1978 年的 77. 7% 下降到 1996 年的 28. 8%；[①]在 1996 年，国有企业吸纳了 57. 4% 的城市工人就业；国有企业占工业固定资产总投资的 52. 2%。国有企业仍然在亏损，尽管它们从低息贷款和其他政策保护中享受了大量的暗中补贴（Lin et al. 1998：426）。在亏损的同时，对国有企业的明确补贴总量没有增加。因此，在 1986 – 1991 年间，补贴与亏损的比率

① 1996 年，在全国所有国有企业中，大型国有企业在数量只占 5. 6%（!），但是贡献了国有企业总产值的 63. 3%（Lin et al. 1998：425）。

持续下降，提供给亏损国有企业的补贴在GDP中的比重也下降，从1985年的最高5.66%下降到2001年的0.27%。[①]总的来看，在1996年：390000家企业中有23%报告了亏损（Jefferson and Rawski 1998：35）。根据Cao等人的考察，90%的亏损企业是小企业。在1996年，各类企业亏损比例为：国有企业38%（其中40%为大中型国有企业，60%为小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18%，“其他”（股份制和外资）企业34%（Jefferson and Rawski 1998：35；Cao et al. 1999：122）。这些数据随着较小较低层级而增加，同时，再生产约束硬化趋势朝着更小较低层级，从国有企业到乡镇企业，沿着相同的线获得政府救助的机会更小，**预测了私有化有选择地向上级扩展。**

通过私有化和倒闭在地方层级切断互联线

网络内自我再生产约束硬化，被来自网络外的竞争压力、资源的减少和有选择地分配、从较低层级攫取资源的困难、负担的增加进一步加剧了，这导致地方政府有动力通过加快私有化、倒闭和下岗来减轻负担。You and Wang基于1996年对小型国有企业的一项调查，强调了1996年中期各省小型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比例：黑龙江省91.4%、山东省6%、湖南省60%、吉林省56%、安徽省39%。另一数据表明，截至1996年底，江苏已经对50%的小型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河南在1996年开始私有化，计划在1997年年底完成这一过程（Cao et al. 1999：109）。截至1996年底，在积极改革的省份，超过70%的小型国有企业被私有化了。很多省对50%以上的县级下属小中型国有企业实行了所有权转换（Cao et. al 1999：109）。到了1996年，一些积极改革的县对其下属的几乎所有国有企业都实行了私有化。至1997年，绝大多数县对半数以上的地方监管的国有企业实行了私有化（Qian and Roland 1998：1157）。

遗憾的是，我们找不到私有化的总体数据。我们只能通过小型国有企业的数量减少来估计私有化的规模。从1995年到2000年，小型工业国有

① 《国有企业市场化研究》（A Research on the Marketization of SOEs），by research team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ket economy，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Resource Management，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2002. Source：hffp：//www. snweb. com. cn/gb/people _ daily/ 2002/12/14/f1214001. htm.

企业数量减少了一半，从72000家减少到34000家。消失的这38000家企业或者被私有化，或者被清算，或者被合并（World Bank Interview 2002）。Csanádi和Lai（2003）基于数据阐明了县、市和省级国有企业2000年与1994年相比在数量和就业方面的下降速度，从中可以看出私有化趋势（Csanádi and Lai 2003：Appendix 4，9，15）。随着政府行政层级上升，下降速度逐步降低。这也意味着私有化的进程正在逐步由小型国有企业扩展到大型国有企业，因为从总体上看，企业越大，监管它的行政级别就越高。再者，更高级别和更大企业的再生产约束软化，进一步促进了私有化向上扩展的趋势。沿着再生产约束硬化的路径，私有化正逐渐向更大的企业和更高的层级扩展。向上扩展是一个相对性的术语，因为在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倾向于把非效率企业下放给较低层级、以便摆脱负担（参见2002年党的十六大最近关于中央下属国有企业分权化的决定）。同时，一个相反的趋势刺激了这种动力：有效率的国有企业的从属关系的集权化（Csanádi and Lai 2003），既有助于受到影响的政府的再生产约束硬化，也有助于向上扩展的趋势。

为了甩掉包袱，缓解再生产约束，倒闭或出售的不仅仅是非效率企业。受到再生产条件硬化约束的地方政府，加快了所属国有企业中的裁员：在1995－1997年间，中国地方政府开始制定许多措施以裁减国有企业中的冗员。裁员大多发生在市一级，私有化大多发生在县一级（Qian and Roland 1998：1157）。最近几年，许多城市开始重组中型国有企业，把下岗工人转移到非国有企业，或者把他们遣送回家，但是工人与他们的企业仍然保持着一些名义上的关系（维持生活的工资、住房和医疗）。在1996年，1000多万工人失去了工作，其中890万人领到了由于转换工作或失业的补偿金。大约360万人重新找到了工作，230万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这一过程大多发生在纺织、测量仪器、煤炭、冶金、化工、森林、机械、电子等行业（Wang，X. 1998）。

从1997年开始的网络解体由于再生产和外部（预算）约束硬化而加速

中央适应地方的发展

1997年9月第十五届党代会率先引发了以上动力。在这次党代会上，江泽民公开提出**国有产业应该被削减**。他宣称中国将对其国有部门实行大

规模的私有化（Woo 1998：180）。中国将对369000家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Woo 1998：155）。事实上，这是五年前开始的向上扩展过程的形式化和加速。中国证监会在2000年11月发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引用了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结果，预计国有企业最终将从大部分产业部门中退出，不过政府依然会控制几个关键领域。国家垄断应该保留在15个部门，包括军事工业、电子输出。①

较低层级依附线的弱化和掏空

网络外的竞争压力，结合于私有化、倒闭、裁员以及僵化结构掏空，还导致了与经济相联结的**互联线弱化**。这一进程的原因在于，国内外资本不仅从政党－国家网络外部施加了竞争压力，同时也进入网络内部。例如，在合资企业中，党委书记不能像以前那样拥有公司董事会的席位。党委书记通过工会潜在地发表意见，特别是由于党委书记通常也同时担任工会领导（Pearson 1997：69）。广东和经济特区已经成功消除了政党的影响和活动。到了1995年，在广东省，政党基本上从合资企业中退出了（Pearson 1997：70）。国有股从股份公司中退出，也发生了同样的过程。②再者，党委会也大大精简了；企业党委书记一职逐渐变成兼职而不是专职的。

倒闭、私有化和渗透，从而网络被切断和弱化，以及国有资产通过资产剥离而转移到网络外，都稳步推进，因此掏空了与经济联结的网络。在1995年12月，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State Administration of State Property）就已经报告，国有部门的资产剥离是巨大的（Woo 1998：177）。③这一过程的速度很快，以至于国务院在当时副总理朱镕基的指挥下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来考察这一问题。资产通过各种途径被吸干，比如通过在国有

---

① "SOE restructuring accelerates",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a U. K. – based information provider, in ChinaOnline*. December 6, 2000.

② "Fortune": Inside the New China A Special Report (Oct. 11, 1999. No. 19: 50 – 86).

③ 笔者参考了"State Drain Must End", *China Daily*, Dec. 13, 1995. 也可参见"State Toughens Staud to Protect Its Possessions", *China Daily*, June 2, 1995; "Asset Checks Can Stop Fiddles", *China Daily*, June 7, 1995; "Market Investigated for Losing State Assets", *China Daily*, June 2, 1995.

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建立合资企业（Smyth 1998：798）。具有可转变技术的个人不断地跳槽，强化了这一过程；网络外竞争性企业单位，私有化和倒闭的进一步动力，也强化了这一过程。

分配职能和依附线的撤离

竞争压力和摆脱负担的努力，刺激了网络内除了决策分权化、切断债务、渗透、剥离僵化结构之外的进一步变化。**把持这些互联线的行为人**也消失和弱化了。从1998－2001年间，在中央发起、地方追随的几次机构重组浪潮中，发生了网络的绝对收缩。行动目标在于通过政企分开来实现经济管理的简化、分权化和现代化，通过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以来切断和缩小行政性和分配性的政府职能的几次高潮来合并管理、机构、资源和职务权利（Yang 2004：61－71）。经验研究还显示，到了2000年代初，在结构的不同层级和聚合体，分配性的国家职能被掏空或承担那些职能的组织被合并或消除（Csanádi and Lai 2003）。

在1998年，10个部委被取消，从前由其他部委、军队和公安创建和拥有的企业被拆分，以降低企业经营中的经济政策干预。由于这些行动，网络的国家领域内的垂直依附线变得更加稀少，已经大大收缩。政党伸向企业和国家官僚科层的互联线也变得非常稀少。政党与国家、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剩余关联——即使很强的关联——在网络内被弱化了攫取和分配能力。新的政党－国家组织也出现了，以便从经济中自我撤离，把经济单位从国家官僚科层中分离出来，降低非战略性部门的国家所有权（Yang 2004a：60－61）。随着技术人员从意识形态干部手中接管了政治领导职位，干部职业化增加了。对国家活动引入和执行法制的每一步，尤其是提高透明度、检查和平衡、责任的措施，以及通过分配职能而减少一人决策和干预的措施，都倾向于间接弱化政党对国家领域的强有力控制：通过封闭式渠道降低政治命令的潜能和压力（Brodsgaard 2003：228；Zheng，S. 2003：253－281；Zou 2005；Yang 2004b）。

科层内依附线的撤离

或许是由于再生产约束硬化和同时发生的分权化过程，在**政党和国家科层**内也发生了网络的绝对收缩。村一级政府的竞争性选举开始于1990年代初，基于1987年通过的村委会组织法，包括候选人选择（Tong，Y.

1997：216）。再者，尽管与中央指示明确相反，但是作为网络自我撤离的一个完美例子，政府领导的竞争性选举，以及有些地方的政党领导的竞争性选举，被越来越多地进行，在那之后，在乡镇和某些县一级政府也开始这样做。这些选举在较高层级地方政党组织部的指示下，由地方层级的党委会组织。这些方案看来在省的鼓励下向上扩散，以便在政治上不稳定的经济形势下赢得老百姓信任，以及广大群众的资源贡献（Lai，Hairong 2004）。

基于以上过程，我们可以强调，网络内再生产约束硬化与网络外领域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促进了网络的加速**撤离而不是推动适应性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发现撤离（绝对收缩）是降低负担的一种手段：通过消除目标（倒闭）、切断互联线和科层线（私有化）、通过渗透（合资企业和FDI）从而弱化这些线或者撤离这些线（通过半自由选举，通过停止运行和监督机构）。资产剥离（竞争性职业专家、资产、部分单位和整个单位转移到网络外）也会间接导致绝对收缩。

14.4.4. 经济转型的政治条件

政党作为一种制度权力结构而解体的经济影响

独裁体制对经济子域转型具有几个方面的影响。例如，在网络内和网络外，劳动力将受到影响，因为他们在政府部门和私有部门都没有机会发表制度意见。由于同样的独裁条件，新的经济子域在没有制度横向控制的条件下得以发展。由于网络内经济子域解体与网络外子域演进是同时进行的，所以在网络内外都存在经济主体和资本的大量流动，在政治垄断的体制中，这被长期延续的经济转型得到进一步促进。这些条件将会促进寻租行为腐败的长期稳定化，以及通过资本、人力、精英和组织的外逃而促进网络的持续剥离。它也可能会增强短期利益上的网络－选择和网络－依赖的私有领域。相同的条件鼓励了相反的过程：犯罪网络的渗透和制度化，以及有组织的犯罪，它们有利于政党－国家网络的基础结构，因为存在利益提升的垄断的封闭式渠道。

然而，在独裁条件下，同样的延伸过程使网络解体有可能平滑地进行，使网络内的经济和政治多元化渐进地进行，这缘于私有资本渗入国有

部门，资本家渗入网络的不同部位。

网络内的政治理性普遍存在

尽管存在竞争的压力，但是网络的解体与撤离似乎并不必然意味着剩余网络中理性和优先权的改变。它的反应只不过是享受特权者的圈子缩小了。许多因素都表明政治理性和运行原则都普遍存在。干部制度在收缩中的网络中仍然存在，二者都关系到剩余的国有经济[①]，官僚机构和金融领域。[②]

政府命令意味着救助中典型的有选择性：从财政部门获得的直接补助，从国家银行系统获得的廉价信贷，从中央银行获得的政策贷款（由中央银行的货币创造来资助），用强制性的信贷配额来代替指导性的信贷配额，严格限制资金流出国有银行、向信贷计划外项目提供贷款，使用行政信贷计划并通过这种计划来实现分配集权化，而且地方领导（政府、部委和银行）个人要负责完成信贷计划（World Bank interview 2002; Brandt and Zhu 2001: 441）。[③]地方和中央政府预算外财政收入的增加和巨大比例，[④]证实了通过依附线的攫取能力仍然普遍存在。反馈仍然盛行，并且在重要企业中被创造（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拥有有效反馈的大企业仍然可以吸引外国资本，[⑤]以便在网络中继续发展。在较低层级，股份合作并没有削弱地方政府的权力。尽管只是部分地拥有股权，但他们仍然可以提名董事

① 职位任命中的政治理性。根据1995年的官方调查，80%的国有企业经理，特别是那些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经理，都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渠道来任命（参见 Window of Hong Kong, published in HK, March 10, 1995: 10）。

② 银行系统的自主是相对的。为防止银行中的腐败，政府紧密干预和控制信贷过程；惩罚是非常严厉的。政府也控制了货币供应，在每一家银行中，党委都必须起着领导作用。银行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由国务院下属的中央金融工委提名。

③ 例如："然而，国有企业净亏损在1996年早期增加了，在1996年中期，政府命令国有银行满足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Central Bank urges support for faltering enterprises." *China Daily*, July 8, 1996; Sachs and Woo 1997: 44）。

④ 例如，股份合作可以使乡镇企业进行融资，也可以为地方政府融资。管理层有时会强迫工人购买股权，或者他们都被乡镇政府强迫去购买股权（Smyth 1998: 797）。

⑤ Sun 1997: 26－27.

（Smyth 1998：798）。腐败非常高，这也间接证明了政党和国家反馈的重要性仍然存在。在拖延的银行破产程序中，国有企业与地方法院合谋推动资本逃离（China Online 2002）。政党和政府的一些基层官员变成工商企业的新老板。相反，一些成功的私人企业家入了党，并且融入了政治精英的行列（Tong，Y. 1997：216）。私人企业仍然用“红帽子”作为享受特权的方法，这在网络内仍然是可行的。

而且，由于结构和动态特征，网络内仍然在发生与形式相符的过程。自1996－1997年以来，随着现状的再生产越来越不稳定，我们可以观察到以下这些努力：重新加强政党在国有企业中的作用，[①]政党对战略性国有财产——特别是大型企业——实行集权化，同时摆脱负担（World Bank，interview，2002）。在1998年，10个部委被取消，从前由其他部委、军队和警察创建和拥有的企业被拆分，以降低企业经营中的经济政策干预。通过企业合并和拆分而在政府官僚机构中实行合理化所导致的权力真空，在网络内很快就被填满并与形式相符。取消10个部委并没有增加企业自主，而是导致权力再次向政党分配。政治局下设了大型企业工作委员会（LEWC）[②]。大型企业工作委员会负责任命这些大型企业的领导，180家战略性企业被选出，并服从其干部管理职能。[③]在这些企业当中，又有一小撮更重要的企业由中央组织部提名，并由政治局直接任命其领导。在省、直辖市一级，针对它们各自下属的战略上重要的国有企业也设立了类似的委员会。

在理论上，大型企业工作委员会不能执行经济政策职能。但是在实际上，向大型企业工作委员会和较高层级的反馈，意味着对战略上重要的企业的分配和攫取能力从较低层级政府那里被集权化了。当时这些企业是不能进行私有化的。但是，它们可以通过控股子公司来上市。它们参与了中央政府发展“债券项目”的基层组织，实际上是强制商业银行必须提供融资（World Bank interview，2002）。在大型项目上，政党和政府行政的最高

---

① 1997年，中央委员会发布的第三号文件强调了政党的地位（World Bank，Interview 2002）。

② 该委员会的成员选自10个被废除部委的领导层（World Bank，Interview 2002）。

③ 经理、党委书记和总会计师都由它任命（World Bank，Interview 2002）。

层级批准它们的投资。[①]最近，在2003年初，经济与贸易委员会（ETC）、大型企业工作委员会、计划委员会的一些部门合并为一个新的机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这一合并明确地集中了用于分配的资产，以及最重要企业的干部管理。[②]以上所有的都表明，网络的绝对和相对收缩和削弱使选择更严格，同时在网络中也保留了同样的选择标准。

关于债转股也能得出类似的影响。1999年引入了债转股的框架，为挑选出来的、具有讨价还价能力的601家企业和银行提供减负和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些银行经常在政府压力下为这些企业提供贷款。这些企业是从6600家亏损企业中选出来的。债转股通过减少国有企业的利息支付，让它们集中进行现代化和重组，从而有利于国有企业（World Bank，interview 2002）。在许多情况下，这一计划都帮助重新启动了一些困难的国有企业，而不是减小国有部门的规模（Steinfeld，China Online June，2000）。

普遍存在的政治理性选择标准，对于缩小的圈子（以回应其成员的吸引和抵制能力）不仅仅涉及软再生产约束。并且，这些标准也进一步**提高了攫取动力**，以便在网络内实行分配，进一步提高了它们在其所属网络之外去创造资源的动力。自1994年以来，我们可以观察到通过越来越新的收入分成方法而反复进行的收入集权化努力，例如，把从前的地方税纳入了共享税范围，集权化比率增加，赢利企业的从属关系的集权化，非效率企业的分权化，把预算外资金纳入政府预算控制范围，开支的分权化，国有企业的社会成本转给地方预算，等等（Csanádi and Lai 2003）。

14.4.5. 政治转型的经济条件

由于稳定的宏观经济增长、FDI的不断涌入、国内资本的不断增加，

---

① 实际上，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仍然有权介入这些企业中的经济政策决策过程。像中国石化这样的大型企业，其商业决策通常是由国务院和副总理审批（World Bank，Interview 2002）。

② 根据国资委主任的说法，国有部门（160000家国有企业）创造的总利润的64%来自国资委监管下的196家国有企业。改革这196家国有企业的战略是“鼓励那些国有企业境外上市，通过吸引FDI购买股票来实现股东多元化”——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与韩国同行的谈话（*Workers Daily*，July 8，2003）。

从而导致首先发生经济转型，在当前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从一种政治垄断制度权力结构转型为一个政治实体的经济条件，比1980年代末匈牙利的情况要好。但是，新的政治子域的演进是不可能的，因为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宏观经济、社会、知识、政治等方面的要素。社会被非政治化，政治化变成零散的，知识分子在1989年之后在政治上变得温和，尽管随着网络内出现的经济和社会张力逐渐平息而更加差异化了（Xiao，Gonkin 2003a：328）。同样，政党的合法性和权力工具足以禁止网络外出现新的、明确横向的政治或社会组织。

解体期间经济和社会张力的累积

然而，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制度结构的解体过程演进来看，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大好形势可能是暂时的。网络内经济衰退和政治理性普遍存在，相反，网络外却出现了经济增长和相对的经济理性，这导致了张力。[①] 这些张力推动了加速掏空网络内的僵化结构和残留的互联线（资产剥离、把利润转移到网络外、洗钱、自发的私有化、国有资产滥用、腐败、倒闭，等等）。出现张力的原因还有，同时发生的经济和机构变化的加速所导致的累积的不确定性，在许多方面都出现了，并延伸到大的社会集团。解体和经济演进的并行特征，增加了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网络内与网络外既得利益者之间、个人之间（由于收入差距扩大和伴随着的从农村到城市、从内地到沿海、从小城市到大城市的移民）的张力（Herrmann－Pillath at al. 2002；Zheng，Y. 2004：253－281；Lai Hongyi 2005；Zhao 2005）。进一步的张力来自于越来越多的小规模和大规模的腐败案例，这些案子发生在政党和政府官员当中，以及黑社会对剩余网络的渗透，导致集体有组织的犯罪（Chen，W. 2003：210）。揭

① 根据Brandt和Zhu，政府对国有部门的补贴（commitments）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张力。正如他们所强调的，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导致补贴增加，但是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却越来越大（Brandt and Zhu 2001：455）。

露这些犯罪行为的时候存在明显的政治有选择性，使这一现象进一步恶化。[①]张力在国有部门增加，因为挽救亏损国有企业的机会变少了，私有化过程推进到更大的企业，造成大规模集中裁员的可能将变成现实，而国有部门内部失业已经很高了（Tong, S. 2005）。据说国有企业1/3的雇员是闲置的。由于竞争加剧，预期将有近4000万工人失业。[②]同时，社会基础设施十分脆弱，国有企业从前的社会负担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工人越来越不满，特别是在那些具有重工业特色的领域中，由于集中失业、缺乏地方资本筹集能力、FDI流入的机会有限，情况非常糟糕。据新闻机构报道，在中国东北和农村地区发生了数千人参与的大规模游行和冲突。地方破产和频频曝光的腐败造成的政治不稳定，导致了不服从和不信任（Lai, Hairong 2004; Csanádi and Lai 2003）。

这些因素增加了保持政治合法性的困难，但是在政党内部也没有形成符合并行发展的替代意识形态（Zheng, Y. 2003: 196 - 197）。张力增加及其社会和政治影响，以及服从意识形态的缺乏，可能很快就会消耗掉中国共产党累积的政治资本，以及她果断地取缔新生的其他横向组织的能力。

政治子域转型的条件

政党作为一种制度权力结构，在所有融合子域中正不知不觉地经历着一个解体过程，因为政党正逐步地将它们放开。这一过程也包括政治子域，因为剩余网络的凝聚力在不断下降。根据某些资料，招募党员变得越来越困难（Zheng, S. 2003: 175 - 190）；党员数量下降，党员年龄上升，政党在合资企业中的作用下降。没有党员的国有企业的比例越来越大，据说年轻一代一般都没有兴趣入党，愿意入党的知识分子、年轻农民和年轻

---

① Zou Keyuan（2003: 91, fn. 17）提到一个报告，该报告指出，中国领导层准备了一份超过171名高官腐败的清单，这些贪官受到袒护而免受惩罚。（Document on the Selective Protection of Corrupt High - ranking Officials *Cheng Ming*,（in Chinese）, 2000, No. 9, 17 - 18）。只有通过纪律检查委员会之后，高层官员腐败的案子才会移交司法部门。大多数法庭干部都是中共党员（Zou 2003: 243）。任命权属于地方政府的人事部门；法院的财务状况依赖于地方政府，人民代表大会没有建立机构来监督司法程序（Zou 2003: 254）。

② “国有企业中1/3的雇员是闲置的”（China Online, 30 August 2000）。

工人越来越少（Wibowo 2003：190－195），而在各个层级上入党和参与政治决策的资本家却越来越多，他们代表着替代行为和利益，从而弱化了网络（Zheng，Y. 2004：253－281，Table 10.12）。社会团结运动的横向联系凸显（Chen，W. 2003：310），这标志着政治领域开始转型。

根据这类文献，转型了的政治领域（解体中的政党可以调整为一个政治实体）只有很小的机会发生，因为政党作为一种制度权力仍然紧密控制着每一个演进迹象。[①]但是，网络内机会仍在出现，并行于政党解体或部分地作为政党解体，因为网络内的多元化存在组织机会。以互联线与政党联系在一起的全国阵线的、合法的——当前是没有意义的——政治实体可能突然获得动力，并对加速解体和演进起着竞争性作用。随着张力增加，政党的合法性在地方下降，从而网络内的自我再生产约束日渐硬化，在政党机关和领导层内部有可能出现多个派系。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不同社会阶层与那些派系的利益是一致的（Zheng，Y. 2004：253－281）。而且，由于网络的零散撤离（绝对收缩）正在向上层推进和扩散，沿着自我再生产约束硬化的路径，地方的、局部的民主程序作为一种解决约束硬化的方案，出现的机会越来越多。再生产约束硬化的地方发生了分权化、解体、地方政党和政府组织的政治资本的撤离和贬值，并且出现了地方替代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He 2003；Xia 2004）。

14.5　结　论

我们已经阐述，与模式相符的特征如何得到强调，而在适应内部和外

① 这些行为包括：镇压在全国范围内威胁公开政治挑战的团结运动（参见法轮功运动的命运，Xiao，Gonkin 2003b：64－84），清除处于形成中的政治党派的倡导者（参见民主党的命运，Xiao，Gonkin 2003a：320－350），对积极支持人权、研究宪政问题和经济人权的某些私人机构进行清算（参见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命运），在网吧里的频繁围捕，最近取消两个由外国联合官员主办的、有关敏感性问题（如劳动标准）的国际会议，一个有关劳工权力、选举和政府改革的会议。

http：//news. yahoo. com/news？tmpl = story&u =/ap/20050517/ap_ on_ re_ as/china_ democracy_ conference_ 1.

部预算约束硬化的压力的情况下，在稳定实行与模式相符的工具时机动空间变小。虽然三个政党－国家存在不同的与模式相符的措施和个体特征，以及经济转型的不同政治条件，政治转型的不同经济条件，但它们对外部（预算）约束和再生产约束硬化的适应导致了自我毁灭，而这种自我毁灭是以与模式相符的方式进行的。

在罗马尼亚，适应性压力作为针对再生产约束硬化的一种反应而不断增加，因为从较低层级可攫取的、从较高聚合体可吸引的资源耗竭了，网络外预算约束硬化。但是适应性措施并没有背离与结构相符的工具，而与模式不相符的主动性很快就与形式相符了。强制性资源调配的发展螺旋式地把张力推进到极端，创造了压制群众不满的条件。再生产和外部（预算）约束硬化，苏联作为上级单位的解体，该集团的较大聚合体内依附线的逐渐撤离，以及相邻政党－国家的崩溃，为不满和突然崩溃的爆发提供了机会窗口。崩溃前结构的影响，加速了的自我再生产的模式特有性工具，累积的张力，以及没有事前解体的突然崩溃，导致经济与政治转型重叠发生。这种重叠过程的累积的影响导致深深的经济危机，以前在齐奥塞斯库那里失宠了的共产党员快速地占据了政党基层组织，以及其他政治利益的缓慢制度化。因此，经济改革的政治条件和政治改革的经济条件都带着高度累积的不确定性，延长了经济和社会危机，群众不满和长期的宏观失衡，延迟了这些要素的解体和演进。崩溃前的结构及动态运行使其自身陷入困境：私有化、难以稳定、低经济绩效、低国际利益、资源匮乏、法制和市场要素引入相对较慢。甚至到1999年，从前要素仍然没有解体，更不用说整个经济开始转型为一个市场体制。

在匈牙利，较大聚合体中再生产约束硬化，国内再生产约束硬化，网络外预算约束硬化，最终迫使该国领导层放弃了生活水平、经济扩张和调整持续增长的范式。然而，增加的适应性措施基本上局限于与模式相符的工具（分权化改革）的强化实施：首先是经济决策分权化，然后是分配负担分权化，接下来是经济决策者的自由决断权分权化，但结构内攫取和分配的选择性关系没有变化，导致经济下滑和政党合法性危机。再生产和预算约束硬化，分权化措施，经济危机，加速了政党作为一种制度权力结构的解体，这起始于分权化、互联线弱化和撤离、向作为互联线把持者的决

策者扩散，导致政党科层的解散和政党本身的解散，转型为一个政治实体，并根据转型中的政治制度背景作出调整。一方面，由于解体、崩溃和演进的顺序，政治转型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发生，而共产党是一个较弱的反对派议会力量。另一方面，缺乏经验的新的政治精英、不稳定的选民、累积的不确定性、短期行为的激励，提供了经济转型的政治条件。

至于中国的政党－国家，由于模式特有的和个体的因素，她并没有被东方集团以及包括苏联在内的集团成员国的全面解体和崩溃所拖累。然而，中国模式的结构及动态运行特征及其影响发展了类似的适应性压力，导致模式特有的自我耗竭。当解体通过稳定的资源调动努力和分权化而发生的时候，再生产约束硬化首先深化了资源创造型改革，通过这种改革来增加网络外领域，刺激网络的相对收缩。其次，网络内再生产约束硬化在中央层面上变得更加频繁，因为处于更好位置的那些单位的抵制能力增加，处于更差位置的那些单位的再生产约束由于负担分权化、收入被吸走、资源创造型改革导致来自网络外的国内外的竞争压力增加（预算约束硬化）而硬化。这一过程通过私有化加速、倒闭和网络外入侵而刺激了网络的绝对收缩，通过网络内的替代资本、行为和利益的渗入而使网络弱化。到目前为止，网络的经济子域中的解体已经推进到了更大的国有企业。

中国体制转型的顺序与匈牙利情况相反。在中国，首先是经济单位被分权化，然后脱离互联线和科层内依附线，再后，国家行政（组织、职能和手段）被撤离、政党在经济和国家领域的互联线被削弱、切断、掏空和撤离，在增长的情况下，科层线在地方被撤离。这种过程发生在解体中的政治垄断体制的独裁条件下。这样的话，政治改革的经济条件也是特殊的：与匈牙利崩溃前的情况一样，政治子域解体的征兆意味着分权化和撤离的类似阶段，内部多元化的类似机会。由于网络内的社会和经济张力逐步增加，税收差距、失业、倒闭、私有化和资产剥离增加，这一过程可能加快。然而，通过网络外经济领域快速增长而实现的宏观经济增长，容许政党压制住网络外形成的政治子域的演进的任何迹象。由于模式特征和伴随着的动态运行，要素解体主要发生在地方层级，其次才是宏观层面上的，这依赖于局部性的、有选择地推进的、向上扩散的再生产和外部（预算）约束硬化的路径。

15 结 论

结合前面章节的主要结论，现在可以回答本书最初强调的问题了。最初的问题是：政党-国家运行和变迁的政治-经济-社会逻辑是什么？我们如何解释这些政党-国家在运行和转型中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为什么一些政党-国家实行了改革而另一些政党-国家没有实行改革？为什么一些政党-国家崩溃了而另一些政党-国家没有崩溃？为什么一些政党-国家的转型伴随着经济危机而另一些政党-国家的转型却伴随着经济增长？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引入了一个分析模型。互动式政党-国家（IPS）模型是一种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综合分析方法。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政党-国家的权力结构、运行、解体、崩溃和转型，以及它们不同发展路径的结构背景。互动性是这一模型的核心，因为它集中于政党-国家的内部运行，强调特殊结构背景所决定的个人和机构利益和行为间的相互作用。IPS 模型也使我们有可能揭示个体决策者在互动中的结构动机，以及基于政治理性的结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导致再生产过程中讨价还价能力上的差异。它定义了这些要素的自我相似性，容许和限制互动的关联原则和运行原则。它还从不同维度（时间、空间、聚合体的不同层级、不同的结构条件）上揭示了决策者的动机与行为。而且，它强调了从结构和运行的政治理性特征中演进而来的陷阱。

更详细地说，IPS 模型是基于政党与国家之间、政治与国有经济之间的**直接关联**而归纳性地建立起来的动态运行框架。IPS 基于**个体的**政党决策者、国家决策者与经济决策者之间的依附性和利益关系，假定了这些子域中的互动性结构。直接关联起源于政党的**权力工具**——干部责任、主体

责任、区域责任和党员资格。这些都渗入非政党机构，并通过重叠职位结构、活动结构、组织结构而直接影响个体决策，通过党纪直接影响个人。因此，被这些互联线包围的单个决策者不得不考虑通过这些互联线传来的预期和压力：作为职位把持者、活动追求者、组织代表和党员。然而，同样的互联线也用来直接提高政治领域的利益，把持这些依附线的个体决策者的利益。因此，这些联系在被联系的那些行为人和缺乏联系的那些行为人当中造成了累积的结构固有的不平等。由于这些直接联系，在这些领域产生了高度敏感性：政治决策将会直接影响非政治子域，非政治子域的决策也将直接影响政治稳定性。

相互联结的依附线也可能使战略行为人更深地融入决策过程。满足政治理性的优先标准的那些行为人能够在政党和国家科层、跨政党科层、在任何层级上达到决策过程的捷径。有了这些捷径，被选出的行为人能够在他们自己的科层中跳过任何数量的层级，和/或达到特定层级或任何决策者，其实可以达到政党科层的任何层级。借助于这些捷径，制度化的**反馈环**形成了：它的一边是捷径，另一边是科层内或跨科层的依附线。因此，我们把这些捷径叫做**结构性反馈**。结构性反馈将会在提升利益和抵制干预的能力方面导致新的结构**固有的不平等**。这是因为特权主体——与同层级的伙伴们相反——能够与决策者进行沟通，否则后者就绝不能满足他们在科层中正式职位的层级中的特定差异，也能够直接获得和传递信息，否则这些信息就不可能或只有通过中介来获得和传递。结果，通过结构性反馈，被选出的主体便能够直接影响那些将会影响他们的决策，累积进一步的关联，在它们自己的科层内和跨政党科层为抵制不可避免的决策做好准备。不平等的利益提升和抵制可能性导致讨价还价能力和正式职位也有所不同。差异的结构性基础在于政治理性关心。

基于迄今为止所描述的结构特征，IPS 模型阐明了政党－国家结构**不是**科层性的。它具有科层的要素，但是融合整个结构的不同子域和关联原则的其他要素，把这种科层规则搅得模糊不清。由于这种模糊的结构，[1]我

① 回顾一下，模糊的起因在于：国家所有权，互联线，来自和通往任何科层层级的跨科层反馈和科层内反馈，它们的累积，沿着结构攫取、分配资源的不同能力，形成网络的横向机构关系和零散行为人之间关系的缺乏。

们**难以确定**政党与国家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政治与经济之间、统治精英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边界和比重**。因此，由于个体层面上各个子域之间的相同融合，旨在分离政治与经济、政党与国家、社会精英集团与社会从属集团、国家与社会并沿着这些界线来解释政党－国家体制的动态运行，是不精确的。相反，因为这一模型展示了一个精致的结构，所以这避免了把这些体制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monolith）来加以分析。

结构特征包括**关联原则**，根据这些原则，相互联结的依附线——作为政党的权力工具——可以起始于政党科层和跨科层的结构性反馈，因为他们用互联线作为一个圈，也可以起始于非政党科层。结构特征形成了**运行原则**的结构背景：因为所有主体都拥有科层依附线（D_1），但只有政党内的主体才拥有直接或间接地与国家和经济中所有主体相互联结的依附线（D_2），这样，依附性、利益提升和资源攫取、分配都是在政治上垄断的。在这一政治垄断结构中，决策者的地位是双重的：他们**把持**依附线，也被依附线**俘获**，从而**在一个实体中**同时具有分配者和抗辩者的职能：作为依附线的垄断把持者，他们能够也被迫实行干预；作为这些依附线的俘虏，他们为提升利益而保持和增加依附线的时候既受到影响，也有利益所在。由于主体的特殊结构位置、干预的能力和力量、在保持依附线时的受影响和利益——共同地——形成了网络内主体从而整个结构的自我再生产期间**经济行为的政治理性动机**。

因为主体在一个实体中的双重地位，网络内单个主体的联合**资源吸引、攫取、分配和抵制**能力使自我再生产的能力得以衍生。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将提供他们自我再生产约束。但是，这些约束在网络内**不是统一的**。**累积的**固有的不平等（D_2，I_2；I_3）将形成资源吸引、攫取、分配和抵制干预的**有选择的机会**，从而**有选择的软或硬自我再生产约束**，从而有选择的短缺，这种有选择性依赖于建立在政治理性关心基础上的、主体的结构性讨价还价地位。

结构及动态运行特征将发展成为**再生产陷阱**，这些陷阱的出现是由于基于政治理性的体制自我再生产。这些陷阱包括以下政治理性动机：（1）有选择的软再生产约束，有选择的分配的固定途径，经济行为和增长竞赛。结果，从结构特征演化而来的陷阱便解释了（2）在政党－国家体制

或任何自我相似单位中**缺乏经济效率约束**。所以，由于陷阱，自我再生产也意味着同时发生了（3）体制的**自我耗竭**。

由于缺乏经济效率控制，有时（或者是暂时的，或者是长期的）资源攫取和/或吸引在特定权力结构的框架中不再可行，这或者是由于抵制，或者是由于没有可攫取的资源。换句话说，再生产的动态运行陷阱**有时会导致结构上的硬再生产约束，从而导致特定聚合体任何层级上的短缺和整体聚合体凝聚力下降**。

要素及其关联原则、运行原则和随后的动机和行为、自我再生产约束的因素、有选择性和再生产陷阱的特殊性，有着**自我相似的**特征。结构及动态运行的自我相似性将在时间、空间、不同聚合体、不同结构条件中普遍存在。换句话说，这些特征并不局限于哪一层级和时间，而是体现在同一时间的不同层级、不同时间的相同层级、不同时间的不同层级。基于那些特征，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自我相似单位的操作性概念：包含一个上级单位，一个普通单位以及该普通单位的下级单位，允许某个单位进行资源吸引、抵制干预、资源攫取和分配。自我相似单位是建立于一个聚合体的每个层级、不同聚合体层级之上的。最小的聚合单位是网络内的个体决策者，其被依附线包围，在我们的分析中，最大的聚合体是苏维埃集团。

基于以上结果，该模型最重要的一个新概念就是"**再生产约束**"。这一概念与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形成对照。我们可以在这种对照中描述软预算约束的特征和缺点。再生产约束概念包含了与权力结构有关的多个特征，而这些特征在传统的软预算约束概念中没有得到反映。例如：集中关注网络内任一经济单位，结构中主体的双重地位和职能，政治理性结构的促进因素，自我再生产能力的复杂性，自我相似性的结构及动态运行特征，不同层级的聚合体，结构背景及其多样性。

再者，与软预算约束的稳定特征和缺乏结构背景相反，再生产约束不仅仅是一个**结构性的**概念，而且还是一个**动力性的**概念。它不仅可以在空间和不同聚合体上扩展，而且还可以在时间上扩展。再生产约束可以根据较大聚合体内某个主体或某个单位的讨价还价地位而变化，或根据较大聚合体与其下级单位之间关系而变化。它们所控制的线和反馈的数量和质量的改变，可以直接地导致这种变化，或者，下级单位的地位或较大聚合体

的地位的改变，也可以间接地导致这种变化。压力与网络内外决策者之间相互强制性的互动，网络内陷阱与网络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也可以导致这种变化，因此，这便解释了各种模式内部、模式之间、体制之间重组的原因。

IPS 模型中的另一新概念是**有选择性和有选择的软/硬再生产约束**，与软预算约束形成对照。科尔奈将软预算约束视为政党 - 国家中国有企业的一般特征，同时也承认他故意忽视软预算约束差异的重要性。软预算约束并没有反映出权力网络中固有的不平等，因此没有反映出**有选择性**。在软预算约束下，有选择的软再生产约束所确认的结构性动机和各自行为，是由企业经理的个人野心和国家官僚机构的家长式行为来解释的。官僚科层协调（Kornai, 1992, pp. 97 - 100）作为共产主义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没有包含政党和国家决策者与国有企业经理之间的行政关联。然而，揭示个体决策者之间结构性不平等的个体决策者之间产生的关系的结构基础，并没有得到发展。各自有选择的资源吸引和抵制能力和行为，都没有得到考虑。科尔奈谈到了机会上的差异性，注意到不同企业的软预算约束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没有重视这一点。结果，在科尔奈理论中，官僚科层协调没有联系于结构特征和作为一种制度权力结构的政党的社会背景，也没有联系于它的自我相似的结构性和动力性特征。

相反，再生产约束的有选择性解释了网络内有选择的吸引、抵制、攫取和分配能力，以及有选择的干预和分配的政治理性关心。它涉及政治理性经济动机与个体决策者谋求增长的行为之间的紧密联系。最后，有选择性导致了再分配的固定途径和整个结构再生产约束硬化。它也是短缺的有选择性的一个因素和某个单位层级整体上出现短缺的原因。

IPS 模型不仅介绍了政党 - 国家体制的一般（自我相似性）结构及动态运行特征，还揭示了政党 - 国家间的**差异**，并给出了一个结构性解释。这些差异出现在自我相似的特征内，是由于互联线的起点、范围和深度的不同分布；所得反馈的起始位置、到达位置（层级，科层内或跨科层）和密度；资源攫取和分配能力沿着结构的不同层级的不同分配。这些差异组合在一起，便确定了**不同的权力分配**，从而确定了**软或硬再生产约束分布偏离的差异**。约束的软度和硬度将根据某个单位内讨价还价能力的实际分

配而演进，这种讨价还价能力决定该单位内的自我再生产约束，从而决定该单位内的权力分配。结构内有选择性的存在和分布上的差异，是具有选择性软再生产约束的主体的不同分布的原因，也是整个结构再生产约束硬化的不同频率的原因。选择性特征影响了结构特征（反之亦然），影响了自我再生产的结构特有性工具的演进，并最终影响了再生产约束在空间、时间上硬化的有选择的扩散特征。尽管再生产约束硬化刺激了体制特有的行为和战略，但是结果取决于结构的特征。

从体制再生产的角度来看，政党－国家的发展可以根据权力分配及其相关动态运行而进行分组。权力分配包括**三个主要的结构性因素**：沿着政党科层的互联线的占有的分配；来自经济的结构性反馈（捷径）的存在；在网络内沿着国家科层的资源攫取和分配的自由决断权的分配。显然存在**三种主要模式**：自我掠夺型、自我解体型、自我撤离型。这些结构模式将决定权力分配的特征：模式内资源吸引、抵制干预和攫取的能力。它们也会导致再生产约束硬化的不同频率，以及在模式内恢复凝聚力所需时间的长短。它们将促进资源攫取和分配的与模式相符的工具的发展（强制性的资源调配、资源调动型改革和资源创造型改革）。它们也确定了这些工具的位置，从而确定了自我再生产的不同方式。模式将导致特定体制**转型的路径和条件**的差异。

要素的解体、崩溃和演进将会根据模式特征和权力分配动态运行而表现出不同的**顺序和速度**。在自我掠夺型模式中，体制崩溃先于体制要素的转型，而崩溃后要素转型重叠发生。在自我解体型模式中，崩溃和演进完全是按顺序进行的，在自我撤离型模式中，解体和演进同时发生，伴随着有选择的推进、局部性地方消亡向上层扩散。

模式的背景也决定了结构要素的转型顺序。在自我掠夺型模式中，政治和经济转型是重叠发生的，在自我解体型模式中，政治转型在先，然后是经济转型。在自我撤离型模式中，首先发生的是经济转型。因此，模式特有的顺序强烈地影响着政治转型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在自我掠夺型模式和自我解体型模式中经济下滑，在自我撤离型模式中，宏观经济增长，伴随着网络内经济下滑、网络外经济增长）。类似地，它们也影响经济转型的政治条件（在后自我掠夺型和自我解体型模式中，正式的民

主和民主政府，在自我撤离型模式中，政党作为一种垄断制度权力）。模式特征也决定了聚合体的层级（位置），发生在权力分配的特定模式中的要素转型（全国性的和/或地方性的）。

从前模式的结构和动态运行以及它们内部的个体特征将会影响转型的**社会成本**：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深度，实现宏观平衡的难度，经济改革的机会，体制构成要素解体和演进的速度和可能的时机。它将有力地影响累积不确定性的水平、腐败程度、社会阶层化程度、调整中的灵活性、法制的引入以及相应行为的发展。因此，模式也将实际性地影响领导们在转型期间建立并成功实施其战略的机动空间。

模式的动态运行在网络自我再生产过程的背景中解释了的改革位置、作用和影响。自我相似的特征、不同的模式及其动态运行，以及它们对转型的影响，可以解释以下各方面的差异：改革的**起点、速度、顺序**，实施这些改革所处的**政体**。完全渐近式的改革——从上面开始——发生在独裁主义政体下自我解体型模式中，政治转型首先发生。完全渐近式改革——从下面和上面同时开始——发生在独裁主义政体下自我撤离型模式中，经济转型首先发生。在自我掠夺型模式中，体制崩溃之前没有发生改革。因此，模式动态运行的背景**包含**和**协调**了比较研究改革文献中关于改革的理想的位置、速度、顺序和政体的相反论述。他们证明这些问题主要依赖于背景，而不是一个战略选择问题。

更详细地说，模式特有的工具也决定了决策者在运行期间影响转型的不同**机动空间**。在自我掠夺型模式中，机动空间在崩溃前是很大的，在崩溃后却大大受限。在自我解体型模式中，机动空间在体制崩溃前后都受到同样的限制；在自我撤离模中，转型领域的机动空间在网络内受到有力的限制，但在网络外限制被放松。由于以上差异和限制，战略决策可以加速、减缓或者补偿但**不能改变**以上所说的依赖于结构模式的改革和转型的特征。机动空间和战略选择**受到**模式特征及其内部变型的**约束**——在崩溃之前，在崩溃期间、崩溃之后的影响中。其他选择出现在模式**内**，但**不能**在模式之间**跨越**，也**不能**在模式与体制之间**跨越**。

这些不同的模式动态运行和与模式相符的工具，解释了以下问题的**结构性原因**：为什么相似措施可以导致相反结果（这些措施在一个国家成功

了，而在另一个国家却失败了）；为什么相似的措施在不同的政党－国家崩溃之前和之后可以达到类似的结果；为什么相似的宏观条件刺激了不同政党－国家的不同反应。

因此，如果脱离体制和模式背景来讨论改革，那么不同的模式（自我掠夺型、自我解体型、自我撤离型）将变得一致，混淆了模式与体制（或者是与政党－国家相混淆，或者是与资本主义相混淆），不同的体制（政党－国家与资本主义）将变得一致。脱离改革的结构－制度－体制背景以及改革对转型的影响来分析和实施改革，将导致不切实际的努力、无意识的结果，形成自我反省式的解释。

基于 IPS 模型的特征，我们定义了政党－国家作为体制的主要特征，换句话说，我们定义了**共产党作为一种政治垄断制度权力结构**的主要特征。这一定义包括其结构的自我相似性和差异性、自我再生产、自我耗竭和转型。因此，政党－国家体制意味着（1）结构及动态运行在时间、空间、聚合体和条件等方面自我相似的复杂性；（2）在时间、空间、聚合体及条件方面的结构及动态运行差异。具体来说，（1）自我相似性涉及（图 1. a）结构：主要构成要素及其基于单个决策者关系的关联原则，形成结构中依附性、利益提升、资源攫取和再分配的政治垄断特征的关联原则和运行原则，从而个体决策者在政治垄断结构中作为依附线**把持**者和被**俘获**者的特殊地位。（图 1. b）动态运行：导致根据结构内权力分配而出现的有选择的软再生产约束的随后的结构性动机，以及与结构相符的行为。（2）权力分配的多样性（图 2. a）导致自我再生产动态运行的与模式相符的特征，以及（图 2. b）导致自我再生产工具以及政党从一种制度权力结构到一个政治实体的解体、崩溃和转型的路径等方面的差异。

这里，我们的一般观点是，符合以上标准的**所有结构**都是政党－国家结构，它们可以**任何**时间处于任何聚合体层级、某一聚合体层级上任何单位。基于以上定义，我们的特殊观点是，以**极权主义**体制为特征的政党－国家，只符合自我掠夺型模式**内**的某些变型。它不符合自我解体型模式和自我撤离型模式中的任何变型。

除了以上解释政党－国家结构及动态运行的新概念之外，我们在分析政党－国家动态运行时还使用了社会学中所用的**传统术语**。然而，根据由

IPS 模型所提供的结构及动态运行背景，以及案例研究的经验，我们重新解释了这些传统术语。我们已经证明，由于再生产陷阱，在政党－国家背景中运用**传统上用于市场条件中的**工具，**其效果变得“扭曲”了**。于是，本来能够促进市场条件和市场行为发展的方法，在政党－国家中的**作用却有些不尽人意**。比如，**改革**使结构解体和收缩，而不是促进结构的适应。**分权化**并不必然提高行为人所期望的自主，但是却重新分配负担，激发自我相似行为，并且有可能增加较低科层的依附性。**市场竞争**压力不仅提高所预期的适应性，而且加速掏空和剥离刚性结构、扩大腐败，同时在残留网络中维持基于政治理性的选择。奇怪的是，**西方贷款**没有直接促进生产结构的经济效率，相反，它们有助于维持现状。调整措施作为对**外部（预算）约束进一步硬化**一种反应，促进与模式相符的措施，而不是促进市场行为，导致自我破坏，而不是导致适应。因此，对于政党－国家适应和转型，没有“**一般的**”解决方案，也没有“一般的”预期。

通过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中国**三个国家**的政党－国家历史和转型，我们可以对 IPS 模型的主要假说进行**阐释和验证**，这三个国家分别对应于三种不同的模式。从体制上对三个政党－国家发展和转型的不同阶段进行描述，可以阐明这些模式的运行，以及 IPS 模型对比较分析的有用性。

对三个政党－国家的考察证明：尽管政党－国家具有自我相似的特征，起始于相同的结构模式（自我掠夺型模式），共产党接管的阶段具有重要相似性，但是，**个体特征**最初就已经影响了自我掠夺型模式内的权力分配特征。这些个体特征包括：国内外具体的历史条件，前述的历史事件和政治事件，地理政治位置，战略重要性上的差异，共产党的不同力量，经济和制度发展的水平，原材料的可得性，苏联在政治和资源上的影响，国内共产党和莫斯科派共产党的角色，领导者的宏观政治、宏观经济和外交政策战略，等等。案例研究证实了这些个体特征在特定模式的形成、变迁、解体、崩溃和演进中的重要作用。**国家层面的研究**所反映出来的只不过是 IPS 模型所定义的术语的模式和变型中的具体表现。例如，选择标准的具体变型**如何**体现于每一个国家、不同的时期。这些是网络内解体与网络外演进的紧密相互作用的具体迹象，这有助于在经验上确定再生产约束硬化的因素，揭示这些因素的多样性。具体事件表明，这些约束可能导致

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促成了网络要素的不同类型的转型。对这种多样性的探究也使我们有可能把解体现象从分权化现象和演进现象中分离出来。

模式决定了：有选择性的特定路径，整个结构再生产约束由于自我相似行为而硬化的频率，用以获取进一步资源的工具，与模式相符的工具的强化运用（导致再生产陷阱的与模式相符的演进）。我们揭示宏观层面上的再生产约束硬化导致根据模式特征和领导个人野心的不同反应；指出有多少种领导个人动机被放松或被不同模式所约束，而不论他们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我们证实体制和模式动态运行的再生产陷阱限制了个人战略，以至于即使受到再生产约束和外部（预算）约束的压力，自我再生产的工具也没有实质性地偏离与模式相符的措施，反而实施得更加频繁。因此，**适应**性动态运行加快了与模式相符的自我再生产手段，而不是进行调整，导致与模式相符的自我耗竭。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由于动态陷阱，改革导致了自我再生产期间的自我解体和自我毁灭。所以，政党－国家体制的**适应**是**自我耗竭的**。自我耗竭式适应体现了它们**有限的学习能力**。

从案例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存在个体特征和不同模式，但是自我相似的动态运行特征——基于政治理性的有选择性，有选择的硬/软再生产约束，资源储藏，增长的驱动力，陷阱——突破了并盛行于每一种模式。实际经验突出表明，在这种网络普遍存在（即使逐渐衰退）的地方，网络内行为和选择标准的政治理性都没有改变。案例研究还强调，当自我相似特征（要素、关联原则、运行原则、结构激发因素及相应行为）**解体**时，模式特征和个体特征的影响将**主导**转型的过程。然而，不论是什么模式，在经济子域的并行的解体和演进中都具有一般特征：网络内经济下滑，累积的不确定性，收入差距增大，逃离和掏空网络的短期行为，腐败增加。在政治解体中也存在一般特征：理性化，简化委员会成员和职能，使依附线变得更稀薄，分权化互联线，撤离相互联结的科层内依附线，逃离机关，招募党员的困难。

案例研究还揭示，**较大聚合体**的模式也决定了较低层级的机动空间，这依赖于它们通过在科层内或跨科层与上级联结的互联线、内部科层线和反馈的密度而联系有多紧密。但是，下级单位的模式仍有可能各不相同，与较大聚合体的模式也有所不同。历史事件表明，较大聚合体的松解，不

会自动地导致放松对下级单位的控制。然而，这种松解导致了下级单位追求各自发展战略的更大空间。于是，相似的宏观条件在一个政党－国家中导致模式转变，在另一个政党国家中导致模式维持，这依赖于个体因素。这些个体因素包括：在较大聚合体中的讨价还价地位，政党科层内的严格性，领导层的合法性，精英内部冲突的平衡，领导者的个人性格和能力，社会不满程度。尽管具有相似的宏观条件，但是崩溃在一种模式中可能是突发的，而在另一种模式中可能是温和的，而在第三种模式中可能被避免。因此，相似的战略行动（如紧缩政策或自由化）导致不同结果，这依赖于模式特征和个体特征。

案例研究还揭示，自我掠夺型模式中领导者巨大的机动空间，以及在这种模式由于解体与演进重叠而导致崩溃之后领导者机动空间有限。在自我掠夺型模式中，领导们的个人性格和动机的巨大作用存在差异，这在于国内或对外经济政策，在于资本和人口的实物调配。我们还指出在出现不同的新领导者以及新或旧模式的稳定化的情况下，三个国家中个人权力稳定化的不同措施。类似地，在凝聚力很强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苏联作为上级单位的有力影响，以及其领导个人野心的广泛影响，在凝聚力松散的时候，决策者的机动空间相对很大。我们还可以发现，当集团下级单位再生产约束和外部约束也硬化的时候，融合关系从它们那里撤离的影响的连锁反应。

然而，当再生产约束和外部（预算）约束都持久硬化的时候，模式便限制和左右了领导们的动机。国际环境和/或更大聚合体影响了在每一个被考察国家中与模式相符的措施的加速。对于罗马尼亚，我们经验性地追溯了再生产和外部约束硬化的时候张力上升的方式。我们论证了在给定的地缘政治条件下张力如何导致社会爆炸；我们可以发现，相同的国际条件如何导致匈牙利加速的解体、政治转型、崩溃和经济转型。最后，我们可以追溯在中国网络的内部和外部条件正在如何刺激它有选择的绝对收缩加速，以及政党作为一种制度权力结构的缓慢解体，而不论其领导们的个体性格如何。

深入的分析不仅证实了模型，而且通过在所有三个案例中揭示几个更加彻底的相关性而精练了模型：网络内再生产约束硬化总是诱导决策者的

行为。案例研究强调，经济减速或下滑是结构性约束的迹象。经济政策改变、内部权力冲突、改革、分权化、决策自由化、多元化、倒闭、私有化、吸引私有资本的驱动力、资本逃离，是对再生产约束硬化的反应所引致的。这也清楚地表明，这些反应有力地影响了网络内权力再分配、网络解体和新子域的演进。相反，当（由于缺乏效率标准和自我相似行为）资源决策分权化刺激通货膨胀和投资过热、需要用行政措施限制它们的时候，发生了紧缩。模式特征体现为，与模式不相符的工具（例如，自我解体型模式和自身撤离型模式中的强制性资源调配努力，或自我掠夺型模式中的自由化）很快就与形式相符了，然而那些与模式相符的工具（自我掠夺型模式中的集权化、自我解体型模式中的合并、自我撤离型模式中的分权化）则反应过于强烈。体制动态运行中的这些微妙特征强化了这样的论点：在研究政党－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逻辑以及它们自我再生产和转型的原因和结果时，我们不能忽视结构性制度背景。

总之，借助于 IPS 模型，基于单个政党－国家与经济决策者的关系，我们以上描述了政党－国家运行和变迁的政治－经济－社会逻辑。利用 IPS 模型和案例研究，我们阐明了权力分配的自我相似性和特征模式。它们强调，制度化权力关系的背景揭示了政党－国家结构及动态运行上的自我相似性，运行方式出现差异的结构和动态运行原因，以及转型的典型特征。IPS 模型提供了一种背景基础，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可以区分出结构的自我相似性（在时间上、在空间上、在不同层级聚合体、在不同条件下）、结构特征的差异。除了个体特征之外，在这种背景中，我们可以揭示决策者的政治理性动机和经济行为的结构及动态运行背景、增长动力和资源获取机会的不平等。类似地，这有助于指出在模式内、模式间权力关系的差异，以及体制的转变。在解释资源攫取的不同工具的使用和作用的时候，在揭示实施和忽视改革以及改革的位置、步伐、顺序和政治条件的时候，它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因素。对于自我再生产期间缺乏效率约束、体制凝聚力、暂时性体制崩溃和恢复、确定性的崩溃、平滑和猛烈的崩溃的原因，它是一个主要的解释性背景。它也可以澄清转型顺序上的差异，即，政党－国家的要素解体和新体制的子域的演进的顺序上的差异。IPS 模型分析有助于理解分权化、集权化的原因和结果，以及权力分配的暂时

变化或在类似条件下稳定的自我再生产的原因和结果。它使我们可能操作转型的因素，把它们当作组合的解体和演进，以及这种解体和演进的不同的具体类型。基于这种背景，我们可以揭示经济转型的不同政治条件、政治转型的不同经济条件、不同的机动空间和战略决策空间、影响结构约束和外部约束的个体战略的不同机会以及这些约束对结构的影响。最后，基于这种背景，我们揭示了根据内部和外部约束而实行调整期间的自我耗竭的结构和动态运行原因及其差异。